

陈金生 著

古代思想家傳

中外名文传记
吉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古代思想家传

陈金生 主编

目 录

前言	陈金生 (1)
孔子世家	
——《史记》卷四七	梁运华译 (1)
老子、庄子、韩非传	
——《史记》卷六三	梁运华译 (41)
仲尼弟子传	
——《史记》卷六七	陈金生译 (55)
孟子、荀卿传	
——《史记》卷七四	梁运华译 (87)
陆贾传	
——《史记》卷九七	梁运华译 (96)
董仲舒传	
——《汉书》卷五六	梁运华译 (103)
司马迁传	
——《汉书》卷六二	赖长扬译 (141)
桓谭传	
——《后汉书》卷五八	梁运华译 (178)

王充、王符、仲长统传

——《后汉书》卷七九 梁运华译 (188)

嵇康传

——《晋书》卷四九 何双生译 (234)

向秀传

——《晋书》卷四九 何双生译 (247)

范缜传

——《梁书》卷四八 梁运华译 (251)

朝愈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刘林译 (266)

刘禹锡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刘林译 (287)

柳宗元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刘林译 (296)

欧阳修传

——《宋史》卷三一九 姚汉荣译 (300)

王安石传

——《宋史》卷三二七 江小涛译 (319)

周敦颐传

——《宋史》卷四二七 陈金生译 (343)

程颢传

——《宋史》卷四二七 陈金生译 (349)

程颐传

——《宋史》卷四二七 陈金生译 (361)

朱熹传

- 《宋史》卷四二九 陈金生译 (374)
- 程大昌传**
- 《宋史》卷四三三 夏经林译 (417)
- 陆九龄传**
- 《宋史》卷四三四 曲安京译 (424)
- 陆九渊传**
- 《宋史》卷四三四 陈金生译 (429)
- 胡安国传**
- 《宋史》卷四三五 吴言译 (437)
- 真德秀传**
- 《宋史》卷四三七 吴言译 (454)
- 魏了翁传**
- 《宋史》卷四三七 吴言译 (470)
- 刘因传**
- 《元史》卷一七一 吴言译 (483)
- 吴澄传**
- 《元史》卷一七一 吴言译 (492)
- 王守仁传**
- 《明史》卷一九五 陈金生译 (500)
- 罗钦顺传**
- 《明史》卷二八二 孙剑译 (527)
- 陈献章传**
- 《明史》卷二八三 孙剑译 (532)
- 康有为传**
- 《清史稿》卷四三七 何双生译 (537)

孙奇逢传

——《清史稿》卷四八〇…………… 何双生译 (546)

黄宗羲传

——《清史稿》卷四八〇…………… 何双生译 (550)

李颀传

——《清史稿》卷四八〇…………… 何双生译 (560)

颜元传

——《清史稿》卷四八〇…………… 何双生译 (564)

龚自珍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邱文龙译 (567)

魏源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邱文龙译 (569)

方以智传

——《清史稿》卷五〇〇…………… 何双生译 (572)

傅山传

——《清史稿》卷五〇一…………… 魏连科译 (576)

前言

本书共从《二十五史》中遴选了 41 篇传记，加以今译。入选的传主首先是各时代最著名、影响最大或较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次是在当时的影响虽不大但在今天看来在哲学思想史上有一定重要性的人物。此外也酌量选入了一些著名经学家（含小学家）。还有一些人物本来应当入选，但由于他们在《二十五史》中没有传记，只好付之阙如。各篇传记大体按传主的时代先后排列。

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不少堪称世界文化名人，如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等。今天我们弘扬中华文化，不但应阅读他们的著作和研究他们的思想，而且也应当了解他们一生的为人与事迹，这反过来对正确了解和研究他们的思想也很有助益。本书就是主要为了帮助青年与部分老干部阅读这些传记而编写的。这里我想对读者强调的一点就是：希望读者在阅读这些传记之前，对任何一位思想家都不要怀有先入之见，包括不要受某些哲学思想史专著中长期流行过的某些成见乃至偏见的影响和支配，独立地、客观地来阅读、思考和分析，这样也许会有更多的新认识和新收获。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编纂，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向

出版社提交了一份思想家传记选目，自己动手今译其中八、九篇，联系一两位朋友各自今译了一部分，此外也由出版社自行组织其他学者今译了一部分。对别人的译文，有的我未过目，看过的也极少改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持各自的理解和独特的文字风格，但也可能造成某些不统一的缺点。对其中错误和缺点，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陈金生

1994年8月28日

孔子世家

——《史记》卷四七

【说明】孔子（前 551—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至孔子时已贫穷卑贱。孔子从小便讲究礼节，长大后曾做过管理仓库和牲畜的小吏。三十五岁时到过齐国，四十一岁才返回鲁国。四十二岁时，鲁定公继位，因他知识渊博，已有人视他为圣人。因不被任用，便在家整理诗书礼乐，四方从学的人很多。五十岁时，鲁定公任他为中都宰，后升为司空、大司寇。五十六岁时由大司寇代理国事，因不满意在鲁国执政的季桓子，于是周游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共十四年，都不被任用，若丧家之犬，只能回到鲁国，整理古典文献，教育弟子，直至逝世。他的言论和事迹，主要见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编辑的《论语》。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经过董仲舒等人的修改补充而逐渐系统化，从汉以后，成为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本人也被尊崇为至圣先师。对孔子思想的评价，至今仍众说纷纭，原因在于评论者各自的立场与出发点不同，但他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之一，这是

毫无疑问的；他的思想的主体有利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读本篇传记，可以简略地了解孔子的生平及思想概貌。

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陬邑。他的上辈是宋国人，名叫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与姓颜的女子在不符合礼仪的情况下结合而生孔子。孔子的出世是在尼丘山进行祷告的结果。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 551）年。生下来头顶凹陷，所以取名叫丘。字仲尼，姓孔。

孔丘出生不久叔梁纥便死了，埋葬在防山。防山在鲁国的东边，因此孔子搞不清他父亲埋葬的地方，母亲对此也避而不谈。孔子小时候游戏，常常陈列礼器，讲究礼节法度。孔子母亲去世，便将灵柩停放在五父之衢，因为他十分谨慎。陬人辄父的母亲告诉孔子父亲的墓地，然后前往合葬于防。

孔子穿着丧服，季氏设宴款待士人，孔子前往参加。阳虎指责说：“季氏款待士人，不敢款待你。”孔子因此退下。

孔子十七岁，鲁国大夫孟厘子病危，告诫他的嗣子懿子说：“孔丘，是圣人的后代，前辈被宋国所灭。他的十世祖弗父何开始具有宋国，可是又将继承权让给了宋厉公。到七世祖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三次接受任命而一次比一次谦恭，所以鼎上镌刻的铭文说：‘第一次接受任命便低头，第二次接受任命便曲背，第三次接受任命便弯腰，沿着墙边迅速前行，也没有人敢欺侮我。在鼎里煮饭，在鼎里熬粥，以维持我的生活。’他是如此谦恭。我听说圣人的后代，即使不做国君，也必定出现飞黄腾达的人。如今孔丘年少好礼，大

概是要飞黄腾达的人吧！我就要死了，你一定要拜他为师。”厘子死后，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到孔子那里学礼。这一年，季武子死了，平子接替了职位。

孔子贫穷而且卑贱。等到长大，曾经做季氏的管理仓库的小吏，实物账目完全相符；曾经做管理牲畜的小吏，牲畜繁衍生息。因此当了司空。不久离开鲁国。在齐国遭指责，在宋国、卫国被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处于困境，于是返回鲁国。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人们都叫他“长人”而对他另眼相看。鲁国重新优待他，因此返回鲁国。

鲁人南宫敬叔向鲁君进言说：“请帮助孔子到周。”鲁君送他一乘车，两匹马，一位小童同行，到周请教礼，因而见到老子。辞行，老子送他说：“我听说富贵的人送人是给钱财，仁德的人送人是用言语。我得不到富贵，盗用仁人的名义，用言语为你送行：‘耳聪目明观察入微却接近死亡的人，是喜好议论别人的人；渊博善辩无所不包却危害自身的人，是揭发别人罪过的人。作为人子不要表现自己，作为人臣不要表现自己。’”孔子从周返回到鲁国，从学的人遂渐增多起来。

这个时候，晋平公荒淫，六卿专权，向东征伐诸侯；楚灵王兵强，欺压中原各国；齐国强大而靠近鲁国。鲁国弱小，依附于楚国则晋国发怒；依附于晋国则楚国来讨伐；不防备齐国，齐国的军队便侵犯鲁国。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孔子大概三十岁了。齐景公和晏婴来到鲁国，景公问孔子说：“过去秦穆公国家弱小，地方偏僻，他称霸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秦穆公国家虽小，他的志向很大；地方虽然偏僻，行为公平正直。亲身提拔百里

奚，赏他大夫的爵位，从囚犯中起用，交谈三天，便把政事托付给他。凭借这些取天下，即使称王也是可以的。他称霸，成就太小了。”景公十分高兴。

孔子三十五岁，季平子与郈昭伯因为斗鸡的缘故得罪鲁昭公，昭公带领军队攻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同进攻昭公，昭公兵败，逃到齐国，齐国将昭公安排在乾侯地方居住。事后不久，鲁国内乱。孔子到齐国，做高昭子的家臣，想因此见到景公。他和齐国的太师研讨音乐，听到演奏《韶》乐，便进行学习，几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齐国人十分赞赏他。

景公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父要像父的样子，子要像子的样子。”景公说：“太好了！的确，如果君不像君的样子，臣不像臣的样子，父不像父的样子，子不像子的样子，虽有粮食，我难道能吃到吗！”

另一天又再次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为政在于节省开支。”景公十分高兴，想要把尼溪的田分封孔子。晏婴进见说：“儒者八面玲珑却不能遵循法度；傲慢随便，不能用来驾驭臣民；看重丧事，放任哀思，破财厚葬，不能用来指导风俗；游说乞讨，不能用来治理国家。自从大贤绝迹，周室已经衰落，礼乐残缺为时已久。如今孔子推崇容颜服饰的阔绰，使上下尊卑的礼节十分繁琐，进退快慢的规定过分复杂，世代不能穷尽他的主张，当年不能弄清他的礼教。您想用他以便改变齐国的风俗，却不可能首先在平民百姓中推广。”

后来景公恭敬地接见孔子，没有请教他主张的礼仪。

有一天，景公留住孔子说：“用对季氏的礼节招待您，我办不到。”于是用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礼节招待孔子。齐国大夫想杀害孔子，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景公说：“我老了，不能任用您了。”孔子于是启行，返回鲁国。

孔子四十二岁，鲁昭公死在乾侯，鲁定公继位。定公继位的第五年，夏天，季平子死，桓子嗣立。季桓子打井得土缶，里边有像羊的动物，询问仲尼时说“得狗”。仲尼说：“据我所知，是羊。我听说，树木山石中的怪物是夔、魍魉，水中的怪物是龙、罔象，土中的怪物是罔羊。”

吴国讨伐越国，毁坏会稽山，得一节骨头要一辆车才能装下。吴国派使臣问仲尼：“什么的骨头最大？”仲尼回答：“禹招群神到会稽山，防风氏最后到，禹将他杀死并暴尸。他的骨节要一辆车才能装下，这算最大的了。”吴国的客人问：“谁是神？”仲尼回答：“名山大川的神足以管理天下，掌管名山大川祭祀的是神，掌管社稷祭祀的是公侯，他们都属于称王的人。”客人问：“防风氏掌管什么祭祀？”仲尼回答：“汪罔氏的君主掌管封山、禺山，称厘姓，在虞、夏、商三代称汪罔，在周代称长翟，如今叫他大人。”客人问：“大人有多高？”仲尼回答：“僬侥氏高三尺，是最矮的了。高的不超过僬侥氏的十倍，是最高的了。”于是吴国的客人说：“多么伟大的圣人啊！”

桓子宠幸的臣子名仲梁怀，与阳虎有矛盾。阳虎想赶走仲梁怀，公山不狃阻止他。这年秋季，仲梁怀益加骄横，阳虎拘捕仲梁怀。桓子怒，阳虎因而囚禁桓子，一起订了盟约才将他释放。阳虎从此益加轻视季氏。季氏也僭越鲁国公室，

作为陪臣而执掌鲁国政事，因此鲁国从大夫往下都背离正道，所以孔子不做官，回家整理诗书礼乐。弟子越来越多，从远方到来，没有不跟他学习的。

定公八年（前 502），公山不狃在季氏那里很不得意，依靠阳虎作乱，想废除桓公的三个嫡传（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另立桓公的旁支中阳虎平素所喜欢的人，于是拘捕季桓子。桓子采用欺骗手段，逃脱出来。

定公九年（前 501），阳虎失败，逃到齐国。这时孔子五十岁。

公山不狃盘踞费邑背叛季氏，派人请孔子去。孔子坚守正道已经很久了，过分斯文而无从施展，没有人能任用他，于是说：“周文王、武王从丰、镐兴起而称王天下，如今费邑虽小，也许差不多吧！”很想前往。子路不高兴，阻止孔子。孔子说：“那个请我去的人，难道是开玩笑吗？如果任用我，将建立一个东方的周朝！”但也终究没有去。

这以后，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仅一年时间，四方都效法他。从中都宰升为司空，从司空升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前 500）春季，与齐国媾和。夏季，齐国大夫黎鉏向景公进言：“鲁国任用孔丘，势必危害齐国。”于是派使臣通知鲁国举行友好会盟，会于夹谷。鲁定公准备乘坐公车抱友好态度前往。孔子主持赞礼事宜，说：“我听说对待文事一定要有武备，对待武事一定要有文备。古时候诸侯离开国土，必须配齐官员跟随。请配备左右司马。”定公说：“好。”配备左右司马。与齐侯在夹谷会盟，筑盟坛设两君坐位，土质台阶三级，按普通会晤的礼节相见，揖让而后登坛。相互

敬酒的礼仪结束，齐国的主管官吏快步向前说：“请演奏各地的乐曲。”景公说：“好。”于是手持各种旗帜武器的人鼓噪而至。孔子快步向前，抢步登上台阶，还差一级，挥袖说道：“我们两国君主举行友好会盟，夷狄的乐队到这里干什么！请命令主管官吏执法！”主管官吏让他们退下，无人离开，孔子就向左右看晏子和景公。景公问心有愧，挥手将他们赶开。不一会儿，齐国的主管官吏快步向前说：“请演奏宫中的乐曲。”景公说：“好。”优伶侏儒戏耍而来。孔子快步向前，抢步登上台阶，还差一级，说：“匹夫而迷惑诸侯的罪当死！请命令主管官吏执法！”主管官吏使用刑法，手足异地。景公惶恐不安，知道理亏。回国后大为恐慌，告戒他的群臣说：“鲁国用君子的正道辅佐他们的君主，可你们只用夷狄的主张教导我，致使得罪了鲁君，怎样处理这件事呢？”主管官吏向前回答说：“君子有过失就用实实在在的东西表示悔过，小人有过失就用花言巧语表示悔过。您如果对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就用实实在在的东西表示悔过。”于是齐侯便将侵夺来的鲁国的郕、汶阳、龟阴的田地归还鲁国以表示谢过。

定公十三年（前497）夏季，孔子对定公说：“大臣没有私储的军队，大夫不筑高大的城墙。”他让仲由做季氏的家臣总管，准备毁掉三桓的三座城邑的城墙。因此叔孙氏首先毁掉郈邑。季氏准备毁掉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人袭击鲁国都城。定公与季孙、叔孙、孟孙三人躲进季氏的宫中，登上武子台。费人进攻，没有得手。有人攻到定公侧面的台下，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台迎敌，费人败退。都城的人进行追击，在姑蔑将费人打败。公山不狃、叔孙辄二人逃到

齐国，于是毁掉费邑。准备毁掉成邑，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毁掉成邑，齐国人肯定直抵鲁都北门。况且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我不愿毁掉。”十二月，定公包围成邑，没有攻下。

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代理国事，显得十分高兴。弟子说：“听说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说：“有这种说法。不是说‘赞赏那些能放下架子的人’吗？”因此处死破坏政事的鲁国大夫少正卯。他参与过问国家政事三个月，卖猪羊的不敢漫天要价，男女行人在路中分开走，路不拾遗，四方客人到达都邑的用不着向主管官吏求情，都为他们提供方便满意而归。

齐国人听说后很担忧，说：“孔子主持政事必定称霸，称霸的话，那么我们的国土离他最近，我们将首先被吞并了。何不割地给他？”黎鉏说：“请先试着破坏他，破坏他还不行，就割地，难道还晚吗？”于是选择齐都城中的美女八十人，都穿漂亮的衣服并学会跳《康乐》舞，毛色斑斓的马一百二十匹，赠送鲁君。齐国将女乐和文马排列在鲁国都城南面的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前往观看多次，准备接受，便对鲁君说要沿大路外出游玩。他前往观看了一整天，荒废了政事。子路说：“先生可以离开了。”孔子说：“鲁国现在将要祭天，如果把祭肉分给大夫，那么我还可以留下。”桓子终于接受了齐国的女乐，多日不理政事；祭天，又不把祭肉分给大夫。孔子于是离开，在屯地留宿。师己送行，说：“那个人乃是无罪的。”孔子说：“我朗诵诗歌可以吗？”朗诵诗歌的人说：“那个妇人的口，能够使人出走；那个妇人的禀报，足以让人败亡。优哉游哉，只

好如此度时光。”师己还回，桓子说：“孔子又说些什么？”师己如实禀告。桓子十分感慨地叹道：“那个人归罪于我是因为这一群婢女的缘故吧！”

孔子于是到卫国，住在子路内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领多少俸禄？”回答说：“俸粮六万斗。”卫国人也供给粮食六万斗。没住多久，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说孔子的坏话。灵公派公孙余假频繁进出。孔子害怕获罪，住了十个月，离开卫国。

准备到陈国，经过匡城。颜刻为车夫，用手中的马鞭指道：“从前我进入这里，是从那个缺口。”匡人听到这番话，以为是鲁国的阳虎。阳虎曾经虐待匡人，匡人因此就拦住孔子。孔子的形状类似阳虎，在这里被围了五天。颜渊后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您在，我怎敢死！”匡人围孔子更加紧急，弟子十分恐慌。孔子说：“文王死后，文化不都在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消灭这种文化，后来的人是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的。上天既没有消灭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孔子让跟随的人做宁武子的家臣留在卫国，然后得以离开。

离开后立即经过蒲乡。一个月后，回到卫国，住在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叫南子的，派人对孔子说：“四方的君子不觉得是羞辱想与我们的君主结为兄弟的，一定要会见我们君主的夫人。我们君主的夫人愿意相见。”孔子辞谢，不得已才见她。夫人在葛幕里。孔子进门，向北叩拜。夫人从幕后回拜两次，玉环玉佩玎玲作响。孔子说：“我原本是不愿意见的，和她相见是出于礼节性的应酬。”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

“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上天惩罚我！上天惩罚我！”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灵公与夫人同车，宦官雍渠陪乘，外出，让孔子乘车随后，招摇过市。孔子说：“我从未见过喜好美德像喜好美女一样的人啊！”因此感到羞愧，离开卫国，经过曹国。这一年，鲁定公逝世。

孔子离开曹国到宋国，和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魋想杀孔子，将那棵大树拔掉。孔子离开。弟子说：“可以赶快走了。”孔子说：“上天在我身上造就了美德，桓魋他能把我怎样！”

孔子到郑国，和弟子相互走散，孔子独自站立在城郭的东门。郑国有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但是从腰往下比禹短三寸，无精打采好像丧家狗。”子贡如实禀报孔子。孔子欣然笑道：“外表的描绘，是无关紧要的。但说像丧家狗，是这样啊！是这样啊！”

孔子于是到陈国，住在司城贞子家。过一年多，吴王夫差讨伐陈国，夺取三座城邑才离去；赵鞅讨伐朝歌；楚国围困蔡国，蔡国迁移到吴国；吴国在会稽打败越王句践。

有一头隼落在陈国朝廷然后死去，楛木箭将它贯穿，石质箭头，箭杆长一尺八寸。陈湣公派使臣问仲尼。仲尼说：“隼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这是肃慎的箭。从前武王战胜商纣，道路沟通九夷百蛮，让各自用他们的特产来贡献，使他们不要忘记本职工作。因此肃慎贡献石质箭头的楛木箭，长一尺又八寸。先王想显示自己的美德，将肃慎箭分给长女大姬，许配虞胡公并分封他们在陈国。将珍贵的玉器分给同姓，使亲

属间感情加深；将远方的官职分给异姓，使不要忘记归顺。所以将肃慎箭分给陈国。”试着在老仓库中寻找肃慎箭，果然将它找到。

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适值晋楚两国争强，更番讨伐陈国。及吴国侵犯陈国，陈国经常遭到劫掠。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那里的学生志大而轻率，没有放弃他们原来那种只知进取的毛病。”因此孔子离开陈国。

经过蒲地，适值公叔氏凭借蒲地叛乱，蒲人拦截孔子。弟子有名公良儒的，用五辆私车跟随孔子。他为人善良贤能，有勇气和力量，说道：“我从前跟随您在匡城遇到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遇到危难，这是命里如此吧！我与您再次遭受危难，宁可战斗而死。”战斗非常激烈。蒲人害怕，对孔子说：“如果不到卫国，我放你出去。”和他订立盟约，他将孔子从东门放出，孔子便到卫国。子贡问：“盟约可以违反吗？”孔子回答：“被迫签订的盟约，神是不会理睬的。”

卫灵公听说孔子到来，十分高兴，到郊外迎接。问道：“蒲可以讨伐吗？”回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夫认为不可以。如今的蒲地，卫国靠它抵御晋国和楚国，用卫国讨伐它，岂不是不可以吗？”孔子回答：“那里的男子有必死的决心，妇人有保卫西河的愿望。我讨伐的不过四五个人，”灵公说：“好。”但没有讨伐蒲。

灵公年迈，对政事十分厌倦，不用孔子。孔子十分感慨地叹道：“如果有用我的，一年便走上正轨，三年就见到成效。”孔子离开卫国。

佛肸为中牟长官。赵简子进攻范氏、中行氏，讨伐中牟。

佛肸叛乱，派人召请孔子。孔子想去。子路说：“我听您说过，‘本人亲自干坏事的，君子不到他那儿去’。如今佛肸凭借中牟亲自叛乱，您想去，怎样解释呢？”孔子回答：“是说过这样的话。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只被挂着而不被食用呢？”

孔子击磬。有挑着草筐从门口经过的，说：“有心事啊，是在击磬吧！郢郢作响，是没人了解自己吧，那就算了。”

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十天了还原地不动。师襄子说：“可以增加乐曲了。”孔子回答：“我已熟悉乐曲的调子，还未掌握乐曲的节奏啊。”过一段时间，师襄子说：“已熟悉乐曲的节奏，可以增加乐曲了。”孔子回答：“我还未掌握乐曲蕴涵的志向啊。”过一段时间，师襄子说：“已掌握乐曲蕴涵的志向，可以增加乐曲了。”孔子回答：“我还未掌握乐曲作者的为人啊。”过一段时间，好像在默默地用心思考，好像在愉快地仰望而志在远方，说：“我掌握乐曲作者的为人了，黝黑的皮肤，颀长的身躯，眼睛仰视，好像天下的王，不是文王难道还有谁能创作这首乐曲呢！”师襄子离开坐位一拜再拜，说：“老师原本说是《文王操》啊！”

孔子在卫国既然得不到任用，准备向西见赵简子。抵达黄河便听到奚鸣犊、舜华的死信，孔子临河而叹道：“多美的水啊，浩浩荡荡！我不能渡过它，是命中注定的吧！”子贡快步向前问：“敢问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奚鸣犊、舜华，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未得志的时候，须要这两个人而后执政；等他已经得志，杀死他们才执政。我听说，剖

胎杀幼那么麒麟不会来到效外，竭泽而渔那么蛟龙不再兴云降雨，覆巢毁卵那么凤凰便停止飞翔。为什么呢？君子忌讳伤害他的同类啊！那些鸟兽对于不义行为尚且知道回避，何况我呢！”于是回到陬乡休息，创作《陬操》以表示哀悼。又返回卫国，进住蘧伯玉家。

后来，灵公问军队阵法。孔子回答：“礼节方面的事情还曾经听说过，军队方面的事情从未学习过。”第二天，和孔子谈话，看见飞雁，抬头仰望，神色不在孔子。孔子于是离开，又到陈国。

夏季，卫灵公逝世，立孙子辄，这就是卫出公。六月，赵鞅送卫太子蒯聩到戚地。阳虎让卫太子披麻戴孝，八个人身穿丧服，假装是从卫国前来迎接的，哭着进城，于是住了下来。冬季，蔡国迁移到州来。这一年是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已经六十岁了。齐国帮助卫国包围戚地，是因为卫国太子蒯聩在那里的缘故。

夏季，鲁桓公、厘公的庙遭火灾，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国，听到鲁国宗庙着火，说：“火灾必定发生在桓公、厘公两庙吧！”结果真是这样。

秋季，季桓子得病，坐在人拉的车里察看鲁国都城，十分感慨地叹道：“从前这个国家几乎兴盛起来了，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没有兴盛起来。”回顾他的继承人康子说：“我死了，你肯定执掌鲁国朝政。执掌鲁国朝政，必须召请仲尼。”几天以后，桓子逝世，康子代立。安葬完毕，想召请仲尼。公之鱼说：“从前我们已故的君主任用他半途而废，结果被诸侯耻笑。如今又任用他，不能善始善终，这又会被诸侯耻笑。”

康子问：“那么召请谁好呢？”公之鱼回答：“必须召请冉求。”因此派使臣召请冉求。冉求将行，孔子说：“鲁国人召请冉求，不是一般地使用他，而是要重用他。”这一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那里的学生志大而轻率，表现得文采斑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培养他们。”子赣知道孔子想回去，为冉求送行，就告诫说：“如果被任用，就将孔子请回去。”

冉求走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迁移到蔡国。蔡昭公打算到吴国去，是因为吴国召请他。过去昭公欺骗他的臣属要迁移到州来，后来打算前往，大夫们害怕又要迁移，公孙翩射死昭公。楚国侵犯蔡国。秋季，齐景公逝世。

第二年，孔子从蔡国到叶城。叶公问政治，孔子回答：“政治在于使远方归附、近处顺从。”后来，叶公向子路问孔子，子路不回答。孔子听到后，说：“仲由，你何不回答说，‘他的为人，学习道不知疲倦，教诲人不知厌烦，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衰老行将到来’，如此而已。”

离开叶城，返回蔡国。长沮、桀溺协同耕种，孔子以为是隐士，派子路去问渡口。长沮问：“那位驾车的是谁？”子路回答说：“是孔丘。”问：“这就是鲁国孔丘吗？”回答说：“是。”长沮说：“这就是知道渡口的了。”桀溺对子路说：“您是谁？”回答说：“是仲由。”问：“您是孔丘的门徒吗？”回答说：“是。”桀溺说：“庸俗的人天下都是，你跟谁去改变他们？况且与其跟随躲避庸人的人，还不如跟随躲避社会的人呢！”仍旧不停地平整土地。子路向孔子报告，孔子失望地说：“不能与飞禽走兽同群。天下都遵循道义，我孔丘使用不着去改变了。”

后来，子路独行，遇见扛锄草工具的老人，问：“您看见我的老师吗？”老人回答说：“四肢不会劳动，五谷分不清楚，谁是你的老师？”放下他的拐杖便去锄草。子路将这件事报告孔子，孔子说：“是隐士啊。”再返回去，已经不见了。

孔子迁移到蔡国的第三年，吴国讨伐陈国。楚国援救陈国，军队驻扎在城父。听说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楚国派人聘请孔子。孔子打算前往拜见致礼，陈、蔡大夫谋划说：“孔子是贤人，针砭的内容都切中诸侯的病痛。现在长期逗留在陈、蔡之间，各位大夫设计施行的都违背仲尼的想法。今天的楚国，是大国，前来聘请孔子。孔子被楚国任用，那么陈、蔡主事的大夫就岌岌可危了。”因此便一齐打发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和弟子不能行动，粮食断绝。跟随的人都病了，没有人能站起来。孔子讲课诵读弹琴唱歌毫不泄气。子路很不高兴地来看望说：“君子也会陷于困境吗？”孔子说：“君子陷于困境仍然坚持到底，小人陷于困境便无所不为了。”

子贡脸色也不好看。孔子问：“赐，你认为我是广泛学习而又牢牢记住的人吗？”答：“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对。我的言行是由一个基本观念贯串起来的。”

孔子知道弟子们心里很不高兴，于是召见子路而问道：“《诗经》上说：‘不是犀牛和老虎，却在旷野中出没。’我的主张错了吗？我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说：“细想起来我们还没有做到仁吧，所以人们不相信我们。细想起来我们还很不明智吧，所以人们阻止我们行动。”孔子说：“果真如此吗？由，假若具备仁德的人就必然得到人们的信任，哪里还

会有伯夷、叔齐呢？如果明智的人都必然行动自如，哪里还会有王子比干呢？”

子路退出，子贡入见。孔子说：“赐，《诗经》上说：‘不是犀牛和老虎，却在旷野中出没。’我的主张错了吗？我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子贡说：“老师的主张广大无边，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容纳老师。老师何不稍微收敛一些呢？”孔子说：“赐，出色的农夫能努力种好庄稼而不能保证获得好收成，出色的工匠能巧夺天工而不能保证人人心满意足。君子能完善自己的主张，使它纲举目张，使它条理分明，但不能保证被人容纳。如今你不完善你的主张却追求被人容纳，赐，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子贡退出，颜回入见。孔子说：“回，《诗经》上说：‘不是犀牛和老虎，却在旷野中出没。’我的主张错了吗？我为何落到这个地步？”颜回说：“老师的主张广大无边，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尽管如此，老师将它推广实行，不被容纳有什么坏处！不被容纳更能显出君子的本色！不完善自己的主张，这才是我们的耻辱。自己的主张既然已经十分完善但不被采纳，这是国君的耻辱。不被容纳有什么坏处！不被容纳更能显出君子的本色！”孔子十分高兴地笑道：“果真如此啊！颜氏的孩子，如果你十分富有，我当你的管家。”

于是派子贡到楚军驻地。楚昭王发兵迎接孔子，终于避免了这场危难。

楚昭王准备用七百里有户籍的地区分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说：“您的出使诸侯的使臣有像子贡这样的吗？”答：“没有。”“您的辅弼大臣有像颜回这样的吗？”答：“没有。”“您的将军

有像子路这样的吗？”答：“没有。”“您的行政长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答：“没有。”“况且楚国的先祖受封于周王朝，爵号子男才五十里。如今孔丘陈述三皇五帝的法度，阐明周公、召公的王业，您如果任用他，那么楚国哪里能够世代保持堂堂方数千里的领地呢？当年文王在丰地，武王在镐地，只有百里的君主终于称王天下。如果孔丘能够占有领地，又有贤明的弟子作为助手，并非楚国之福啊！”昭王这才打消了分封孔子的想法。这年秋季，楚昭王在城父逝世。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的旁边经过，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道德如此晦气！过去的无法挽回啊，未来的尚可弥补。算了吧，算了吧，当今的从政者危矣！”孔子下车，想和他交谈。他赶忙离开，孔子无法和他交谈。

因此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就是鲁哀公六年（前489）。

鲁哀公七年（前488），吴国与鲁国在缙地会见，吴向鲁索要一百头供祭祀用的牛。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康子派子贡前往，然后才得以制止。

孔子说：“鲁国、卫国的政事，有如亲兄弟一般相似。”这时，卫君辄的父亲没有被立为国君，流落在外，诸侯屡次对此加以指责。然而孔子的弟子大多在卫国做官，卫君想得到孔子来管理政事。子路问：“卫君等您去管理政事，您准备先做什么？”孔子回答说：“一定要首先辨正名分啊！”子路说：“果真如此的话，您就太迂腐了！这有什么好辨正的？”孔子说：“太放肆了仲由！名分不正那么说话就不成体统，说话不成体统那么事情就办不好，事情办不好那么礼乐就无法提倡，

礼乐无法提倡那么刑罚就会失当，刑罚失当那么老百姓连手脚都无处安放了。君子做事必定能名正言顺，说话必定能贯彻执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总是毫不苟且，如此而已。”

鲁哀公八年（前487），冉有替季氏统率军队，和齐国在郎地交战，战胜了齐国。季康子问：“您统率军队的本领，是学来的？还是天生的？”冉有回答说：“在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问：“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回答说：“孔子用兵，师出有名，向老百姓宣讲，向鬼神询问，都感到满意。我在这方面达到的水平，即使能增加千社那么广大的土地，老师也不会给予肯定的。”康子问：“我想召请他，行吗？”回答说：“想召请他，就不要用小人包围他，那才行啊。”卫国的孔文子准备攻打太叔，向仲尼请教计策。仲尼推辞不知道，回来后便下令备车而离开，说：“鸟能够选择树木，树木难道能够选择鸟吗！”文子再三挽留。适值季康子驱逐公华、公宾、公林，用礼物迎接孔子，孔子回到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共十四年然后返回鲁国。

鲁哀公问政治，孔子回答说：“政治在于选用臣属。”季康子问政治，孔子回答说：“将正直的人提拔到奸邪的人上面，那么奸邪的人也会变得正直。”康子害怕盗贼，孔子说：“如果您不贪心，即使鼓励他们也不会去偷盗。”但鲁国终究不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追求做官。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朝衰微而礼乐被废弃，《诗》、《书》残缺。他跟踪寻求夏商周三代的礼制，编辑《书传》，上起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缪公之时，顺序记述他们的事迹。他说：“夏代的礼制我能叙述出来，可惜杞国已不足以证实。

殷代的礼制我能叙述出来，可惜宋国已不足以证实。如足以证实，那么我就能引来作证了。”考察殷代、夏代礼制的增减变化，说：“今后即使是一百代的礼制也是可以预知的，根据是都离不开在文采与质朴之间增减变化。周朝的礼制借鉴于夏、殷两代，文采多么丰富啊！我赞同周朝的礼制。”因此《书传》、《礼记》都出自孔氏。

孔子对鲁国太师说：“音乐的概貌是可以预先把握的。乐曲开始演奏，声音十分丰满，展开以后，十分和谐，十分明畅，十分缠绵，一首乐曲到此为止。”“我从卫国返回鲁国，才完成了对音乐的研究和整理，《雅》乐、《颂》乐都各自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古时候《诗》有三千多篇，直到孔子，删去其中重复的内容，保留可以用于礼义教化的篇章，最早的选录自商代的始祖契和周代的始祖后稷，其次的内容描述了殷代、周代的盛况，直到反映周幽王、周厉王的腐败从淫乱开始，所以说：“《关雎》全篇作为《风》的开始，《鹿鸣》为《小雅》的开始，《文王》为《大雅》的开始，《清庙》为《颂》的开始。”共三百零五篇，孔子都一一弹琴歌唱，目的在于使它们与《韶》、《武》、《雅》、《倾》之音相符合。

礼乐从此以后才能够得以阐述，用来完善王道，构成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

孔子晚年喜欢研究《周易》，论述《彖》、《系》、《象》、《说卦》、《文言》。他阅读《周易》，编连竹简的皮绳都断了三次。说：“再给我几年时间，如果能这样，我对于《周易》就可以文质兼备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进行教授，弟子差不多三千人，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这样的弟子，接受过长期教育的特别多。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弟子：书本知识，社会实践，待人忠诚，坚守信用。他克服了四种毛病：不主观，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他十分小心谨慎对待的是：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很少谈论功利、命运和仁德。他教育弟子，不到弟子苦苦思索而不得要领的时候，决不进行启发诱导；举一件事而不懂得类推以知道更多方面的事，就不再反复讲解了。

孔子在乡里和街市，恭恭敬敬地好像不善言谈的人。孔子在宗庙和朝廷，谈吐头头是道，只是特别小心谨慎罢了。上朝时，同上大夫说话，态度和颜悦色；同下大夫说话，表情严肃认真。走进朝廷大门，表现得十分恭顺，快步向前，显得格外小心。君主叫他去接待宾客，脸露出庄重的颜色。君主下令召见，不等备车已徒步动身。

鱼腐，肉烂，切割不得法，不吃。坐位与身分不符，不坐。在死了亲属的人身旁进餐，从未吃饱过。这一天哭泣过，就不再唱歌。看见穿孝服的人、盲人，即使是孩童，也一定要深表同情。

孔子说：“几个人走在一起，肯定可以找到值得我效法的人。”“不修养品德，不研究学问，听到正义的言行不能看齐，有错误缺点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最为忧虑的。”如果有人唱歌，唱得很好，他就让人家再唱一遍，然后跟着一起唱。

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鬼神。

子贡说：“老师在诗书礼乐方面的学问，是能够听到的。

老师在天道、天性和天命方面的言论是不能够听到的啊。”颜渊十分感慨地叹道：“老师的学问十分高深，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力钻研越感到深。看起来好像在前面，忽然间又到后面去了。老师善于有步骤地引导每个人进行学习，他用文化知识来丰富我，用礼仪制度来约束我，使我欲罢不能。已经竭尽我的才力，而老师指引的目标好像仍旧在面前高高耸立。虽然想努力攀登，又不知如何下手才好。”达巷地方的人说：“孔子真伟大啊！知识渊博，而不追求某种名声。”孔子听到后说：“我做点什么呢具体工作呢？赶马车吗？射箭吗？我赶马车好了。”牢说：“孔子说：‘我不被任用，所以懂得不少技艺。’”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季，在大野地方狩猎。叔孙氏的车夫辄商获得一头野兽，认为是不祥之物。仲尼看后，说：“是麒麟啊。”这才将它取走。孔子说：“黄河没有出现图，雒水没有出现书，我这一辈子算完了啊！”颜渊逝世，孔子说：“老天不让我活了！”等到西部地区打猎看见麒麟，说：“我的主张彻底完了！”十分感慨地叹道：“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问：“没有人了解您，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说：“我不是在怨恨天，也不是在归咎人，我一生在广泛学习社会常识并进一步探索治乱的原因，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使自己的身体遭到侮辱，这就是伯夷和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和少连不仅降低了志向，而且侮辱了身体。”又说：“虞仲和夷逸隐居而不发表议论，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保持纯洁相一致，他们的自暴自弃与遵循权变相符合。”又说：“我却与他们不一样，坚持我的主

张，进退自如。”

孔子说：“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君子最痛心的是死后而名声不被人称颂啊！我的主张无法推行了，我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被后世遗忘呢？”于是根据鲁国史记写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共十二位君主。立足于鲁，亲附于周，溯源于殷，穿插夏、商、周三代。文辞简洁而意旨宏博。因此吴国、楚国的君主自称为王，而《春秋》将它们贬称为“子”；践土会盟实际上是召请周天子，而《春秋》忌讳这件事，说成是“天子在河阳狩猎”。目的在于推广这类主张，用来纠正当代的错误做法，希望贯穿于贬低压抑中的原则，被后代称王天下的君主发扬光大。《春秋》提倡的原则得到施行，那么天下的乱臣贼子就会十分惧怕了。

孔子在位听理诉讼，有的判案文字可与别人共同商量，不是完全由自己决定。至于写作《春秋》，该写的写，该删的删，像子贡这样的弟子也不能参与一句话。弟子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代了解我孔丘的是根据《春秋》，而怪罪我孔丘的也是根据《春秋》。”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子路死在卫国。

孔子得病，子贡请求进见。孔子正好将拐杖放在背后悠闲自得地呆在门口，说：“赐，你怎么这样晚才来！”孔子于是十分感叹，唱道：“泰山要毁坏了吧！梁柱要摧折了吧！哲人要病危了吧！”因此泪下。对子贡说：“天下没有德政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人能归心于我。夏朝人将灵柩停放在东边的台阶上，周朝人停放在西边的台阶上，殷朝人停放在两根柱子的中间。昨晚我梦见坐在两根柱子中间受祭奠，我的祖

先是殷朝人啊。”过了七天，孔子逝世。

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己丑日逝世。

鲁哀公哀悼他说：“老天不发慈悲，连一位老人也不肯暂且留下，抛下我一人管理国家，孤独的我沉浸在痛苦之中。呜呼哀哉！尼父，不要牵挂！”子贡说：“您大概不会在鲁国死去吧！老师的话说：‘礼节丧失就变得昏庸，名分丧失就出现过错。丧失志向是昏庸，丧失本分是过错。’活着的时候不任用，死了以后却哀悼他，是一种无礼行为。自称‘我一人’，不符合自己只是一个诸侯的身分。”

孔子葬于鲁国都城北面的泗水旁，弟子都服丧三年。守丧三年结束，相互告别要离去的时候，就哭起来，各人又竭尽哀悼，有的再次留下。唯有子赣住在墓旁守墓，一共六年，然后离去。弟子及鲁国人前往墓旁落户的有一百多家，因此命名为孔里。鲁国地区世代相传按年节奉祀孔子墓，儒生们也在孔子墓地举行乡饮、大射等礼仪活动。孔子墓大一顷。从前孔子和弟子居处过的堂屋内，后代作为庙宇珍藏孔子用过的衣、帽、琴、车和书籍，直到汉代二百多年延续不绝。汉高祖经过鲁地，用太牢礼祭祀孔子。诸侯卿相到鲁地，常常先拜谒孔庙然后执掌政事。

孔子生孔鲤，字伯鱼。伯鱼活了五十岁，死在孔子之前。

伯鱼生孔伋，字子思，活了六十二岁。曾跟随孔子受困于宋国。子思著有《中庸》。

子思生孔白，字子上，活了四十七岁。子上生孔求，字子家，活了四十五岁。子家生孔箕，字子京，活了四十六岁。

子京生孔穿，字子高，活了五十一岁。子高生子慎，活了五十七岁，曾做魏国的辅政大臣。

子慎生孔鲋，活了五十七岁，在陈涉手下做博士，死在陈县。

孔鲋弟弟子襄，活了五十七岁。曾为汉惠帝博士，官至长沙太守，身高九尺六寸。

子襄生孔忠，活了五十七岁。孔忠生孔武。孔武生孔延年和孔安国。孔安国为当今皇帝（汉武帝）博士，官至临淮太守，早逝。安国生孔邛。孔邛生驩。

太史公（司马迁）说：“《诗经》中有这样的话：‘道德像高山一样使人敬仰，行为像大路一样供人遵循。’虽然达不到那么高的境界，但心中无时无刻不在向往。我读孔子的书，便想见他的为人。到鲁地，瞻仰仲尼庙堂及其中的车子、服饰和礼器，儒生们按时在孔家学习礼仪，我徘徊流连不忍离去。天下的君王以至于贤人实在太多了，活着的时候十分荣宠，死后便销声匿迹。孔子是一个普通百姓，他的形象流传十几代，学者一直推崇他。从天子王侯起，中国谈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书的都把孔子的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可以称得上是最伟大的圣人了！”

（梁运华 译）

【原文】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邾人辄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经，季氏飧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飧士，非敢飧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戒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僇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与？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穀，爵之大夫，起累继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阍，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厘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释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

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僭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旌旄羽袂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郛、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

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鄆，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膾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膾鉏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

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绡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国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勾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楷矢贯之，石罫，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楷矢石罫，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击磬，有荷蓑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郢郢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奚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奚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

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纁，八人衰经，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厘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焚必于桓、厘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

“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竅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蓑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

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土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吴与鲁会缙，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

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

《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俟，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

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岁，子路死于卫。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谏之曰：“旻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谏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邛，邛生驩。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过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老子、庄子、韩非传

——《史记》卷六三

【说明】本篇传记载录了老子、庄子、申不害和韩非的生平事迹。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做过周朝藏书室的史官，后隐居。著有《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有人说老子是老莱子或太史儋的，但司马迁也弄不清这些说法是对还是错。

庄子（约前 369—前 286），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做过蒙地的漆园吏，曾拒绝楚威王的聘任。著有《庄子》，推崇老子而排斥儒、墨。

申不害（约前 385—前 337），战国时郑国京（今郑州市西南）人。曾为韩昭侯相十五年，推行法治，使国治兵强。著有《申子》，今仅有辑本。

韩非（约前 280—前 233），出身韩国贵族。曾建议韩王变法，未被任用。他的著作受到秦王政的赞赏。他与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后出使秦国，遭李斯陷害，死在狱中。著有《韩非子》。司马迁对他的死特别感到悲伤。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是周王朝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到周，打算向老子请教礼。老子说：“您所说的，那些人连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们的言论还存在。况且君子处在能施展抱负的时代才担当重任，处在不能施展抱负的时代就遮盖面目而混迹社会。我听说，出色的商人善于囤积货物好象什么都没有；君子道德高尚，容貌却显得特别寻常。抛弃您的傲气和贪心，装模作样和好高骛远，这些都不利于您的身体。我要告诉您的，如此而已。”孔子离开以后，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鱼，我知道它会游；兽，我知道它会跑。会跑的可以准备网，会游的可以准备纶，会飞的可以准备矰，至于龙，我无法知道，它乘风驾云而到达天上。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和龙一样啊！”

老子研究道和德，他的学说提倡自身隐姓埋名。在周居住了很长时间，看到周王朝已经衰败，于是便离开。到函谷关，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勉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就著书上下两篇，论述对道和德的看法五千多字然后离开，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论述道家的作用，与孔子同时。

原来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有人说活了二百多岁，是因为他研究道而且善于养生的缘故。

从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还记载周太史儋进见秦献公说：“起初秦国与周合并，合并五百年才分开，分开七十年才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有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有人说

不是，世上没有人弄清这些说法是对还是错。

老子是有道德的隐士。

老子的儿子名宗，宗是魏国将领，分封在段干。宗的儿子注，注的儿子宫，宫的玄孙假。假在汉文帝时做官，而假的儿子解是胶西王刘卬的太傅，因此在齐地定居。

世上学习老子的人就贬低儒学，儒学也贬低老子。孔子说“主张不一样，不相互进行商量”，难道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吗？

老子主张无所作为，听凭万物自生自灭；清静自守，听凭人们返朴归真。

庄子是宋国蒙县人，名周。庄周曾在蒙县漆园地方做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他的学识没有什么不洞察的，但他的基本观点与老子的言论相一致，因此他著书十多万字，大抵都类似寓言。他创作《渔父》、《盗跖》、《胠箝》，用来诽谤孔子，以阐明老子的主张。《畏累虚》、《亢桑子》一类作品，都是空发议论，毫无事实根据。但他善于属文措辞，借事寓情，因此攻击儒家、墨家，当代的饱学之士也不能自我开脱。他的议论宏阔豪放在于自我陶醉，所以即使是王公大人不能器重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十分贤能，派使臣携重礼迎接他，答应委他为相。庄周笑对楚王的使臣说：“千金是优厚的待遇，卿相是尊贵的职位。您难道没有看见郊祭时用来做祭品的纯毛牛吗？喂养它几年，给它披上彩缎，将它牵入太庙。在这个时候，即使想做一头小猪活下来，难道能行吗？您赶快离开，

不要玷污我。我宁可在污泥浊水中游戏而自得其乐，不愿被统治国家的人所羁縻，一辈子不做官，以满足我的意愿。”

申不害是京县人，过去郑国的贱臣。他学习刑名之学以干谒韩昭侯，韩昭侯用他为相。在国内他完善政治教化，对国外他应付诸侯，前后共十五年。直至申子逝世，韩国国治兵强，没有侵犯韩国的。

申子的学说以黄帝、老子的思想为基础，而注重循名责实，主张法制。著书二篇，名为《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庶生公子。他爱好刑名法术之学，而他的学说归根结底是以黄帝、老子的思想为基础。韩非生来口吃，不擅长说话，而善于著书。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弟子，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

韩非见韩国削弱，屡次写信规谏韩王，韩王都没有采纳。因此韩非十分憎恨君主治理国家不努力完善国家的法制，充分利用权势以驾御自己的臣下，通过求人任贤达到富国强兵，反而举用虚浮不实的蠹虫凌驾于建功立业者的上面。认为儒生用文乱法，侠客以武犯禁。太平时就尊宠徒有虚名的文人，危难时就使用披坚执锐的将士。当今正是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他怜悯清廉正直的人遭到奸诈邪恶之臣的迫害，考察历来成败的变迁，因此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

尽管韩非十分清楚游说君主的困难，在《说难》一书中讲得头头是道，但是终究死于秦国，自己并没有能够逃脱厄

运。

《说难》议论说：

大凡游说中存在的困难，不是我知道的东西能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困难，也不是我辩论问题难以阐明我的思想这样的困难，也不是我敢于放开议论将所有的道理全部讲清楚这样的困难。大凡游说中存在的困难，在于知道被说对象的心里，能够通过我的游说使他心悦诚服。

被说对象是以追求显赫名声为目的的君主，却用怎样得到厚利去游说他，那就会被看成是没有气节而甘处卑贱，必定被远远抛弃。被说对象是以谋取厚利为目的的君主，却用怎样得到显赫名声去游说他，那就会被看成是没有头脑而远离事体，必定不肯录用。被说对象是内心想谋取厚利却露出要追求显赫名声的君主，若用怎样得到显赫名声去游说他，那么表面会录用这个人而事实上将被疏远；若用怎样得到厚利去游说他，那么暗里采纳这个人的主张却会公开将这个人抛弃。这些方面是不能不搞清楚的啊！

事情是由于保密而获得成功，言谈中由于不慎泄密而遭致失败。未必是说者本人要泄漏君主的秘密，而是言谈中无意露出了君主隐匿的事，像这样的人就有生命危险。君主出现过失，而说者公开论述正确的意见以追究他的错误，就有生命危险。恩宠不深却将知道的全部说出来，所说的得到实行并获得成功，那么君主的恩惠也就到此为止；所说的行不通并遭到失败，那么就会被

怀疑，像这样的人就有生命危险。君主有所谋划而想把它作为自己的功绩，说者同样知道而讲出来，就有生命危险。君主公开做某件事，可是他借此却要完成别的事，说者同样知道而讲出来，就有生命危险。勉强君主做他肯定不愿做的事，阻止君主做他不肯罢休的事，生命就有危险。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大臣，他就认为是企图离间自己；和君主议论小民，他就认为是想出卖他的权利；议论他宠爱的人，他就认为是在寻求靠山；议论他憎恶的人，他就认为是在试探自己。干脆精简言辞，他就认为是无知而理屈；文辞优美，滔滔不绝，他就认为是空话连篇而浪费时间。就事论事，陈述意见，他就认为是怯懦而不敢畅所欲言；虑事周遍，思路开阔，他就认为是轻率而傲慢。这些游说中存在的困难，是不能不搞清楚的啊！

大凡游说的当务之急，在于懂得使被说对象所崇敬的能锦上添花，而使他所憎恶的销声匿迹。他自认为他的计谋十分明智，就不要指出他的失误使他感到窘迫；自认为他的决裁十分果断，就不要指出他的对手使他愤愤不平；自认为他的力量十分强大，就不要列举他的困难对他横加阻拦。规划别的事情却与君主的考虑相同，表彰别的人物却与君主的行为一致的，就加以美化而不要中伤。有与君主的过失相同的，就公开进行掩饰，表明这不是失误。对君主一片忠心，没有丝毫违碍，言辞没有任何触犯，然后才发挥自己的口辩和才智。这正是能使君主亲近不疑，能使自己竭尽才智的困难所在啊。能

旷日持久，恩宠已经深厚，达到充分谋划而不起疑心，相互争辩而不致获罪，这才公开计较利弊以使君主获得成功，直接指出是非以使君主提高修养，能以此相互对待，这才算游说取得成功。

伊尹充当厨师，百里奚充当奴隶，都是为了干谒君主以得到任用。这两人原本都是圣人，尚且不能不役使自己而有此卑贱的经历，那么有才能的士人就不会取笑我的主张了。

宋国有一位富人，天下雨损坏了墙壁。他的儿子说：“不修筑将会被盗。”他的邻人的父亲也这样说。到了晚上，他的财物果然大量丢失。他的家里对他的儿子十分了解，于是对邻人的父亲产生了怀疑。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人，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于是问群臣道：“我想用兵，谁是可以讨伐的对象？”关其思回答说：“胡人可以讨伐。”便杀死关其思，说：“胡人是兄弟邻邦，你说讨伐他，为什么呢？”胡人的君主听到后，认为郑国亲近自己，便对郑国不加防备。郑人袭击胡人，取得胜利。这两位提建议的人，他们的看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严重的被处死，轻微的被怀疑。对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并不困难，将正确的认识使用得恰到好处就困难了。

从前弥子瑕得到卫国君主的宠爱。卫国的法律规定，私驾君主车辆的处以刖刑。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生病，有人听说后，连夜告诉他。弥子瑕矫命驾驶君主的车辆外出。卫君听说后反而赞美他说：“多么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不怕触犯刖刑！”同卫君游览果园，弥子瑕吃桃觉

得味道非常好，没吃完便奉献给卫君。卫君说：“多么爱我啊，连自己的嘴都不顾却想念着我！”等到弥子瑕面色衰老而丧失宠爱，得罪于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矫命私驾我的车辆，又曾经将他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本来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一样没什么变化，从前被称赞而后来却获罪，根本原因在于爱和憎发生了变化。所以得到君主的宠爱，那就认识完全一改而感情更加亲密；遭到君主憎恶，那就罪名恰到好处而关系更加疏远。因此进行规谏和游说的士人，不能不首先审察君主对自己的爱憎，然后再向他进言了。龙作为一种爬虫，可以驯服亲近而骑在它身上。但它的脖子下面有一尺长的逆鳞，人要是触动它，就必定将人杀死。君主也有逆鳞，游说他的人能够做到不触动君主的逆鳞，那就差不多能取得成功了。

有人将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阅读《孤愤》、《五蠹》等作品，说：“唉，我能见到这个人和他交往，死也不感到遗憾了！”李斯回答说：“这是韩非写的书。”秦国因此加紧进攻韩国。韩王当初不任用韩非，等到事情紧急，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十分高兴，还没有加以信任和使用。李斯、姚贾十分害怕韩非，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庶出公子。如今您想兼并诸侯，韩非终究向着韩国不向着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您不任用，留了很长时间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以罪过依法惩治他。”秦王认为很对，将韩非交法官治罪。”李斯指使人送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亲自向秦王表白，不让见。秦王十分后悔，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已

经死了。

申子、韩非都写有作品，流传到后世，学者大多具有。我独自感到悲哀的是韩非写了《说难》而自己并没有能够逃脱厄运啊！

太史公（司马迁）说：老子尊崇的是道，主张虚无，在无为之中顺应千变万化，因此著书用辞堪称微妙难识。庄子排斥道德，放纵言论，基本观点亦是强调回归自然。申子孜孜不倦，一心实践循名责实的主张。韩子申明法度，分别事实，明辩是非，他的法制主张极其残酷无情。他们的学说都来源于老子对道和德的看法，可见老子思想的深刻远大了。

（梁运华 译）

【原文】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

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箝》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

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繡，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

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礪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仲尼弟子传

——《史记》卷六七

【说明】孔子不但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第一个创立私学而成绩卓著的伟大教育家。在他之前，我国古代社会只有官学，其教材是《诗》、《书》之类经典，入学的都是贵族子弟。而在孔子的私学中，对原有的经典做出了有新的人文精神的独特解释，入学的一般是属于士阶层的人，有的出身更为微贱，这就为古代文化学术的新生和下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相传前后在孔子门下学习过的达三千人，其中比较著名的则有七十余人。司马迁写作的这篇《仲尼弟子列传》，共记载了七十七人。其中三十五人有姓、名、字，有年龄（一般仅指出他们比孔子年轻多少岁），也详略不同地叙述了他们的言论、事迹及与孔子的关系。其他四十二人，一般只有姓、名字，有的则连字都没有，而且一概没有言论、事迹、年龄等的叙述，这也许是当时已难找到这类材料。本篇虽然主要取材于《论语》，但也有不少今天已难见到的其他材料。读者从本篇的生动记述中，不但可以或多或少了解孔子的一些主要弟子的情况，同时还可以了解与研究孔子本人的教育思想、方

法，他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伟大精神，以及他培养人才上的卓绝贡献。

孔子说：“接受了学业培训而自身能通达的有七十七个人。”都是有优异才能的士子。品德高尚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长于政务的，冉有、季路。善于辞令的，宰我、子贡。熟悉文献的，子游、子夏。颛孙师偏激，曾参迟钝，高柴愚笨，仲由卤莽，颜回屡屡贫乏，端木赐不信命运而去经商，预测行情能屡屡猜中。

孔子所严格师事的，在周王室的就是老子，在卫国的是蘧伯玉，在齐国的是晏平仲，在楚国的是老莱子，在郑国的是子产，在鲁国的是孟公绰。他多次称赞过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但孔子的时代比他们都晚，不是同一世代的人。

颜回，鲁国人，字子渊，比孔子小三十岁。

颜回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以回归到礼的规范上，天下都会承认是仁。”

孔子说：“颜回真贤啊！一个竹筐箩吃饭，一个瓜瓢儿喝水，在狭窄的巷子里住，别人受不了这样的忧愁困苦，颜回却不因此失去他的快乐。”“颜回像是很笨，退回去私下反省研究，很能有所发明。颜回不笨！”“有人任用就实行学说，没有人任用就藏起来研究学说，只有我和你有这样的胸怀啊！”

颜回才二十九岁，头发全白了，早死。孔子哭得很伤心，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弟子们更加亲近我。”鲁哀公问：“弟子中谁是好学的？”孔子答道：“有个叫颜回的好学，不把怒

气转移到不相干的人身上，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就没有好学的了。”

闵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

孔子说：“闵子骞真孝顺啊！人们从不批评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那些话。”他不到大夫手下做官，不吃贪心君主的禄米，说：“如果有人再来找我去做官，我一定躲到汶水之北去了。”

冉耕，字伯牛，孔子认为他有德行。

伯牛有恶性的病，孔子去探视他，从窗口握着他的手，说：“是命吧！这样的好人却有这样的病，是命吧！”

冉雍，字仲弓。

仲弓问怎样从政，孔子说：“出门办事像接待贵宾，役使百姓像主持重大的祭祀（那样认真严肃）。在诸侯那里做事无所怨恨，在大夫家里做事无所怨恨。”

孔子认为仲弓有德行，说：“冉雍可以派他坐北朝南做长官。”

仲弓的父亲是个地位卑贱的人。孔子说：“杂毛牛生下的牛犊却有赤色的毛，周正的角，即使人们想不用它做祭神的牺牲，山川之神难道会不要它吗？”

冉求，字子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当了大夫季氏的管家。

季康子问孔子说：“冉求仁吗？”回答说：“拥有千户居民的城邑里，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家里，冉求可以派去管理它的军队。仁不仁，我就知道了。”又问：“子路仁吗？”孔子答道：“和冉求一样。”

冉求问道：“听到了道理就去实行吗？”孔子说：“实行。”

子路问：“听到了道理就去实行吗？”孔子说：“有父亲兄长活着，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实行！”子华觉得奇怪说：“斗胆问，为什么问题相同而答复不同？”孔子说：“冉求畏缩，所以鼓励他进取；仲由好胜，所以要让他畏缩些。”

仲由，字子路，卞邑人，比孔子小九岁。

子路性子粗野，喜欢讲勇敢和气力，内心刚强率直，头戴公鸡形的帽子，身佩公猪形的饰物，曾粗暴地凌辱孔子。孔子用礼节步步地诱导子路，子路后来改穿儒者的服装，呈上进见礼，转托孔子的门人请求做弟子。

子路问怎样从政，孔子说：“自己先做，然后叫下面的人努力做。”子路请求再讲一点，孔子说：“永不疲倦。”

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义是最重要的。君子喜好勇敢而没有义就会乱来，小人喜好勇敢而没有义就会当强盗。”

子路听到了道理，没有来得及去实行，唯恐又听到新的道理。

孔子说：“凭单方面的证词就能断案子的，恐怕就是仲由吧！”“仲由好勇超过我，没有其他可取之处。”“像仲由这样，难得有个好死。”“穿件破旧丝绵袍子和穿狐貉袍子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不好意思的，大概就是仲由吧！”“仲由的学问修养可算及格了，但还没有深入。”

季康子问：“仲由仁吗？”孔子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派他去管理它的军政，不知道他仁不仁。”

子路喜欢跟随孔子周游列国，遇到过隐士长沮、桀溺和一个用拐杖挑着除草工具的老人。

子路做季氏的管家时，季孙问孔子说：“子路可以称得上大臣吗？”孔子说：“可以称得上够格的臣。”

子路要去当卫国蒲邑的长官，告别孔子。孔子说：“蒲邑勇士多，民众又难治理。但我告诉你：谦恭而又尊敬，可以团结勇士；宽大而又正派，可以亲近民众；谦恭正派而又平静无事，可以报答上司了。”

起初，卫灵公有个爱妃叫南子。灵公的太子蒯聩得罪了南子，怕被诛杀逃跑到国外。到灵公死后而夫人南子想立公子郢为国君。公子郢不肯，说：“逃亡的太子的儿子辄还在国内。”于是卫国就立辄为国君，这就是卫出公。出公接位十二年，他的父亲蒯聩住在国外，不被允许入境。子路当了卫国大夫孔悝的封邑的长官，蒯聩就和孔悝一起发动叛乱，想办法混进了孔悝的家，终于和他的部下一起袭击出公。出公跑到了鲁国，而蒯聩进来当了国君，这就是卫庄公。正当孔悝发动叛乱时，子路在外面，听到消息便急忙赶去。正好遇到子羔从卫国都城的城门出来，对子路说：“出公走了，而城门已经关闭，你可以回去了，不要白白去送死。”子路说：“吃了他的饭，不能在他有难时躲开。”子羔终于走了。恰好有一位使者进城，城门开了，子路跟着进去。到蒯聩那里，蒯聩和孔悝登上了高台。子路对蒯聩说：“君子哪里用得着孔悝？请交给我杀了他。”蒯聩不听，于是子路要放火烧台。蒯聩害怕了，就命令石乞、盍廙下台进攻子路，砍断了子路的帽带。子路说：“君子就是死也不能不戴帽子。”于是系好帽带而死。

孔子听说卫国发生动乱，说：“可叹啊，仲由活不成了！”不久果然死了。所以孔子说：“自从我得到了仲由这个弟子，

恶言恶语就不进我的耳朵。”这时候子贡正作为鲁国的使者去了齐国。

宰予，字子我，口齿伶俐善于辞令。当了弟子以后，问：“为死去的父母服三年的丧，时间不是太久了吗？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必然破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必然荒废。旧年的粮食吃没了，新年的粮食上了场，钻孔打火的燧木要改用新的了，一年的丧服期满就可以停了。”孔子说：“这样你心里安吗？”回答说：“安。”孔子说：“你心安，就那样做吧。君子守丧期间，吃美味不觉得甜，听音乐不觉得美，所以不那样做。”宰我退出以后，孔子说：“宰予不仁啊！儿子出生满三年，然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给父母服三年的丧，是天下通行的大道理。”

宰予白天睡大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没法子雕刻，烂泥巴做的墙壁没法子粉刷。”

宰我问五帝的功德，孔子说：“宰予你不是配谈这个问题的人！”

宰我做了临菑的长官，和田常一起举行叛乱，以至灭了他的族，孔子认为可耻。

端木赐，卫国人，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

子贡口齿伶俐巧于辞令，孔子常贬斥他的巧辩。孔子问他：“你和颜回谁强？”答道：“赐怎么敢想去和颜回比！颜回听到一条道理就能推论出十条道理，我听到一条道理只能推论出两条道理。”

子贡完成学业以后，问道：“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你是器皿。”问：“什么器皿？”孔子说：“是瑚琏（宗庙里贵

重的祭器)。”

陈子禽问子贡说：“孔仲尼的道理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说：“文王、武王之道没有掉到地上去，就在人们身上，贤人懂得它的根本精神，不贤的人也知道它的细微末节，没一个人身上没有文王、武王之道。老师不跟谁学，而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师！”又问道：“孔子到这个国家必定能听到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是求到的？还是人家主动告诉他的？”子贡说：“老师是靠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和谦让而得到的。孔师的求到，或许和别人的求到是不同的吧。”

子贡问道：“富而不骄傲，穷而不谄媚，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但比不上穷而乐于行道，富而谦恭好礼。”

田常想在齐国发起叛乱，畏惧高、国、鲍、晏四位大臣，所以转移他的兵力想要攻打鲁国。孔子听说后，对门下弟子说：“鲁国是先人坟墓所在，是父母之国，国家危险到如此地步，学生们为什么没有一个挺身而出？”子路请求出去，孔子阻止他。子张、子石请求动身，孔子不允许。子贡请求动身，孔子允许他，於是出发。

到了齐国，说服田常道：“君要攻打鲁国是错误的。鲁国，是难攻的国家，它的城墙又薄又矮，它的土地又狭又浅，它的君主愚蠢而不仁，大臣虚伪而无用，它的兵士和民众又厌恶打仗的事，这个国家不宜与它打仗。君不如去打吴国。吴国的城墙既高又厚，土地既广又深，铠甲既结实又新，战士既优秀又吃得饱，贵重的宝器和精良的兵器都藏在其中，又派精明的大夫负责守卫，这个国家是容易攻打的。”田常气得变了脸色说：“先生所认为难打的，却是一般人认为容易的，

先生所认为容易打的，却是一般人认为难打的，竟拿这一套来教训我，是什么道理？”子贡说：“臣听说，忧患在内部的要攻打强国，忧患在外部的要攻打弱国。现在君的忧患在国内。我听说君三次想加封而三次都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国内的大臣有不赞成的。现在君攻破鲁国而扩大齐国的土地，战胜了敌人而助长齐君的骄傲，攻破城池而使大臣们的地位更加尊贵，而君的功劳不被算在内，与齐君的交情就会一天比一天疏远。这样君对上则助长了君主的骄心，对下则使群臣更加放肆，要想借以办成大事，就难了。君主骄傲就会放肆，大臣骄傲就会与你争夺利益，这样君上则与君主有隔阂，下则与群臣相争夺。这样，君要在齐国站稳脚跟就难了。所以说不如去打吴国。攻打吴国失败，百姓死在外面，大臣在国内又力量空虚，这样君上则无大臣的敌对，下则无百姓的怪罪，能孤立君主、控制齐国的就只有君了。”田常说：“主意很好。尽管这样，我的军队已经压在鲁国头上，转而去吴国，大臣们怀疑我，怎么办？”子贡说：“君暂且按兵不动，臣请求出使到吴王那里，让他救鲁国而进攻齐，君就用军队去迎战。”田常答应，就让子贡到南方去见吴王夫差。

子贡说服吴王说：“臣听说：王者不让别人绝了后代，霸者没有强大的敌人；拿三万斤的重物去推轻微的小物必定能使之移动。现在以强大的齐国而吞并掉弱小的鲁国，再来与吴国争霸，我私下为王感到危险。况且挽救鲁国，是显著的名声；打败齐国，是巨大的利益。由此而安抚泗水之北的诸侯，惩罚残暴的齐国而威服强大的晋国，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既能得到挽救濒于灭亡的鲁国的名声，又能得到制

服强大的齐国的实际好处，聪明人是不会迟疑不决的。”吴王说：“主意是不错。尽管这样，我曾经与越国打仗，迫使他们逃到会稽山上栖身。现在越王正含辛茹苦训练士卒，有报复我的决心。请先生等我讨伐了越国然后再听从你的主意。”子贡说：“越国的力量超不过鲁国，吴国的强大超不过齐国，大王放过齐国而去攻打越国，齐国就早已削平鲁国了。况且大王目前正以使濒于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和使濒于绝后的贵族得以有后代继承为名义来号召天下。讨伐弱小的越国而畏惧强大的齐国，算不上勇敢。勇者不逃避困难，仁者不消灭弱小，智者不丧失时机，王者不断绝人家的后代，以树立大义。现在保存越国向诸侯显示仁德，救鲁国攻齐国，给予晋国以威胁，诸侯必定相继臣服吴国，霸业就成功了。况且大王如果一定要顾虑越国，臣请求到东面去见越王，让他出兵跟随大王去打齐国，这样实际上是使越国内部空虚，而名义上则是让诸侯跟从大王去讨伐齐国。”吴王听了大喜，就让子贡去越国。

越王句践让人清扫道路到郊外迎接子贡，亲自为他驾车到客舍然后问道：“这里是蛮夷之国，大夫为什么庄严地屈身光临？”子贡说：“现在我以救鲁伐齐劝说吴王，他心里愿意但又怕越国在后面攻他，说：‘等我先讨伐了越国才行。’这样一来，必定会先击破越国。况且没有报复人家的决心却让人怀疑，是笨拙。有报复人家的决心却让人知道，是冒失。事情还没有开头就张扬出去，是危险。这三项是做事的大敌。”句践叩头弯腰说：“孤家曾经不自量力，竟和吴国打仗，被围困在会稽，心里对他们恨入骨髓，日日夜夜急得口干舌燥，一

心只想和吴王同归于尽，这是孤家唯一的心愿。”於是向子贡请教办法。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猛残暴，群臣难以承受；国家凋敝而又屡屡打仗，士兵难以忍耐；老百姓怨恨当官的，大臣内部变了心；伍子胥因忠谏而死，太宰伯嚭当权，迎合君主的错误以保全自己的私利。这些都是祸害国家的做法。现在大王如果真能发兵帮助他以激发他攻打齐国的意志，用贵重的宝物取悦他的心，用谦卑的言辞抬高他的身份，他必定会出兵讨伐齐国。他战而不胜，是大王的福气；战而胜，必定去攻晋国。臣请求到北方去见晋君，让他共同攻打吴军，必定能削弱吴国。它的精锐部队在齐国被消灭，装备坚甲的部队又在晋国遭受重创，而大王乘它衰败时制服它，必定能灭亡吴国。”

越王大喜，答应了，送给子贡金二千两，剑一把，好矛二支。子贡没有接受，就动身去吴国，报告吴王说：“臣谨将大王的话告诉了越王，越王非常害怕，说：‘孤家不幸，小小年纪死了父亲，内心不自量力，触犯了吴国，兵败身辱，栖身会稽山上，国家变成一片荒野，靠大王的恩赐，使我还能给祖先奉上祭物而举行祭祀，死也不敢忘记，怎么还敢打什么不好的主意呢！’”五天后，越国使者、大夫文种到吴国对吴王叩头说：“东海贱臣、孤家句践的使者——小臣文种，斗胆行贱吏之礼，问候于左右。现在听说大王将要伸张正义，锄强扶弱，打击残暴的齐国而安抚周王室，请允许调发境内的全体士兵三千人，孤家也请求亲自披坚甲执利器，以充当大王的先锋。通过越国的贱臣文种奉上先人收藏的宝器，战甲二十副，以及战斧、屈卢矛、步光剑，以向军官们表示祝贺。”

吴王大喜，告诉了子贡，说：“越王亲自跟随寡人攻打齐国，可以吗？”子贡说：“不可以。让人家国内完全空虚，士兵全部跟你去打仗，又要让他们的君主跟随你，不合理。君王可以接受他们的礼物，允许他们出师，但要辞谢他们的君主。”吴王同意，就辞谢了越王。于是吴王就调发九个郡的兵力去攻打齐国。

子贡于是离开吴国到了晋国，对晋君说：“臣听说，计谋不预先确定不足以应付突发事故，军队不预先准备好不足以战胜敌人。现在齐国与吴国将要开战。吴国战而不胜，越国必定会打乱它的后方；如果战胜齐国，必定让它的军队进逼晋国。”晋君大吃一惊，说：“那怎么办？”子贡说：“修理好兵器，休整好士卒，等着它。”晋君答应了，子贡便离开晋国回到鲁国。吴王果然和齐人在艾陵会战，大破齐军，俘获七个将军的部队而不回国，果然用他的军队进逼晋国，与晋人在黄池相会，相互争夺霸主的地位。晋人发动进攻，大败吴军。越王听到消息，立即渡江袭击吴国，在距吴国都城七里的地方下寨。吴王听到后，放弃晋国回到吴国，与越军在五湖决战。屡战不胜，城门失守，越军於是包围了王宫，杀了夫差又处死了他的宰相伯嚭。灭吴之后三年，越国东向而称霸。

所以子贡一出面，保存了鲁国，搞乱了齐国，灭亡了吴国，使晋国强大，越国称霸。子贡一出使，造成各国相互攻打形势，十年之中，鲁、齐、吴、晋、越王国的情况各有变化。

子贡喜欢从事贱买贵卖，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随时把货

物转手赚钱。喜欢表扬别人的美德，不能替人隐瞒过失。曾先后在鲁卫两国担任相职，财产积累到千金之多，最后死在齐国。

言偃，吴国人，字子游，比孔子小四十五岁。

子游完成学业以后，当了武城的长官。孔子经过武城，听到弹弦唱歌的声音。孔子微微地笑道：“杀鸡哪里用得着宰牛的刀！”子游说：“以前言偃听先生说过：‘君子学了礼乐之道就能爱人，小人学了礼乐之道就容易使唤。’”孔子说：“学生们，言偃的话对，我刚才说的话是和他开玩笑罢了。”孔子认为子游对文献之学很熟悉。

卜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

子夏问：“‘带酒涡的脸蛋儿笑得美啊，黑白分明的秀眼多么媚啊，纯白的丝帛上画花卉啊’，这三句诗说的是什么？”孔子说：“纯白的丝帛在先，绘画的事在后。”子夏说：“仁义的素质在先，礼乐的文饰在后吗？”孔子说：“卜商现在可以开始和你讨论《诗经》了！”

子贡问：“颡孙师和卜商谁更贤？”孔子说：“颡孙师过头，卜商不足。”子贡说：“然则颡孙师更贤吗？”孔子说：“过头和不足一样。”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

孔子死后，子夏住在西河教授弟子，做了魏文侯的老师。他的儿子死后，哭瞎了眼睛。

颡孙师，陈国人，字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

子张问怎样求到禄位，孔子说：“多听别人说，去掉其中不可信的部分慎重地说其余的部分，说错话就少。多看别人

做，去掉其中的失误，慎重地做其余的部分，后悔的事就少。说话错误少，做事后悔少，禄位就在其中了。”

后来子张跟随孔子在陈国、蔡国一带活动，遇到艰难困苦，问怎样才能通行无阻。孔子说：“说话忠诚老实，做事厚道恭敬，就是到蛮狄之国，也能通行无阻。说话不忠诚老实，做事不厚道恭敬，就是在本乡本土，能通行无阻吗？忠诚、老实、厚道、恭敬这几种品德，站着时就像看见它们竖在眼前，坐在车上时就像看见它们靠在车前的横木上，这样才能通行无阻。”子张把这些话写在系腰的大带子上。

子张问：“士子怎么样才可以叫做通达？”孔子说：“你所说的通达，是什么呢？”子张答道：“在诸侯手下做官必然闻名，在大夫家里做官必然闻名。”孔子说：“这是闻名，不是通达。通达的人，就是质朴正直而爱讲道义，注意考察别人的言论和观察别人的脸色，所考虑的是以谦下的态度待人，这种人在诸侯和大夫那里做官必定顺利通达。至于闻名的人，表面上赞成仁德而做事违背仁德，还以仁者自居而不怀疑自己，这种人在诸侯和大夫那里做官必定闻名。”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孔子认为他能通晓孝道，所以传授给他学业。他写了《孝经》，死在鲁国。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比孔子小三十九岁。

他的容貌很丑恶，想师事孔子，孔子认为不是好材料。完成学业以后，退回去修养品行，走路只走大路不走捷径，不是公事不去见卿大夫。

去南方游历到了长江，招收了三百个弟子，设立了利禄

取舍和官位去就的规矩，名声传播到各国君主那里。孔子听到后，说：“我以口才取人，在宰予身上出了失误；以容貌取人，在子羽身上出了失误。

宓不齐，字子贱，比孔子小三十岁。

孔子说：“子贱是君子呀！鲁国要是没有君子，这人从哪里学到这种品德？”

子贱做了单父地方的长官，回来报告孔子说：“这个地方有比我贤明的五个人，教给我治理的方法。”孔子说：“可惜呀不齐所治理的地方太小了，所治理的地方大那就合适了。”

原宪，字子思。

子思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有道，可以当官吃公粮。国家无道，也去当官吃公粮，这就是耻辱。”

子思说：“好胜、吹牛、怨恨、贪欲四种毛病都不犯，可以算是仁吗？”孔子说：“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是不是仁我就知道了。”

孔子死后，原宪就躲到荒郊野外去住。子贡在卫国担任相国，而领着一队车马，拨开野草进入穷巷子里，去拜访原宪。原宪穿上破旧的衣帽与子贡相见。子贡觉得他可耻，说：“先生难道有毛病吗？”原宪说：“我听说，没有财富的叫做贫穷，学了道而不能实行的叫做有毛病。像我原宪这样，是贫穷，不是有毛病。”子贡羞愧，不高兴地走子，一辈子都以自己说话的不恰当为可耻。

公冶长，齐国人，字子长。

孔子说：“公冶长是个可以把女人嫁给他做妻子的人，虽然曾被绳子捆着关在监牢里，不是他本人有什么罪过。”于是

把女儿嫁给他。

南宫括，字子容。

他问孔子说：“羿善于射箭，奭善于驾船作战，都不能得个好死。禹和稷亲自下地种庄稼却能得到天下。”孔子不回答。子容出去后，孔子说：“君子啊这个人！崇尚道德啊这个人！”“国家有道，他不会被废弃不用；国家无道，他也不会被判刑罚。”子容三番两次地背“白珪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啊；说话出了毛病，无可奈何啊”这几句诗，孔子就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说：“天下没有德行的，大多去做家臣，在城里当官，只有季次不曾做官。”

曾点，字皙。

曾点侍候孔子，孔子说：“说说你的理想。”曾点说：“春天的衣服穿定了，成年人五六个，小孩六七个，沂水里洗洗澡，舞雩台上吹吹风，唱着歌走回来。”孔子大声地叹道：“我赞许曾点啊！”

颜无繇，字路。颜路，是颜回的父亲，父子各自在不同的时间里师事孔子。

颜回死时，颜路很穷，请求孔子把车卖掉（来替颜回买椁）以安葬颜回。孔子说：“成材也好未成材也好，各自说来也都是自己的儿子。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只有内棺而没有外椁，我不（卖掉车子）徒步走路来替他买椁，因为我忝列诸位大夫之后（做过大夫），是不可以徒步走路的。”

商瞿，鲁国人，字子木，比孔子小二十九岁。

孔子把《周易》传授给商瞿，商瞿传授给楚国人驺臂字子弘的，子弘传授给江东人矫子庸名叫疵的，矫疵传授给燕国人周子家名叫竖的，周竖传授给淳于地方人光子乘名叫羽的，光羽传授给齐国人田子庄名叫何的，田何传授给东武地方人王子中名叫同的，王同传授给菑川地方人杨何。杨何在元朔年间因为研究《周易》当了汉朝的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比孔子小三十岁。

子羔身高不满五尺，在孔子门下承受学业，孔子认为他笨拙。

子路让子羔去当费邑、郈邑的长官，孔子说：“这是害人家的儿子！”子路说：“那里有老百姓（可供治理），有社稷坛（可供祭礼），何必要读了书才算得上学问呢？”孔子说：“所以我厌恶快嘴利舌的人！”

漆彫开，字子开。

孔子让子开去做官，子开回答说：“我对这事还没有自信心。”孔子很高兴。

公伯缭，字子周。

子周在季孙面前告子路的状，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还说：“（季孙）他老人家固然对子路有了疑心，但公伯缭呢，我的力量还能够做到把他的尸首摆在市场上示众。”孔子说：“正道将要实行，是天命；正道将要废弃，也是天命。公伯缭他能奈何得天命吗！”

司马耕，字子牛。

子牛话多而又急躁。他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有仁德的人，他的言语迟顿。”子牛说：“他的言语迟顿，这就可

以叫做仁吗？”孔子说：“仁德实行起来很难，说起来能不迟顿吗！”

又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惧怕。”子牛说：“不忧愁，不惧怕，这就可以叫做君子吗？”孔子说：“自己反省起来没有什么内疚的地方，他又愁什么怕什么！”

樊须，字子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

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又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菜农。”樊迟出去后，孔子说：“樊须真是个下等人！上面的人爱好礼节，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尊敬；上面的人爱好行义，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上面的人讲究信用，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说实话。能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用襁褓背着他的孩子来了，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问什么是智，孔子说：“懂得人。”

有若，比孔子小四十三岁。

有若说：“礼的运用，以和为最重要。先王的治国之道，这一条是最好的，小事大事都要遵循它。但有一点不能实行：知道和的好处而一味的和，不用礼来节制它，也是不可以实行的。”“信用是接近于义的，因为讲信用的人所说的话可以反复地说（这表明他的话合乎义）。恭敬是接近于礼的，因为恭敬的人不会遭到羞辱（这表明他的行为合乎礼）。所依靠的人不失其为可亲近的人，这一条也是可以宗奉的。”

孔子死了以后，弟子们想念他。有若的容貌很像孔子，弟子们互相许诺一起拜他为老师，师事他就像孔夫子活着的时

候一样。后来有一天，弟子上前问他说：“以前孔夫子正要出门，让弟子拿着雨具，过一会儿果然下了雨。弟子问他说：‘夫子怎么知道的？’夫子说：‘《诗经》上不是说过吗：“当月亮运行到（形状像捕鸟的网的）毕宿附近就像被网子套住一样的时候，就使滂沱大雨降下来。昨天傍晚月亮不是棲息在毕宿附近吗？”后来有一天，月亮又棲息在毕宿附近，却始终不下雨。商瞿年纪大了还没有儿子，他母亲为他娶了妻子。孔子派他到齐国去，商瞿的母亲请求别让他去。孔子说：‘别担心，商瞿年龄到四十岁以后会有五个男孩子。’后来果然是这样。斗胆问，孔夫子为什么知道这些？”有若沉默了半天没法回答。弟子站起来说：“有子走开，这里不是你的座位。”

公西赤，字子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

子华出使到齐国去，冉有替他母亲请求孔子给一点小米，孔子说：“给她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增加，孔子说：“给她十六斗。”冉有却给了她八十斛。孔子说：“公西赤去齐国，乘着肥马驾的车，穿着轻暖的皮袍。我听说过君子只接济有紧急困难的人而不给富裕的人锦上添花。”

巫马施，字子旗，比孔子小三十岁。

陈司败问孔子说：“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说：“懂得礼。”孔子退出后陈司败便和巫马旗作揖施礼说：“我听说君子不应偏袒自己一边的人。难道君子也会偏袒吗？鲁昭公娶 吴国王室的女儿为夫人，而称她为孟子。孟子姓姬，鲁昭公因为自己也姓姬而忌讳称呼她的姓，所以只称呼她为孟子（而不称孟姬）。如果说鲁昭公懂得同姓不婚之礼，谁又是不懂得礼的呢？”巫马施把这番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孔丘真幸运，

假如有过失，别人一定知道。但臣子不可以讲君主和父母的错，我为君主隐讳过失，这也是礼啊。”

梁鱣，字叔鱼，比孔子小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冉孺，字子鲁，比孔子小五十岁。

曹卹，字子循，比孔子小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比孔子小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比孔子小五十三岁。

自子石以上共三十五人，在书籍中明显地有年龄、名字以及接受孔子教育时听到见到过什么的记载。其他四十二人，没有年龄以及事迹不见于书籍记载的纪录在下面：冉季，字子产。公祖句兹，字子之。秦祖，字子南。漆雕哆，字子敛。颜高，字子骄。漆雕徒父。坏驷赤，字子徒。商泽。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齐，字选。公良孺，字子正。后处，字子里。秦冉，字开。公夏首，字乘。奚容点，字子皙。公肩定，字子中。颜祖，字襄。鄒单，字子家。句井疆。罕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申党，字周。颜之仆，字叔。荣旗，字子析。县成，字子祺。左人郢，字行。燕伋，字思。郑国，字子徒。秦非，字子之。施之常，字子恒。颜诔，字子声。步叔乘，字子车。原亢，字籍。乐欬，字子声。廉絜，字庸。叔仲会，字子期。颜何，字冉。狄黑，字皙。邦巽，字子敛。孔忠。公西與如，字子上。公西蒧，字子上。

太史公说：学者中很多人谈论七十子之辈，夸奖的或许超越了他们的实际情况，诋毁的或许损害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同样都是由于没有亲自看到过他们本人是什么样子。然则议

论孔子弟子的有关记载，应以从孔氏宅中发现的古文材料为接近真实。我把有关孔子弟子姓名的文字都与从《论语》取来的弟子向孔子提问的部分合并排比成篇，可疑的部分则去掉。

（陈金生 译）

【原文】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

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

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为有德行。伯牛有恶疾，孔子往问之，自牖执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子仲弓。

仲弓问政，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

季康子问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孔子对曰：“如求。”

求问曰：“闻斯行诸？”子曰：“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子华怪之，“敢问问同而答异？”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曰：“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孔子曰：“片言可以拆狱者，其由也与！”“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赀褐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

赋，不知其仁。”

子路喜从游，遇长沮、桀溺、荷蓑丈人。

子路为季氏宰，季孙问曰：“子路可谓大臣与？”孔子曰：“可谓具臣矣。”

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

初，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灵公太子蒯聩得过南子，惧诛出奔。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辄在。”于是卫立辄为君，是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聩居外，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聩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攻出公。出公奔鲁，而蒯聩入立，是为庄公。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蒯聩，蒯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蒯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蒯聩惧，乃下石乞、壶廙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纓而死。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

宰予，字子我，利口辩辞。既受业，问：“三年之丧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

不乐，故弗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圯也。”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

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陈子禽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又问曰：“孔子适是国，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

子贡问曰：“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之，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

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郤，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句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

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铁屈庐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

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货。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

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然而师愈与？”曰：“过犹不及。”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

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

子张问干禄，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国必闻，在家必闻。”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国及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国及家必闻。”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

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

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齐，字子贱，少孔子三十岁。

孔子谓：“子贱君子哉！鲁无君子，斯焉取斯？”

子贱为单父宰，反命于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

原宪，字子思。

子思问耻，孔子曰：“国有道，谷。国无道，谷，耻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弗知也。”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怩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公冶长，齐人，字子长。

孔子曰：“长可妻也，虽在累继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宫括，字子容。

问孔子曰：“羿善射，夏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三复“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

曾点，字皙。

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点曰：“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尔叹曰：“吾与点也！”

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

颜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槨，吾不徒行以为之槨，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

子羔长不盈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

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漆彫开，字子开。

孔子使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说。

公伯缭字子周。

周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缭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孔子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公伯缭其如命何！”

司马耕，字子牛。

牛多言而躁。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切。”曰：“其言也切，斯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

切乎！”

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

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

子华使于齐，冉有为其母请粟，孔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适齐也，

乘肥马，衣轻裘，吾闻君子周急不继富。”

巫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岁。

陈司败问孔子曰：“鲁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退而揖巫马旗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

梁鱣字叔鱼，少孔子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岁。

冉孺，字子鲁，少孔子五十岁。

曹邴字子循，少孔子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

冉季，字子产。公祖句兹，字子之。秦祖，字子南。漆雕哆，字子敛。颜高，字子骄。漆雕徒父。坏驷赤，字子徒。商泽。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齐，字选。公良孺，字子正。后处，字子里。秦冉，字开。公夏首，字乘。奚谷点，字子皙。公肩定，字子中。颜祖，字襄。鄒单，字子家。句井疆。罕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申党，字周。颜之仆，字叔。荣旗，字子祈。县成，字子祺。左人郢，字行。燕伋字思。郑国，字子徒。秦非，字子之。施之常，字子恒。颜哂，字子声。步叔乘，字子车。原亢籍。乐欬字子声。廉絜，字庸。叔仲会，字子期。颜何，字冉。狄黑，字皙。邦巽，字子敛。孔

忠。公西與如，字子上。公西蔵，字子上。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钩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孟子荀卿传

——《史记》卷七四

【说明】本篇传记记述了孟子（孟轲，字子舆，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和齐国稷下学者驺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以及荀卿（荀况，公元前313—前238）、公孙龙、剧子、李悝、尸子、长卢、吁子、墨翟等人的事迹和思想，虽然少得可怜，却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其中一些论述，如认为好利是祸乱的根源；孟子讲德政不合时宜，因此四处碰壁；驺衍的怪诞迂阔只不过是迎合君主的一种手段，目的仍在于要推行仁义节俭的主张；稷下学者之盛，说明了齐王能招贤纳士等，反映了司马迁的思想倾向。

太史公（司马迁）说：我读《孟子》，至梁惠王问“用什么办法使我的国家得到利益”，未尝不将书放下而叹息，说：“唉，利这个东西确实是祸乱的根源啊！”孔夫子很少谈论利，根本原因就是为时常防范祸乱的根源，所以他说：“以利为出发点而行动，就会招惹很多怨恨。”从天子到普通百姓，好利的弊端有什么不同呢！

孟轲，是驺县人，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学业既已精通，便游说齐宣王以谋取职位，宣王不能任用。前往梁国，梁惠王不同意他的主张，被看作是迂腐而不通情理。正在这时，秦国任用商君，富国强兵；楚国、魏国任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任用孙子、田忌之辈，诸侯向东朝见齐国。天下正致力于合纵连横，把进攻讨伐当作真本领，而孟轲却阐明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德政，因此走到那里都不受欢迎。回来以后便与万章等人研讨《诗》、《书》，阐明仲尼的思想，创作《孟子》七篇。孟子以后又出现驺子等人。

齐国有三位驺子。他们中最早的是驺忌，以善于弹琴干谒齐威王，因此涉足国家政事，被封为成侯而接受相印，早于孟子。

其次是驺衍，后于孟子。驺衍目睹各国君主日益荒淫奢侈，不能崇尚道德，像《大雅》歌颂的那样，自身加强修养，百姓得到恩惠。可是深入观察阴阳的更替消长而进行怪诞迂阔的推演，著《终始》、《大圣》等篇章十多万言。他的言论广博妙远而缺乏根据，都是先从小事物上取得验证，然后进行推论，将它夸大，直到无边无际。比如先从当今开始，一直往上排列到黄帝，都是学者共同遵循的，大体依据时代的盛衰，相应记载其中的吉凶制度，然后往远处推论，直至天地还没有产生，幽深不可考的源头。比如先罗列中国的名山大川，所有山谷中的飞禽走兽，水中地上繁衍的东西，各种珍奇的物品，然后据此进行推论，直至连海外的人都无法目睹的物件。他引证开天辟地以来，历代均按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属性而互相更替，虽然治理国家各有合适的措施，

但预示吉凶的征兆都是如此。他认为儒生所说的中国，对于整个天下来说，只不过是八十一分中仅占其中的一分罢了。中国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本身又分为九州，这就是夏禹所分定的九州，不能计算在天下的州数之中。中国以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共有九个，这才是所谓的九州。在九州之间有小海环绕它们，人民禽兽没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像这样一个区域范围中的，才是一州。像这样的共有九个，便有大海环绕在它们外面，就是天地的边缘。他的主张都是这样一类的东西。但总结他的归宿，必定离不开讲求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间的恩德，是最基本的出发点。王公大人最初见到他的主张，十分惊喜留念而信服，但此后都不能加以实行。

因此驹子在齐国十分受人尊重。前往梁国，惠王到郊外迎接，用的是主人欢迎宾客的礼节。前往赵国，平原君走在他旁边，用衣袖替他拂净座席。到燕国，昭王拿着扫帚走在前面清道，请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而接受学业。建造碣石宫，自己亲身前往拜他为师。驹子写了《主运》。他游历各诸侯国得到如此尊贵的礼遇，难道和仲尼在陈国、蔡国挨饿，孟轲在齐国、梁国受困一样吗！因此周武王凭借仁义讨伐纣王而称王天下，伯夷宁可挨饿也不吃周朝的粮食；卫灵公问军队阵法，而孔子避而不答；梁惠王想谋划攻取赵国，孟轲却称赞周朝的太王为避开狄人侵犯而离开囿地。这哪里是在为迎合世俗而采取苟合态度了事呢！拿着方形榫头想放进贺形卯眼里，难道能放进去吗？有人说，伊尹充当厨师而勉励商汤终于称王天下，百里奚充当仆人在车下喂牛而秦穆公因重用他便称霸诸侯，开始出现先做到意趣相投，然后再引上大道。

驹衍的主张虽然不规范，或许也有伊尹和百里奚那样的意向吧！

从驹衍和在齐国的稷下讲学的各位先生算起，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驹冶等人，各自著书论述有关国家治乱的事情，用来干谒当时的君主，哪里能够介绍得完呢！

淳于髡是齐国人。他博闻强记，学习不宗一家。他进行游说和规谏，羡慕晏婴的为人，然而却致力于察颜观色以迎合君主的心意。有一位客人将淳于髡引见给梁惠王，惠王让左右的人员回避，单独坐下而后再次会见淳于髡，可是淳于髡始终一言不发。惠王十分不高兴，因而指责客人说：“你称赞淳于先生，说管仲、晏婴也赶不上他，等到和我相见，我一点收获也没有。难道我不配听他说活吗？这是什么缘故呢？”客人将这番话告诉淳于髡。淳于髡回答说：“的确如此。我先前见到惠王，他心里正考虑如何驰骋；后来又见到惠王，他心里正想着听音乐，我因此只好一声不吭。”客人原原本本告诉惠王，惠王大惊，说：“唉，淳于先生真是圣人啊！前一次淳于先生来，有人贡献良马，我没有来得及察看，正好先生到。后一次先生来，有人贡献歌伎，没来得及表演，也正好先生到。我虽然让人回避，但自己的心思却在那里，是有这么回事。”后来淳于髡进见，一直连着谈了三天三夜毫无倦容。惠王想安排他做卿相，淳于髡便辞谢离去。因此惠王送他一辆四匹马拉的供乘坐用的车，五匹一捆的帛，上面放着玉璧，黄金百镒。他终身不做官。

慎到，是赵国人；田骈、接子，是齐国人；环渊，是楚国人，都学习黄帝、老子有关道和德的主张，由此发明论述

他们的意旨，所以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都有所论述。

驺佚，是齐国众驺子之一，也大量采用驺衍的主张而著书立说。

因此齐王对这些人十分赞赏，从淳于髡往下，都称他们为列大夫，在康庄大道两旁为他们建造住宅，高门大屋，使他们信受尊宠。纵览天下诸侯的宾客，首推齐国能招致天下的贤士。

荀卿，是赵国人，五十岁才到齐国来讲学。驺衍的主张十分迂阔而且能言善辩；驺佚的文论面面俱到而难于付诸实践；淳于髡与人长期相处，时常发表一些精采的言论。因此齐国人称颂道：“谈天说地数驺衍，文辞精美是驺佚，能言善辩淳于髡。”田骈等人都在齐襄王时死去，因而荀卿是最有名望的老师。齐国非常重视补充列大夫的缺额，而荀卿曾三次充任祭酒。齐国有人诬陷荀卿，荀卿便到楚国，于是春申君用他为兰陵县令。春申君死，于是荀卿被免职，便在兰陵安家落户。李斯曾经是荀卿的学生，不久在秦国为相。荀卿对浊世的政治十分憎恶，由于亡国昏君一个接着一个，不遵循大道而被巫祝荧惑，迷信鬼神；庸俗的儒生目光短浅，不知变通；像庄周等人又荒唐滑稽，伤风败俗，因此推敲儒家、墨家、道家在实践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论述编著数万言而后逝世，就安葬在兰陵。

而赵国也有名叫公孙龙的从事于明辩事物的属性及同异，还有剧子的言论。魏国有李悝，主张发展生产力以富国强兵。楚国有尸子、长卢，阿地的吁子。从孟子到吁子，他

们的著作在社会上大量存在，所以不再论述其流传情况。

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擅长守卫城池，主张节省费用。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有人说他后于孔子。（梁运华 译）

【原文】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纵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疆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邹子之属。

齐有三邹子。其前邹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

其次邹衍，后孟子。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上以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讥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窃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

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实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璲。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内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倘有牛鼎之意乎？

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骈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疆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讼焉。

邹佚者，齐诸邹子，亦颇采衍之术以纪文。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壮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辨；佚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佚，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群互而荀卿发，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圣白同共之辨，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陆贾传

——《史记》卷九七

【说明】陆贾，楚国人，西汉初随高祖平定天下，因游说南越王尉他有功，官拜太中大夫，在诛灭诸吕及立汉文帝的政治大事件中出谋划策，颇有功劳。他是西汉初年出色的政论家，曾提出“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治理国家应当文武兼用的著名论断。他论述国家治乱的十二篇文章（后名《新语》），颇受汉高祖的称赞。班固将他与董仲舒、刘向、扬雄相提并论。王充赞美他可与古代圣人并驾齐驱。

陆贾，是楚国人，以客卿身分跟随汉高祖平定天下，被名为能言善辩之士，不离高祖左右，经常出使诸侯。

在汉高祖时，中国刚刚平定下来，尉他讨平南越，因而封他为王。高祖派陆贾赐给尉他南越王印。陆贾到来，尉他樵髻箕踞接见陆贾。陆贾于是向尉他进言道：“您是中国人，亲戚兄弟的坟墓在真定。如今您违背天性，抛弃中原的文明，想凭借小小的南越与天子抗稀，建立一个平起平坐的国家，大祸将要临头了。况且秦朝政治腐败，诸侯豪杰同时起兵，只有汉王首先进入关中，占据咸阳。项羽背叛盟约，自立为西

楚霸王，诸侯都归顺他，可称得上是最强大的了。然而汉王从巴蜀起兵，鞭笞天下，用武力征服诸侯，于是诛杀项羽，将他消灭。五年之间，海内平定，这并非人力，而是上天的建树。天子听说您在南越称王，不帮助天下人诛除暴逆，将相们都想调兵来杀您，天子怜悯百姓再次劳苦，因此姑且罢手，派我授予您南越王印，剖分符节，互通使臣。您应在郊外迎接，北面称臣，却想凭借刚刚创建而未成形的南越，在此桀骜不驯。汉王朝如果知道，掘烧您先人的坟墓，夷灭您的宗族，派一员偏将率十万大军来到南越，那么越人将您杀死，归降汉朝，简直易如反掌啊！”

因此尉他便突然起立，向陆贾道歉说：“在蛮夷中呆的时间长了，实在有失礼义。”于是问南贾道：“我和萧何、曹参、韩信比起来谁强？”陆贾回答：“您似乎强一些。”又问：“我和皇帝比起来谁强？”陆贾回答说：“皇帝从丰沛起兵，讨伐暴秦，诛灭强楚，替天下兴利除害，继承五帝三王的事业，统治中国。中国人口以亿计，地方万里，占有天下的肥沃土地，人多车众，万物殷富，政出一家，自天地开辟以来还没有过。如今您人不过数十万，都是蛮夷，地势崎岖处于山海之间，如同汉朝的一个郡，您怎能与汉皇帝相比！”尉他大笑说：“我没有在中国起兵，所以在这里称王。如果我在中国，哪里就赶不上汉？”于是十分喜欢陆贾，留他一起饮酒好几个月。说：“南越国内没有值得说话的人，从你到来，让我每天都闻所未闻。”赏赐陆贾一个内装价值千金宝物的口袋，其他馈赠也价值千金。陆贾终于拜尉他为南越王，让他称臣并遵守汉朝的盟约。回报，汉高祖特别高兴，拜陆贾为太中大夫。

陆贾在高祖面前进言常常称引《诗》、《书》，高祖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回答说：“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用武力取天下而以文德守天下，文武并用，是长久之计。从前吴王大差、智伯黜武而亡；秦始皇任用刑法而不知迹通，终于毁灭宗室。过去如果秦国已兼并天下，推行仁义，师法前辈圣人，您怎能取得天下？”高祖不高兴而脸有愧色，乃对陆贾说：“你试着替我将秦为何丧失天下，我为何取得天下的原因，及古代成功和失败的国家写出来。”陆贾于是粗略论述国家存亡的证验，共著十二篇。每上奏一篇，高祖没有不说好的，左右欢呼万岁，将陆贾写的书名为《新语》。

汉惠帝时，吕太后执政，想封诸吕为王，畏惧能言善辩的大臣，陆贾自度不能争辩，于是称病免官家居。因为好畤县田地肥沃，可以在那里安家。有五个男孩，于是拿出出使南越得到的袋中宝物换来千金，分给自己的儿子，每人二百金，让他的从事生产。陆贾经常乘坐四匹马拉的车。跟随着善歌舞鼓琴瑟的侍者十人，宝剑价值百金，对他们儿子说：“我与你们约定：到你们家，你们供给我的人马酒食，尽量满足他们的欲望，十天更换一家。我死在那家，宝剑车骑侍从就归他。一年当中我还要到其他客人家中往来，到你们家中总不会超过两三回，不要让我经常见到不鲜美的食物，不要因为时间久就厌烦我。”

吕太后时，封诸吕为王，诸吕擅权，想劫持幼主，危害刘氏。右丞相陈平对此十分忧虑，无力争辩，怕大祸临头，经常在家中深思。陆贾前往请安，径直到屋内坐下，而陈丞相

正在深思,随时接见陆贾。陆贾问:“为什么这样苦思冥想呢?”陈平回答说:“你猜我在想什么?”陆贾说:“您位居上相,是食三万户的侯,可称得上富贵到头,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但心存忧虑,只不过是担心诸吕和幼主罢了。”陈平笑道:“正是这样。怎样处置这件事呢?”陆贾说:“天下安定,留心丞相,天下危乱,留心大将。将相协调,那么士大夫便诚心归附。士大夫诚心归附,天下虽然出现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替国家考虑,全在你们两人掌握之中。我时常想告诉太尉绛侯,绛侯与我开玩笑,岔开我的话。您何不取得太尉欢心,相互紧密联合?”替陈平谋划几件关于吕氏的事情。陈平采用陆贾的计谋,于是用五百金为绛侯祝寿,备办丰盛的食品一起欢饮。太尉也像他一样进行回报。这两个紧密联合,便使吕氏的阴谋日受挫。陈平于是用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赠送陆贾作为饮食费。陆贾因此在汉朝廷公卿之间活动,声名狼藉。

至诛灭诸吕,立汉文帝,陆贾是十分尽力的。汉文帝即位,想派人到南越。陈丞相等于是荐南贾为太中大夫,出使尉他,使尉他打消做皇帝的念头,让他与诸侯并列,都如愿愿以偿。这翻话记载于《南越列传》中。陆贾最后终正寝。

(梁运华 译)

【原文】

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

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魑结箕踞见陆生。陆生

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敌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

于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性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五之业，统治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乃大说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

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怩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曾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畷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三过，数见不鲜，无久悃公为也。”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陈

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遗陆生为饮食费。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

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陈丞相等乃言陆生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黄屋称制，令比诸侯，皆如意旨。语在《南越》语中。陆生竟以寿终。

董仲舒传

——《汉书》卷五六

【说明】董仲舒（公元前 179—前 104 年），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为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为人廉洁正直，勤于治学著书，专心致志到“三年不窥园”，后世传为佳话。他是西汉时著名的思想家，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大一统、仁义治国、崇尚教化、“天不变道亦不变”等主张在本传中都有系统的论述，阅读本传便可以大致把握他的思想概貌。

董仲舒是广川人，从小研究《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放下帘幕讲习诵读，学生按资历深浅转相传授学业，有的没有见过他的面。他多年不窥视园圃，专心致志到这种程度。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士人都把他当老师加以尊敬。

武帝即位，存举为贤良文学的士人前后一百多，唯有董仲舒以贤良的身分对策。

诏令说：

我得以继承最尊贵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品德，要将地

位传至无穷而将美德延至无极，责任重大而职守艰巨，因此昼夜不得安宁，深思万事的来龙去脉，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所以广泛招致四方的杰出人才，郡国列侯公选贤良正直博学的士人，想听听治国之道的要领，最为正确的主张。如今大夫您在荐举的贤良中俨然是最杰出的，我非常赞赏您。大夫您精心思考，我专心听取并向您询问。

听说五帝三王的作法，是改革制度，大兴礼乐，从而天下融洽和睦，历代帝王都是如此。舜时的音乐没有比《韶》更完美的，在周代没有比《勺》更完美的。圣王已故，钟鼓管弦之声并未衰竭，而治国之道已逐渐残缺。衰败至于桀、纣的所作所为，王道便大坏了。五百年之间，遵守法度的君主，掌握大权的士人，想效法先王的办法来拯救社会的很多，但还是没有能够扭转，一天天走向灭亡，直到后代君主出来而后停止。难道是他们的操守有悖谬的地方而丧失天下呢？还是原来天命便不可挽回，必定使他们发展到特别衰败而后止息呢？呜呼！凡是苦心经营，夙兴夜寐，努力效法上古的，也都无补于事吗？夏、商、周三代禀承天命，他们的符瑞应在哪里？灾异这种不祥之物，由什么原因引起？性和命的真实情况，有的夭折，有的长寿，有的仁爱，有的粗野，经常听到这些名目，并不清楚其中的道理。想教化流行而号令畅通，刑罚减轻而奸邪归正，百姓和睦，政事开明，如何修养，如何整饬，才能甘露普降，百谷丰登，德润四海，恩及草木，三光普照，寒暑平和，受上

天之福，享鬼神之佑，恩德洋溢，施于境外，延及众生？

大夫您通晓先圣的业绩，熟知世俗教化的演变，了解从始至终的顺序，研讨高深理论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请明确地将这些告诉我。要条理分明，不要堆砌材料，不要眉目不清。选择要得法，表达要慎重。对那些不公正、无原则、不忠诚、违正道、卖权渎职的，将他们写出来不要漏掉，进献给我，不用惧怕以后会遭到迫害。大夫您应当尽心，不要有任何隐瞒，我将亲自过目。

董仲舒对策说：

陛下发出善言，下达英明指示，询问天命与情性，都不是愚臣能回答的。臣谨慎地根据《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的既成事实，以观看天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实在太可怕了。国家将发生因违背道德而引起的坏事，那么天便预先现出灾害对君主进行谴责告戒，如果自己不知醒悟，又现出怪异的事情对君主进行警告恐吓，如果还不知改变，那么损伤毁坏就会到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天仁爱君主想帮助他阻止祸乱的发生。只要不是十分无道的时代，上天总是尽力帮助而保全他，事情在于努力勉励自己去做就是了。努力勉励自己从事学问，那么见闻就广博而智慧就光大；努力勉励自己走正道，那么道德就一天天完善而成就便十分显著，这都是可以立竿见影而行之有效的。《诗经》上说“昼夜不懈”，《尚书》上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说的要努力勉励自己啊！

所谓道，就是达到治理好国家必须遵行的路啊。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好国家的工具，所以圣王已没，而子孙

长久安宁几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啊。王者还没有创作音乐的时候，便采用适合于当代的先王的音乐，用它来深入教化百姓。教化的真实效果没有得到，雅颂的乐章就创作不成，所以王者功成然后作乐，用来歌颂自己的功德。音乐这个东西，是用来改变民风、转化民俗的。它改变民风十分容易，它转化民俗成绩显著。因此声音从和谐中产生而来源于真情实意，接触肌肤，深入骨髓。所以王道虽然逐渐损坏，而管弦的声音未尝衰微。虞舜不当政已经很久远了，然而赞颂的乐章遗音犹存，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太平而厌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岌岌可危的很多，因为任用的人不恰当，而遵循的不是正道，所以政权一天天走向灭亡。周朝一直遵循的道，在幽王、厉王时衰微了，不是道本身没有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啊。到宣王时，想念昔日先王的德行，振兴停滞，弥补弊端，光大文王、武王的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写诗赞美他，认为上天保佑他，替他降生了贤能的助手。后世称诵，至今不绝。这是白天黑夜努力行善的结果。孔子说“人能使道光大，不是道使人光大”，因此国家的治乱兴废决定于自己，不是上天降命不能挽回，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荒谬，丧失了先王的传统。

臣听说上天特别推举让他做王的，肯定有不是人力能够招致而是自然而然到来的东西，这就是禀承天命做王的符瑞。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上天的符瑞被诚心感应而到来。《尚书》说“白鱼跃进

了武王乘坐的船；有火覆盖在武王的屋顶，变成了赤鸟”，这便是禀承天命的符瑞。周公说“善报啊善报啊”，孔子说“有德的人不孤立，肯定有辅佐的人”，都是积善积德的效应啊！等到后世，肆意享乐，道德衰败，不能统治万民，诸侯背叛，为争土地而残害良民，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刑罚失当，就产生邪气，邪气沉积于下，怨恶聚集于上，上下不和，那么阴阳错乱而妖孽便产生了。这是灾异发生的原因。

臣听说命就是上天的命令，性就是天生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短命，有的长寿；有的仁爱，有的粗野，烧陶冶金而成器，不能都精美，人生经历有治有乱的社会，因此各自的命、性、情不一样。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草被风吹一定倒下。”因此尧、舜施行德政那么老百姓就仁爱、长寿，桀、纣施行暴政那么老百姓就粗野、短命。统治者教化民众，民众顺从统治者，好比泥在陶钧上，任凭制陶的工匠加工；好比金在熔炉里，任凭冶炼的工匠铸造。“安抚百姓，他们就忠心归顺；鼓励百姓，他们就齐心协力”，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臣细心考察《春秋》的文字“春王正月”，寻求王道的开端，在“正”字上得到了答案。“正”在“王”的下边，“王”在“春”的下边。“春”是天的所为，“正”是“王”的所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主向上禀承天的所为，而在下用来端正自己的所为，这正是王道的开端啊。那么君主想有所为，就应当在天那里寻求王道的开端。天

道最核心的东西是阴阳，阳为德，阴为刑，阴主杀而阳主生，因此阳始终处于盛夏，把生长养育作为应做的事情；阴始终处于严冬，聚积在空虚无用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的。天使阳出现在上面布施而主管着一年的时序变化，使阴潜藏在下面而时常出来辅佐阳，阳得不到阴的帮助，也不能独自成就一年。阳从始生至终了称为一年，这是天意。君主禀承天意行事，因此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罚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好像阴不可任用来成就一年一样。处理政事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于天，所以先王没有一人肯这样做。如今废弃先王管理德教的官吏，而专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百姓，岂不是任用刑罚的意思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便诛杀这叫做暴虐。”对下面施行暴虐，却想德教能遍及四海，所以难于达到目的。

臣细心考察《春秋》讲“一元”的意义，“一”是万物的起点，“元”是言语中表示大的意思。将“一”说成是“元”，是表明一种大的开始而想端正根本啊。《春秋》深入探寻这个根本，于是返回到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作为君主的，只有端正自己的心才能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才能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才能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才能端正四方。四方都走正道，那么无论远近便没有人敢于不统一到正道上来，也就没有歪风邪气在中间作祟了。因此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众生融洽而万民繁衍，五谷丰登而草木茂盛，天地之间受到滋润显得极其丰美，四海之内听到盛德都来称臣，各种象征福的事物，可以招

致的祥瑞，无不到来，这就是王道的最高境界了。

孔子说：“凤凰不到来，河图不出现，我恐怕没有希望了。”自己为能招致凤凰、河图却因地位卑贱不能招致感到悲伤。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能招致的地位，据有能招致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的条件，操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清醒而心地善良，爱护民众而尊重士人，可称得上是富于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而祥瑞没有到来，原因何在呢？大概是由于教化没有施行而万民没有走上正道吧。万民追逐利益，好比水往低处流，不用教化作为堤防来限制他们，是禁止不住的。因此教化得到施行而奸邪都被禁止，这是由于作为堤防的教化十分完备。教化遭废弃而奸邪同时出现，用刑罚不能取胜，其原因是作为堤防的教化被破坏了。古代的帝王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居尊位而治天下，没有一个不把教化作为大事来抓的。在国都设立大学进行教化，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进行教化，用仁来感化民众，用义来勉励民众，用礼来节制民众，所以刑罚轻而禁令无人违犯，根本原因在于教化得到施行而习俗十分淳美。

圣王继承乱世，扫除乱世的痕迹而全部将它抛弃，重新恢复教化而对它格外推崇。教化已经突出，习俗已经养成，子孙后代遵循它，经过五六百年仍然不至衰败。至周朝末年，十分无道，因而丧失天下。秦朝继周之后，不仅不能变革，反而更加无道，严禁文献经典，不准携带诗书，捐弃礼义而厌恶听到它。他的本意是想将先王之道全部消灭，专门从事独断专行、滥用权力、不讲仁义

的治理，所以从做天子算起才十四年便国破家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以乱治乱、极度伤害天下民众像秦这样的啊。他的遗毒和余威至今未灭，使习俗浅薄险恶，人民凶狠野蛮，抵触冒犯无所不为，有谁糜烂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无法雕琢，糟烂的墙壁无法粉刷。”如今汉紧跟在秦的后面，已经像朽木糟墙了，虽然想好好治理，却无可奈何。法律一公布而奸邪便产生，命令一下达而诈伪便出现，好比扬汤止沸，抱薪救火，更加毫无益处。我将这比作琴瑟声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将弦卸下重新安装，才能演奏；管理政事而不见成效，严重的必须变革更新，然后方可治理。应将弦重新安装而不重新安装，即使有高明的琴师也不能将琴瑟的声音调整好；应将政治更新而不更新，即使有出色的贤人也不能将国家治理好。所以汉得天下以来，常想将国家治理好而至今未能治理好，毛病就出在应更新政治而没有更新。古人说过：“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如今当政而希望得到治理已七十多年了，不如从头更新政治；政治更新就可将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那么灾害便一天天离去，福禄便一天天到来。《诗经》说：“符合人民利益，上天赐予福禄。”管理政事而使人民获得好处，自然应当得到上天赐予的福禄。

仁、义、礼、智、信五种永恒的道德，这是做君主的必须认真修养的。这五方面修养好了，因此能受上天的保佑，获鬼神的帮助，恩德施于境外，延及众生。天子阅读董仲舒的书面意见，认为他非同一般，于是又

写出问题问他。

诏令说：

听说虞舜的时候，在廊檐下散步，垂衣拱手无所事事而天下太平。周文王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而天下同样得到治理。帝王治国之道，难道没有相同的原则共同遵循吗？为何劳逸如此悬殊呢？

俭朴的君主连黑色、黄色的旌旗都不制作。到了周代，在宫门外建两座高台，乘坐豪华的车子，大红的盾牌，玉制的大斧，六十四人的舞蹈队在庭院中表演，颂声大作。帝王治国之道难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美玉不用雕刻，又说没有文彩无法辅助德行，两种说法完全不同。

殷朝人掌握五种刑罚用来督察奸邪，用毁伤肉体的办法来惩治坏人。周成王、康王不用刑罚，四十多年，天下无人犯法，监狱空虚。秦国使用刑罚，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四处可见，太黑暗了，可悲呀！

唉！我夙兴夜寐，考虑前代帝王的法典，深思能够维护尊贵的地位，光大宏伟的事业的，全在于发展农业，任用贤人。现在我亲自率领耕种藉田，为农民做个榜样；勉励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崇尚有德的人；派出的使臣一个接一个，慰问劳苦大众，抚恤鳏寡孤独，费尽心思，仍旧谈不上获得丰功，成就美德。如今阴阳错乱，灾气充塞，众生极少存活，百姓未能拯救，廉洁和无耻颠倒，贤人和恶人混淆，没有分清真实情况，所以遍请杰出的士人，大概可以解决问题了吧！如今您们大夫等候诏令

的有一百多人，有的人议论时务但无济于事，考察他们的主张，既与上古不合，又难在今天实施，难道是受法律条文的约束而不能充分发挥吗？还是遵循的学术不同，听来的办法各异呢？各自尽情回答，写成文章，不必畏惧主管官吏。将自己的思想和办法表达清楚，认真琢磨探讨，以满足我的心愿。

董仲舒对策说：

臣听说尧接受天命，以天下治乱为忧，而不以居王位为乐，所以诛杀驱逐乱臣，努力寻求圣人贤人，因此得到舜、禹、后稷、皋、咎繇。众多圣人辅助完善道德，贤能的人协助办理公务，教化普遍施行，天下和睦融洽，万民都安仁乐义，各得其所，行动符合礼制，在正确的道路上从容迈进。所以孔子说“若有帝王兴起，一定要三十年然后才能实现仁政”，正是指这种情况说的。尧在位七十年，便将帝位让给虞舜。尧死后，天下人不归顺尧的儿子丹朱而归顺舜。舜知道无法回避，便坐了天子的宝座，用禹做宰相，仍旧任用尧的助手，继承尧的传统和事业，因此垂衣拱手无所事事而天下太平。孔子说“《韶》乐已经十分完美了，又十分完善了”，正是指这种情况说的。到了殷纣，违背天意，暴殄天物，杀戮贤人智者，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代的贤人，隐居而不称臣。在位的人都奔走逃亡，跑到河边海边。天下黑暗纷乱，万民不安，所以天下人背离殷而顺从周。周文王顺天意治理万物，尊敬任用贤人圣人，因此闾閻、大颠、散宜生等都在朝廷里聚集。仁爱加于万民，天下人

都归顺他，所以太公从海边来便做了三公。这个时候，纣王还在上面，尊卑一片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所以文王十分痛心，想让人民得到安宁，因此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孔子作《春秋》，先摆正王的位置，然后分头记述万事，显示了无冕之王的文德。由此看来，帝王遵循的原则是相同的，然而劳逸悬殊，是因为遇到的时代不同啊。孔子说“《武》乐十分完美了，还不算十分完善”，正是指这种情况说的。

臣听说规定文采用黑色黄色来装饰，为的是分尊卑，别贵贱，勉励具备良好的品德。所以《春秋》禀承天命首先制定的，是更改历法，变换所用车马、祭性和服饰的颜色，为的是顺应天命。那么宫室旌旗的制度，是有所效法才这样的，所以孔子说：“奢侈就显得傲慢，俭省就显得寒酸。”俭省不是圣人主张的恰如其分的制度。我听说美玉不用雕刻，是因为它的质地本身就润泽美好，没有必要加以雕刻，这和达巷党人没有经过学习便天生能认识事物一样。可是普通的玉不加以雕刻，就不具备美丽的文采；君子不学习，就不具备美好的品德。

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对年幼的就反复教他们学习，对年长的就量才录用，用爵位和俸禄培养他们的品德，用刑罚禁止他们作恶，所以人民懂得礼义而以冒犯长上为羞耻。周武王坚持正义，平定凶恶的贼人，周公制礼作乐进行文饰，直到成王、康王时的太平盛世，监狱空虚达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浸染和仁义的影响，不仅是伤害人的肌体的刑罚的功效啊。到秦朝就不是这样，效

法申不害、商鞅的办法，推行韩非的主张，憎恶帝王的治国之道。贪婪成性，根本没有用礼乐道德来教化天下。只求名而不察实，为善的不一定能免罪，犯罪的未必便受刑，因此百官都说假话而不顾事实，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貌，骨子里却存背叛君主之心，制造假象来掩饰欺诈，追求私利而不知羞耻。又爱使用残酷的官吏，赋敛无度，竭尽民间财力，百姓离散逃亡，不能从事耕种纺织的本业，强盗蜂起，因此受刑的很多，死的人接连不断，然而作奸犯科的事却从未停止过，这是由风俗教化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整治他们，人民苟免于罪却无廉耻之心”，正是指这种情况说的

如今陛下统一了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人不顺从，博览兼听，充分吸收了所有人的智慧，全面具备了天下的优点，崇高的品德多么显著，一直影响到国外，连夜郎、康居远隔万里，都崇尚道德，归服正义，这是太平景象的顶点啊。然而功绩没有体现在百姓身上，大概是因为您的心思未放在这方面吧。曾子说：“重视自己听到的，就高明了。实践自己知道的，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别的地方，在于集中注意力罢了。”希望陛下采用听到的道理，在内心确立诚意而付诸实践，那么与三王又有什么区别呢！

陛下亲自率领耕种藉田，为农民做出榜样，夙兴夜寐，替万民忧心操劳，向往古代而努力寻求贤人，这也是尧、舜的用心了，然而仍旧谈上不收获，是因为平时

没有勉励士人的缘故。平时不教养士人却又想得到贤人，好比对玉不雕琢而想得到文采一样。所以教养士人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能超过太学。太学是贤士的必由之路，是进行教化的根本所在。如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却没有能对诏书作出满意回答的，这是因为王道经常遭到断绝的缘故。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安排高明的老师来教养天下的士人，时常进行考问，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出类拔萃的人才就毫无疑问地得到了。

现在的郡守、县令，是人民的老师和领导，是用来继承传统和宣布教化的，所以老师和领导不贤，那么君主的品德便得不到宣扬，恩惠便不可能流布。如今官吏既不对下进行教育，又不实行君主的法令，欺压虐待百姓，与坏人狼狈为奸，使贫穷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离失所，实在不能满足陛上的心愿。因此阴阳错乱，灾气充塞，众生极少存活，百姓未能拯救，都因为地方长官不贤明，才造成这样的局面。地方长官多数来源于郎中、中郎，大官年俸二千石的子弟选为郎官，又凭借富裕的资财，未必有良好的品德和才能。况且古代所说的功劳，是根据做官称职来排列等第的，不是指做官的时间积累得多。所以小材积累时日，不能从小官的职位上调离；贤材虽然时间不久，不影响成为辅佐之臣。因此官吏们竭尽能力和智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以建立功勋。今天就不是这样，积累时日是为了取得富贵，长期积累是为了能够做官，因此廉洁与无耻相乱，贤和不肖混淆，没有能够掌握其中的真实情况。臣的愚见认为，应让各位列

侯、郡守、年俸二千石的大官分别选择他们管辖的官吏和人民中的贤人，每年各自贡献二人作为宫中的值勤人员，并以此观察大臣的能力，贡献的是贤人就给赏赐，贡献的是不肖的人就给处罚。像这样，诸侯、年俸二千石的大官都尽心寻求贤人，天下的士人就可以招致并被官府使用了。天下的贤人全都被招来了，那么三王的盛世就容易实现，尧、舜的名声便可赶上。不把日月作为功绩，把实践证明是贤能的人放在首位，量材授官，按德定位，那么廉洁和无耻就不同路，贤和不肖就不混在一起了。陛下施恩，宽恕臣的罪过，让臣不要被法律条文约束，使臣能够认真琢磨探讨，臣怎敢不尽情倾吐愚见！因此天子再次向他提出策问，诏令说：

听说“擅长谈论天的一定在人事方面得到印证，擅长谈论古的一定在现实中得到效验”，所以我在天人感应方面加以询问，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痛悼夏桀、商纣，目的在于借鉴他们逐渐走向衰微灭亡、逐渐走向兴旺昌盛的道理，虚心改正不对的地方。如今大夫您深知阴阳创造化育万物的原因，熟习前代圣王的治道和事业，然而没有在文章中充分发挥出来，难道是因为对当代的事务心存疑虑吗？没有将道理有条不紊地全部表达出来，层次分明地彻底剖析清楚，是因为我的不明智呢？还是因为听取意见心神不定呢？三代的教化来源不同，但都有缺陷，有人说经久而不改变的是道，细想起来难道其中有不同的地方吗？如今大夫您既已阐明了大道的根本，陈述了治乱的端绪，请说得更全面些，更彻底些，更深

刻些，更周到些。《诗经》上不是说过吗，“告戒诸位君子，不要总是偷懒，神灵听着你们，帮你得到洪福”。我将亲自阅览，大夫您努力将这些道理讲清楚。

董仲舒又对策说：

臣听《论语》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幸蒙陛下施恩，注意听取仍在学习的臣下的意见，再次下达高明的策问，以满足自己的心意，但要将圣人的美德研究透彻，不是愚臣能办得到的。日前呈上的对策，没有将道理有条不紊地全部表达出来，层次分明地彻底剖析清楚，辞语不清，意旨不明，这都是臣才疏学浅的罪过啊。

策问说：“擅长谈论天的一定在人事方面得到印证，擅长谈论古的一定在现实中得到效验。”我听说天是万物之祖，所以普遍覆盖包容而没有任何偏废，造就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治理阴阳寒暑来成就万物，所以圣人效法天而确立道，也博爱而无私，布施仁德以厚待人民，设立礼义以引导人民。春是天用来滋生万物的，仁是君主用来爱护人民的；夏是天用来成长万物的，德是君主用来养育人民的；霜是天用来杀伤万物的，刑是君主用来惩罚人民的。从这些地方说，天人之间的征验，正是从古至今不变的原则。孔子著《春秋》，上揆度天道，下质询人情，借鉴往古，考察当今，所以《春秋》讥刺的对象，正是灾害所施加的对象，《春秋》憎恶的对象，正是怪异所施加的对象。记载国家的过失，同时描述灾害怪异的突然变化，从这里看出人的所作所为，其中的好坏

到了极点，就与天地流通而交相感应，这也正是谈论天的一个方面。古时候设立教育训导的官员，目的在于用道德和善行教化人民，人民已经普遍感化之后，天下便常常没有一个人进监狱了。现代废弃而不设立，无法教化人民，人民因此放弃追求正义而冒死贪图财利，因此犯法犯罪的人很多，一年之内进监狱的成千上万。从这里看出古代的法度不可不采用，所以《春秋》对变更古制的就加以讥刺。天的命令叫做命，命离开圣人就不能善始善终；淳朴的本质叫做性，性离开教化就不能完满形成；人的欲望叫做情，情离开法度就不能规范节制。因此君王向上谨慎地奉承天意，使命能善始善终；向下努力突出教育感化人民，使性能完满形成；努力确定适宜的法度，区分上下的等第，使情欲受到规范节制。做好这三个方面，那么国家的根本就奠定了。人受命于天，本来远远不同于众生，在家有父子兄弟之爱，在外有君臣上下之节，聚会相遇就有老少长幼之别。有鲜明的礼仪相互交往，有融洽的恩情交相亲爱，这正是人高贵的地方。天生五谷给人吃，长桑麻给人穿，产六畜供人享用，服牛乘马，圈豹槛虎，这是由于人得到天的灵气比万物更高贵的缘故。所以孔子说：“天地之间的本性，人是最高贵的。”对天性有明确认识，才懂得自己比万物高贵；懂得自己比万物高贵，然后懂得仁义；懂得仁义，然后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安心处于善道；安心处于善道，然后乐于遵循真理；乐于遵循真理，然后称他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法成为君子”，正是指这种

情况说的。

策问说：“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痛悼夏桀、商纣，目的在于借鉴他们逐渐走向衰微灭亡、逐渐走上兴旺昌盛的道理，虚心改正不对的地方。”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圣人没有一个不是从昏暗中通过积累达到光明，从卑贱里通过积累达到显贵。因此尧从诸侯的地位兴起，舜从深山中兴起，不是一朝一夕便显贵起来，原来是通过逐渐积累才达到的。言语从自己嘴里吐出，是堵塞不了的；行为由自己身上做出，是掩盖不了的。言语和行为，在治理国家方面是最重要的，君子感动天地的地方正在这里。所以从小处着眼的能够变得伟大，在细微地方谨慎从事的能够变得名声显赫。《诗经》上说：“惟有这位文王，能够小心翼翼。”所以尧每天兢兢业业地奉行他的治国之道，而舜每天兢兢业业地尽他的孝心，善积得多则名声就显赫，道德高尚则自身就尊贵，这就是他们逐渐走上兴旺昌盛的道理。善在自己身上积累，就像身体日渐成长而人并不知道一样；恶在自己身上积累，就像灯火消耗油而人不易察觉一样，不是明察情性和世俗的人，谁能知道这个道理呢？这正是唐尧、虞舜之所以获得美名，而夏桀、商纣能使人伤心惧怕的原因。善和恶的以类相从，好比影子跟随形体，回响应和声音，所以夏桀、商纣暴虐侮慢，奸邪险恶的人一起得到任用，贤人智士隐退躲藏，罪恶一天天明显，国家一天天混乱，却泰然自以为如日在天，最终衰落以致于灭亡。暴逆不仁的君主，不是一下子就灭亡的，也是逐渐造成的，所以

夏桀、商纣虽然无道，但仍旧享国十多年，这就是他们逐渐走向衰微灭亡的道理。

策问说：“三代的教化来源不同，但都有缺陷，有人说经久而不改变的是道，细想起来难道其中有不同的地方吗？”臣听说乐而不至于乱、反复实行而不至于厌倦的称做道，道是万世没有弊病的，弊病的产生是由于违背了道。先王的治国之道一定有偏差和不实用的地方，所以政治出现昏暗和行不通的事情，举出他发生偏差的地方和弥补他的不足就行了。三王的治国之道来源不同，并不是他们相互反对，而是为了拯救过失、扶持衰朽，因为遇到的变故正是这个样子，所以孔子说：“无所作为而国家得到治理的，只有舜啊！”更改历法，变换所用车马、祭牲和服饰的颜色，为的是顺应天命而已，其余的完全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还做别的事呢？所以君王只改变制度的名称，没有改变道的实质。然而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因为要拯救前代遗留下来的偏差，必须这样做啊！孔子说：“殷代承袭夏代的礼制，减损增益的地方是可以知道的；周代承袭殷代的礼制，减损增益的地方是可以知道的；其他继承周代的，即使经历百代也是可以知道的。”这是说百代君王采用的，就是遵循忠、敬、文三者了。夏代承袭虞舜，唯独不说减损增益，是因为他们的治国之道完全一样而崇尚的全部相同啊。道的根本是从天产生出来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人相互传授而坚守同一个道，没有拯救弊病的政治，所以不说他们

有什么减损增益。由此看来，继承太平盛世的他们的治国之道完全相同，继承乱世的他们的治国之道就要加以改变。如今汉朝继大乱之后，应当稍微减损周代的过分的文，采用夏代的忠。

陛下有圣明的德和美好的道，怜悯世俗的衰败轻薄，痛心王道的不明，所以选举贤良方正的士人，进行议论考问，打算发扬仁义的美德，光大帝王的法制，建立起实现天下太平的治国之道。臣愚昧不肖，阐述听来的，背诵学到的，说出老师的教导，仅能做到不遗漏罢了。至于议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兴衰，这是辅弼大臣的职责，三公九卿的任务，不是臣董仲舒能做到的。但是臣私下也有感到奇怪的地方。古时的天下也是今日的天下，今日的天下也是古时的天下，同是一个天下，古时天下太平，上下和睦，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无奸邪，民无盗贼，监牢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飞来栖息，麒麟前来游逛。用古时衡量今日，为何竟相差那么远呢！什么地方出现差错而衰败成这样？或许是有违背古道的地方吗？有违背天理的地方吗？试着考察古代，回归天理，大概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吧！

天的赐予也是有所分别的，赐给牙齿的就取消角，加上翅膀的就只有两支脚，这就是接受大的便不能占有小的。古时得到俸禄的，便不靠体力吃饭，不从事商业活动，这也是接受大的便不能占有小的，与天遵循着同样的道理。已接受大的，又占有小的，天都不能满足，何况人呢！这正是人民纷纷为不足而愁苦的原因。身受恩

宠而居高位，家庭温饱而食厚禄，凭借富贵的资产权力，在下面与人民争利，人民哪里是他的对手呢！因此增加他们的奴婢，增多他们的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宅，扩充他们的产业，积聚他们的家私，追求这些东西而没有止境，因而压榨人民，人民一天天被剥削，逐渐陷入困境。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穷急愁苦；穷人穷急愁苦而在上位的人不加拯救，那么人民就不乐意活下去；人民不乐意活下去，因而死尚且不怕，怎能怕犯罪！这就是刑罚增加而奸邪不能禁止的原因啊。所以领取俸禄的人家，吃俸禄就行了，不与人民争生计，然后利益可以平均分配，而人民便可以家用充足。这就是上天之理，也就是远古之道，是天子理应效法以订立制度的，是大夫应当遵循以指导行动的。所以公仪子在鲁国做相时，到自己家中看见织帛，便愤怒地将自己的妻子赶出家门，在家中进食而吃到葵菜，便生气地将自家的葵菜拔掉，说：“我已经享受俸禄，还要剥夺园工织女的利益么！”古代居官位的贤人君子都是这样，因此百姓都推崇他们的行为而听从他们的教诲，人民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无耻。到周代衰落的时候，卿大夫不讲义而急于追逐利，丧失了谦让的作风而产生了争夺田产的诉讼，所以诗人憎恨而讽刺他们说：“那高耸的南山，山石多么峻峭，那显赫的师尹，人人把您瞻望。”你好义，那么人民就向仁而风俗淳美；你好利，那么人民就奸邪而风俗败坏。由此看来，作为天子大夫的，是下民注视而效法，远方从四面向里瞻望的啊！近处的注视而效法，远处的瞻望而效法，

怎能身居贤人的位置而表现出普通人的行为来呢！为求财利奔忙而常恐匮乏，这是普通人的思想；为求仁义奔忙而常恐不能感化人民，这是大夫的思想。《周易》上说：“背着东西又乘车，便将强盗招惹来。”乘车是君子的待遇，负荷是小人的事情，这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而做小人的事情，祸患必然到来。如果处在君子的地位，做与君子相称的事情，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为相那样，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春秋》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永恒的原则，古今的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的主张不同，人民的议论各异，各种流派趋向不一，思想分歧，因此在上位的无法掌握一个统一的标准；法制多次更改，在下面的不知应遵循什么。臣愚以为，凡是不在六艺的科目之内、不属孔子的学术范围的，对他们的主张全部加以禁绝，不让他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被消灭，然后学术体系可以统一，法度可以显明，人民就知道应当遵循什么了。

对策已经结束，天子进用董仲舒为江都相，侍奉易王。易王是皇帝的哥哥，素来骄横好勇。董仲舒用礼义进行匡正，易王十分敬重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易王问仲舒：“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大夫文种、范蠡谋划讨伐吴国，结果灭掉吴国。孔子称赞殷有三位仁人，我也认为越有三位仁人。桓公请管仲解决疑难，我请你解决疑难。”仲舒回答说：“臣愚不足以回答大问题。听说过去鲁君问柳下惠：‘我想讨伐齐国，怎么样？’柳下惠答道：‘不行。’回去后面有忧色，说：‘我听说讨伐他国不问仁人，这种讨伐他国的话为何问到我的头上呢！’”

只是被问一声，尚且还感到羞辱，何况设计谋去讨伐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原本连一位仁人都没有。作为仁人，应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因此仲尼的门下，五尺童子都羞提五伯，因为他们注重诈力而轻视仁义。只不过进行欺诈罢了，所以在孔子的门下值不得一提。五伯和其他诸侯相比还算贤人，他们与三王相比，就像石头与美玉一样了。”易王说：“太好了。”

仲舒治理国家，据《春秋》所论灾害怪异的变化推论阴阳错行的原因，所以举行求雨的仪式，就禁闭各种象征阳的事物，放开各种象征阴的事物。他举行止雨的仪式便与此相反。这种办法在一个国家推行，没有达不到目的的。中途被废为中大夫。在这以前，辽东高庙、长陵高园宫殿失火，仲舒在家中推论其中的道理，草稿还未奏上，主父偃等候仲舒，私自看见，十分嫉妒他，窃取他的书稿便上奏皇帝。皇帝召诸儒观看。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他老师的书稿，认为太愚蠢了。因此将仲舒交法官审讯，被判处死罪，皇帝下诏书赦免了他。仲舒于是不敢再议论灾害怪异。

仲舒为人廉洁正直。这时正好向外抵御四夷，公孙弘研究《春秋》不如仲舒，但公孙弘办事能迎合世俗，位至公卿。仲舒把公孙弘看作是阿谀奉承，公孙弘十分嫉妒他。胶西王也是皇帝的哥哥，尤其放纵恣睢，多次迫害俸禄二千石的官吏。公孙弘于是对皇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派去做胶西王的相。”胶西王听说仲舒是大儒，对待他特别好。仲舒惟恐时间长了获罪，称病辞官。一共在两国为相，尽侍奉骄横的诸侯王，端正自身以率领属下，屡次上疏谏争，号令国中，所在

之处都得到治理。辞官家居以后，始终不过问家中的产业，一心从事治学著书。

仲舒在家中，朝廷里如有重大争议，便派使臣和廷尉张汤到他家问他，在他的对答中都有明确的主张。从武帝开始即位，魏其、武安侯为相便推崇儒学。到董仲舒对策，突出孔子，罢黜百家，确立掌管学校的官员，州郡推荐秀才孝廉，都是由董仲舒提出来的。年纪老了，在家中寿终正寝。全家搬到茂陵，儿子和孙子都通过学习做了大官。

董仲舒的著作，都是阐明经学思想的，加上上奏的奏疏和条陈，共一百二十三篇。而论说《春秋》记事的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类，又有数十篇，十多万字，都流传于后世。摘取其中切于当代并在朝廷得以施行的著录在传记中。

赞说：刘向称赞“董种舒具有帝王辅佐的才干，即使是伊尹、吕望也不能超过他，管仲、晏婴之辈，是诸侯首领的辅佐，根本赶不上他”。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伊尹、吕望是圣人一类的人物，帝王得不到他们就兴盛不起来。所以颜渊死，孔子说‘唉！老天抛弃我’。只有这一个人能与伊尹、吕望相比，从宰我、子贡、子游、子夏以下都不够格。仲舒处在汉代继秦朝毁灭学术之后，《六经》支离破碎，他放下帘幕发愤钻研，专心于伟大的学业，让后来的学者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成为群儒的首领。但考察他的师友渊源的受益情况，还赶不上子游、子夏，却说管仲、晏婴赶不上他，伊尹、吕望不能超过他，太不对了。”到刘向的曾孙刘龚，是一位评论

精当的君子，认为刘歆的话是对的。（梁运华 译）

【原文】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缺。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褒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治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途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山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

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与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藏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

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徕，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

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教德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生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徯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

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颀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蛮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祿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祿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廊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

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皋、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

以閼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繇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惨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

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

尧舜之名可及也。母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寢微寢灭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

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乎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寢微寢灭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尧兢兢日行其道，

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寢微寢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掇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掇，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

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厪能勿失尔。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穷。富者奢侈美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之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

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句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繇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

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山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徒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

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尽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司马迁传

——《汉书》卷六二

【说明】司马迁（前 145—？），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其父司马谈是汉代第一任太史令。在家庭的影响和自己的努力下，司马迁自幼受到古代文化的陶冶，为继任史官打下了坚实基础。父亲去世之后，司马迁决心继承他的遗愿，写完父亲已经动笔了的史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生了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事件；为了自己的事业，他隐忍苟活，接受了宫刑。这不能忍受又必须忍受的残酷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极大的影响了他的写作。司马迁最终完成的史书当时称为《太史公书》，后人称为《史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似的通史。《史记》采用的体裁后人称为纪传体，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部份。本纪主要是选择能左右天下大局的代表人物为主体，与政治上的大事，连续而集中地展示三代至汉武时期的兴衰更迭。表是用谱牒的形式，条理历史大事。本纪和表都是以时间为顺序，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书是以事为类，主要记录各项典章制度的发展过程，具有专史的性质。世家是记载诸侯、勋贵和对社会起过比较突出作用的

人物及大事，兼用编年和列传的写法。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这五种体裁各自为用，又交织配合，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记述人类社会史的体系。这是《史记》的首创。此后我国所有“正史”，虽各有变通，但其基本表达形式都采用了这种纪传体。《史记》贯穿着“实录”精神，努力从客观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历史的实际联系。因此，就整个《史记》说，表现出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至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史记》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把历史再现为一幅幅色彩斑斓、威武雄壮的活生生的图画，洋溢着感人肺腑的巨大艺术力量。司马迁是“历史学之父”，在世界史学史上也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

在遥远的颛顼时代，任命南正重主管有关天的事务，任命火正黎主管有关地的事务。陶唐氏与有虞氏相交的时候，让重、黎的后人继承重、黎的事业，重新掌管与天、地有关的事务，一直到夏朝和商朝都是这样，所以重、黎氏世代代管理天、地的事情。重、黎氏在周朝，程伯休父是他们的后人。当周宣王的时候，重、黎氏失去了管理天、地事务的职掌而成为了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朝的史事。周惠王与周襄王承继之间，司马氏迁到了晋国。晋中军将会逃奔魏地，司马氏因而进入了少梁。

从司马氏离开周室迁到晋国，（其宗族）就分散开了，有的在卫，有的在赵地，有的在秦地。在卫地的，当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地的，以传授剑术的理论而出名，司马蒯聩是他们的后人。在秦国的是司马错，他与张仪争论，于是秦惠王

派他率兵伐蜀，灭了蜀国，因而就地戍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在武安君白起手下做事。这时候少梁更名叫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白起坑杀了赵国兵败长平的军队，回去以后二人都在杜邮这个地方被赐死，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担任了秦王的铁官。当秦始皇的时候，司马蒯聩的玄孙司马卬为武信君的将军而去攻取朝歌。诸侯们相继为王，司马卬被（项羽）封为殷王。汉朝讨伐楚霸王时，司马卬归降了汉朝，汉朝以他原先的封地建立了河内郡。司马昌生了司马母泽，司马母泽为汉（长安四市）的一个市长。司马母泽生了司马喜，司马喜爵为五大夫，去世后安葬在高门。司马喜生了司马谈，司马谈担任了太史公。

太史公司马谈在唐都那里学习天文，在杨何那里接受《易》（的教育），在黄生那里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是在建元、元封年之间的时候担任这个职务的，他责备学者们不彻底理解各家的思想而被各派师法所困惑，就论述六家的要旨说：

《易大传》说：“为使天下达到同一目标而有一百种设想，相同的归宿但道路不同。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这些都是努力于治理社会的，只是他们学说的思路不一样，有的能省察有的不能省察罢了。我曾私下观察阴阳家的学术，众人忌讳重大的吉凶预兆，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但是它管理的四季的顺序变化，是不可错过的。儒学学者博学但不得要领，劳而少功，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事情难以完全遵从，但是他们讲叙的群臣父子之间的礼仪，罗列的夫妇长幼之间界线，是不可变改的。墨学学者的节俭难以遵从，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事

情不可尽用，但是他们所说的强本节用的道理，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严格而缺少恩情，但是他们理顺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改的。名家让人简朴而容易失去真实，但它强调名称与实在的区别和联系，是不可不省察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展开和闭合都没有形状，哺养万物，它的学术构成，遵循阴阳家对四季顺序变化的主张，采纳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吸收了名家和法家的要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针对不同的事物而变化，建树习俗办理事务，没有不恰当的，它的宗旨简约而容易实施，办事少而见效多。儒学学者则不然，认为皇上是天下的仪表，君主倡导臣下就要拥护，君主在先臣下应该随后。这样一来，君主烦劳而臣下则轻松了。至于对重大问题的主张，则远离贤人，废黜智慧，放弃这些而仅用自己的学术。我们知道，精神耗费多了就会枯竭，形体太劳累了就会凋敝；精神和形体很早就衰颓了，想要与天地一样长在久存，这种事情还没听说过。

阴阳家主张，四季、八卦位、黄道的十二度、二十四节令各有处理的原则，而说（对这些原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则未必然，所以（我）说他们“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春天播种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天体运行的规则，不顺应就无法制订天下纪纲，所以（我）说“四季的顺序变化，是不可错过的”。

儒学学者，以（《礼》、《乐》、《尚书》、《诗经》、《易》、《春秋》）六艺为原则，阐释它们的疏传成千上万，一辈子也不能把它们弄懂，一年内连对其礼法也不能全

搞清楚，所以（我）说他们“博学而不得要领，劳而少功”。如果说他们罗列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讲述的夫妇长幼之间的界线，虽然让一百个学派（来论辩）也是不能变改的。

墨家学者也崇尚尧、舜，他们阐述自己的德行说：“堂屋（屋基）只要三尺高，土阶只要三级，盖房子的茅草不要翦整齐，木椽子不要修整；用土锅烧饭，用土碗盛羹，吃粗米，喝菜汤；夏天穿葛藤制的衣服，冬天穿鹿皮衣。”他们为人送终，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悲哀。他们教授丧礼，固执地要用这一套作为万民的表率。所以天下如果都这样，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社会不同时代发展了，做的事情就不必相同，所以说“（他们的）节俭难以遵从”。总的说来他们主张的强本节用，是人给家足的原则。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虽然让一百个学派（来论辩）也不能废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关系，不划分贵贱，只依据法令来决断，就使得亲近亲人、尊重尊贵的恩情断绝了，这可以为一时之计，而不能长久作用，所以（我）说它“严格而缺少恩情”。若论主尊臣卑，明分职守不相逾越，即使让一百个学派（来辩论）也不能废弃。

名家要求苛刻，使人不能违反它的意旨，一切以名为准则，有失人情，所以说：“使人简约但容易失去真实。”假若说到他们主张的引名责失，处理错综复杂的事情不犯错误，这些都是不可不省察的。

道家主张无为，又叫无所不为，它的具体主张容易

实行，它的言辞难以理解。它的学术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自然为功用，没有既成的形势，没有固定的方式，所以能够彻底推求万事万物情况。它不先于物也不后于物，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一定的法则又没有凝固的法则，只因时事的变化推行自己的事业；有一定的界线又没有凝固的界线，只因事物的情况决定兴起或废弃，所以说“圣人没有机巧，只是遵守顺应时变罢了”。虚是道的常理，顺应它是君主的纲领。群臣一起到来，让他们各自阐明（自己的主张），其中确实名实相符的叫做端（正），确实虚有其名的叫做款。不听叫做款的这种人所说的话，奸就不会产生，贤德和不肖之人就自然分开了，白色还是黑色就显现出来。（剩下的事）就在你想怎么使用了，有什么事办不成呢？于是遵循最基本的法则，混混冥冥（任其自然）；照耀天下，反复往还不计较名称。大凡人有生命是因为有精神存在，所依附的则是形体。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了就会凋敝，形体和精神分离开就会死亡。死去了的不能再恢复生命，离分了的不能再结合，所以圣人看重（神与形）。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躯壳。不先确定精神与形体（的关系和地位），就说“我有（理论）去治理天下”，请问根据什么呢？

太史公司马谈已掌管了天文事务，就不负责民众的事。他有个儿子名叫迁。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龙门山之南黄河的北岸以耕牧为业，十岁时就开始诵读古文。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南游江淮，上

会稽山，探寻禹穴，远望九疑山，泛舟沅水和湘水；又北涉汶水和泗水，在齐、鲁的都市讨论学业，观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和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到蕃县、薛城和彭城时司马迁旅费缺乏，就取道梁、楚返回了。这时候司马迁当了郎中，奉皇上之命出使巴、蜀以南，巡视了邛、笮、昆明等地，回到长安复命。

这一年，天子汉武帝举行了汉朝的第一次封禅大典，但太史公司马谈留滞在洛阳，没有能跟随武帝去执行封禅的职事，在悲愤中去世。（司马谈弥留之际）司马迁则好从西南回来，在黄河与洛阳之间见到了父亲。太史公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说：“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从远古开始，就曾经在有虞氏和夏朝的时候立功扬名，职掌天文的事务。到后代就衰落了，难道要从我这里断绝么？你继任太史，就是延续我们先祖的事业了。现在天子承接千年的统绪，封禅泰山，而我不得随行，是我的命（不好）呵！命（不好）呵！我死去之后，你必定要当太史；当了太史之后，不要忘了我想写的著作呵。孝道，是从服事亲人开始，经过为皇上做事，最终达到卓然自立；扬名于后世，使父母显荣，这是最大的孝。天下赞扬周公，说他能宣扬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讲解《周南》、《召南》等《诗经》中的国风，表达太王、王季的思虑，一直追溯到公刘，以尊崇（周的始祖）后稷。周幽王、厉王之后，王道残缺，礼乐制度衰落了，孔子修旧起废，论述《诗经》、《尚书》，作《春秋》，学者们至今都把他当作典范。自从获麟年以来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就绝灭了。现今汉朝兴起，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不

少)，我身为太史而不记载评论这些，废弃了事关天下的文字，我太害怕（承担这个重大责任）了，你一定要时刻想着这事呵！”司马迁低着头泪流满面地说：“儿子虽然不敏捷，还是要请求父亲允许我将父亲已经整理好的史事加以裁断，不敢有所缺漏。”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便在朝廷的石室金匱藏书中搜集材料。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五年是太初元年，这年的十一月甲子日是朔日，早上冬至，改（原用的颛顼历而）行太初历，在明堂中颁布新历，祭祀诸神。

太史公司马迁说：“我的父亲说过：‘自周公去世后五百年而出了孔子，从孔子至现在已经五百年了，一定有继承发扬孔子事业的人（出来），以《易传》为本，继承《春秋》，以《诗经》、《尚书》、《礼》和《乐》为基础。’这话的意思不正在这里么！这话的意思不正在这里么！作为儿子我怎么敢推让呢！”

上大夫壶遂问：“过去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司马迁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制度被破坏了，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加害于他，大夫干扰他。孔子知道当时社会不重用他，自己的理论得不到实行，于是就评论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是非曲直，作为天下法式，贬损诸侯，批评大夫，以阐明君王应该做的事情罢了。’他老人家说：‘我与其写抽象的理论，还不如（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能充分显现（我的思想的）事实之中。’《春秋》上阐明了三王的法则，下理清了人事的纲纪，阐明疑惑难明的事理，明白是非，确定犹豫，赞美善行憎恶丑恶，推崇贤人轻视不肖之人，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修补弊端兴起

被废弃（了的制度），这是君王最重大的法则。《易》叙述的是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变化之道；《礼》为人确定规则，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可以施行；《尚书》记载了先王的事情，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政治方面；《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等，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讽谏；《乐》是快乐所以产生的根据，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协和；《春秋》分辨是非，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对人进行管理。所以说《礼》是节制人的，《乐》是后发协和的，《尚书》是记事的，《诗经》是表达意愿的，《易》是阐述变化的，《春秋》是讲义理的。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有数千，万物的聚散之理都在《春秋》（中说明了）。《春秋》之中，弑君有三十六次，亡国有五十二个，诸侯奔走还是不能保住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其中的原因，都是丧失了根本。所以《易》中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原故，是由来已久的’。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不然）在自己的面前有言就听不见，自己背后有贼人就不能觉察。为臣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不然）坚持大政方针而不知道它（如何）恰当，遇到事情变化了而不知道对它（如何）权衡。做君主和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承担首恶的罪名。做臣下和儿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陷入篡位、弑杀君父的死罪。事实上他们都自以为是在做好事，但是不知道义理，一旦把道理讲出来他们就不敢推卸罪责了。不通礼的意义的旨，就会（坏）到君主不像君主，臣下不像臣下，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程度。君主不像君主就会被臣下冒

犯，臣下不像臣下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原则，儿子不像儿子就会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用天下最大的过错来责备他们，他们是只好接受而不敢反驳的。所以说《春秋》是礼的意义的本原。礼在事情发生之前起阻止作用，法在事情发生之后才施行，所以法的功用显而易见，而礼所起的阻止作用就连那些禁止（败坏行为）的人也难以明白。”

壶遂说：“在孔子那时候，上没有明君，下面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他作《春秋》，把平铺直述的文章用礼义作为标准加以批评取舍以垂示后代，当作一统之王的法则。现在先生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得以各守其职，万事具备，都各自遵循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原则行动，先生所要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呢？”太史公司马迁说：“先生说得对，也说得不对，道理不能这样说。我听我的父亲说过：‘虑戏非常纯厚，作了《易》的八卦。尧舜时代的繁盛，《尚书》里有记载，礼、乐创造出来了。商汤和周武王的兴隆，诗人们吟咏歌唱。《春秋》采录善行贬斥恶行，推崇三代的德行，褒扬周室，不仅仅只有讥刺而已。’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如今圣明的天子，获得了符瑞，进行了封禅，改了历法，变了服装的颜色，受天命而政清人和，恩泽无边，海外不同风俗、相隔数国的国家都派人来叩击塞门，请求进献珍宝晋见皇上的，不可胜言。臣下百官努力歌颂皇上的德行，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而况贤能的士人，倘若得不到任用，是有国家的人的耻辱；皇上圣明，德行得不到传扬，是官吏们的过错。并且我职掌史官，倘若废毁了皇上的圣明盛德不记载下来，灭没功臣、贤

大夫的建树不加以叙述，毁弃了我父亲的话，就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叙述以往的事情，整理与它们有关的传世材料，并非是创作，而先生把我写的东西比作《春秋》，那就错了。”

于是，司马迁开始写作。十年之后他因为为李陵投降匈奴的事辩护而遭到灾祸，被囚禁起来，就喟然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呵！我的身体短少了已经是无用之人了！”他退一步深思说：“《诗经》和《尚书》透露出来的忧愁屈怨，是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思绪呵。”于是，他叙述从陶唐氏以来、到汉武帝获麟那年为止的历史；他把黄帝作为历史的开端。（全书目录）本纪为《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表的次序是，《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书的次序是：《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世家的次序是，《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

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七，《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列传的次序为，《伯夷列传》第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瑄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郤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

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汉朝继承了五帝的余脉，承继了被断绝了的三代的事业。周朝的学说衰落了，秦朝抛弃了古文，焚灭了《诗》、《书》，所以明堂、石室、金匱的玉版、图书散乱。汉朝兴起之后，萧何整理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建立章程，叔孙通拟定礼仪，文章学术就文质兼备有所进步，散佚了的《诗》、《书》常常相继出世。自从曹参推荐盖公讲黄老之学，而贾谊、朝错阐明申不害、韩非的理论，公孙弘以崇尚儒学而显贵，百年之间，天下的遗文古事没有不集中在一起的。太史公是父子相袭掌理编纂史书的职务，司马谈曾说“呵哟！我的先人曾任职掌这事，在唐、虞之世就有名气。到了周朝，又重新典理此事。所以司马氏一族世代以来都主管天官，到了我这一辈，要恭敬地记住这事呵！”（于是司马迁）网落天下散佚了的旧事，考察帝王事业兴起的线索，推究它的发端观察它的结果，

审视它的兴盛追究它的衰落，议论和考证事迹，略述三代，记录秦、汉，上从轩辕黄帝起，下到当代为止，著作了十二本纪，写出了历史的主要线索。有同时的，有异世的，年代有差别不易辨明，就作了十表。礼、乐制度历代有增有减，律、历有改变，兵书、山川、鬼神，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表明其承敝通变的情况，就作了八书。二十八宿环绕北极星，三十辐条共同装在一根轴上，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合（着帝王），忠诚、信义、推行天道以事奉主上，所以作三十世家。申张正义卓绝不凡、不让自己失去了时机，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很多），所以作了七十列传。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名为《太史公书》。其序文大体说，这部书是为了网罗遗失补充六艺的；它构成了一家之言，协调了对六经不同的解说，整齐了百家杂乱的意见；这部书的原本藏名山，副本在京都，以等待后来的圣人和君子们（观览）。这些都是书中的列传第七十，司马迁的《自叙》所说的。（现在，《太史公书》）有十篇缺失了，只剩下目录而没有正文。

司马迁受腐刑之后，担任了中书令，这是个受人尊敬很受皇上宠信的职位。他的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给他写信，用古代贤臣的标准责备他。司马迁回信说：

少卿先生：以前有辱您写信给我，教导我努力慎重地处理各种关系，推贤进士，意义殷勤诚恳，仿佛是怨我不按照老师的教导去做，而让俗人的言语左右了我的志向。我是不敢如此去做的。我虽极其愚钝，也曾经从侧面听说过长者遗风。只是我身残处秽受着感情的折磨，动辄得咎，想加倍地检点自己，所以精神抑郁而跟谁也

不说什么。谚语说：可为作之，令谁听之？”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鼓琴，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像我这样一个本质上已有亏缺的人，虽怀着随侯珠、和氏璧一样美好的才能，德行跟许由、伯夷一样，最终也不能得到荣光，只不过足以使人发笑而自己使自己遭受到玷污而已。

本来很早就应回您的信，不巧遇到我随皇上从东方归来，又被不足道的事情所纠缠，与您相见的时间很短，匆匆忙忙没有一点机会得以完全说明我的意见。现在少卿先生遭受到预想不到的罪罚，过一个月，已经是接近季冬，我又要跟从皇上到雍地去，恐怕先生您猝然之间不能与我见面了。如若是这样，我就终究不得把我的忧愤烦闷向接近我的人抒发，而与我永别者的魂魄将怀着无穷无尽的私恨。请求您允许我陈述我浅陋的看法。我很久没回信给您请您不要埋怨我。

我听说，修身的人是智慧的聚集之所，喜欢施舍的人是仁的开端，收受与给予（恰当）的人是义的标准，（懂得）耻辱的人是勇敢的基础，立名的人是人的作为的最高追求。士人具备了以上五种德行，然后就可以依于社会，被列入君子之列了。所以就灾祸说没有比追求功利更使人痛心的人，就悲伤说没有比伤了心更使人痛苦了，就行为说没有比侮辱先人更丑恶的人，而就耻辱说没有比受宫刑更大的耻辱了。受了宫刑的人，没有什么可相比的，不是一个时代是这样，已经是由来已久的了。昔日卫灵公与雍渠同车，孔子去到了陈国；商鞅依靠景

监面见（了秦孝公），赵良就感到寒心；赵谈做了参乘，爰丝满脸不高兴，自古以来都以这样的事为耻辱。有中等才能的人，有事与官相关，就莫不伤心气恼，更何况慷慨之士呢！现在朝廷虽然缺乏人才，怎么可以让刀锯之余（的我）去推荐天下的英雄俊杰呢！我依赖承继先人的事业，得以待罪于皇上的辇毂之下，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我自思：对上说来，我不能怀忠效信，得到献奇策、出大力的赞誉，与皇上搞好关系；其次，我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使岩穴之士等以显露；就朝廷之外说，我不能作为军队的一员，去攻城野战，建立斩将搴旗的功劳；就最低要求说，我也不能累日积劳，取得尊官厚禄，为宗族结交达官贵人。以上四方面，我没有一样事是做得到的；我苟合取容，对各方面都无所贡献，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过去，我也曾经侧身于下大夫之列，陪着外廷议论些细枝末节的事。不在那时候引进维纲护纪之人，竭尽我的思虑，现在我已亏损了形体为打扫清洁的奴仆，在猥贱的人当中，想昂首扬眉，来论列是非，不是太轻视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了吗！呵哟！呵哟！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啊！还有什么话可说啊！

而且事情的本末是很难辩明的。我少年时自负于不羁之才，长大了后没有得到家乡人的称赞，皇上因为我先人的原因照顾我，使我得以凭浅薄的才学，出入于防卫周密的宫廷之中。我认为头上戴着盆是怎么也看不见天的，（不可有更大的奢望）所以我断绝了和宾客之间的

往来，忘却了家室的生计事业，日日夜夜想竭尽我不成器的才力，一心一意致力于我的职守，以讨得皇上的欢心。但事情完全违背主观愿望。我与李陵都在朝廷供职，素来不是朋友，兴趣爱好各不相同，从未有过举杯戏酒殷勤款待的欢聚。但是我观察他的为人，认为他是无可争议的奇士，他事奉长辈遵循孝道，与士人相交以信为本，面对财物表现廉洁，取得与给予都以义为标准，对身份职别表现出谦让，对下人很客气，常常想奋不顾身以赴国家的急难。这些高贵的品德都是他平素间所积累起来的，我认为他有国士之风。为臣的人出生入死不顾自己一生的长远之计，赴公家之难，这已经奇特了。而今一件事情办得不妥当，那些苟且偷生护妻保子的臣子们紧跟着就牵连生事造谣中伤，我实在是心痛极了！而且李陵率领的步兵不到五千人，深入敌人后方，足迹经过了匈奴的王庭，垂饵虎口，往西向强大的胡人挑战，面对匈奴的亿万之师，与单于连续作战了十多天，（就李陵军队的人数而言）杀掉的敌人之多已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匈奴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穿制衣服的君长们都震恐了，就全部征集左右贤王属部，征发凡是能骑马射箭的百姓，倾一国之力共同围攻李陵。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绝，救兵又没有到，士卒伤者相堆积。但是李陵只要一呼唤已疲劳的军队，战士们没有不奋起的，他们弯着身子流着眼泪，抚着流血的伤暗自饮泣，拉开没有上箭的弓，顶着雪亮的刀刃，面对北方与敌人死战。李陵还没去世之前，有使者回来报告，汉朝的公卿王侯都捧酒祝贺皇上。

几天后，李陵战败的事被奏闻于朝廷，皇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政时很不高兴。大臣们忧愁恐慌，不知计从何出。我不自量个人卑贱的地位，见皇上惨淡悲恻，真心想用我忠实诚恳的愚陋报效皇上。我认为李陵平素间与士大夫相处就同甘共苦，所以能让人为其拼死，虽然是古代的名将也超不过他。他虽然陷于失败，但看他的意图，是想得到机会而报效汉朝。事情已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所摧毁战败的战绩，功劳也足以显露于天下了。我心里怀着这个意见想上陈皇上，但没有门路。恰好遇到皇上召问，就根据这个思路推崇李陵的功劳，想以此开扩皇上的思路，堵塞小怨小忿引起的不实之辞。我还没完全说明，皇上没很好考虑，就认为我是在攻击两师将军而为李陵游说，于是就把我下发到司法官审问。我的拳拳忠心，终究不能自陈。因为认定我诬上之罪，最后就让狱吏们去议论量刑。我家贫穷，所有的财产不足以自赎其身，朋友们没有来救援的，左左右右亲近的人都不为我说一句话。身体不是木石，我独自与法吏为伍，深深地囚禁在监牢之中，向谁去诉说我满腹的心酸呵！这些事都是您少卿先生亲自见到的，我的行为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李陵既然投降，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又被推进了蚕食，再次被天下人笑话。太可悲了！太可悲了！

事情不容易给俗人说明白。我的先人没有享受剖符丹书的功，做掌管文史星历的史官，地位与卜人巫祝相近，只是供主上所戏弄，当着优伶一样养蓄着罢了，为社会所轻视。如果我伏法受诛，若九牛失去一毛，与螻

蚁有什么区别？而且社会上又不把我的死与为气节而死等量齐观，不过认为是我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只好就死罢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平日里自己立志造成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最好是不辱没先人，其次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其次不辱没义理名份，其次不辱没辞令，其次是屈体受辱，其次换了服装受辱，其次是带枷绳被杖击受辱，其次是剃去毛发打上金印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折断肢体受辱，最下等的侮辱是腐刑，这就到了极点了！《传》上说：“刑不上大夫。”这话是说士人的气节不可不磨砺，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到落入陷井之中，就只能摇尾乞食，它的威风被欺诈制约了。所以士人们知道，即便是画地为牢也不能入，即使是木头做的狱吏也不能跟他对话，做出这种决定是因为道理太明显了。现在我手足交叉，被绳索，暴露肌肤，受击，被禁锢在环墙之中，这时候，看见狱吏就低头撞地，徒隶出现我就心中恐惧，这是为什么？威风被权势所制约了。到了这个时候，说没有受辱的人，就是所谓的勉强装样子罢了，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呢？而且，西伯，是伯，被拘于牖里；李斯，是相，被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是王，在陈地被桎梏；彭越、张敖南面称孤，或系于狱或治大罪；绛侯诛杀了吕后一党，权倾五霸，结果被囚在关押有罪官吏的牢狱中；魏其，是大将，穿上了赭色的衣服，颈、手、足三处都上了枷锁；季布（这样一个有作为的人）成了朱家的钳奴；灌夫受辱之后只好居住在家里。这些都是身居王侯

将相，名声远扬邻国的人，到了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时候，不能自杀对自己进行裁决。在茫茫尘世之中，古今都是一样的，怎么能不受侮辱呢！这样看来，勇敢和怯弱，是人所处环境和地位决定的；强与弱，是形势所使然。道理确实是这样的，有什么奇怪的呢！而且人不能及早规范自己的行为，已经落到置身于鞭棰之间时，才想引荐有节操的人，这不是太离谱了吗？古人所以难以对大夫施用刑法，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就人情说没有不贪生怕死、思念亲戚、眷念妻子儿女的，而被义理所激发的人却不然，他们有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幸的，太早地失去了双亲，没有兄弟间的亲爱，独身孤立，少卿先生把我当作您最亲近的人怎么样呢？而且勇敢的人未必都是为殉节而死，怯懦的人钦慕义，就没有什么地方不以义理激励自己！我虽然怯弱想苟且偷生，也很知道去就的界线，为什么会陷入牢狱囚禁的耻辱之中不能自拔呢？而且即使奴婢侍妾也能引咎自裁，何况像我处于这种不得已境地的人呢！我所以隐忍苟活，被淹埋在粪土之中而不辞，是因为怀恨自己的心愿有没有实现的，鄙视被世事所淹没而我的文采不能遗留给后人。

古代富贵的人而名字被磨灭了的，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得以显身扬名。大概说来，西伯被拘之后而演绎了《周易》；仲尼受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就赋了《离骚》；左丘失明，就写了《国语》；孙子的脚受了膑刑，就写了《兵法》；吕不韦被放逐到蜀，世间就流传了《吕览》；韩非被秦国所囚，就作了《说难》、《孤

愤》。《诗经》的三百篇，大约都是贤圣的发愤之作。以上这些人都是因为思想有郁结之处，弄不通其中的道理，所以叙述往事，思考未来。像左丘明眼睛看不见，孙子被断了脚，终究得不到任用，只好引退写文作书以抒发自己的悲愤，想留下文章以自表其志。我私下里很不恭敬，近来以没有才气的文辞自托，网罗天下的佚闻旧事，考证事实，探寻成败兴坏的道理，总共一百三十篇，也想以此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今的变化，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草创未就，恰好遭遇了这场灾祸，可惜它还没有完成，所以我毫无愠色地接受了极刑。我将此书写完之后，要把它藏之名山，留传给能在通邑大都扬播的人，那么我就补偿了受辱所遭到的责难，虽被戮杀一万次，难道还会后悔吗？但是这些话只可以跟有理智的人道，难以给俗人言。

况且背负侮辱的人不容易安居，地位低微的人遭到的诽谤最多。我因为说话不慎而遭遇到宫刑之祸，再一次受到乡党的讥笑和指责，辱了先人，还有什么脸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呢？虽然是百代以后，我所造成的污垢只会越积越厚的！所以，我肠一日而九回，在家里坐着就感到飘飘浮浮若有所失，出门则不知道自己到什么地方去。一想到自己的这一耻辱，汗就没有不从背上往外冒浸湿衣服的。身虽为皇上内廷之臣，还不如自己引退深藏到山岩洞穴当中去呵！所以姑且随俗浮沉，与时俯仰，以此来疏通我的大惑不解。现有少卿先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不是和我个人的愿望相违么？现在我虽然

想雕琢自饰，用美妙的言辞自我解嘲，也是没有益处的，社会上不会相信我的辩解，只不过取得羞辱罢了。总之到我死那天，是非才能明确。书不尽意，所以只是大略地陈述我浅陋的看法。

司马迁死后，他写的《太史公书》才有一些部份流传出来。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师法、陈述《太史公书》，于是此书才全部公布于世。到王莽的时候，访求司马迁的后人，封他为“史通子”。

评论说：自从古代文字发展之后就有史官，他们所写的书太多了。到孔子对这些书加以整理，就上从唐尧时开始，下到秦穆公时截止。唐尧虞舜以前虽然有遗留下来的记载，它们所说的却不符合经典，所以说黄帝、颡项的事是弄不明白的。到孔子根据鲁国的史记而作《春秋》，在左丘明又编辑了《春秋》所涉及的事情的本事为《春秋》作了传，又把各种不同的记载纂集编成了一部《国语》。又有一本叫《世本》的书，记录了自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的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谱系。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国兼并诸侯，有《战国策》一书。汉朝兴起讨伐秦国安定了天下，有《楚汉春秋》一书。所以司马迁根据《左氏》、《国语》，采录《世本》、《战国策》，转述《楚汉春秋》，并接着《楚汉春秋》记述后来的事情，到大汉朝结束。《太史公书》记述秦、汉的事情，非常详细。至于它选择经和传，把各个国家的事分散开来叙述，疏略之处就太多了，有的还相互矛盾。司马迁涉猎广博，贯通经、传，驰骋古今，耕耘于上下数千载间，这是很勤奋的。但他的是是非非与圣人很不相同，论术基本理论推崇黄老而压抑六经，评

论游侠则贬退有才德却隐居不仕的士人而拔高奸雄的地位，叙述货殖则崇尚势利而以贫贱为羞，这些都是司马迁的片面之处。然而即使是博览群书的刘向、扬雄，也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佩服他善于安排史事的轻重缓急，辩论而不显得浮华，质朴而不显得鄙俗，他的文章直书其事，记载的事情坚实可靠，不虚饰其美，不隐讳恶行，故称他的书为实录。啊！凭司马迁的多闻博识，但不能用自己的智慧保全自己；已经受了极刑之后，就潜思发愤，他写给任安的信所说的一切，都是靠得住的。寻思他所以自己伤悼的线索，跟《小雅》计中巷伯遇作诗的情况属于一类。要做到《大雅》所说的“既明且哲，能保其身”，是很难很难的呵！（赖长扬 译）

【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毋怵，毋怵为汉市长。毋怵生喜，喜为五大夫，卒，

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美，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

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故天下共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壹断于法，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成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款言不听，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峰；扼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雒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续史记石室金匱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

《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牦，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未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

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成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虑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坠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

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传》第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

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鞮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郤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

贾谊、朝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同，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

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令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懣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託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官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以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闾茸之中，乃欲叩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首！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

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卽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以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

伍，深幽圜圉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

李陵既生降，贖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蛄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诟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捶，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

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捶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倏傥非常之人称焉。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彫琢，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

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迂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桓谭传

——《后汉书》卷五八

【说明】桓谭（公元前 23 年？—公元 56 年），字君山，汉沛国相（今安徽淮南市相山）人。汉成帝、哀帝、平帝时位不过郎，王莽时为掌乐大夫，汉光武帝时官至议郎给事中。著有《新论》二十九篇，已佚。他是东汉时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对他推崇备至，称孔子为素王，称他为素丞相，并将《新论》与《春秋》相提并论。本篇传文简述了桓谭的生平，阐明了他的“咸以仁义正道为本”，反对以“奇怪虚诞”治世的主张，突出了他从现实社会出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始至终反对作为统治思想的谶纬神学，既不迎合王莽，也不屈服于汉光武帝，置生死于度外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大无畏精神。

桓谭字君山，是沛国相县人。父亲在汉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因父亲的功绩被保任为郎，因而爱好音乐，善于弹琴。博学而且多能。普遍研习《五经》，注重解释大意，不讲求章句。擅长写文章，尤其喜好古文字，屡次跟刘歆、扬雄辨析疑异。生性嗜好歌舞艺人的音乐，简慢而不修边幅，喜欢非难诋毁

俗儒，因此时常遭到攻击。

哀帝、平帝年间，官位没有超过郎。傅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对桓谭十分友善。这时高安侯董贤受皇帝宠幸，妹妹为昭仪，傅皇后已日渐被疏远，傅晏默默不得意。桓谭进言道：“从前武帝想立卫子夫为皇后，暗地里寻求陈皇后的过失，结果陈皇后被废，卫子夫终于被立为皇后。如今董贤倍受宠爱而妹妹更受宠幸，大概将要发生卫子夫那样的变故，怎不令人忧虑呢！”孔乡侯傅晏十分震惊，说：“是这样，怎么办呢？”桓谭回答说：“刑罚不能加到无罪的人身上，邪枉不能胜过正直的人。士人凭借才智取信于君王，女子凭借妩媚邀宠于夫主。皇后年少，很少经历艰难，有人会驱使医巫，外求方技，这不可不加以防备。又君侯您由于是皇后的父亲十分尊贵而交往众多宾客，必定会借用显赫的权势，招来非议，不如谢绝遣散门徒，努力保持谦逊诚恳，这是修身正家避祸的好办法。”孔乡侯晏回答说：“太好了。”于是遣散宾客，入内禀明皇后，正如桓谭告戒的那样。后来董贤果然暗示太医令真钦，让他寻求傅氏的罪过，于是逮捕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奉诏审理没有收获，才算了事，所以傅氏在整个哀帝时期得以保全。至董贤为大司马，听说桓谭的名声，想和他结交。桓谭先上书董贤，用辅国保身的办法进行劝说，董贤未能采纳，于是没有和他交往。当王莽摄政弑君篡权的时候，天下的士人，没有不竞相称颂道德纯美，造符命进行奉承谄媚以求欢心的，唯独桓谭坚守己志，默然无言。王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为皇帝，召拜为太中大夫。

光武帝即位，征为待诏，因上书论事违背旨意，没有被

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荐举桓谭，拜议郎给事中，于是上书陈述当时政治应该采取的措施说：

我听说国家的兴废在于政事，政事的得失出自辅佐。辅佐贤明，那么出色的士人充满朝廷，而理论与社会形势相符合；辅佐不贤明，那么理论不合时宜，而措施多失误。大凡治理国家的君主，都想振兴教化确立善政，然而政治没有搞好，是由于他们所谓的贤不一样啊。从前楚庄王问孙叔敖说：“用来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我还没有得到。”叔敖回答说：“国家有大政方针，是众人所厌恶的，恐怕君王您不能确定啊。”庄王说：“不能确定只在于君主，也在于臣下吗？”回答说：“君主对士人十分傲慢，说士人没有我就无法富贵；士人对君主十分傲慢，说君主没有士人就无法安存。有的君主直至丧失国家还不觉悟，有的士人直至饥寒交迫还不做官。君臣不和，那么国家的大政方针就无法确定了。”庄王说：“太好了。愿丞相与诸位大夫共同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原来所谓善政，就是要根据世俗而施行教化，考察失误而制定防范措施，威德兼施，文武并用，然后政治适宜于时势，那么不守本分的人便可安定下来。从前董仲舒说：“治理国家好比弹奏琴瑟，对那些不协调的弦就解开然后重新调整。”重新调整不容易办到，而违背众人的却遭灭亡，所以贾谊因才智被贬逐，而朝错因才智遭杀身。世上虽存在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于进言，原因在于惧怕重踏前人的覆辙啊。

况且制订法律禁令，并非能够全面制止天下的奸邪，

普遍符合众人的欲望，大抵采用对国家对事情有较多好处的就行了。设置官吏，是为了治理万民，悬赏施罚，是为了区别善恶。恶人被杀伤，那么善人就得福了。如今人们相互杀伤，虽然已经伏法，但私自结下怨仇，子孙相互报复，后来的怨恨比从前更深，甚至灭绝满门，倾家荡产，可是世俗却称做豪杰，所以尽管有的十分怯弱，还勉强这样做，这是听凭人们自行其事而不再有法律禁令了啊。现在应申明旧令，如果已经伏法还私下相互伤害的，虽然只身逃亡，也应将家属全都流放到边境地区。那些相互杀伤的，要比常刑加倍惩罚，不准雇人替罪。这样一来，那么怨仇自然解开，盗贼也就没有了。

治理国家的原则，是提倡农业而抑制工商业，因此汉高祖对从事两种职业的人加以限制，约束商贾不准做官为吏，这是为了抑制兼并，勉励廉耻。如今富商大贾，大量放贷钱物，中等家庭的子弟，做他们的佣工，奔走和仆人一样勤快，收取的利息和享有封地的贵族的收入相等，因此众人羡慕效法，不耕而食，甚至大量贩运奢侈浪费的东西，用来淫乱人们的耳目。现在可以让商贾们相互检举揭发，如果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便将赃物全部奖给告发的人。像这样，就只能自己一人奔走，不敢将货物委托他人，事情少，力量弱，必定回到田亩劳作。田亩修整好，那么谷物收成多而地力就得到充分利用了。

又见按法令判决案件，轻重不一，或同一事件所用法令不同，同一罪行定罪两样，奸猾的官吏得机会上下其手，想放条生路的就提出不该死的意见，想进行陷害

的就与死罪相提并论，这叫做刑开二门。现在可让精通义理、明习法律的，审定案例，统一法度，向下颁布到郡国，废除旧的条例。像这样，天下有法可依，那么狱讼就没有冤枉和不当了。

奏章奉上，没有下落。

这时皇帝正迷信谶记，多用来决定疑难。又俸禄薄，赏赐少，天下长期难于安定。桓谭又上疏说：

我上次进献不明事理的言论，未蒙诏书回答，不胜烦闷，冒死进一步陈述。愚蠢的人出谋划策，之所以对政事有好处，是因为合人心而得事理。大凡人之常情对眼前的事情容易忽略，对奇异的传闻特别重视。观察先王的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没有奇怪虚诞的事情。原来天道和性命，是圣人很少谈论的。从子贡以下，都没有能够听到，何况后世浅薄的儒生，能够将天道性命搞清楚吗？如今各种耍小聪明、小才干、掌握方技术数的人，夸张符命，假托谶记，用欺骗邪恶的手段，贻误君主，怎能不压制疏远他们呢！臣桓谭伏闻陛下穷究挫败方士的炼金术，实在太高明了；但却想听从接纳谶记，又为何如此失策呢！谶记所说的事虽然有时应验，但就好比卜卦得奇数偶数是一样的。陛下应当集中圣明的听觉，开启圣明的思想，屏弃群小的邪说，阐述《五经》的正义，不理雷同的俗语，详察通人的良谋。

臣又听说天下太平就尊重有道德学术的士人，天下危难就崇尚披甲冠胄的臣子。如今圣朝复兴祖宗的传统，作为臣民的主子，而四方盗贼没有全部归顺，这是因为

没有掌握权谋的缘故。臣桓谭伏观陛下用兵，对所有投降和占领的地方，既不施重赏用恩德加以诱导，有时甚至还虏掠抢夺那里的财物，因此长官头领各自产生怀疑，结成朋党，成年累月不能拆散。古人说过：“天下都知道取之为取，而没有人知道与之之为取。”陛下真能轻视爵禄进行重赏，和士人共同享用，那么哪里有招唤而不到来的，哪里有解释而不明白的，哪里有向前而不畅通的，哪里有征讨而不克服的！果真这样，那么就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亡者复存，失者复得了。

皇帝察看奏章，更加不高兴。

后来下诏聚众研究灵台的建造地址，皇帝问桓谭：“我想用讖语做出决定，怎么样？”桓谭沉默很长时间，回答说：“臣不读讖。”皇帝问他什么缘故，桓谭再次极力说明讖语不是经典。皇帝大怒说：“桓谭诽谤圣人，无法无天，拉下去杀了。”桓谭叩头流血，过了好长时间才得到宽恕。贬为六安郡丞，心思恍惚，闷闷不乐，在路上病死了，时年七十多岁。

当初，桓谭著书论说当代行事共二十九篇，称为《新论》，上书敬献，光武帝十分赞赏。《琴道》一篇没有完成，汉章帝命班固续成。所著赋、诤、书、奏共二十六篇。

元和中，汉章帝往东方巡视，来到沛地，命使者到桓谭的墓前祭奠，乡里以此为荣。

（梁运华 译）

【原文】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

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哀、平间，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是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谭进说曰：“昔武帝欲立卫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变，可不忧哉！”晏惊动，曰：“然，为之奈何？”谭曰：“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备。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势，貽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谦慙，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晏曰“善”。遂罢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谭所戒。后贤果风太医令真钦，使求傅氏罪过，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及董贤为大司马，闻谭名，欲与之交。谭先奏书于贤，说以辅国保身之术，贤不能用，遂不与通。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兢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徵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

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朝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害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书奏，不省。

是时帝方信讖，多以决定嫌疑。又畴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

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懣，冒死复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讖记，以欺惑贪邪，诳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讖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今圣朝兴复祖统，为人臣主，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此权谋未得也。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陛下诚能轻爵重赏，与士共之，

则何招而不至，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开，何征而不克！如此，则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亡者复存，失者复得矣。

帝省奏，愈不悦。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讖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讖。”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讖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绩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肃宗行东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

王充、王符、仲长统传

——《后汉书》卷七九

【说明】王充（公元 27—约 97 年），字仲任，东汉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曾游都城洛阳，在太学师事班彪。家境贫寒，经常到书摊看书，因此博通百家之言。后回乡教书。官至郡功曹、治中，均不得意。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在于著书立说，不信神，不信鬼，不做圣贤之言的奴隶，批判虚妄，追求真理，毫不畏惧权势，是一位出色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生平及思想主要见于所著的《论衡》。

王符（约公元 85—162 年），字节信，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他终身隐居著书，研讨治国安民之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习尚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社会的祸乱是统治者昏庸造成的，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著作有《潜夫论》，本传选录了五篇。

仲长统（公元 180—220 年），字公理，东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西北）人。从小好学，生性倜傥，敢于直言，不拘小节，当时人称为狂生。官至尚书郎，曾帮助曹操办理军务。他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侈靡腐败极为不满，认为富贵产生不仁，荒淫导致昏庸，是世乱的根源所在，并提出各种改变

世风的主张。著作有《昌言》，大部分佚失，本传选录了三篇。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的先辈从魏郡元城迁到这里。王充从小便是孤儿，家乡的人称赞他十分孝顺。后来到达京城，在太学学习，师事扶风班彪。喜好博览群书而不死守章句。家中贫穷，没有书籍，经常出入洛阳的集市商店，阅读那里出售的书籍，看一遍就能背诵，因此博通各家各派的学说。后来回归故里，隐居教书。在郡里做官到功曹，因多次进谏争论不合而辞官。

王充喜好发表议论，开始好像十分奇特，与众不同，最终却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依据。认为世俗儒生死守书本，大都违背真实情况，于是闭门深思，谢绝喜庆吊唁的礼节，门窗墙壁都安放书写用的刀笔，撰写《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言，辨析万事万物的同异，解决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疑难问题。

刺史董勤征召他为从事，升迁为治中，自己辞官回家。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的才能和学识，汉章帝特地下诏书用公车征召他，因为有病而没有成行。年近七十，精力衰减，于是编写《养性书》十六篇，节制嗜好欲望，自己注意保养精神。汉和帝永元（公元89—105年）中，在家中病逝。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从小好学，有志向操守，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十分友好。安定地区社会上鄙视妾生的孩子，而王符母亲家里没有人，被乡里人瞧不起。自汉和帝、安帝之后，世俗致力于外出做官，掌握实权的大官

更番相互引荐，而王符却性情耿介，不同于流俗，因此便得不到进升。心情郁闷怨恨，于是隐居著书三十多篇，用来讥刺当时社会的得失，不想显露自己的名声，因此命名为《潜夫论》。书的中心思想在于攻击当时社会的弊端，声讨谴责物理人情，足以看出当时社会的风俗政治，现著录其中的五篇。

《贵忠篇》说：

帝王所尊敬的是天，皇天所爱护养育的是人。如今人臣接受君主委任的重位，治理皇天钟爱的人民，怎么能够不使他们享受安宁而获得利益，养育而救济他们呢？因此君子做官就想着使人民获得利益，向上表达意见就想着荐举贤能，所以在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尚书》说：“皇天的职能，人理当代替它完成。”成就王业的人效法皇天而设置官位，所以英明的君主不敢凭私情授官，忠臣不敢凭空而任职。窃取人家的财物尚且称为盗，何况偷取皇天的官位以满足一己的私利呢！用罪恶的手段侵害人，必定加以诛杀惩罚，何况是侵害皇天，怎么会不招灾惹祸呢？唐虞夏商周五代的臣子，用正道侍奉君主，恩泽施及草木，仁爱覆盖大地，因此福祚流传繁衍，宗族延续百世。末代的臣子，用谄媚侍奉君主，不考虑顺从皇天，专门依仗杀伐。白起、蒙恬，秦王朝把他们当作功臣，皇天把他们当作奸贼；息夫、董贤，君主将他们当作忠臣，皇天将他们当作强盗。《周易》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不遭到惩罚的实在太少了。”因此道德与职位不相称，遭到的祸害必定十分悲惨；才能与职位不相称，蒙受的灾殃必定大得惊人。那些窃据

官位的人，皇天夺走他们察看自己的镜子，尽管有善于明察的资质，施行仁义的志向，一旦富贵，就背弃亲朋故旧，丧失他们的本心，疏远骨肉而亲近小人，薄待知心朋友而厚爱走狗坐骑，宁可看着金钱堆积成山，也不肯将一文钱借贷旁人，情知仓库里的存粮腐烂，也不肯把一斗米借贷旁人，骨肉怨恨于家，百姓咒骂于路。前人因此败亡，后人争相沿袭，实在令人痛心啊！

纵观前代朝廷要人的用心，和幼小的婴儿有什么不同呢？婴儿有经常出现的病痛，贵臣有经常遭到的祸殃，父母有经常出现的失误，君主有经常犯的过错。婴儿经常出现的病痛，是因为吃得过多造成的；贵臣经常遭到的祸殃，是因为过于受宠造成的。哺乳太多就生癫痫病，富贵过头就犯骄横病。溺爱的孩子遭伤害，骄横的臣子被灭亡，并非少数啊！惩罚得最厉害的，便是有的趴着死在大牢里，有的被斩首在大街上，难道不是无功于天，有害于人么！鸟儿以为山太低便将巢高筑在它的上面，鱼儿以为泉太浅便在它的里面凿穴居住，最终被人们捉住，是因为诱饵的缘故。贵戚希望自己的住宅吉利而替它取了美名，想让住宅的门坚实而制造了铁枢，最终遭到败亡，并非因为苦于禁忌太少和门枢腐朽，而是因为时常苦于崇尚财货和行为骄横不守本分啊。

不上顺天心，下育人物，却想凭借自己个人的小聪明，私下戏弄君主的权威，违背天地，欺诬神明，居累卵之危，却图泰山之安，行若朝露，却想功传万世，难道不是太糊涂了吗！难道不是太糊涂了吗！

《浮侈篇》说：

帝王把天下当作家，把万民当作子。一个农夫不耕种，天下因此有人挨饿；一个妇女不纺织，天下因此有人受冻。如今所有世俗之人放弃农业这个根本，争着去经商谋利，牛马车辆，填塞道路，游手好闲、投机取巧，充满城镇。从事农业生产的少，张嘴吃闲饭的人多。《诗经》上说：“繁华的都城，四方的中心。”现在看看洛阳，从事商业的十倍于农夫，游手好闲的十倍于商人。这就是一个农夫耕种，一百个人吃饭，一个妇女养蚕，一百个人穿衣，用一个人养活一百人，怎能供给得了！天下上百个郡，上千个县，城镇以万计，大都是如此。农商不能满足供给，那么人民怎能不遭受饥寒？饥寒交迫，那么人民怎能不做坏事？做坏事的人太多，那么官吏怎能不严酷？屡遭严法酷刑，那么老百姓怎能不痛苦怨恨？痛苦怨恨的人多了，那么灾祸的征兆便一齐到来。老百姓活不下去，上天又降灾难，那么国家就岌岌可危了！

贫穷是从富裕转化来的，衰弱是从强盛转化来的，祸乱是从太平转化来的，危亡是从安定转化来的。因此英明的君主教养人民，关心他们，慰劳他们，教育他们，开导他们，防微杜渐，以打消他们的不良企图。所以《周易》赞美从节约出发来制定各种规范，不伤财，不害民。《诗经·七月》这首诗，教育人民做各种农活，一年到头终而复始。从这里看来，人本来是不可放纵的。

现在的人，衣着奢华，饮食侈靡，专门搬弄是非，擅长尔虞我诈。有的人以图谋不轨合伙犯禁为业，有的人

以嬉戏赌博为事。成年男子不扶犁把锄，却怀夹弹丸，携手上山遨游。有的喜好用土做弹丸出卖，对外不能防御寇盗，对内不能消灭鼠雀。有的造泥车瓦狗等各种供玩乐的器具，用来欺骗小孩。这些都是毫无益处的。

《诗经》中讽刺说：“妇女不绩麻，街上舞婆娑。”又妇女不料理家务，放弃养蚕织布，却学做巫婆，装神弄鬼，蒙骗百姓，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的人家，心怀忧虑，愁苦不堪，很容易被吓倒。甚至使得他们四处奔走以讨吉利，离开住宅，待在崎岖的山路旁，被风寒所伤，遭奸人暗算，受强盗抢劫。有的加重了灾祸，甚至死亡，却不知是被巫婆欺骗伤害，反而悔恨侍奉鬼神太晚了，这种事情实在荒唐到了极点。

有的人用美丽的绸子剪裁绘画，用来书写祝辞；有的人花言巧语，希望获得福祚；有的人剪碎五彩的缎子，弄成只有分寸的小块；有的人截断各种丝线，缠绕在手腕上；有的人裁剪绮罗，拼缝成幡。所有这些浪费了成百匹的绸缎，花去了成千倍的功夫，把牢固的东西破坏掉变得毫无用处，将简单的事情搞得十分繁难，白吃了好的粮食，消耗宝贵的光阴。山林不能满足野火，江海不能装满漏卮，所有这些都是应当禁止的。

从前汉文帝身穿粗绸，以皮做鞋，用革为带，如今京城贵戚，衣服饮食，车辆房舍，其奢侈程度远远超过帝王规定的制度，实在太不像话了。而且他们的家奴婢妾，都穿戴彩带花绸，锦绣绮纨，精细的葛布、越布、筒中布，犀角、象牙、珠玉、琥珀、玳瑁，雕刻上隐约的

山水花纹，镶嵌着金银丝线，穷极奢丽，转相夸耀。那些嫁娶的人，车辆排数里，帘幕遮满道，骑马的家奴，侍候的僮仆，在车旁前呼后拥。富人竞相攀比，穷人羞愧不及，一次宴会的花消，破费一辈子的产业。古人一定要有官职然后才能穿丝绸，乘车马，现在虽然不能复古，也应该令小民稍微效法汉文帝时的规定。

古代埋葬死人，裹上厚厚的草，埋在野外，不起坟，不植树，丧期没有固定的时间。后代的圣人改用棺槨，用桐木做棺材，用葛藤捆紧，掘坑不见泉水，掩土不泄臭味。中世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杙、槨为棺，都是就地取材，只用胶漆，使它坚固可靠，能够使用，如此而已。如今的京城贵戚，一定要用江南出产的櫟、梓、豫章等珍贵木材。边远的小地方，也竞相仿效。櫟、梓、豫章这些东西，出产在特别遥远的地方，从高山上砍伐下来，拖到深谷里，弄到大海边，经过淮河，逆黄河，溯洛水，工匠雕刻，连日累月，聚集众人才能移动，使用很多的牛才能运到，重达千斤，动用近万人，东到乐浪，西至敦煌，在上万里的地区费力伤农。古代建墓而不起坟，中世起坟而不高大。孔子死了母亲，坟高四尺，遇雨崩塌，弟子请求修筑，孔子哭泣说：“古人不修坟。”到儿子孔鲤死的时候，只有棺，没有槨。汉文帝葬在芷阳，汉明帝葬在洛南，都不埋藏珠宝，不起山陵，坟墓虽然低矮，道德最为高尚。如今京城贵戚，郡县豪家，活着的时候不尽心赡养，死后却大办丧事。有的甚至使用金缕玉匣，选用櫟、梓、楸、柏木，大量埋葬珍宝、偶人、

车马，筑起高大的坟墓，种植很多松柏，建造房屋祠堂，竭力崇尚奢华。考察周文王、武王在郾、毕的陵墓，曾子父亲在南城的坟茔，并非周公不忠，曾子不孝，他们以为，表彰君父，不在于大量的财物；光宗耀祖，不取决于车马。从前晋灵公增加赋税，用来装修墙壁，《春秋》认为不像君主的样子；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不像臣子的样子，何况是一般官吏士大夫和庶民，怎能奢侈到僭越君主，违背天道呢？

《实贡篇》说：

国家因贤能兴起，因谄媚衰微；君主因忠臣安宁，因奸佞危亡。这是古今的通论，得到社会的共识。然而衰败的国家，危亡的君主，络绎不绝，哪里是因为当时没有忠信正直的士人呢，实在是苦于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实行啊。在十步之内，必定有茂盛的草；十户人家居住的地方，必定有忠信之人。因此危乱的殷朝有三位仁人，弱小的卫国君子众多。现在以大汉朝如此广大的领土，士人民众如此众多，朝廷如此清明，上下如此善良正派，而做官的却没有好官，在位的却没有良臣。这哪里是社会上没有贤能，想来是因为使用的人名不符实。原来坚持正道的缺少知己，顺从世俗的同伙众多，因此结党营私，放弃质朴，崇尚浮华。那些荐举士人的，不再根据他们的本质才干，衡量他们的能力操行，只是凭空捏造名誉，胡乱抬高声望。粗略估计举荐的人，每年差不多二百。察看他们的样子，那么品行可与颜渊、冉求比美；认真考核他们的能力，那么很少赶得上中等人，都是伙同追求

升官，相互推举引荐。作为士人，重在如何使用，不要求十全十美。所以孔子的四个弟子虽然都很好，但才能并没有相互兼有；殷朝的三位仁人一起招致，并没有做同样的事情。汉高祖的辅佐之臣，来自灭亡的秦朝；汉光武得到士人，也全靠残暴的王莽。何况太平盛世，能说没有士人吗！

英明君主的诏令好像声音，忠臣的附和好比回响。声响的长短大小，清浊快慢，必定是相互适应的。况且加工玉要用石头，淘洗金子要用盐，洗涤锦缎要用鱼，漂洗布匹要用灰。万物本来就有用贱的治理贵的，用丑的改变好的这种情形。聪明的人弃短取长，以成就自己的功业。现在如果荐举士人都能考核真才实学，他们有点小毛病，不用勉强掩饰，进退语默，各随他们方便，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之辈，哪里会招致不来，吴汉、邓禹、梁统、窦融之属，立等可得。孔子说：“没有加以考虑啊，哪有什么遥远的呢？”

《爱日篇》说：

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人民。人民之所以成为人民，是因为有粮食。粮食之所以能丰产，是因为有人的功绩。人的功绩之所以能建立，是因为有充足的时间。太平国家的日子十分漫长，所以人民闲暇而有余力；危乱国家的日子十分短促，所以人民苦于追求而无余力。日子漫长，不是说太阳慢慢移动，乃是君主英明，人民安宁而有余力。日子短促，不是说减损时间刻度，乃是在上位的昏庸，在下位的胡来，没有余力。孔子说：

“既然人口众多，就让他们富起来，已经富了，便加强对他们进行教育。”因此礼义的产生是由于富足，盗贼的出现是由于贫穷。富足的产生是由于时间充裕，贫穷的出现是由于没有时间。圣人深刻理解劳力是人民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所以尽力减省徭役，使大家珍惜时间。因此尧命管历法的羲氏、和氏，“恭敬地顺从皇天，慎重地颁布农时。”汉明帝时，接待臣民上书的公车令因凶日不接受奏章，皇帝听说后责怪说：“人民放弃农业生产，老远来到宫门，却又用禁忌来加以限制，难道符合管理政事的本意吗？”于是便取消这种规定。如今冤民渴望申诉，而官吏却以神自居，百姓放弃农业生产赶往官府衙门的，在路上排队等候，非从早到晚得不到通报，非行贿不能被召见。有的连日累月，三番五次探望；有的转请街坊邻居，给被囚禁的送饭，听候召唤。一年的收成已经亏耗，天下怎能没有受饥挨饿的呢？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从这句话看起来，中等才能以上，足以审议是非曲直，乡长、亭长和部吏，也有能胜任判案的，却大都造成冤案，这是有缘故的。理直就凭借正义而不屈，事亏就谄媚阿谀而行贿。不屈所以不会给官吏好处，行贿因此得到法律的偏袒。如果案子有反复，官吏会相应受罚。官吏因为会相应受罚，不得不在公堂上冤枉好人。以无依无靠的贫弱小民，同豪强猾吏对簿公堂，在这种形势之下，怎么会不遭冤屈呢？县官听从小吏的说法，所以和小吏一模一样。如果案子有反复，县官也会相应受罚。县官因为

会相应受罚，于是在郡衙里串通一气。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民，却同一县的官吏对簿公堂，他的理由难道能得到伸张吗？案子有反复，郡守也会遭到处罚。郡守因为会一起受罚的缘故，便在州衙里串通一气。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民，同一郡的官吏对簿公堂，在这种形势之下，难道能获得胜利吗？既然不肯禀公审理，所以才老远来到三公衙门。三公衙门又不能认真核察，当然就拖延日期。贫弱的无法旷日持久，有权有势的富人可以耗满千日。审理诉讼像这个样子，有什么样的冤枉能得到昭雪呢！正直的人满怀怨恨而不能伸冤，奸猾的官吏袒护坏人而不受惩罚，这就是小民容易被侵害，而天下人民多困苦贫穷的原因。

姑且排除上天因感伤而降灾不说，只就花费在诉讼上的人工而论。从三公州郡衙门，到乡县主管的官吏，打官司的人，与官司相关联反复审查对质的人，每天差不多有十万人。一个人参与讼事，要两个人帮着应付，这就是每天有三十万人荒废自己的本业。按中等农夫可养活的人口计算，那么这就是每年有三百万人因此要挨饿了。这样一来，盗贼怎样会消灭，太平怎么能实现呢！《诗经》上说：“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富有，君主哪来的富有？怎能不想一想呢！怎能不想一想呢！《述赦篇》说：

凡治疗疾病的，必须知道脉的虚实，气结不散的原因，然后开出药方，所以病能治好而命可延长。治理国家的，必须首先知道人民受苦的原因，灾祸产生的原因，

然后加以禁止，所以奸邪可以杜绝而国家能够安宁。现在贼害良民最厉害的，没有超过屡次赦免和赎罪的了。赦免和赎罪频繁，那么恶人嚣张而善人就悲伤了。用什么说明这个问题呢？原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人，自身不去做坏事，又有的官吏十分正直，不避强暴，而奸猾之徒却对他们横加诬陷，是因为都知道赦免不会太久的缘故。善人君子，被侵害怀恨而能到宫廷自己剖白的，万人中没有几人；这几个人之中能得到尚书省讯问的，百人之中不过一人；已经对簿尚书省而凭空被打发回去的，又占了十分之六七了。那些轻薄奸猾为乱之徒，既然已经沦陷法网，怨恨的人家便希望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解除心中的积愤，却反而一概被赦免释放，让恶人大举宴会而放肆夸耀，盗贼老手服藏赃物而经过家门。孝子看见仇人而不能声讨，被盗的人见到东西而不敢索要，悲痛之情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

养杂草的伤害庄稼，施惠奸邪的贼害良民。《尚书》说：“文王制定刑法，对恶人加以惩办不要赦免。”先王制定刑法，不是喜好损伤人的肌肤，断送人的寿命，而是注重威慑奸邪，惩治恶人，清除害人虫。所以经书称赞“上天赏赐有道德的人，制定五种官服分五种色彩；上天惩治有罪恶的人，制定五种刑法有五种用途”。《诗经》讽刺“他应当判罪，你却将他开脱”。古时候只有最初接受天命的君主，继天下大乱的顶点，盗贼奸邪难于被法令禁止，所以不得不有所赦免，同他们一起更新社会，让万民休养生息，以实现天下太平。并不是以此培

养奸邪，姑息罪恶，放纵天贼。性恶的人，是人民中的豺狼，虽然受宽宥、释放之恩，终究没有改悔之意。早上摆脱沉重的枷锁，晚上又回到关押的牢笼，严肃公正的长官，不能使他们永远绝迹。为什么呢？大凡敢于做大坏事的，才能必定有超过众人的地方，而且能够自己取媚于在上位的人。他们大量分发不义之财，用谄媚阿谀之辞进行奉承，以此辗转相互驱使，没有第五公那样清廉正直的品行，谁不为之动心呢？议论的人都说：“长期不赦免，那么奸邪气焰嚣张，而官吏不能制服，应当经常开脱过失将他们释放。”这是没有弄清政治混乱的根本原因，不懂得祸福产生的根源所在啊。

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辞官回到安定，乡人中有一位用钱财捐得雁门太守的，亦离职回家，写名片拜见皇甫规。皇甫规躺着不起来迎接。既已进屋，便问道：“你从前当太守时吃雁肉味道好吗？”过一会，又禀报王符在门外。皇甫规素来听说王符的名声，便十分惊讶地赶紧起身，来不及系衣带，拖着鞋出外迎接，拉着王符的手进来，和他坐在一起，高兴极了。当时的人评论说：“但见郡太守，不如一儒生。”是说书生注重道义特别值得推崇。王符终究不做官，最后死在家里。

仲长仲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从小好学，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擅长文辞。二十多岁，在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间游学，与他交朋友的都对他另眼相看。并州刺史高干，是袁绍的外甥，向来高贵而有名望，招致四方游学的士人，士人归附的很多。仲长统路过进见高干，高干十分友善地款待，征

求对时事的看法。仲长统对高干说：“您有雄心而无雄才，喜好士人而不会选择人，这是我要深切告戒您的。”高干平素自视甚高，不采纳他的意见，仲长统于是离去。没过多久，高干凭借并州叛乱，终于遭到失败。并州、冀州的士人都因此对仲长统另眼相看。

仲长统生性倜傥，敢于直言，不拘小节，默语无常，当时有的人称他为狂生。每逢州里、郡里派人召见，就称病不往。平时认为，凡是游说帝王的，是想以此立身扬名，可是名声不长存，人生易消逝，悠闲自在，可以自得其乐。想选择一个清静空旷的地方居住，以满足自己的愿望，并议论说：“如果居住的地方有良田，有宽敞的宅院，背山临水，沟池环绕，遍地竹木，房前建场圃，屋后造果园。有舟车足以替代步行的艰难，有使唤的人足以摆脱四肢的劳苦。奉养双亲有多种名贵的菜肴，妻儿没有吃苦受累的劳作。高朋云集，就摆酒菜使他们高高兴兴；佳节吉日，就烹猪羊以供奉先人。徘徊于田间林苑，游戏在平地树丛，濯洗清流，追随凉风，垂钓游鲤，仰射飞鸿。在舞雩台下讽诵，歌咏着回到高堂之上。闺房中安心养神，思考老子玄妙莫测心境虚灵的意旨；呼吸精气和气，达到与至人无物无我相仿佛的境界。与几位胸襟开阔的人论道讲书，穷究天地，品评人物，弹奏高雅的《南风》琴曲，发出清高美妙的声音。逍遥于尘世之外，睥睨于天地之间。不承担当代的责任，永保性命以尽天年。像这样，就可以凌于霄汉之上，出于宇宙之外了。哪里还羡慕出入帝王之门呢！”又作诗两篇，以表达自己的志向，诗曰：

飞鸟留下足迹，蝉儿脱掉陈壳。腾蛇遗弃鳞甲，神

龙解除头角。至人善于应变，达士超越世俗。驾云不用马缰，御风无须双足。垂露形成帷帘，天空便是帷幕。沆瀣当作饮食，太阳权当灯烛。恒星艳丽如珠，朝霞滑润似玉。天地四方之间，听凭心意所欲。人事全可抛弃，哪里还受拘束！

大道虽然很平坦，察见征兆人实少。随心所俗无过错，追随万物不讨好。古来纠缠解不开，委曲求全似锁套。千思百虑又何必，自身想开最重要。愁云寄放在天空，忧思深埋在地下。背叛废置乃《五经》，毁灭抛弃是《风》、《雅》。诸子百家大杂烩，请让他们化火花。坚定志向居山林，驰骋心意到天涯。元气姑且当小舟，微风自然做船舵。自由翱翔在太空，纵情打扮全在我。

尚书令荀彧听到仲长统的名声，对他十分赞赏，推荐为尚书郎。仲长统后来曾帮助丞相曹操办理军务。每当议论古今和现实的风气行事，常恼怒叹息，因而写下论著名叫《昌言》，共三十四篇，十万余言。

汉献帝让位那年，仲长统逝世，时年四十一。友人东海缪袭曾赞美仲长统的才华文章足以承接西汉时的董仲舒、贾谊、刘向、杨雄。现简要摘录他的书中对政事有补益的文字，略加记载。

《理乱篇》说：

顺应天命出现的豪杰，原本没有据有天下的名分。没有据有天下的名分，所以争战便纷纷发生。在这个时候，都假借天威，矫命占据一方自立为国，拥有军队同我较

量才能智慧，比试勇气力量与我争高低，不知进退，贻误天下，真是数不胜数。斗智的都穷途末路，斗力的都败下阵来，形不堪复抗，势不足再争，于是才头颈套绳索，到我这儿听从摆布。这些人有的曾是我的尊长，有的曾是我的同辈，有的曾使唤过我，有的曾拘禁过我。他们得意的时候，都在心中咒骂，庆幸我遭到失败，并以此奋力实现他们从前的志向，岂肯把现在这种结果作为终身的名分呢？

到继承皇位的时候，民心已经安定了。普天之下，靠我而得到生存繁衍，因我而得到富贵，安居乐业，养育子孙，天下一片太平景象，全都归心于我了。豪杰的雄心已经消逝，士民的志向已经摆平，最贵的只有固定的一家，最尊的只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虽然是最愚蠢的人当皇帝，也能使他的恩德如同天地，威望好比鬼神。暴风迅雷，不足以形容他的愤怒；阳春时雨，不足以比喻他的恩泽；周公、孔子几千个，无法再与他的圣明争高下；孟贲、夏育上百万，无法再同他的勇武较长短了。

到后世继承帝位的昏君，见天下无人敢违抗他，自认为像天地那样不会消亡，便放纵自己的私欲，驰骋自己的邪念，君臣公开淫乱，上下一起胡为。目极杂耍游戏，耳穷靡靡之音，入则沉溺女色，出则玩命打猎，荒废政事，抛弃人才，有如洪水泛滥，没有尽头。信任亲爱的人，都是献媚阿谀之徒，受宠极贵的人，全为后妃姬妾之家。让饿狼守庖厨，饥虎管猪圈，便发展到煎熬天下人的脂膏，敲吸活人的骨髓。愤恨绝望，祸乱并起，

全国一片混乱，外族侵夺背叛，土崩瓦解，一朝覆亡。从前是我哺养的子孙，如今全成了饮我鲜血的仇敌。直到天命转移，大势已去，仍然不觉悟的，难道不是因富贵产生了不仁，荒淫导致了昏庸吗？存亡因此更替，治乱从此反复，这正是天道永恒的规律。

又管理政事的人，只知采取权宜之计罢了，不能认真思考贤人和愚人的区别，以便揭示国家盛衰的规律。一天天不如古代，越往后差得越远，难道不是这样吗？汉朝兴起以来，相互都是普通百姓，而凭借财力占据统治地位的，世上无计其数。可是清廉纯洁的士人，自己白白在荆棘丛中受苦，对世风世俗一点影响也没有。富豪人家的房屋，鳞次栉比数百间，肥沃的田地布满原野，奴婢上千，依附的人以万计。用车船贩货经商，通达四面八方；囤积居奇，遍布都市城镇。珍奇宝物，巨大的房屋容纳不下；马牛羊猪，深山大谷承受不了。妖冶的童仆婢妾，填满华丽的居室；歌舞弹唱的艺人，陈列在幽静的厅堂。宾客等待进见而不敢离开，车辆马匹纵横交错而不敢前行。牛羊猪肉，多到臭不可食；清醇美酒，多到变质不可饮用。稍有顾盼，那么大家就随他的目光探望；略显喜怒，那么大家就迎合他的心意改容。这些都是公侯们的享受，统治者的财富。如果能运用智谋，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如果能得到这些东西，人们便不会认为是一种罪恶。源头一打开便到处横流，道路一铺好便四通八达了。要求士人放弃荣华享受而甘居穷苦，抛开自由自在而自找束缚，谁肯这样做呢！乱世长而治世

短。乱世则小人富贵荣宠，君子困穷卑贱。当君子困穷卑贱的时候，在高天下弯腰，在厚地上敛足，还惟恐遭到压迫的灾祸。待到治世，却又深受矫枉过正的限制。老的快死了，不能赶上轻松富裕的社会；年轻的刚步入壮年，又将在衰乱的时代穷愁潦倒。这是让奸人专擅无穷的福利，而善士承担不赦的罪孽。如果眼睛能分辨颜色，耳朵能分辨声音，嘴巴能分辨味道，身体能分辨冷暖，都将把修养洁身当作难言的罪过，想方设法加以避开，哪里会有肯安贫乐道的呢？这正是后世君主权宜处事的过错啊！

从前春秋时代，是周王朝的乱世。到了战国，就更加厉害了。秦始皇利用兼并各国的势头，放纵虎狼般的野心，宰割天下，吞食幸存者，残暴极了，因而招来了楚汉争战的苦难，远远超过了战国时代。汉王朝经历二百年又遇到王莽作乱，计算这次被杀戮死亡的人数，又超过秦始皇、项羽时一倍多。到了今天，著名的都市空虚而无人居住，百里之内绝迹而看不见人的，不可胜数。这就又超过王莽作乱的时候了。可悲啊！不到五百年，出现三次大灾难，中间其他的祸乱尚且不计算在内。越演变越可怕，越往后越残酷，照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就达到全部死光的地步了。唉！不知后世圣人将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拯救社会危难啊！又不知上天如果让这种社会规律发展到了尽头，还想让它走到哪里去呢？

《损益篇》：

措施对社会有利，制度对万物适宜，可加以实行。事

情违背礼数，法令忽略现实，应当加以改变。所以在古代推行产生过效益，用在今天没有好处的，不可不进行改变。改变后反而不如从前，替换后反而失败更多的，也不可不加以恢复。汉王朝刚兴起的时候，分别封子弟为王，将士人百姓的性命托付他们，把生杀大权交给他们。因此骄奢放纵，欲望无度。鱼肉百姓，以满足他们的私欲；奸淫骨肉，以发泄他们的情欲。对上有篡逆背叛的不法行为，对下有暴虐凶残的严重危害。虽然是凭借亲属的恩典，但原本也是历史的发展和形势使他们成这个样子的。爵位被降低，封地被削减，权力被慢慢剥夺，最终至于坐食俸禄罢了。但他们的污秽行为，荒淫昏庸的罪行，还是非常多的。所以使他们的根基变浅，对他们的恩义减少，尚且还假借一日的尊贵地位，让士人百姓替他效力，何况是专权于封国，擅自传位于后代的时候，怎能通过鞭打喝骂，便让他们完全听从我的摆布呢？政治衰败，风俗改变，纯朴丧失，奸诈出现。摆脱礼制的约束，纵情于嗜欲之中已经很久了，原本就不该将权柄交给他们，把资本借给他们。因此收回他们世代继承的权力，阻止他们跋扈的势头，优秀的尽快提升，邪恶的及早铲除，所以地方上没有被埋没的士人，朝廷中没有专宠的贵人。这是变革很出色，可以一直推行下去的例子。

井田制被瓦解，豪强经商营利，房产遍布于州郡，田地连片于方国。自身连当小吏的命都没有，却偷偷穿戴只有三公才能享有的彩服，连五户居民的头领都不是，却

役使有千户人家的名邑的百姓。荣华享乐超过有封地的贵族，权势等同于郡守县令，财货私营不纳税，违犯法律不受罚，刺客和敢死之士为他卖命。使得力单忠厚的人，被破帘坏，死于他乡而无人收敛，蒙受冤枉，走投无路而不敢控诉。虽然也有法纪松弛的原因，实则乃占有田地不受限制造成的。如今想重振太平社会的纲纪，确立长治久安的基础，平均人民的财富，纠正奢侈的风俗，非实施井田制就实在没有别的出路了。这是变革有失败，而应当恢复旧制的例子。

肉刑被废除，各种罪行便没有相应的惩治标准，不够死刑的就处以髡刑和钳刑，不够髡刑、钳刑的就处以鞭笞。处死的人不能复生，而受髡刑的并没有多大伤害。髡刑和鞭笞不足以惩办犯中等罪行的人，哪里能够不将他们处死呢？偷鸡摸狗，男女淫乱私奔，一般性的贿赂，误伤他人，都是不应当处以死刑的。杀了他们就太重，处以髡刑就太轻。不制订中等刑法以适合这样的罪行，那么法令怎能不混乱，生杀怎能没有差错呢？如今忧虑刑罚太轻不足以惩治恶人，就虚增赃物以定成死罪，假托病死以掩盖极刑。法律条文中无法找到依据，名实不相符，恐怕不是帝王的通法，圣人的良制吧！有人说：“从重处罚恶人是可以的。从重处罚了好人，哪里能够挽回呢？”回答说：“像前朝以来，从未冤枉杀害过善人，就是因为有罪而不处以死刑。这种做法是对杀人能够容忍，而对处死罪犯不能容忍。现在使五种刑罚有明确的等级，定罪轻重有准确的界限，法律井井有条，定罪与罪行完

全相符，不是杀人、叛逆、作乱、乱伦等罪大恶极的人，一概不杀。继承周朝罕见的典籍，接续吕侯制订的刑律，这又是应当恢复旧制的最好例子。”

《易经》说：“阳卦一君二臣，是君子之道；阴卦二君一臣，是小人之道。”如此说来，那么少数人是人上人，多数人是人下人。五户人家的长官，是才能足以管理五户的人；一国的君主，是才能足以掌管一国的人；天下的王，是才能足以称王天下的人。愚人被智者使唤，好比树枝依附树干，这个道理是天下的正常法则。组建国家是为了分头治理百姓，推行政事是为了分头处理事务。百姓离得太远就难于安抚，事务集中一处就不易解决。现在边远地区州府的属县，有的相离数百千里，虽然山陵钁泽很多，仍有可以住人种谷的地方，应当重新划定管辖范围，使远的不超过二百里，把户籍登记清楚以便相互检查，将五户十户的地方组织详细划分以便相互连接帮助，限定农夫的占田数量以杜绝兼并，制订五种刑法以拯救无辜的死亡，增加官员以振兴政事，抓紧农业生产以充实储备，舍弃工商业以专注农业，勉励教学以转变不良性情，表彰德行以改变风俗，考核才干技能以合理安排官员，选择精明强悍的人以学习军事，保养武器以应付战争，严肃法律禁令以防止越轨行为，信守赏罚以落实奖惩，督察游戏以杜绝奸邪，清查苛政以消除烦扰暴虐。确定这十六个方面作为政务，长期坚持实施，定期检查考核，太平时不懈怠，有事时不慌乱，圣人再现，不能变更。

以往，天下户数超过千万，除去其中的老弱，只每户一强壮男子，便有千万人。遗漏的已经不少，在汉朝领域内居住的少数民族还没有计算在内。十个强壮男子中，必有能胜任什长伍长的人，按什长以上计算，就有百万人。又从中取十分之一，那么可做辅佐官吏的人才就超过十万人。又从中取十分之一，那么可以让他们担任政务长官的就有万人。凭借体力发挥作用的称为人，对人要求强壮；凭借智力发挥作用的称为士，对士要重老成。完全按这种规定来使用天下的人，还会有所储备，何必担心不够用呢？所以物品有不去寻求的，没有无物品的时候；士有不去使用的，没有缺乏士人的社会。只有像这样，然后便可以利用人的天性，穷尽人的道理，兴废继绝，网罗遗漏，包容天和人了。

有人说：“善于管理政事的，想清除烦扰苛刻，合并减省官职，以无为求有为，以无事求成功，您为何说出这番话呢？”回答说：如果这样，那么夏商周三代就不值得效法，圣人就不值得学习了。君子利用法制便实现天下大治，小人利用法制就造成天下大乱。都是同一个法制，有的用它实现大治，有的用它造成大乱，是因为做法完全不同啊。倘若用豺狼去放猪羊，用盗跖去管征税，国家昏乱，官吏放肆，那么对法制的损益还有什好议论的呢？百姓待君子然后感化治理，国家待积蓄才没有忧患。君子不是靠亲自从事农业生产来取得衣食的，积蓄不是靠横征暴敛来求得富足的。俸禄如果十分优厚，那么盘剥受贿的罪行才可以消灭；积蓄如果十会充足，那

么战争水旱的灾难就不必害怕。所以遵循正道得到俸禄，百姓不认为是奢侈；遵循正道征税，百姓不认为是抢夺。天灾流行，开仓库救济借贷，不也是仁政吗？衣食有富余，减少浪费奢华进行施舍，不也是义举吗？那些居官位为士人百姓长官的君子，本应享受大量的肉食和布帛，乘坐四匹马拉的红轮车子。现在反而说住破房子的才高尚，吃豆叶的才清高，既已丧失天地的本性，又提倡虚伪的名声，使不聪明的人占据高位，使各种事业荒废，未必不是从这里产生的。得到洁身自好的人而失去有才能的人，不是从建立功业的实际出发啊！凭廉洁得到荐举而因贪婪被免职，这不是士君子的本意。选用官吏必须取自善士，善士富的少而穷的多，俸禄不足以供养，怎能不多少做一些营私舞弊的事呢？因此而惩治他们，是设置机关陷阱以等待天下的君子啊！

盗贼灾荒，九州交替发生，饥饉突然出现，军队仓猝出征，横征赋税使百姓更加贫穷，剥夺减少小吏的俸禄。可依赖的东西很少，要收取的东西太多，上万里的地区长期匮乏，首尾不能相救，徭役一齐征调，农业荒废，万民向苍天哭喊呼叫，贫穷的流亡死于沟壑。现在按好田的平均产量，计算农业的收入，如果每亩收三斛，每斛征收一斗，并不算多。一岁之间，就有数年的储备，即使征调非法的徭役，放纵奢侈的欲望，大量赏赐受宠幸的人，也不可能用尽。不遵循古代的法制，改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处受灾，不到三年，核算亏空，坐视战士蔬食，立望饿殍满道，做君主的为什么要推行这种

政策呢？二十税一，孟子称为是野蛮人的做法，何况三十税一呢？克扣小吏的俸禄以充军用，起因于秦朝征讨诸侯，接着又征讨四夷。汉朝继承秦朝的事业，于是没有更改，使国家遭受危害，正是由此造成的。现在田地没有固定的主人，百姓没有固定的住处，小吏吃每天供给的东西，俸禄的品级没有确定。应当订立法制，统一条例，租税十一，更役赋税依旧不变。如今土广人稀，中等以下土地未能开垦。尽管如此，仍当限制富家大族，不让他们超过规定。凡是长草的田地，一概称为官田，有能力胜任农业劳动的，才允许分配。如果听凭自己占有，将来一定会出现不法行为。

《法诫篇》说：

《周礼》中提到六种立国的法规，是由冢宰掌管以辅佐君主治理天下的。春秋时期，有道德修养的诸侯，都用一位上卿主持国政。到了战国，也都是这样。秦朝兼并天下，便设丞相，用御使大夫作为辅佐。从汉高祖到汉成帝，沿袭不变，大都一辈子坚持到底。汉朝的昌盛，正在于此。任用一人便政事专一，任用数人便相互依赖。政事专一就协调一致，相互依赖就矛盾抵触。协调一致便是太平产生的根源，矛盾抵触便是混乱出现的原因。汉光武帝恼怒几代皇帝丧失权柄，愤恨强臣窃据帝位，矫枉过正，大权不下放，虽设置三公，政事都归台阁管理。从此以后，三公的职位，不过是充数而已。但政事有处理不当的，还是要进行谴责。然而权力移交给外戚之家，宠信遍及于身边的宦者，亲信同党，任用私人，内充京

师，外满州郡，颠倒贤愚，舞弊选举，愚蠢无能的人掌管地方，贪婪残暴的人统治百姓，骚扰人民，激怒四夷，招致叛乱，流离疾苦，怨气并作，阴阳失调，日月星辰出现残缺，怪异现象频繁发生，害虫蚕食庄稼，水旱造成灾害。这些都是由外戚宦官当政带来的恶果，反而用来责怪三公，甚至于处死或免职，这实在是令人呼喊苍天，号咷痛哭的事啊！又中古时代选拔三公，努力在清廉谨慎、循规蹈矩的人中寻找。这种人是妇女中的守本分的人，是乡间的平平常常的人，哪里能够胜任那样的职务呢？形势既然像那样，选举又像这样，却想盼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为生民做出业绩，不也太遥远了吧！从前汉文帝对邓通，可以说宠爱到了极点，尚且允许司徒嘉施展稟公执法的志向。受信任到这种程度，那么对君主身旁的小臣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到了近代，外戚宦官的请托受阻，馈送得不到满足，马上能陷人于不测的灾祸之中，哪里还谈得上进行弹劾和纠正呢？从前任务重而责罚轻，现在任务轻而责罚重。过去贾谊有感于绛侯周勃被囚禁受辱，因而上书陈述有关大臣廉耻的名分，开了大臣有罪不受刑而自杀的头。从此以后，便成为惯例。继位的君主，生下来就见到这种情形，习以为常，从未有人觉悟。唉，太可悲了！左手握着天下的版图，右手刎自己的脖子，愚蠢的人都知道难办，何况明智的君子呢！汉光武帝剥夺三公的重任，至今更加厉害，不把权柄交给后党，几代以后便行不通，原来是因为亲疏之间的形势大不相同啊。母后的亲族，是不离左右的

人，有这种至亲的地位，所以他们贵幸万世。一般大臣的失败，没有一个朝代不出现，却没有一个人引以为鉴，也实在令人痛心啊。不如设置丞相自己总揽大权。如果委任三公，就应分清职责负责将事情办好。任命执政的人，不应和他通婚；通婚的人，不应命他执政。像这样，在位使百姓困穷，荐举任用不是贤人，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灾变，人物多妖孽，然后就可以分别承担这些罪行了。

有人说：“政事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权力太大了。”回答说：“人才实在难得，何必嫌权力太大？从前霍禹、窦宪、邓鹭、梁冀之类，凭借外戚的势力，掌管国家的权柄，到他们被处死，用一句话的诏书，第二天早上就解决问题，有多么大的权力值得畏惧呢？如今国家对宦官失于明察，将大权交给外戚，算起来十代当中这样做的占了八九，不惩罚他们却怀疑其他人，多么荒唐啊！”

评论说：诸子百家谈论政事的由来已久，大体归结为巩固根基，变革时弊。遇到国家命运无常，意见便偏颇杂乱，所以对是非的论述，矛盾百出。试着妄加议论，认为社会已不是远古赫胥氏、大庭氏的时代，人们放弃了无私无欲的生活，世风万端，情欲萌生，虽有赅备万物的智慧，也不能弄清其中的推移变化；即使山川那样的奥秘，也不足比喻人心的险恶。那么要适合世俗顺应万事，就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章程。如果用人深知他的主张，就能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才能与名分背离，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有道德的圣人治理社会，效法自然，符合中道，那么振兴还是废

除的原则，就不会有不同的规定。而随着时代的不同有所减损或增益，只不过文彩与质朴交替施行而已。公开施行还是隐蔽推行，与过去不相一致；动用干戈还是举行祭祀，同前世互有参差。等到做帝王时，无论是乘高贵的黄盖车，还是穿普通的葛布衣，丰俭虽不一样，而实现太平则是相同的。也有的宽宥公族的罪过，而对储君施以黥刑，宽容与惨毒相去甚远，而防止非分之想必然相同。这正是分流共源，百虑一致啊！若果偏离情理，一意孤行，那么便会矫枉过正。所以穿草鞋踏冰霜，其弊来源于过分节俭；衣冠楚楚，警告在于过分穷奢极欲；防范不严，分封太多，就会因尾大不掉，欺凌弱君；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就会因苛刻薄情而分崩离析。这就是受到《曹风》、《魏风》讥刺的对象，在国风中十分鲜明的缘故；周、秦二朝穷途末路，于灭亡的征兆里便特别显著的原因。所以取舍的开始，就隐含着兴盛与失败。因此繁简随时而易，宽猛相互补充。刑书刻在鼎上，事有应该周详；约法三章著为法规，贵在简明易行。由太叔将执政，导致子产对猛政的表扬；因子产遗爱，孔子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赵盾如夏日般可畏，一改赵衰如冬日般平和；曹参为相，全遵萧何统一的法规。这些的确是一张一弛的大概，可以验证为政的传统了吧！王充、王符、仲长统论说当代得失都很深刻，但大多背离精辟的古训，喜好强调片面的主张。崇尚清静无为的道家，把儒家讲席上的一套看作是迂腐的说教；拘泥于循名责实的名家，把老子的观点看作是荒诞不经的言辞。有的人推行前王的教化，可以在当年实施；有的人援引挽救弊端的法规，应当永世流传。用纯正的道理来考查它们，将会

认为是一种弊端了。如果知道舟没有在陆地上推着走的功能，瑟不是只弹奏一个永远不变的声音，不局限在眼前以怀疑远古，不拘泥于黑色以妨害白色，那么致力于天下太平的主要部门各自把握准确的原则，各种治国的方略便可以评说了吧？

赞辞说：一孔之见易偏，众人之言难一，救质朴须文彩，矫迟顿必迅急。纲举自然目张，偏执肯定失误。详审现实弊病，成就光大治术。

（梁运华 译）

【原文】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徵，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

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诤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

《贵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达上则思进贤，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泽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谄媚主，不顺天，专杖杀伐。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虽有明察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讟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

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子其何异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

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市，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鸟以山为埤而增巢其上，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饵也。贵戚愿其宅吉而制为令名，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卒其所以败者，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耳。

不上顺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图太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世之功，岂不惑哉！岂不惑哉！

《浮侈篇》曰：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徵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夫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化，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

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丁夫不扶犁锄，而怀丸

挟弹，携手上山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此皆无益也。

《诗》刺“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崇，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或刻画好缯，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广分寸；或断截众缕，绕带手腕；或裁切绮縠，缝紩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破牢为伪，以易就难，坐食嘉谷，消损白日。夫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皆所宜禁也。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绋，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箠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璆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骈数里，缁帷竟道，骑奴侍童，夹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飧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古者必有命然后乃得衣缯丝而乘车马，今虽不能复古，宜令细民略用孝文之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桐木为棺，葛采为缄，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后，转用楸梓槐柏桧槨之属，

各因方土，裁用胶漆，使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櫟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请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鲤也死，有棺无槨。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櫟梓榱桷，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案鄙毕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为褒君爱父，不在于聚财，扬名显亲，无取于车马。昔晋灵公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不君；华元、乐举厚葬文公，君子以为不臣，况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过天道乎？《实贡篇》曰：

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今以大汉之广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无善吏，位无良臣。此岂时之无贤，谅由取之乖实。夫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畴，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

虚造声誉，妄生羽毛。略计所举，岁且二百。览察其状，则德侔颜、冉，详核厥能，则鲜及中人，皆总务升官，自相推达。夫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故四友虽美，能不相兼；三仁齐致，事不一节。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资暴莽。况太平之时，而云无士乎！

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如响。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应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今使贡士必核以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出处语默，各因其方，则萧、曹、周、韩之伦，何足不致，吴、邓、梁、窦之属，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爱日篇》曰：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馀；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馀也。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暗下乱，力不足也。孔子称“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爱日。是以尧敕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畜，

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脯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岁功既亏，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议曲直，乡亭训吏，亦有任决断者，而类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则恃正而不挠，事曲则谄意以行赅。不挠故无恩于吏，行赅故见于私法。若事有反覆，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庭。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势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若事有反覆，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与一县为讼，其理岂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故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日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怀怨结而不见信，猾吏崇奸轨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

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见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乡县典司之吏，辞讼之民，官事相连更相检对者，日可有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经营，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然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由而作乎？《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可无思哉！可无思哉！

《述赦篇》曰：

凡疗病者，必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为之禁，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哉？夫谨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强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什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臧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视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故经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民，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天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桎，夕还囹圄，严明令尹，不能使其断绝。何也？凡敢为大奸者，才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诞得之财，奉之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非有第五公之谦直，孰不为顾哉？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

之所生也。

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友者多异之。并州刺史高干，袁绍甥也，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归附。统过干，干善待遇，访以当时之事。统谓干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干雅自多，不纳其言，统遂去之。无几，干以并州叛，卒至于败。并、冀之士皆以是异统。

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踟蹰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永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

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辞曰：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帟，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舵。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尚书令荀彧闻统名，奇之，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数万言。

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友人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继西京董、贾、刘、杨。今简撮其书有益政者，略载之云。

《理乱篇》曰：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仇，势不足复校，乃始羈首系颈，就我之衔继耳。

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讎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

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贡、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牴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

又政之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日不如古，弥以远甚，岂不然邪？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

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踟高天，蹈厚地，犹恐有镇厌之祸也。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辩色，耳能辩声，口能辩味，体能辩寒温者，将皆以修洁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

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

《损益篇》曰：

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玩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虽藉亲属之恩，盖源流形执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于坐食奉禄而已。然其污秽之行，淫昏之罪，犹尚多焉。故浅其根本，轻其恩义，犹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专之于国，擅之于嗣，岂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为者乎？时政凋敝，风俗移易，纯朴已去，智慧已来。出于礼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资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权，校其从横之执，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无壅滞之士，国朝无专贵之人。此变之善，可遂行者也。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执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此变有所败，而宜复者也。

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鸡狗之攘窃，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赂遗，谬误之伤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杀之则甚重，髡之则甚轻。不制中刑以称其罪，则法令安得不参差，杀生安得不过谬乎？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臧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科条无所准，名实不相应，恐非帝王之通法，圣人之良制也。或曰：过刑恶人，可也；过刑善人，岂可复哉？曰：若前政以来，未曾枉害善人者，则有罪不死也。是为忍于杀人，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轻重有数，科条有序，名实有正，非杀人逆乱鸟兽之行甚重者，皆勿杀。嗣周氏之秘典，绩吕侯之祥刑，此又宜复之善者也。

《易》曰：“阳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则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犹枝之附干，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国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远则难绥，事总则难了。今远州之县，或相去数百千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谷者焉，当更制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

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安宁勿懈堕，有事不迫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壮，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推什长已上，则百万人也。又十取之，则佐史之才已上十万人也。又十取之，则可使在政理之位者万人也。以筋力用者谓之人，人求丁壮；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贵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犹将有储，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后可以用天性，究人理，兴顿废，属断绝，网罗遗漏，拱桺天人矣。

或曰：善为政者，欲除烦去苛，并官省职，为之以无为，事之以无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圣人未可师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国家昏乱，吏人放肆，则恶复论损益之间哉！夫人待君子然后化理，国待蓄积乃无忧患。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奉禄诚厚，则割剥贸易之罪乃可绝也；蓄积诚多，则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馀，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

累帛，朱轮四马。今反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开虚伪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绩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实也。以廉举而以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井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穡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间，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蹇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绩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稟，班禄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

《法诫篇》曰：

《周礼》六典，冢宰贰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时，诸侯明德者，皆一卿为政。爰及战国，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

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则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弩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惠谨慎，循常习故者。是妇女之检桢，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昔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引自裁之端。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呜呼，可悲夫！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也。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责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

斯鉴，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窦宪、邓鹭、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及其伏诛，以一言之诏，诘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国家漏神明于媾近，输权重于妇党，笄十世而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诡邪！

论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夫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尝试妄论之，以为世非胥、庭，人乖穀饮，化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如使用审其道，则殊涂同会；才爽其分，则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世，则天同极，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沉于曩时；兴弋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绋衣，丰薄不齐，而致化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储，宽惨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履履霜，敝由崇俭；楚楚衣服，戒在穷賒；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罚，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太叔致猛政之褒，

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画一之法。斯实弛张之弘致，可以徵其统乎！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敝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敝矣。如以舟无推陆之分，瑟非常调之音，不限局以疑远，不拘玄以妨素，则化枢各管其极，理略可得而言与？

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

嵇康传

——《晋书》卷四九

【说明】嵇康（224—263），字叔夜，谯郡铨（今安徽宿县西南）人。他和魏宗室通婚，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为“竹林七贤”之一，和阮籍齐名。他崇尚老、庄，好谈养生服食之事，但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和虚伪的礼教和礼法之士极其不满，公开发表离经叛道、非薄圣人的言论，遭到司马氏集团钟会的陷害，被司马昭所杀。他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回归自然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的繁琐礼数。对文学、诗歌、音乐也有一定造诣，善鼓琴，并曾作《琴赋》。著作有《嵇中散集》。

嵇康字叔夜，是三国时魏国谯郡铨人。他的祖先姓奚，会稽的上虞人，因为躲避仇家，才搬迁到这里。铨地有座嵇山（今安徽宿县西南），他的家就在嵇山的山侧，因以嵇为姓。哥哥嵇喜，有做官的才干，历任太仆、宗正等官职。

嵇康早年是孤儿，有奇特的才能，孤高而不合群。他身高七尺八寸，谈吐和气质很好，很有风度仪表，保持本来面目，不加修饰，人们认为他有龙的文采、凤的姿容，天生的

资质出于自然。心境清静淡泊没有世俗的欲望，有宽宏的度量，待人宽厚心胸豁达。学问不是由老师传授，而博览群书无不完备通晓，长大以后受好读《老子》、《庄子》。嵇康和魏国的宗室成婚，被授官中散大夫。他常常研习道家涵养本性和服用丹药等事情，弹琴吟诗，胸怀中自我感觉满足。他认为神仙禀承于自然，不是因为长期的学习所能做到的，只要导引养生找到它的规律，那么象安期生、彭祖那样的长寿也可以达到，便撰写了《养生论》。又认为君子应该没有私心，他的主张说：“被称为君子的，是指心里不掺杂是是非非，而行为不违背常道的人。这话怎样解释？凡是气静神虚的人，心里不在于夸大自己的操守；领悟透彻心里豁达的人，性情不为自己的欲念所连累干扰。心里没有夸大自己操守的想法，所以能够超越名声和教化而任其自然，性情不受自己欲念的连累干扰，所以能够明白贵贱而通晓物理人情。对物理人情顺意通晓，所以不会违背常理正道；超脱于名声放任自己的心情，所以不受是是非非的掺杂干扰。因此说君子以没有掺杂干扰为最重要，以通晓物理人情为善美；说小人隐匿真情为不对，违背常理正道为过错。这是为什么隐匿真情自我夸张，是小人最令人厌恶的行径；心里不带成见没掺杂干扰，是君子诚笃遵行的美德。所以常道正理说‘及吾无身，吾又何患’。不以生命为贵的人，才能胜过看重生命的人。从这一点来说，修养达到最高境界者的本心，原来就不存在掺杂干扰。所以说，‘君子行道，忘其为身’，这种说法很对。君子做好事，不是先衡量法度然后才去行动；听凭自己的本心便没有邪恶的想法，不是先谈论善良与否然后才去纠正；袒露自己

的真情便无矫揉造作，不是先谈论正确与否然后才去修饰。因此能超然忘贤，而贤与法相符；忽然忘心，而心与善相合；潇洒而不造作，而事情正确密不可分。”他的大致意见就是如此。原来嵇康内心深藏的抱负，认为十分契合的人很难遇到，常常想能有《庄子》中所说的郢人那种气质的知己。和嵇康以道义相交、推心置腹的只有陈留的阮籍、河内的山涛，参预嵇康这一流派是河内的向秀、沛国的刘伶、阮籍的侄子阮咸、琅邪的王戎，他们经常一起在竹林中行游，被世人称为“竹林七贤”。王戎自称和嵇康在山阳一同居住了二十年，从未看到嵇康脸上流露出欢喜或恼怒的神色。

嵇康曾经因为采摘药材而遨游高山大泽，遇到如愿以偿满意而归的时候，忽然忘记回去。当时有些打柴割草的人遇见他，都以为他是神仙。他到汲郡的山里见到孙登，嵇康便跟随孙登一起行游玩乐。孙登为人沉默注意自己的操守，和嵇康没有交谈。嵇康临离开的时候，孙登说：“你的性情刚毅而才气俊秀，能够避免灾难吗！”嵇康又遇到王烈，一起到山里去，王烈曾经得到象饴糖般的石髓乳，自己吃了一半，余下的一半给嵇康时，却凝固成了石头。王烈又在石室中见到一卷兵书，急忙叫嵇康去取来，兵书立即就不见了。王烈便叹息说：“叔夜的志向情趣非同寻常而总是得不到机遇，这是命运啊！”他的精神和心灵所感应的，每次所遇到隐逸的机会却竟然这样。

山涛在离任尚书吏部郎时，推荐嵇康出来代替自己的官职。嵇康便写信给山涛表示和他绝交，信中说：

听说足下要推荐我出来代替自己的职务，这件事虽

然没有成功，但因此知道足下原来并不了解我。恐怕是足下独自做这样的官害羞，要拉我给您当助手，就象厨师羞于一个人屠宰，想拉祭师去帮忙一样，让我手执屠刀，也沾上一身腥气，所以为足下陈述能不能这样做。

老子、庄周，是我的老师，身处卑下的职位；柳下惠、东方朔，是通达知命的人，安于低下的职位。我怎么敢妄加评论他们！孔子主张兼爱，为了道义，即使要他去执鞭赶车也不以为耻；子文没有当卿相的欲望，却三次登上令尹的高位，这就是君子想救世济人的心意。这就是所谓“达则兼善天下”而始终不改变原先的志向，“穷则独善其身”而能恬然自得没有烦恼苦闷的人。从以上所谈的道理来看，所以知道唐尧、虞舜在位于世，许由的隐居不仕，张良辅佐刘邦建立汉朝，楚国隐士接舆唱歌劝孔子归隐，他们出处行为不同，而原则都是一样的。举目仰望唐尧、虞舜这些人，可以说他们是能够实现自己志向的人了。所以君子的各种行为表现，所走的道路虽然各不相同而终归到达同一地点，都是顺着本性而行动，各得其所，所以有人在朝廷做官而不肯离去；有人在山林隐逸而不肯返回尘世的说法。况且吴国的季札推崇曹国子臧的高风亮节，司马相如敬慕蔺相如的节操，他们都从中寄托了自己的志向，这是不能强加改变的。

我每次读到《尚子平》、《台孝威传》赞叹仰慕，可以想象到他们的为人。加以我少年时孤苦而且羸弱，母亲和兄长很骄宠我，所以不去读那些修身做官的经书，又读了《老子》、《庄子》，更助长了我的举止随便懒散，所

以使我对做官求荣的进取心一天天减弱，而放纵任性的情意越加强烈。阮籍口里不谈论别人的过错，我常常想学习他这一长处，但没有能做到。阮籍天性敦厚超过一般人，待人接物没有害人之心，只是有饮酒过度的毛病而已，以致遭到礼法之士的弹劾，对他恨得象仇敌那样，幸亏得到大将军司马昭的保护。我的天赋才资不如阮籍，反而有傲慢懒散缺点；又不懂事理，不明白应当随时机的变化而变化；没有汉代万石那样的谨慎小心，而有尽情直言、不知道避忌的毛病；如果长期和人事接触，那么得罪人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虽然想求得太平无事，这怎么能做得到！

又听到道士传言，服食术根、黄精等药草，可以使人长寿，心里很相信。游玩于山水之间，观赏鱼游鸟飞，心里感到非常快乐。一旦去做官，这些使我惬意的事便都失掉了，怎么能舍弃自己乐意的事而去做那些自己所怕做的事呢！

人们的相互了解，贵于认识彼此的天性，然后顺其天性加以帮助。禹不强迫伯成子高出来做官，是为了成就他的节操；孔子不向子夏借雨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爱财的短处。近来的诸葛亮不强迫徐庶跟随自己去四川，华歆不强迫管宁做卿相，禹、孔子、诸葛亮、华歆这些人才可以说是自始至终够朋友，是真正相知的人。我自己经过考虑并已经决定，如果我无路可走，那也就算了，足下要平白无故地使我受到冤屈，让我辗转于山沟河谷之间陷于绝境。

我刚死了母亲和兄长，失去了他们的欢爱，心中常常感到凄凉悲切。女儿才十三岁，儿子八岁，还没有长大成人，况且又多疾病，想到这些心里的悲伤，不知从何说起。现在我只愿过贫穷的生活，教育抚养子女，时时和亲朋故旧叙谈离别之情，谈论往事，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向情意就都满足了，怎么能见阍者而称赞他守贞呢！如果急于我共登仕途，想把我招去，和你共作欢乐，一旦来强迫我，那么我一定会发疯的。如果不是有深仇大恨，想来你不致于这样做的。写这封信，既是为了摆脱足下对我的推荐，并且也是用来告别的。

这封书信送到以后，山涛知道嵇康不会受羁縻屈服。

嵇康生性非常机巧而喜好打铁。住处有一株柳树长得很茂盛，便引水将树环绕起来，每当夏天，在树荫下锤打铁器。东平吕安很佩服嵇康的高卓情趣，每当想念他，便不远千里驾车来拜访，嵇康对他很友好。后来吕安被兄长诬告控诉，因为受事情的连累被投入监牢，供词经过相互验证援引，便又将嵇康逮捕。嵇康的性格说话和行动都很谨慎，一旦被捕入狱，便写了《幽愤诗》，说：

可叹我福份浅薄，少年时遭到父丧，悲伤和孤独都还不懂，由于当时年纪还很幼小。母亲和兄长对我抚养教育，只有慈爱没有威吓，自恃得到宠爱而肆意撒娇，缺少教育。到了成年之时，凭借骄纵而自负放任，坚守自己的本心希望追及古人，任凭所崇尚的做。寄托于爱好《庄子》、《老子》，轻视财物而重视身躯，志向在于节操淳朴，涵养自身的素性以保持本性。

我缺乏明智，却喜欢品评别人的善恶得失，子玉遭到身败名裂，屡屡使我增添脱离尘世的想法。德行高尚者有容忍人的器量，能承受耻辱。人们多怀有偏执，想达到纯正却身不由己。以为这种褊急的性情，才能表明自己的评品褒贬；等觉悟到自己的过失，悲痛得象受伤留下痕。想要减少过失，但诽谤非议沸沸扬扬，生性并不是要伤害别人，但频繁地招致怨恨憎恶。既有愧于古人柳下惠，又有愧于今人孙登，对内有违宿愿，对外辜负了自己的好友。仰慕古代隐士严光和郑谷，安贫乐道而隐居，与世无争，神气可以得到安然。

叹息我自己失德无行，遭遇到许多不幸的事。这不是上天降临的，实在是由于自己顽劣狂放所造成的，有悖于常理使得祸患连结，最终身陷牢狱。要答复我目前的审讯，只是身在拘禁之中，实在耻于诉讼申冤，我还有什么时间。虽说是道理正直，但是精神遭受凌辱志气已经沮丧，即便在清水中洗涤，还谈得上什么补救。天空的鸿雁鸣叫和谐，振翅向北方遨游，顺应时节而行动，得意自在而忘却忧愁。唉，我悲愤叹息，还能有什么筹划打算。事实和愿望互想违背，遭遇到目前的羁留，贫穷和显达都是命中注定的，还能有什么要求？

古人曾经说过，做好事不要追求名声。顺乎时代虔恭而沉静不言，灾祸就不会发生。万石君周到谨慎，安抚亲属保持了荣耀。世上的事情纷纷扰扰，只能搅乱我的性情，安宁快乐必须铭诫于心，最终于会顺利吉祥。生命炽盛的灵芝草，一年中成熟三次，唯独我还能做什么，

有志向而不能成功。以过去的祸难为鉴戒思考再三，心中觉得内疚，希望勉励自己今后，能无声无息。在山坳里采野菜而食，在深山石窟中披散头发隐居，放声歌咏，颐养精神求得长寿。

当初，嵇康家居贫穷时，曾经和向秀一起在大树底下打铁，来养活自己颖川的钟会，是富贵人家的公子，为人精干练达有才识能言善辩，所以去拜访嵇康。嵇康看见了他不施礼，仍旧打铁不止。等了很久钟会才离去，嵇康对钟会说：“你听到什么而到这里来？又看到什么而离去？”钟会说：“我听到所听到的而到这里来，看到所看到的而离去。”钟会因此感到遗憾。到这时，便告诉文帝司马昭说：“嵇康，是隐居的杰出人物，无法让他出来做官。您不必为天下的事担忧，可虑的只是嵇康而已。”因而诬告说嵇康要帮助母丘俭造反，幸好山涛劝告没有听从。从前齐国杀掉华士，鲁国诛杀少正卯，实在是由于他们有害时政扰乱教化，所以圣贤要把他们除掉。嵇康、吕安等人说话议论毫无顾忌，诽谤诋毁国家的典制法则，作为帝王不应当宽容这种行为，应当借助这个机会把他们除掉，使风气质朴敦厚。司马昭亲近钟会听信了他的话，便把嵇康、吕安一起杀害。

嵇康将被押赴刑场行刑，三千名太学生请求将他赦免当太学的老师，没有得到准许。嵇康回头看看自己在太阳下的身影，向别人要了琴弹奏，说：“从前袁孝尼曾经要跟我学习弹奏《广陵散》，我总是不肯教给他，到今天《广陵散》将成为绝响了！”当时他的年龄才四十岁。海内的士人，无不感到痛惜。司马昭不久后便省悟而感到悔恨。当初，嵇康曾经在

洛阳西面游览，傍晚时留宿在华阳亭，取琴弹奏起来。半夜里，忽然有客人来，自称是古代人，和嵇康一起谈论音乐声律，谈吐清晰明辩，因此索取琴弹奏起来，这就是《广陵散》，琴声音调无与伦比，便把它教给嵇康，还发誓不再传给别人，也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

嵇康善于谈论玄理，又很会写文章，高超的情怀和深远的旨趣，飘然高尚而又清远。撰写上古以来超世脱俗隐士的传记并加以评论，想和千年以前的这些人结交。嵇康又写了《太师箴》，也足以阐明帝王的治理之道。还写了《声无哀乐论》，说得很有条理。

（何双生 译）

【原文】

嵇康字叔夜，谯国铨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铨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

康早孤，有奇才，远遇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又以为君子无私，其论曰：“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

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倘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其略如此。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木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沉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杰，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馀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曰：

“闻足下欲以吾自代，虽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故为足下陈其可否。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

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为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知尧舜之居世，许由之严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涂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意气所先，亦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骄恣，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讎，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缺，又不识物情，闇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书之累，久与事接，疵璺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长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审，若道尽涂殫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

未及成人，况复多疾，顾此怆怆，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涂，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讎，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

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环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继，乃作《幽愤诗》曰：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茆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好，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宗朴，养素全真。

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创痛。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慙育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絜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曷云能补。雍雍鸣雁，厉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畴。事与愿违，遭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

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祇揽余情。安乐必诚，乃终利贞。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勛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

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贍给。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不锻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愿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母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黜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又作《太师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复作《声无哀乐论》，甚有条理。

向秀传

——《晋书》卷四九

【说明】向秀（约 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是“竹林七贤”之一，擅诗赋。喜好老、庄之学，曾为《庄子》作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他主张自然与名教统一，合儒道为一。他的好友嵇康被杀以后，曾应征到洛阳，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他的作品今多散佚。

向秀字子期，河内郡的怀人。他高洁聪悟有远见卓识，少年时就为山涛所知，素来喜好老子、庄子的学说。庄子著有《内篇》、《外篇》等几十篇，历代有才德的士人虽然有读过它的，但没有能够恰当论述它的思想体系，向秀便对《庄子》索隐阐解，启示其中的特异旨趣，振作起道家谈玄的风气，使读它的人有离世脱俗心领神悟之感，无不自己满足于一世。到晋惠帝时期，郭象又论述而加以推广，儒家墨家的言论遭到轻视，道家的学说便兴盛起来。起初，向秀要注解《庄子》，嵇康说：“这本书怎须再加以注解，正是阻止有人借此作典取乐。”向秀注解写成以后，给嵇康看，说：“这比你所认为的是否要好得多？”他又和嵇康谈论养生之道，往来诘问辩论，

为了要激发嵇康高卓的情趣。

嵇康擅长打铁，向秀为他做帮手，两个人相对时都觉得喜悦，态度从容旁若无人。他又和吕安一起在山阳灌溉园子。嵇康被杀以后，向秀接受本郡的郡举来到洛阳。文帝问他说：“听说你有许由、巢父隐于箕山那样的志向，为什么却会来这里。”向秀回答说：“我认为巢父、许由是拘谨自守的士子，没有能通达尧的心意，对他们不足以过份羡慕。”文帝很高兴。向秀便从此供职做官，写了《思旧赋》说：

我和嵇康、吕安的住处很近，他们都是有才能而不肯受拘束的人。嵇康志向高远而疏略于人事，吕安心性旷达而脱略人事，后来他们都由于犯罪而遭刑。嵇康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尤其擅长演奏琴箫等弦管乐器，临刑之前，曾经顾望太阳的日影，索取琴弹奏了一曲《广陵散》。我以往远行来洛阳，经过他的故居，当时太阳已快落山，寒冽的冰水使人感到凄凉。嵇康的故邻有人吹笛，笛声清越高远，使自己追想起从前和嵇康、吕安的交游，被笛声感动而叹息，所以作赋说：

“奉命去京都洛阳啊，然后就转回来往北走。渡黄河乘船漂浮游荡啊，经过山阳的旧居。眺望旷野的萧条景象啊，把我的车驾停在城边。去探访嵇康、吕安生前的旧居啊，经过隐僻里巷的空房子。叹息《黍离》悲悯周室的颠覆啊，悲哀《麦秀》面对殷商故都的废墟。思念往昔的交游情景而怀念今天这样的生活不能复得啊，心中感慨很多而犹豫停步不前。嵇康的故居还在而没有毁坏啊，只是人不知到哪里去了。从前李斯被处斩的时候

啊，对儿子感叹再也不能一起牵黄狗出猎。痛悼嵇生的与世长辞啊，顾望太阳的日影而弹琴。临刑时已经领悟到自己的命运啊，把自己的余生寄托于弹琴的片刻之间。听见悲凉慷慨的笛声啊，美妙的笛声断断续续地响着。停着的车子即将出发了啊，所以就用笔写下自己的心意。”

向秀后来任散骑侍郎，转为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时不任实职，只是安身而已。在散骑常侍位上逝世。有两个儿子：向纯、向悌。

（何双生 译）

【原文】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诂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

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旧赋》云：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水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曰：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济黄河以汎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踟蹰。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二子：纯、悌。

范缜传

——《梁书》卷四八

【说明】范缜（约公元450年——约510年），字子真，南朝梁南乡舞阴（今河南泌县西北）人。出身寒微，先后仕于齐、梁，官至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他不畏权势，面对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引诱和梁武帝的围攻，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不“卖论取官”，义正辞严地批驳了他们极力崇信并风靡朝野的佛教。本篇传记叙述了范缜的生平，载录了他的代表作《神灭论》，是了解和研究范缜的重要史料。

范缜字子真，是南乡舞阳（今河南泌县西北）人。晋安北将军范汪六世孙。祖父范璩之，官中书郎。父亲范濛，早逝。

范缜从小孤苦贫穷，侍奉母亲十分孝敬。年龄接近二十，听说沛国刘瓛聚众讲学，才前往跟他学习，出类拔萃而刻苦攻读，刘瓛十分器重他，亲自替他举行加冠礼。在刘瓛门下多年，无论进出还是回家，总是穿草鞋布衣，步行于路。刘瓛门下乘车骑马的王公贵族很多，范缜在他的门下，毫无羞愧。已长大成人，博通经学，尤其精于《周礼》、《仪礼》和

《礼记》。为人正直，喜出语惊人，发表高论，得不到士友的赞同，只与表弟萧琛相互理解，萧琛称范缜叫“口辩”，十分佩服他具有很深的造诣。

范缜起初在齐朝官宁蛮主簿，经多次提升官至尚书殿中郎。齐武帝永明年间，与北魏和亲，每年互通聘问修好，特地挑选有才学的士人作为使臣，范缜及堂弟范云、萧琛、琅邪颜幼明、河东裴昭明相继受命，都著名邻国。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广招宾客，范缜也在其中。建武年间，升为领军长史。出任宜都太守，因母亲逝世而离职。回家在南州居住。义军到来，范缜穿着黑色丧服出迎。梁高祖萧衍曾与范缜同游萧子良的西邸且交情不错，见到他特别高兴。至平定建康城，委派范缜为晋安太守。在郡任职期间，十分清廉节俭，全凭俸禄维持生计。工作四年，调任尚书左丞。范缜无论离职复任，即使是亲戚都无所馈赠，唯独馈赠前尚书令王亮。范缜在齐朝做官时，与王亮同在尚书台为郎，素有交情，到这时王亮被摈弃在家。范缜亲自出迎梁高祖的军队，志在得到卿相的职位，后来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便时常怏怏不乐，所以私下相互亲近结交，以使矫正时弊。后来终究因为王亮而获罪，被流放到广州，详情记载于王亮本传。

最初，范缜在齐朝，曾侍奉竟陵王萧子良。萧子良诚心信奉佛教，而范缜极力声言无佛。萧子良问道：“您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世间怎么会有富贵，怎么会有贫贱？”范缜回答说：“人的出生好比一棵树上的花，同样在一枝树杈上发芽，一起在一个花蒂上绽开，随风飘落，有的擦过窗帘落在绣垫上，有的穿过篱笆掉进粪坑里。落在绣垫上的，正是殿下您；

掉进粪坑里的，正是下官我。贵贱即使差别再大，因果报应究竟体现在哪里呢？”萧子良不能说服他，心中十分不快。范缜回去阐明其中的道理，著《神灭论》说：

有人问我：“精神灭亡，怎样知道它灭亡呢？”答：“精神即形体，形体即精神，因此形体存在精神就存在，形体死亡精神就灭亡。”

问：“形体是对没有知觉的称谓，精神是对有知觉的命名，有知觉和没有知觉，在认识事物时就明显不同，精神和形体，按理而言是不容混而为一的，把形体和精神说成是一回事，真是闻所未闻。”答：“形体是精神的实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这就是形体指实体而言，精神指作用而言，形体和精神，不能相互分开。”

问：“精神本来不是实体，形体本来不是作用，说不能把它们分开，其中的道理在哪里呢？”答：“名称不同而实体只有一个。”

问：“名称既然已经不同，实体怎能只是一个？”答：“精神对于实体，好比锋利对于刀刃，形体对于作用，好比刀刃对于锋利，锋利这个名称不是指刀刃，刀刃这个名称不是指锋利，但是抛开锋利就没有刀刃，抛开刀刃就没有锋利，没听说没有刀刃而锋利还存在，怎能形体死亡而精神还存在呢？”

问：“刀刃对于锋利，或许像刚才所说，形体对于精神，其中的道理并不如此。凭什么这样说呢？树木的实体是没有知觉的，人的实体是有知觉的，人既然有像树木一样的实体，却具有与树木不同的知觉，难道不是树

木具有实体，人具有实体又具有知觉吗？”答：“奇怪呀，这种说法！人如果具有像树木那样有实体作为形体，又具有与树木不同的知觉作为精神，那么就可以像刚才论述的那样。如今人的实体，这种实体本身是具有知觉的，树木的实体，这种实体本身是不具有知觉的，人的实体不是树木的实体，树木的实体不是人的实体，哪里会有像树木的实体却又具有与树木不同的知觉呢！”

问：“人的实体所以不同于树木的实体，是因为人的实体具有知觉。人如果没有知觉，与树木有什么不同？”答：“人没有不具有知觉的实体，就好象树木没有具有知觉的形体一样。”

问：“死人的形骸，难道不是没有知觉的实体吗？”答：“死人的形骸是没有知觉的人实体。”

问：“像这样说来，人果真具有像树木一样的实体，却具有与树木不同的知觉了。”答：“死人具有像树木那样的实体，却没有与树木不同的知觉；活人具有与树木不同的知觉，却没有像树木那样的实体。”

问：“死人的骨骼，不是活人的形骸吗？”答：“活人的形体不是死人的形体，死人的形体不是活人的形体，已经区别得十分清楚了，哪里会有活人的形骸，却具有死人的骨骼呢！”

问：“如果说活人的形骸不是死人的骨骼，既然不是死人的骨骼，那么不不应从活人的形骸变成，不从活人的形骸变成，那么死人的骨骼是从哪里变成这个样子呢？”答：“这是从活人的形骸，变成了死者的骨骼啊。”

问：“活人的形骸变成了死人的骨骼，难道不是因为有生才有死吗？这就知道死人的形体和活人的形体没有两样。”答：“如果茂盛的树木变成了枯木，难道枯木的实体就是茂盛的树木的形体吗？”

问：“茂盛的形体变成了干枯的形体，干枯的形体就是茂盛的形体；蚕丝的形体变成了丝线的形体，丝线的形体就是蚕丝的形体，这里有什么区别呢？”答：“如果干枯就是茂盛，茂盛就是干枯，就应该茂盛的时候凋零，干枯的时候结果。又茂盛的树木不应变成干枯的树木，因为茂盛就是干枯，那便没有什么再变化的了。茂盛和干枯是一回事，为何不先干枯后茂盛呢？必定先茂盛后干枯，为什么呢？蚕丝和丝线的道理，也与这种剖析相同。”

问：“活人形体的消亡，就应该豁然都没有，为何刚成为死人的形体，还拖延很长时期没完了呢？”答：“这是因为有生有灭的形体，要有各自生灭的顺序的缘故。那些突然产生的东西必定会突然灭亡，逐渐产生的东西必定逐渐灭亡。突然产生的，暴风骤雨正是这种东西；逐渐产生的，动物植物正是这种东西。有的突然生灭，有的逐渐生灭，这是万物自身的规律。”

问：“形体就是精神，手之类也是精神吗？”答：“都是精神的一部分。”

问：“如果都是精神的一部分，精神既然能思虑，手之类也应该能够思虑。”答：“手之类也应该有痛痒的感觉，但没有对是非的思虑。”

问：“感觉和思虑，是一回事是两回事？”答：“感觉

就是思虑，程度浅是感觉，程度深是思虑。”

问：“像这样，应该有两种思虑，思虑既然有两种，那么精神有两种吗？”答：“人的形体只是一个，精神怎能有两个？”

问：“如果不能有两个，怎能有痛痒的感觉，又有对是非的思虑？”答：“像手和脚虽然不同，终究是一个人，对是非的思虑与对痛痒的感觉虽然仍有区别，也终究只是一个精神。”

问：“对是非的思虑，与手足无关，应与什么地方相关？”答：“对是非的思虑，是由心这种器官主宰的。”

问：“心这种器官，是指五脏中的心，不是吗？”答：“是的。”

问：“五脏有什么区别，而唯独心具有对是非的思虑呢？”答：“七窍又还有什么区别，可是所起的作用却不一样。”

问：“思虑没有固定的领域，怎么知道是由心这种器官主宰的呢？”答：“五脏各有自己主管的事情，其他脏器没有能进行思虑的，因此知道心脏是进行思虑的主体。”

问：“为何思虑不寄放在眼睛等身体的其他部分之中？”答：“如果思虑可以寄放在眼睛部分，眼睛为何不寄放在耳朵部分呢？”

问：“思虑自身没有本体，因而可以寄放在眼睛部分，眼睛自身有主体，不需要寄放在其他部分。”答：“眼睛为何有本体而思虑没有本体，假若思虑没有本体在我的

形体中，而且可以普遍寄放在别的地方，那么张甲的性情也可以寄放在王乙的身体中，李丙的性情也可以寄放在赵丁的身体中。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

问：“圣人的形体和凡人的形体一样，却有凡人和圣人的区别，所以知道形体与精神根本不同。”答：“不对。纯金能照，有杂质的不能照，具有能照特性的纯金，哪里会有不能照的杂质。又哪里有圣人的精神却寄托在凡人的器官中，也没有凡人的精神却寄托在圣人的身体里。因此眉八彩，眼重瞳，这是尧和舜的容貌，龙颜、马口，这是轩辕和皋陶的容貌，这都属于外表形态的奇异之处。比干的心，内分七窍，姜维的胆，大如拳头，这都属于心脏器官的特殊表现。由此可知圣人生就的特质，每每与常人大不一样，不仅是圣人的道德与众不同，就连形体也超越众生。将凡人与圣人的形体等同起来，这是无法接受的。”

问：“您说圣人的形体一定与凡人不同，请问阳货与孔子相似，项籍与舜相似，舜、项籍、孔子、阳货的智慧有天渊之别，而形体却相同，这是什么缘故呢？”答：“珉与玉类似却不是玉，鸡与凤凰类似的却不是凤凰，万物中的确有这种现象，人本来也不例外。项籍、阳货的外貌相似而实质并不相似，心脏器官不一样，虽然外貌相似也毫无用处。”

问：“凡人与圣人的差别，形体与器官不同，可以这样说；圣人十全十美，按理不应有差别，但孔子、周公的外貌不同，商汤、文王的形状两样，说明精神与形体

并不相互依存，从这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答：“圣人在心脏器官方面相同，形体不一定相同，就象马的毛色不一而同样善于奔跑，玉的色泽有别而全都十分美好。因此晋国的垂棘璧、楚国的和氏璧同样价值连城，骅骝宝马、骖骝良驹都能一日千里。”

问：“形体与精神不能截然分开，已经听清楚了，形体死亡，精神也就灭亡，道理本该如此。请问经书上说‘为死去的父母建立宗庙，用对待鬼神的礼节祭祀他们’，讲的是什么意思呢？”答：“圣人的教化是这样的，目的在于安定孝子的心情，进而清除苟且不忠厚的想法，将死人神化，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的。”

问：“死去的伯有披着甲冑，谢世的鼓生化为大猪出现，典籍著录这些事情，难道是为了推行教化吗？”答：“妖怪渺茫，有真有假，暴死的人很多，没有都变成鬼，为什么唯独鼓生、伯有能这样呢？突然出现的人和猪的形象，未必就是齐国的彭生、郑国的伯有啊！”

问：“《周易》说：‘圣人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圣人与天地相类似，因而不违反天地之道。’又说：‘一辆车装着鬼。’其中说的是什么意思？”答：“有的是禽，有的是兽，区别在于会飞还是会跑；有的是人，有的是鬼，区别在于显见还是幽隐。人死会变成鬼，鬼亡会变成人，那就知道了。”

问：“知道这种精神消亡的道理，有什么用处呢？”答：“浮屠危害政事，沙门败坏风俗，如风惊雾起，驰荡不休，我对由此产生的弊病深感悲痛，想拯救那些执迷不悟的

人。为什么那些人收尽钱财去请和尚，倾家荡产去皈依佛门，却不怜恤亲戚，不怜悯穷人呢？实在是由于厚待自己的想法太多，帮助别人的考虑太少。因此薄礼赠予贫穷的友人，吝啬的表情就现在脸上；巨资送给富有的和尚，喜悦的心情便流露于容发。难道不是因为和尚那里寄托着美好的期待，从亲友那里得不到丝毫的回报，进行施舍，一点儿不救济贫穷，积攒功德，全都是为了自己，加上被愚昧的话所迷惑，对地狱苦楚十分恐惧，受虚妄之辞的引诱，对天堂欢乐十分欣羡，因此抛弃儒家的服饰，穿起和尚的袈裟，取消传统的祭典，陈设释氏的器具，家家抛弃亲人，人人断绝后嗣，致使队伍缺兵，官府无吏，粮食被游手好闲的懒汉用光，财物被泥塑木雕的庙宇耗尽。所以坏人不受惩处，颂声仍旧盈年。正因为如此，它的影响无休无止，它的危害没边没际。万物的生成出于自然，万物的变化都来源于自身，倾刻存在，转瞬消逝，生不加阻碍，死不予追寻，顺应天理，全都安于自身的禀性，小人安于种植，君子安于寡欲，耕种而后饮食，食品不可穷尽，养蚕而后穿着，衣物不会缺少，下层的人生活有余用来供养上层的人，上层的人少私寡欲对下层不加干预，能够尽其天年，能够治好国家，能够称霸天下，凭借的就是自然无为之道。”

这种观点一公开，朝野议论纷纷，竟陵王萧子良召集僧侣进行反驳，没有难倒范缜。

范缜流落南方多年，被召回京都建康。回京后被任

命为中书郎、国子博士，死于任所。有文集十卷。

（梁运华 译）

【原文】

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人也。晋安北将军汪六世孙。祖璩之，中书郎。父濛，早卒。

缜少孤贫，事母孝谨。年未弱冠，闻沛国刘瓛聚众讲说，始往从之，卓越不群而勤学，瓛甚奇之，亲为之冠。在瓛门下积年，去来归家，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门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门，聊无耻愧。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唯与外弟萧琛相善，琛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

起家齐宁蛮主簿，累迁尚书殿中郎。永明年中，与魏氏和亲，岁通聘好，特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缜及从弟云、萧琛、琅邪颜幼明、河东裴昭明相继将命，皆著名邻国。于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建武中，迁领军长史。出为宜都太守，母忧去职。归居于南州。义军至，缜墨经来迎。高祖与缜有西邸之旧，见之甚悦。及建康城平，以缜为晋安太守，在郡清约，资公禄而已。视事四年，征为尚书左丞。缜去还，虽亲戚无所遗，唯饷前尚书令王亮。缜仕齐时，与亮同台为郎，旧相友，至是亮被摈弃在家。缜自迎王师，志在权轴，既而所怀未满，亦常怏怏，故私相亲结，以矫时云。後竟坐亮徙广州，语在亮传。

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

蓆，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於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於粪溷之侧。坠茵蓆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曰：

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

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质，犹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犹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问曰：“刀之与利，或如来说，形之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说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在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

问曰：“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以其有知耳。人而无知，与木何异？”答曰：“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知之形。”

问曰：“死者之形骸，岂非无知之质邪？”答曰：“是无人质。”

问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质，而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也。”

问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问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则此骨骼从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也。”

问曰：“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骼，岂不因生而有死，则知死体犹生体也。”答曰：“如因荣木变为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

问曰：“荣体变为枯体，枯体即是荣体；丝体变为缕体，缕体即是丝体，有何别焉？”答曰：“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丝缕之义，亦同此破。”

问曰：“生形之谢，便应豁然都尽，何故方受死形，绵历未已邪？”答曰：“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歟而生者必歟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歟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歟有渐，物之理也。”

问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问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虑，手等亦应能虑也？”答曰：“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

问曰：“知之与虑，为一为异？”答曰：“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问曰：“若尔，应有二虑，虑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体惟一，神何得二。”

问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复有是非之虑？”答曰：“如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

问曰：“是非之虑，不关手足，当关何处？”答曰：“是非之虑，心器所主。”

问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问曰：“五藏有何殊别，而心独有是非之虑乎？”答曰：“七竅亦复何殊，而司用不均。”

问曰：“虑思无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是以知心为虑本。”

问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虑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邪？”

问曰：“虑体无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苟无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

问曰：“圣人形犹凡人之形，而有凡圣之殊，故知形神异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秽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宁有不昭之秽质。又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

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是以八采、重瞳，勋、华之容，龙颜、马口，轩、皞之状，此形表之异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约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圣人定分，每绝常区，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凡圣均体，所未敢安。”

问曰：“子云圣人之形必异於凡者，敢问阳货类仲尼，项籍似大舜，舜、项、孔、阳，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鸡类凤而非凤，物诚有之，人故宜尔。项、阳貌似而非实似，心器不均，虽貌无益。”

问曰：“凡圣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圣人员极，理无有二，而丘、旦殊姿，汤、文异状，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圣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犹马殊毛而齐逸，玉异色而均美。是以晋棘、荆和，等价连城，骅骝、騄骊，俱致千里。”

问曰：“形神不二，既闻之矣，形谢神灭，理固宜然，敢问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何谓也？”答曰：“圣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

问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见，坟素著其事，宁是设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众，不皆为鬼，彭生、伯有，何独能然，乍为人豕，未必齐、郑之公子也。”

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鬼一车。’其义云何？”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未之知也。”

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卹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於贫友，吝情动於颜色；千钟委於富僧，欢意畅於容发。岂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於周急，归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於行间，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货殫於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於自然，森罗均於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埜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馀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缙在南累年，追还京。既至，以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

子胥，字长才。传父学，起家太学博士。胥有口辩，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对接北使。迁平西湘东王谘议参军，侍宣城王读。出为鄱阳内史，卒於郡。

韩愈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说明】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少孤，由嫂抚养，贞元年间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因直言进谏，多次被贬。官终吏部侍郎，卒谥文，世称“韩吏部”、“韩文公”。

韩愈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主张“文以载道”，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散文气势雄健，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又加以新变和发展，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诗也有很高成就，力求新奇，以文入诗，有纵恣雄奇的艺术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流于险怪的缺点。他的诗对宋诗的发展有极大影响。

韩愈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崇儒排佛。所作《原道》、《原性》诸篇，强调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的道统，维护儒家的传统思想。

韩愈的作品流传广泛，有《昌黎先生集》。

韩愈，字退之，昌黎（今属河北）人。父亲韩仲卿，没有名望地位。韩愈才三岁，便成为孤儿，寄养在堂兄家中。韩愈自知是孤儿，所以从小就刻苦学习儒家经典，不待奖励，便自觉学习。大历（766—779）、贞元（785—805）之间，为文多数崇尚古学，仿效杨雄、董仲舒的著作，而独孤及和梁肃学得最深奥，文人们多推崇他们。韩愈跟他们这一帮人交游，积极钻研，想自己振作奋斗，对当代有所影响。及至参加进士考试，在公卿中间投文干谒，原宰相郑余庆积极为他宣传表扬，从此名振于当世。

不久，韩愈考上进士第，宰相董晋出为大梁（今河南开封）长官，招韩愈为巡官。解大梁巡官后，徐州（今属江苏）张建封又请他为宾佐。韩愈说话真率，无所畏惧，也无所回避，品行正直，不巧于世务。后调入京，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唐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也不专于政务机要，宫廷贱买民物的“宫市”之祸害十分严重，谏官提出意见，皇上都不听。韩愈曾写了数千言的奏章严厉批评，皇上也不听，并大怒，贬韩愈为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令，不久移为江陵府（今属湖北）掾曹。元和（806—820）初年，召为国子博士，升都官员外郎。其时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闫济美因为公事停华阴（今属陕西）令柳涧县务，让杜甫代理掾曹之职。任职数月，闫济美罢华州刺史之职，出住公家馆舍，柳涧便乘机劝百姓拦路索取前年军役的劳务费。后任刺史赵昌检查此案，得知柳涧之罪状，上报朝廷，贬为房州（今湖北行山）司马。韩愈因公务出差，路过华州，得知柳涧的事，认为是刺史结党相包庇，上疏治柳涧，被朝廷搁置一边。命监

察御史李宗诜下去复核，得知柳涧贪脏罪状，再贬他为封溪（今越南北境）县尉。朝廷认为韩愈上疏论柳涧是“妄论”，所以复任国子博士。韩愈自负才高，而屡遭排斥，于是作《进学解》以自况，文曰：

国子监先生早晨入太学，召集众儒生在学馆下面站立着，教导他们说：“学业要精，在于勤奋；学业之荒废，在于玩乐。行为之成在于思考；行为之坏在于轻率。当今之世，圣主贤臣相逢，治国之法律纲纪普遍确立，除去凶险邪恶之人，提拔重视优秀人才。具有小的好处一般都加以录取，以一技之长著称的人无不被任用。对于人才，要搜罗选拔，要训练造就。其有幸者而被录选，谁说太多而不加以表彰呢？众儒生只担忧学业不能精进，而不担心主管的官吏之不能明察；行为只担忧不端正，而不担心主管官吏之不能公平。”

国子监先生话没说完，有在儒生行列中窃笑的，说：“先生欺骗我呀！学生我奉事先生，至今已有些年了。先生您嘴里不停地朗诵“六经”之文，手里不停地批翻百家之书。记事之类的书，必定提取其纲要；辑言之类的书，必定探求其玄妙。贪多务得，无论小的大的都不舍弃。晚上点上油灯，接续日光，日夜刻苦读书，常终年地勤勉不懈地用功。先生之对于学业，真可以说够勤的了。抵制排斥不合儒道的异端邪说，排挤责斥佛教和道教，填补空缺，发扬儒家学说的深奥玄理。寻求将要断绝的茫茫然的儒学道统，独自从各方面搜求并远继孔孟事业；阻拦百川之横流，使之东流入海，扭转处于压倒

优势的汹涌狂澜。先生之对于儒学，真可以说很有劳绩的了。沉醉于古人的妙文之中，品味其精华，撰写文章，著书立说，家里堆满了书。上可以说取法于虞舜夏禹的典籍之风格之浑厚深广，周之文诰、殷王盘庚之布告之曲折拗口，《春秋》经文文理之周密严谨，《春秋左氏传》传文文辞之铺张夸大，《周易》阐说事理之奇妙而有法则，《诗经》内容之正大和文辞之华美，下至《庄子》、《离骚》，太史公司马迁所录之《史记》，杨雄、司马相如二人所作的赋之异曲同工。先生之作文，其可以说文旨宏大而文辞恣肆。少时开始学习，勇而敢作敢为；长大通达道理，左右皆适宜。先生之修身为人，真可以说是成熟完美了。然而你却于公不被人所信任，于私不为朋友所帮助，进退两难，到处碰壁，一有举动便获罪。当了短暂的监察御史，很快就被贬斥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三次当国子博士，所任闲职，表现不出治绩。命运有意与之为仇，不知要倒霉到什么时候。冬天温暖，而儿女还叫冷，年景丰收，而妻室还啼饥。头发掉了，牙齿脱落，直到老死，又有什么补益？不知道考虑这些情况，反倒教训起别人来了！”

国子监先生说：“喂，您到前面来。大的木头作屋梁，小的木头作椽子，斗拱短柱，枢臼门橛门闩楔木，都适当地利用各种木材，用以盖成房子，这是工匠们的工巧。玉屑、朱砂、天麻、龙芝，车前草、马屁菌、破烂的鼓皮，都一并收藏起来，等彼派用场，这是医师的良术。光明正大公平合理地选拔人才，巧的拙的掺合着予以录用，

深思稳重的含有内美，超群出众的表现杰出，比较其优劣，按其材器加以适当安排，这是宰相治国的妙法。从前孟轲喜好辩论，孔子的学说因而更加彰明，车轮之迹遍天下，以奔波而终于老死。苟况恪守孔子的正道，儒家宏论才得到发扬，逃避谗毁，跑到楚国，为兰陵令，后被废官，死于兰陵。这两位儒家继承人，说出来的言论就是经典，他们的行动成了行为的准则，超越同辈，以儒学之优进入圣人之门，然而他们在世俗中的遭遇如何呢？今天国子监先生虽然学习勤奋，但却未能遵循儒家的道统；言论虽然颇多，但却不能归结到儒家的中庸之道；文章虽然新奇，但却无益于实用；品行虽然有修养，但却未能显扬于众人之中。尚且月月花费薪金，年年耗损禄米，儿子不知耕种，老婆不会织布，骑着马还有仆从跟随，安稳地坐着吃饭，小心谨慎地跟随世俗之道，偷看古人著作并加以剽窃抄袭。然而圣明的君主并不加以责罚，宰相也不予以罢职，这哪里不是他的幸运呢！一有举动就被毁谤，而狂名却也随之显扬。安置在闲散的职位上，当然是分内应得的。至于计较财物的有或无，论其地位的高或低，忘记自己分量是否符合标准，却指摘前人的缺点，这就是质问工匠不用小木桩代替柱子，责怪医师用菖蒲之药去延年益寿，要他进用泻药猪苓。”

掌权的大官读了韩愈这篇文章而怜惜他，认为他具有治史之才，改任他为比部郎中之职、史馆修撰之任。超过一年，又转为考功郎中，知制法，拜中书舍人。

不久，有不喜欢韩愈的，收集他过去的材料，说他以前

贬为江陵（今属湖北）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给他很优厚的待遇。裴均的儿子裴锷凡庸鄙俗，最近裴锷回来探望父亲，韩愈作序文饯送裴锷，仍称其字。这事议论纷纷，闹到朝臣当中，因为这件事，韩愈被改官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八月，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韩愈为行军司马，仍旧赐金鱼袋和紫衣。淮西、蔡州之乱平定以后，韩愈于十二月随裴度回朝，因有功授官刑部侍郎，下诏让他撰写《平淮西碑》，碑文多叙写裴度的事迹。其时先入蔡州擒捉吴元济的，李愬的功劳应推第一，所以李愬对韩愈所撰碑文深感不满。李愬的妻子出入宫中，四处诉说碑文失实，于是朝廷下诏磨去韩愈所撰碑文。唐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碑文并刻于石碑上。

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手指骨一节，按佛书所传之法，三十年开示一次，开示则岁得丰收人氏平安康泰。元和十四年（819）正月，皇上令宦官杜英奇率领宫人三十人，手拿香花，到临皋驿迎接佛骨。迎佛骨的队伍迎来的佛骨，自光顺门迎入皇宫，留在宫中三日，才送到各寺院。王公贵族，乃至士人百姓，奔走迎送，竞相施舍，唯恐落后。百姓有废掉产业的，有烧灼头颅和臂膀的，都想求供养佛骨。韩愈平素不喜欢事佛，上疏进谏说：

臣以为所谓佛，是夷狄的一法而已。自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在上古从未有过。从前黄帝在位一百年，岁数一百一十岁；少昊帝在位八十年，岁数一百岁；颡顓在位七十九年，岁数九十八岁；帝誉在位七十年，岁数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岁数一百一十八岁；舜

帝和夏禹岁数都上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而且长寿，然而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佛呢。后来商汤岁数也有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历史书籍不说他们的寿命，大概也都不在百岁之内。周文王九十七岁，武王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那时佛法也未传至中国，并不是因为奉事佛节才有这样的长寿啊。

汉明帝时才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后来不是动乱就是亡国，相继而至，国祚并不长久。南朝宋代、齐代、梁代、陈代、元魏以下，奉事佛法渐渐谨诚，然而国运愈是短促。唯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佛，祭祀宗庙，不用三牲，白天每天只吃一顿，只吃蔬菜和水果；后来竟然为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不久也就灭亡了。事佛以求福，却反而得祸。从这些史实看来，所谓佛，实在不能相信，也就可以明白了。

大唐高祖皇帝刚受隋朝之禅让，就商议废除佛法。当时群臣见识短浅，不能深深追溯古圣先王之道，推究阐发圣明之德，以补救佛法之弊端，废佛之事遂搁置一边。臣对此曾感遗憾呀！皇帝陛下，您神圣英武，几千百年来无与伦比。陛下即位初时，就不许剃度人为僧人尼姑和道士，又不允许另立寺院道观。臣当时以为高祖的宏愿，必定实行于陛下手中。今日纵然尚未能立即实行，岂可以恣意奉佛使之变得更加盛行啊。

今听说陛下命令众僧人迎佛骨于凤翔，登楼观看，将佛骨抬入宫廷，还传令各寺院递相迎接供养佛骨。臣虽

然非常愚蠢，也知道陛下不至为佛所迷惑，做出这样推崇奉事佛法以求得福祥的傻事来。只是因为丰收年景人民安乐，顺着民心，为京都的士人百姓设些怪异的观赏和玩耍游戏的名堂而已。哪有如此 圣明而肯相信这等荒诞之事呢？但是百姓们很愚蠢又顽固，容易受迷惑却难以晓以道理，如果看到陛下这样的举动，将会以为陛下真心相信佛法。都说天子大圣人，尚且一心敬佛信佛，百姓既微且贱，对佛哪能爱惜身躯和性命。所以灼炙头顶焚烧手指，或百或十，成群结队，解衣服散钱财，从早到晚，互相仿效，惟恐落在他人之后，老人和小孩也到处奔走，都丢弃各自的活计。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再经历几座寺院，必定有砍断臂膀切割身躯去供养佛骨的。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这不是小事情啊。

佛本来是夷狄之人，和中国语言并不相通，衣服也不一样。佛口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不穿先王的法服，也不知君君臣臣之义和父父子子之情。假如佛身尚存，奉其国君之命，来到京师朝见陛下，陛下容纳并加以接待，也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设迎宾礼一次，赐衣服一件，护卫并送他出于国境，不会让他来迷惑众百姓的。何况其身死去已经很久了，枯朽的骨头，是凶事秽物的剩余，岂宜于引入宫廷之中啊！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古代诸侯，到卫国行吊丧之礼，尚且要让巫祝先用桃枝编的苕帚，扫除不祥，然后再进去行吊。今天无故取这腐朽污秽之物，亲自登楼观看，巫祝不先行，桃枝苕帚也不用，群臣不说那是不对的，御史也不举报这样做的过

失，臣实在感到耻辱。乞请将这佛骨丢到水里或用火烧掉，永远绝掉它的根本，断掉天下人的迷信，消除后代的疑惑。使天下之民，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超出于平常人不是万万所能计算的，那岂不是一大盛举！那岂不快哉！佛如果真的有灵，能致祸作祟，所有灾殃大祸，宜加在臣身上。上天监察作证，臣不怨恨也不翻悔。

奏疏交上去，宪宗非常愤怒。隔一天，宪宗拿出韩愈的奏疏让宰相看，打算加以极刑。裴度、崔群上奏说：“韩愈上疏忤逆皇上尊听，确实宜加罪，然而不是内心怀有忠恳之情，不回避被责斥或贬逐，哪能做到这个样子？尚乞稍赐宽容，以便招后来之进谏者。”宪宗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分，我还可以宽容他。至于说东汉奉佛以后，帝王都招致夭死，这话多么乖逆刺激啊？韩愈作为臣子，竟敢如此狂妄，所以不能赦免。”于是民情惊恐惋叹，乃至国戚权贵也以为对韩愈的判罪太重，借故劝说宪宗，于是贬韩愈为潮州（今属广东）刺史。

韩愈到了潮阳，上表说：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之职，即日启程，奔驰驿路。经过跋涉，来到岭南，计水陆之程，约有万里。臣所管辖的潮州，在广府最东边，距广府虽说二千里，然而一个来回，动即超过一个月。经过海口，下恶水，急流涛波壮阔猛烈，难以计算日期和路程，飓风和鳄鱼，有不测之祸患。州南近处边界，南海之水连接蓝天，毒雾瘴气，日夜发作。臣从小多病，年纪才五十，头发已花白，牙齿也开始脱落，理应不能活得长久。加

以所犯之罪极重，所处之地又极远极险恶，忧惊愧怕，不日死亡。孤独一身，朝中无亲无党，谪居这蛮夷之地，和鬼怪为群。假如不是陛下哀怜顾念，有谁为臣说句好话。

臣稟性愚蠢丑陋，人事关系多不通达，只酷爱学问和文章，不曾一日废弃停辍，实是为同时一辈人所称许。臣对于当世之文，也没有超人之处，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和《诗经》、《尚书》相呼应，写作诗歌，荐送于郊庙，纪封泰山，镂刻白玉牒，铺陈张扬齐天的大美德，表扬激励空前的大功绩，编入《诗经》、《尚书》这类典籍而无愧色，措置于天地之间而无亏损。即使古人再生，臣也不肯谦让。大唐受天命而拥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是臣民与侍妾，东南西北，其疆域各有万里之遥。自从天宝以后，政治稍为松懈，文臣不能优化，武官也难以约束。孽臣奸佞。表面顺从而内怀叛逆，父亲死了，儿子袭承其职权，或以祖传之于孙，类似古代诸侯，自擅其权，自辖其地，不入朝，不进贡，已经六七十年。四位圣君传位，以至于陛下，亲自临朝听政决断，干戈所指，无不听从。宜当制定乐章，以昭告神明，东行巡视封于泰山，向皇天奏功，使长久万年，顺从我大唐功业。当此之际，是所谓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臣戴罪之人，自拘宁于海岛，唉声叹气，日日接近死亡，而不曾献上薄劣的技艺于官隶之间，用尽精力，费尽心思，以赎取以前的罪过。内心怀痛，忧思极天，死不瞑目。瞻望京中皇宫，神魂已随着飞去。希望陛下，如同天地父母，哀而怜我。

宪宗对宰相说：“昨天我收到韩愈到潮州上的表，因而想起他谏迎佛骨的事，确实是很爱我的，我哪里不知？但是韩愈作为人臣，不应当说皇帝奉佛才短命。我所以讨厌他的轻率。”皇上想再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韩愈，看看宰相对这事有什么看法。而皇甫^①讨厌韩愈的狂直，恐怕宪宗再起用韩愈，就带头说：“韩愈实在太疏放狂妄，可以移近京畿一郡任职。”于是授予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初时，韩愈到潮阳，开始办公，问及官吏百姓的疾苦，都说：“郡西潭水里有鳄鱼，下蛋孵化出来的，约有几丈长，吃老百姓的牲畜，快被吃完了，所以百姓贫穷。”住了几天，韩愈去视察一番，让判官秦济烤一猪一羊，投到潭水里，为文咒鳄鱼说：

前代薄德的君主，放弃楚、越之地，那样，鳄鱼游泳生存于这里是可以的。但如今天子神明圣贤，四海之外，也安抚而拥有。何况扬州（潮州古属扬州）之境，刺史和县令所治理的范围，缴纳赋税贡品以供皇帝祭祀宗庙鬼神，鳄鱼岂可以和刺史混居这里呢？刺史受皇上之命，镇守此地，而鳄鱼悍然不安居于溪潭，而吃百姓所养熊、鹿、獐、猪等牲畜，以肥其身，以产卵繁殖，和刺史争长称雄。刺史虽然笨而且弱，但哪里肯向鳄鱼低头而甘拜下风呢？今潮州大海在它的南边，鲸鱼鹏鸟这样的大物，虾和螃蟹这样的小物，无不能容纳，鳄鱼早上离开这里，晚上就到大海中去了。今天和鳄鱼约定，三日至七日，如顽固不愿迁徙，等待害物，那么刺史就选

强壮又有技艺的勇士，拿着强弓毒箭，和鳄鱼决一胜负。

咒鳄鱼的那天晚上，有狂风惊雷从潭中发出来。几天工夫，潭水尽干枯，鳄鱼即迁徙到离郡西六十里的旧潭里，自此潮州之民再没有鳄鱼的祸患了。

袁州的风俗，男的女的如果卖身作奴隶，超过预约期限无钱赎身的，就归于出钱的人家。韩愈来了，设法赎回被籍没的男女，还给他们的父母。仍旧废去其俗之法，不许卖身作奴隶。

元和十五年（820），韩愈被召为国子祭酒，转为兵部侍郎。正遇镇州（今河北正定）杀了田弘正，立王廷凑，命令韩愈到镇州宣布解说。韩愈到了镇州，召集军民，晓以顺逆的道理，说话言辞和情感都很真切，王廷凑敬畏而且重视他。又改任吏部侍郎，转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因为不参谒台臣，被御史中丞李绅所弹劾。韩愈不服气，说有敕令准予御史大夫不必参谒台臣。李绅和韩愈为人性情都偏僻，名刺送来送去，纷纷然没完没了，于是让李绅出为浙西观察使，韩愈也罢去京兆尹之职，为兵部侍郎。及至李绅临行赴镇，向唐穆宗当面辞行，哭泣着叙说情况的经过，穆宗可怜他，于是追下诏令，以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仍旧任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十二月，韩愈死，享年五十七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曰“文”。

韩愈性情弘大通达，和人交往，不管是显荣还是倒霉，交情都不改变。少年时和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好。这二位朋友声名地位还没显露时，韩愈不避寒冷酷热，在公卿中间活动，竭力加以举荐。而张籍终于科举及第，当官显贵。后

来虽然荣贵一时，但每当公余空闲之时，就相聚饮宴谈天，论文赋诗，和以前一个样。而看待那些权贵豪门，却如同走仆奴隶，睁着眼睛也不看一下。同时颇能诱导勉励后进之士，收入馆中的有十六七人，即使早饭吃不上，也怡然自得，从不介意。他一生大抵以振兴名教发扬仁义为己任。共嫁内外亲戚和朋友中的孤女只十人。

韩愈常认为自魏、晋以来，作文的人多拘泥于对仗，而在文经、诰的要旨，司马迁、扬雄文章的气格，却不复加以继承和发扬了。所以韩愈所写的文章，务求反对近体，抒意立言，都自成一家。后学士人，都师其文，取为法则。当时写文章的人很多，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世称“韩文”。然而他有时恃才自傲，肆意而行，也有背离孔子、孟子之旨的地方。譬如南方人妄传柳宗元为罗池神，而韩愈写碑文却加以证实；李贺父亲名晋，不应参加进士考试，而韩愈却为李贺写《讳辨》，要他参加进士考试；又作《毛颖传》，讥刺戏谑也不近人情：这些都是文章中很谬误的。时人说韩愈有史笔，及至撰写《顺宗实录》，繁简失当，叙事也不善于取舍，颇为当时所非议。唐穆宗、文宗曾下诏让史臣加以添改，那时韩愈的女婿李汉、蒋係正处于显荣的地位，诸公颇为难。而韦处厚竟另外撰写《顺宗实录》三卷。韩愈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作序。

韩愈的儿子韩昶，参加进士考试及第。（刘林 译）

【原文】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

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研，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

寻登进士第。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为其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山阳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时华州刺史阎济美以公事停华阴令柳涧县务，俾摄掾曹。居数月，济美罢郡，出居公馆，涧遂讽百姓遮道索前年军顿役直。后刺史赵昌按，得涧罪以闻，贬房州司马。愈因使过华，知其事，以为刺史相党，上疏理涧，留中不下。诏监察御史李宗谔按验，得涧赃状，再贬涧封溪尉。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曰：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

细大不捐。烧膏油以继晷，常矻矻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迨《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栋，细木为桷，榑桷侏儒，椳闳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犖为杰，校短量长，唯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不由其统；言虽多，不要其中；文虽奇，不济于用；行虽修，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廩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

安坐而食，踵常涂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此非其幸哉！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诤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袷芩也。”

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仍赐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颡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

啻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书史不言其寿，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感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

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离世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令巫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后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

愈于潮阳，上表曰：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即日驰驿就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去广府虽云二千里，然来往动皆逾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渐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克不纲。孽臣奸隶，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贡，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躬亲听断，干戈所麾，无不从顺。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使永永万年，服我成烈。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寡，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镈恶愈谏直，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终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弃楚、越之地，则鳄鱼涵泳于此可也。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抚而有之。况扬州之境，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共天地宗庙之祀，鳄鱼岂可与刺史杂处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鳄鱼悍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獐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与刺史争为长。刺史虽弩弱，安肯为鳄鱼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鳄鱼朝发而夕至。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

呪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

十五年，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会镇州杀田弘正，立王廷凑，令愈往镇州宣谕。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仍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及绅面辞赴镇，泣涕陈叙，穆宗怜之，乃追制以绅为兵部侍郎，愈复为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者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

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品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黷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壻李汉；蒋係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

子昶，亦登进士第。

刘禹锡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说明】刘禹锡（772—842），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贞元进士，登博学宏词科。授监察御史，参加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失败后贬为郎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官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

刘禹锡诗与柳宗元、白居易齐名，时称“刘柳”、“刘白”。其诗造语流丽，取境优美、凝练含蓄，善用比兴手法寄托政治内容。所作《竹枝词》等颇具民歌风格，流传甚广。参加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大力写作古文。其论文涉及哲学、政治、医学、书法等许多方面。《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反映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刘梦得文集》。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父刘云，父亲刘淑，历官州县令佐吏，于时以儒学著称。

刘禹锡贞元九年（793）中进士第，又登宏辞科。他精于写古文，又善作五言诗，今体文章也表现多才而华丽。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中干事，掌管记室，尤受礼遇。跟随杜佑入

朝，为监察御史。他和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友好。

贞元（785—805）末年，王叔文在东宫任职，晚辈求进取的，多依附他。刘禹锡尤其为王叔文所了解和奖掖，把他看作宰相之才。唐顺宗登帝位，病了很久，不能胜任政事，宫禁中的文诰，都是由王叔文发出的。王叔文引刘禹锡和柳宗元入宫中，和他们商议大事，他们所说的，无不听从。刘禹锡转官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唐德宗墓）使判官。颇自恃威权，伤害朝士。柳宗元平时不喜欢武元衡，那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把他降为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说刘禹锡挟邪乱政，不适宜留在朝中，窦群当日就被罢官。韩皋凭借他是贵门出身，不依附王叔文之党，被出为湖南观察使。刘禹锡任性以喜怒欺凌于人，京师人士不敢提他的名，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号称“二王刘柳”。

王叔文革新失败，刘禹锡受累被贬为连州（今四川筠连）刺史，在途中，又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朗州地处西南夷之境，风俗鄙陋，举目异样，没有可以对话的。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平时只是写文章吟诗歌，借以陶冶情性。蛮夷风俗喜好巫术，每逢神祀设祭，击鼓跳舞，一定要唱些俚俗的歌词。刘禹锡在这中间干事，有时参与这类活动，于是按骚人写歌词那样，为巫歌写新词，教巫祝传唱。所以武陵谿洞之间的夷歌，大多是刘禹锡的歌词。

初时，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宪宗也发怒，所以再贬朗州。在朝廷的制令中有“逢恩不赦”的话。然而掌朝政的大臣爱惜他们的才华，想洗掉身上的政治痕累，渐渐地再起用他们。正逢程异又掌转运大权，下诏命以韩皋和

刘禹锡等人为远郡刺史。当武元衡任中书，谏官十多人上书议论此事，说这些人不可再用，因而作罢。

刘禹锡多年在湘江澧水之间，郁郁寡欢，因读了《张九龄文集》，乃叙写其意说：“世称曲江张九龄当宰相，建议放逐罪臣不宜放于好地方，多半徙居五谿不毛之地，今读他的文章，自内庭任职出守始安（在今贵州境），有叹息瘴疠之气的意思；自罢相出任荆州（今湖北江陵），有感叹被拘禁的意思。托讽于禽鸟，寄辞于草木，郁郁然和骚人同一风韵。哎呀，身被放逐于边远之地，一旦失意便难以忍受，何况华人士族，而被处于丑陋之地，然后还能感到快意！议论的人认为张九龄是良臣，识破胡维安禄山有反骨之相，以与庸材凡器同列为羞耻，私下上奏，廷上谏诤，就是古时的贤哲之人也比不上，辅佐君王之忠勤，没人比得上，然而却终于成为饿鬼。岂不是猜忌之心失于恕道，暗罚最大，虽有二美也不能赎罪啊？不是那样，袁公哪能一句话明断楚之冤狱而招福四世呢？以此相比较，神明哪能欺瞒呢？”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从武陵被召回京师，宰相又想把他安排在朝内官署任职。那时刘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诗语中含有讥刺之意，令掌政的朝臣不高兴，又被出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诏书颁发下去，御史中丞裴度上奏说：“刘禹锡有老母，年纪已经八十多岁。今播州在西南极远之地，是猿猴所居的地方，人迹很少到达。刘禹锡确实有罪，但他的老母实在不能去播州，那么只能和儿子作死别，臣深恐这有伤于陛下孝治之风。希望屈折一下法律，稍移于近处。”宪宗说：“作为人子，每件事都要特别谨慎，应

常考虑到会不会给双亲带来忧患。今日刘禹锡所应得的罪，理应更重于其他人，你哪里能以孝来议论从宽处理呢？”裴度无语以对。过了很久，皇帝改变面色说：“我所说的，是指责作为人子的事，然而总不想伤他老母的心。”于是改授刘禹锡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他离开京师又经历十多年，接连做了几郡的刺史。

大和二年（828），刘禹锡被从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召入朝，官拜主客郎中。刘禹锡对以前的事衔恨不已，又作《游玄都观诗序》说：“我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任尚书屯田员外郎，那时这个道观还没有花木，这一年我出任连州刺史，不久又贬为朗州司马。在朗州居住十年，被召入京师，那时人人都说有道士手种红桃，栽满道观，开花时烁烁如同早霞，遂有前诗，以记一时之事。不多时，又外出任州郡刺史，至如今又经历十四年，才得以入朝任主客郎中。重游这座道观，已经荡然一树无存，桃花尽净，只有兔葵和燕麦在春风中摇动，因此再题二十八字，以待后游君子。”他的前一首诗，有这样的句子：“玄都观里有千树桃花，都是刘郎我离京去后才栽种的。”后一首则有这样的句子：“种桃的道士今天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前次来游的刘郎我又到这玄都观里来。”人们赞赏他的才气，却鄙薄他的品行。刘禹锡最为愤怒的是武元衡和李逢吉，而裴度则比较理解他。大和（827—835）中，裴度在中书省，想让刘禹锡任知制造之职，掌权的朝臣又听说他写了那篇诗序，更加不高兴，因而转为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裴度罢掉知政事之职，刘禹锡请求分司东都洛阳。他始终因为自恃其才，处世偏激，所以不能长期在朝中任职。

（大和五年）六月，授苏州刺史，赐金鱼袋紫衣。任职期满入朝，又授汝州（今河南临汝）刺史，升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刘禹锡晚年和太子少傅白居易相友善，诗歌文笔，当时没有在他们之前的，冠绝一时。白居易常和刘禹锡往来唱和，因而收集他的诗，并写了序言，说：“彭城刘禹锡，是诗中之豪者。他的笔锋森森然，很少有敌手。我不自量力，往往触犯其锋。和应者必是同声，相争必是敌手。一往一来，想罢不能。因此每写一篇，先看草稿，看完就兴发，兴发就写成文章。一二年来，每日都找笔墨纸砚，互相赠答，不觉愈来愈多。大和三年（829）春以前，纸墨所存吟稿。共计一百三十八首。其他因醉酒乘兴而作的，或者率然而成口号的，都不在此数之内。于是叫小侄龟儿编录在一起，辑成两轴。仍旧抄写两本，一轴给龟儿，一轴给刘禹锡的小男孩伧郎，要他们好好收藏，附在两家的文集。我近与元稹唱和也颇多，有的传播在人们的口头之中。我曾和元稹开玩笑说：‘我和你二十年来作为文友诗敌，是幸，也是不幸。吟咏性情，扬声显名，其适可以忘形，其乐可以忘老，这是幸；然而江南的士人女子议论才子的，多称“元、白”，因为你的原因，使我不能在吴、越之间独冠一时，这是所谓不幸。今年纪已老，又遇到刘禹锡，不是更加不幸吗？’禹锡禹锡，其文章之妙，首推其诗。其神妙之处，我哪敢同他比较？譬如禹锡的‘雪里高山头白得很早，海中仙果结实就迟了’、‘沉没的船其侧有千帆驶过，病老的树其前有万木争春’之类的句子，真可谓神妙啊。禹锡的诗所在之处，都应有神灵来保护，岂能止于

两家的子弟加以秘藏而已！”刘禹锡被名流所推许达到这样的地步。刘禹锡曾写《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的文士称为佳作，虽然他的名位不显达，但公卿大僚多争相和他交往。

开成（836—840）初年，刘禹锡又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不久又授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任期已满，又入朝任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842）七月死，享年七十一，追赠户部尚书。

刘禹锡儿子刘承雍，登进士第，也有文才词藻。

（刘林 译）

【原文】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淑，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词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事。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籍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积岁在湘、沅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谿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伎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锺社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

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大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

男仝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

柳宗元传

——《旧唐书》卷一六〇

【说明】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曾参加永贞元年王叔文等领导的革新运动，失败后长期被贬永州、柳州蛮荒之地，死于柳州任上。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并称“韩柳”。他重视文章的内容，强调“道”与“文”的主次关系，大力提倡古文。他创作了大量论说文、传记文、山水游记、寓言，有着丰富的现实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又工诗，风格多样，造语精妙。部分诗作思想内容与陶渊明相近，后人将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山水诗人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还是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创作了《天说》、《天对》、《断刑论》、《非国语》等重要论著，认为“元气”是物质的客观存在，不存在更高的主宰，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柳宗元自幼好佛，有儒、释、道“三教调和”的主张。有《河东先生集》。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柳诒，在高宗朝任宰相。父亲柳镇，官太常博士，终侍御史。

柳宗元少年时代，聪明机警，超群出众，尤其精通西汉文章和《诗经》、《离骚》。构思落笔为文，可与古人相比并。精心制裁，缜密联缀，璀璨如同编纂珍珠和贝壳。当时文林同辈都推崇他。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第，又应考中宏辞科，授给校书郎、蓝田（今司陕西）县尉之职。贞元十九年（803），柳宗元任监察御史。

唐顺宗即帝位，王叔文、韦执谊掌权用事，尤其看重并任用柳宗元，将他和监察吕温秘密引入宫禁之中，和他们商议大事。柳宗元又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王叔文想让他当大官，恰遇任职不久，王叔文就失败了，他便和七名同辈都被贬谪了。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宝庆）刺史，赴任途中，再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柳宗元既遭贬逐，涉足南蛮瘴疠之地，处身崎岖阻塞之境，内怀骚人抑郁之情，所以抒情叙事，一动就写文章。作骚体文章十多篇，阅览的人无不为之感到凄惻哀惋。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按旧例被移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那时朗州司马刘禹锡任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诏书下达，柳宗元同所亲近的人说：“刘禹锡有老母，年事已高，今到蛮方远郡为刺史，在西南绝域之地，来回上万里，哪能让他和老母一起去。如果母亲不去，母子异方，便成为永别。我和禹锡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哪能忍心看他母子这样为难呢？”遂起草奏章，请求将柳州授给刘禹锡，自己赴播州上

任。正遇裴度也奏请照顾刘禹锡母子，所以刘禹锡终于改授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

柳州风俗，用男或女为质去借钱，如果过期没还钱，人质便为钱主所没收。柳宗元到了柳州，便革掉这种土法。那些已经被钱主没收的男女，柳宗元自己出私钱赎回，并归还给他们的父母。长江至岭南之间，凡是想考进士的，不远千里，都来跟随柳宗元，拜他为师。凡是经柳宗元指点过的，必成为名士。柳宗元著述之多，文名震动当代，时人号称“柳州”。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819）十月五日死，享年四十七。那时他的儿子周六和周日，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柳宗元办理丧事，并护送他的妻室和儿子返回京师，当时的人赞扬他很有义气。（刘林 译）

【原文】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诜，高宗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

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

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

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时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

欧阳修传

——《宋史》卷三一九

【说明】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早年支持范仲淹的改良运动；王安石实行新法时，曾上疏陈青苗法立弊。晚年辞官闲居，卒谥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批判。其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诸体兼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雄健，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在当时极有影响。其诗学习韩愈“以文为诗”，语言自然晓畅；部分诗作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写得沉郁顿挫，风格接近杜甫。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其词婉丽，有南唐遗风，多写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等。欧阳修的赋也很出色，《秋声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赋的发展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于经学、史学、金石学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参加《新唐书》的修撰，自著《新五代史》，收集、整理周代至隋

唐的金石碑刻，辑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郑氏，立誓守节，亲自教导儿子读书，家境贫困，以至用芦管当笔在地上描画着学习写字。欧阳修自幼就聪敏颖悟，超过常人，书读过就能熟记背诵。一到成年，就有了很高的声望。

宋代立国将近百年，但文章的体裁，还是依然沿袭着五代的风气。文人们刻镂雕琢的都是骈偶之文，文坛污浊，文风不振，读书人因循陋习，墨守成规，评论卑下，气调柔弱。苏舜元苏舜钦兄弟、柳开、穆修等人，都有意振作张扬正气，但力量不足。欧阳修游历随州（今属湖北），在废书簏中得到了唐朝韩愈的遗稿，读后万分欣慕。于是就苦心孤诣地探幽索隐，以至废寝忘食，他决心要同韩愈并驾齐驱、比肩齐名。

中进士，得南宫殿试第一，被选拔为甲科，调西京推官。开始和尹洙交游，和尹洙一起写作古文，议论当朝时政，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教师和朋友，又同梅尧臣交往，相互作诗唱和，就这样，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名满天下。不久，选进朝廷，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为议论政事被贬了官，朝廷中很多官员都议论相救，只有司谏高若讷一个人认为当贬。欧阳修就写了封信责备他，指责他不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高若讷把欧阳修写给他的信送给了皇上，欧阳修因此获罪，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不久又迁为乾德（今湖北光化）县令、武成（今河南滑县）节度判官。范仲淹出使陕西，征辟欧阳修执掌

书记。欧阳修笑着推辞说：“从前我所以那样做，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还是同其退不同其进较好吧。”过了很久，朝廷又恢复了他的校勘职务，并被进举为集贤院校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主持谏院。

当时仁宗皇帝更换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做了朝廷大臣，仁宗还决定增加谏官，起用天下名士，欧阳修第一个在被选之列。每次进见，仁宗都要征求每个大臣的意见，询问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朝中兴废的事多了，小人们的聚合趋附感到了很多的不便。欧阳修考虑到正直的好人必然不会得胜，多次向仁宗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初，范仲淹被贬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波阳），欧阳修和尹洙、余靖都因为替范仲淹辩白伸冤而被逐，且被看成是“党人”。从此，朋党的争论就开始了，欧阳修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其大略的意思说：“君子和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成朋党，小人和小人因为私利相投结成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但我说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因为小人所喜好的是名利和厚禄，所贪图的是金钱和财物，当他们利害一致的时候，就暂时互相勾结拉拢成为朋党，这是虚伪的。等到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互相争先，或者无利可图的时候就反而相互残害，虽然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它们来修身，就不仅志同道合而且还互相裨益，用它们来效忠国家，就不仅同心协力而且同舟共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商纣有臣子亿万个，就有亿万颗心，可说是没有朋党

了吧，而商纣因此而亡国；周武王有臣子三千人，三千人只有一条心，可说是大的朋党了吧，而周王朝因此而兴。这是因为君子的朋党，虽然多也不会满足的缘故。所以做国君的人只该贬退小人的假朋党，起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大治了。”

欧阳修评议朝政严厉正直，小人们把他看成似仇人，而仁宗独夸奖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朝服，并且回看着侍臣们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得来？”于是，提拔为同修起居注，又主管起草皇帝的诏令。按照先例，选拔主管起草皇帝诏令的官员一定要经过面试以后才能任命，因为仁宗了解欧阳修，下诏书特地任命欧阳修担任这个职务。

后来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自从朝廷对西方用兵以来，议论时政的人就想废除麟州（今陕西神木）以便节省军队的供给。欧阳修说：“麟州是天然的险要之地，不要废除，废除了麟州，那末河内这些郡县的百姓就不能安居了。不如分出麟州的军队，让他们进驻河内的各个要塞，遇到危急也可以互相得到接应和救援，而平时又可以省去转辗运输之劳，对于谋略来说，这样做比较有利。”由于欧阳修的这个建议，麟州得到了保存。他又说：“忻州（治所在今山西忻县）、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岢岚（今属山西）多的是禁地和废田，希望下命令让老百姓去开垦和种植，不然，就将被敌人占有了。”朝廷把欧阳修的提议交给有关部门讨论，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实行，结果是朝廷每年得到了几百万斛的粮食。凡是河东土地赋税过重，人民无法忍受的摊派，欧阳修上奏朝廷请求免除了十几项。

欧阳修出使回来，正值保州（今河北保定）屯兵作乱，欧阳修被授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他在向天子辞别的时候，仁宗对他说：“你不要做长久留在外面的打算，有什么想说的，说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在谏官任上就该评论朝政，现在我已经不做谏官了，再评议朝政就是越职了，这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没关系，不要因为京官和外官而生出间隔来。”乱贼平定了，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藏妇女，欧阳修逮捕了冯博文把他囚禁在监狱里，李昭亮害怕了，马上放出了所有私藏的妇女。保州屯兵开始作乱的时候，官府曾经用投降不杀的诺言进行招安，等到叛乱平定后却统统把他们杀死了，另外尚有胁从的二千人，本来已经把他们分别编制、隶属到各个州郡里去了，当时富弼是宣抚使，担心这些被编的人以后会再生变故，所以又决定将他们在同一天里全部杀死。碰巧富弼和欧阳修在内黄（今属河南）这个地方相遇了，关夜里，富弼屏退左右，悄悄地把自己的这个打算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说：“灾祸没有比杀死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何况又是胁从的人呢？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如果有哪个州郡不服从你的这个命令，变故起来可不是小事呀！”富弼恍然大悟，因此中止了这个计划。

当时，杜衍等大臣因为党议一个接一个被罢了官，欧阳修愤慨地向朝廷上奏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以被举用的贤才，而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应该被免职的罪过。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贤，他们的说法其实也并不复杂。想大批地陷害忠良，不过就是指责他们是朋党，想动摇大臣的地位，就必须用专权来诬陷他们，这是

什么原因呢？因为除去一个好人，其它很多的好人还在，这对小人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利益；想把好人一网打尽，但好人却又很少有过失，很难一一找到他们的缺点，只有指责他们结为朋党，那么就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全部贬逐他们。至于自古以来那种已经被皇上了解、而且深得皇上信任的大臣，那么就难以用其它的事由来动摇他们了，只有专权是皇上最忌讳和憎恶的，所以，一定要用这种说法，方才可以打倒他们。正直的人士在朝廷，邪恶的小人就会有所避忌，谋臣不被举用，正是敌国的福气。现在这四个正直的大臣一旦罢免，一定会使邪恶的小人相互庆贺于内，四周的敌人相互称贺于外，我替朝廷可惜呀！”于是邪党更加憎恨欧阳修，就借他妹妹的孤女张化的案子罗致他的罪名，把他降为知制造，出为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欧阳修在滁州住了二年，徙扬州（今属江苏）、颍州（今安徽阜阳）。不久，恢复了他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衔，留守南京，因为母亲去世而去职。服丧期满，朝廷任命他为流内铨。当时，欧阳修在外已十一年了，仁宗看到他的头发都已发白，问候慰劳很是周到。小人们害怕欧阳修再次被重用，就有人假造欧阳修的奏章请求仁宗清洗内侍中挟持恩宠，为非作歹，用非法手段获取私利的奸徒。这样就激起了宦官们对欧阳修的深切怨怒，纷纷诬陷他，要把他外放同州（今陕西大荔），仁宗皇帝采纳了吴充的意见才得以中止。迁翰林学士，让他修纂《唐书》。欧阳修奉命出使契丹，契丹君主命令四个贵臣掌管宴会，并且对欧阳修说：“这种规格的接待并不是常规制度，只是因为你的名声大，所以才这样做的。”

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贡举。当时应考的读书人喜欢写作险怪奇涩的文章，号为“太学体”，欧阳修极力排斥，贬抑这种文体，凡是写作这种文章的人一概黜落。这件事结束后，从前那些轻狂浅薄的人侦候得欧阳修出门，聚集在一起气势汹汹地拦住欧阳修的马头高声责骂，街上的巡逻队无法制止；然而科举考试的风气，却从此得到了改变。

欧阳修被封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他继承包拯威严治政之后，用简明便易、遵循法制的原则治政，不求显赫的名声，京师也治理得很好。十个月以后，改充群牧使。《唐书》修撰完毕，欧阳修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当时黄河在商胡决口，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贾昌朝想掘开横垆故道，回折河水使它向东流。有个叫李仲昌的人，却主张把河水引入六塔河。议论的人不知听谁的好。欧阳修认为：“黄河水流多泥沙，按理说来没有不淤塞的，下流既然已经淤塞了，上流就一定会决口。用近来发生的事情去考察，黄河的决口并不是不能努力塞住，故道也不是不能努力恢复，但是这种做法都不是治本之道，因而势必不能保持久长。开掘横垆故道工程很大，但难以成功，即使成功了，最终还是要再次决口。而六塔河河床狭窄，令黄河水悉数倾注，滨、棣、德、博各州一定会遭到它的灾害。不如依循河水的走向，增高河堤，疏通它的下游，让黄河之水无所阻拦地流入大海，这才是几十年的长久利益呀。”当时的宰相陈执中主张贾昌朝的意见，文彦博主张李仲昌的意见，终于造成了河北的大灾难。

谏院论述陈执中的过失，但陈执中仍然拖延着企图稳住

自己的官位。欧阳修上书皇帝，认为“皇上拒绝采纳忠告，庇护愚顽的宰相，给皇上带来了连累。”过了不久，陈执中被免去了宰相职位。狄青做了枢密使，很有威望，仁宗不高兴，谣言纷起，欧阳修请求出任外官，以保全自己得以善终。于是就免去了他的朝官而改任陈州（今河南淮阳）知州。欧阳修曾经因为水灾向仁宗上奏疏说：“皇上君临天下已经三纪了，但至今东宫太子之位未定。从前汉文帝刚即位，因为臣子们的建议，马上立了太子，因此享国很久长，为汉太宗。唐明宗讨厌臣下议论接班人的事，不肯早早立定太子，因此造成秦王之乱，宗庙社稷由此倾覆。皇上为何犹豫而久久不选定太子呢？”此后的建立英宗，推究其源，就在于欧阳修的这次上书。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升任为枢密副使。嘉佑六年（1061），为参知政事。欧阳修在兵府时，曾经和曾公亮考核全国的军队数和三路驻守兵员的多少，地理的远近，重新制造了地图和簿籍。凡是边防长久以来没有派兵驻守的，一定进行检阅和补充。他在任执政大臣时，和韩琦同心辅助仁宗。凡是兵民、官吏、财利等中书省应当知晓的重要大事，编集成一个总目，碰到事情就不必临时匆忙地向有关部门了解。当时东宫太子的人选还没有决定，欧阳修就和韩琦等人对这样一件大事协商出了一个意见。宋英宗因为得了病，无法亲自处理朝政。皇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互相猜忌，制造矛盾，皇帝和皇太后几乎因此成为怨仇。在韩琦奏事的时候，太后哭着向韩琦说了英宗和自己的种种矛盾。韩琦用英宗有病来进行劝解，太后听了不高兴，欧阳修就进一步劝说道：“太后

侍奉仁宗皇帝已经几十年了，您的仁德昭示于天下。以前温成专宠，太后您处置得从容自如；现在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宽容吗？”太后的情绪稍稍和缓了些，欧阳修又劝说道：“仁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久，他德政的恩泽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所以一旦驾崩，天下奉戴太子，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的。现在太后您只是一个妇人，而我们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意，天下谁人肯听从呢？”太后不作声，过了很久，母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平息了。

欧阳修平素和人相处总是坦率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从不掩饰和隐瞒。等到他执政以后，士大夫们对他有所请求，他总是当面说明可以还是不可以的理由，就是谏院的官员议论政事，他也一定用是非作为标准来责问他们，因此怨恨他、说他坏话的人就更多了。英宗将追封尊崇濮王，下命令让有关部门讨论，都说应当称皇伯，改封一个大国。欧阳修引述《礼记·丧服记》，认为：“身为人子的人，应该替他的父母实行“报祭”，降服丧三年为服丧一年，而不隐没父母的名字，可是丧服可以降等，但名字是决不可隐没的。如果出嗣的儿子把亲生的父亲改称为皇伯，这种例子就是遍考前代，都是没有根据的。进封为大国的王，但礼制规定又没有加爵的道理。所以中书省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不同。”最后太后写出了手书，允许英宗称濮王为亲，推尊濮王为皇考，三夫人为后。英宗不敢承当。于是御史吕诲等人毁谤说欧阳修主张这种意见，争论不休，后来吕诲等人都被贬逐出了御史台。只有蒋之奇的意见附和欧阳修的主张，所以欧阳修推荐他为监察御史，但是被御史台的很多人看成是奸佞邪恶的小人，蒋

之奇为此十分害怕，就想使自己摆脱这种窘境。正好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和欧阳修有仇恨，他捏造了欧阳修家庭生活淫乱的谣言来诋毁欧阳修，这个谣言转辗相传，一直传到了御史中丞彭思永的耳中，彭思永又把这个谣言告诉了蒋子奇，蒋子奇就上奏章弹劾欧阳修。当时，神宗皇帝初即位，心里希望重重地谴责一下欧阳修，就去征求过去的宫臣孙思慕的意见，孙思慕替欧阳修辩白解释，欧阳修杜门不出，要求神宗对制造谣言的人治罪。神宗派人诘问彭思永、蒋之奇，追问谣言的出处，彭思永、蒋之奇回答不出来，结果都遭到了贬逐。欧阳修也坚决要离开朝廷，结果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亳州（今安徽亳县）知州。第二年，迁兵部尚书、青州（今山东益都）知州，后来又改为宣徽南院使、兼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欧阳修辞不受命，后又改徙蔡州（今河南汝南）。

欧阳修总是以风骨气节自我制约，但却屡屡遭到污蔑，且年纪已六十了，就一再上表要求辞去官职，神宗帝总是宽慰他，没答应他的辞官。及至出守青州，又因为请求停止散发青苗钱，被王安石所诋毁，因此要求放归的愿望益发急切。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熙宁五年（1072）死，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

欧阳修始在滁州时，自号为“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然机关陷阱就在前面，但也能置触发之险于不顾。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放逐流放，却仍旧是志气自若。当他被贬夷陵时，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就取出积年的陈旧案牍反复观看，看到其中冤屈谬误的地方

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道：“一个荒远的山城，尚且如此，天下冤屈谬误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自此以后，碰到狱讼之类的事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疏忽。学者求见，和他们谈话，从来不论及文章，只谈官事，他认为文章只能润及自身，而政事却可以推及它物。他前后历任数郡的长官，不炫耀政绩，不追求声誉，为政宽缓简要而不扰民，所以，凡是他所到的州郡，人民都感到安适。有人问他：“您老治政宽缓简要，而政事却并没有弛废，这是什么原因呢？”欧阳修说：“如果以放纵为宽，以怠慢为简，那么政事就一定会弛废，而人民也一定会受其弊害。我这里所说的宽，是指政令不苛刻急迫，我所说的简，是指政令不繁杂琐碎。”欧阳修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秉烛夜读公文，屡屡停卷而叹。我问他，他就说：‘这是个死狱啊，我想设法让他能活，不能啊！’我说：‘生可求吗？’你父亲就说：‘做官的人想方设法寻求使死狱者获生的办法而不得，那未死的人和我就都无恨了。而做官的人虽然常常存有使死狱者变活的愿望，尚且会不小心使他死了，何况世上不少做官的常常希望的是治民以死呢！’他平时教育他的子弟，也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说，我耳朵都听得熟了。”欧阳修听后终身遵循父亲的这个教导。

欧阳修写的文章，自然天成，或丰满或简约，都符合标准。他的文辞简要，旨意明朗，立论有据，内容通博，旁征博引，引类例举，分析事理至深至透，因此很能折服人心。他趋然脱俗，独自奔驰，众人不能相及，所以天下的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尊称他为师。欧阳修鼓励提携后进，犹恐不及，凡

是被他赏识的人，大多成了有名望的人。曾巩、王安石、苏洵、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当他们还是平民的时候，屏处乡里，不为人知，欧阳修就为他们游说，赞美他们的声誉，说他们一定会显名闻达于世。他对待朋友非常笃实，朋友在世的时候举拔扶持他们；朋友去世以后就調理保护他们的家族。

欧阳修喜好古文，爱好读书，凡是周、汉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都要采集收拾起来，研究考核它们的异同，把自己的观点写在左边，明白、昭著可为表证，称之为《集古录》。奉诏修撰《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章法严谨，用词精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论述欧阳修的文章时说：“论大道时像韩愈，议政事时像陆贽，记史事像司马迁，作诗赋像李白。”有识之人以为这是真正了解欧阳修的话。

……

评论说：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一直到秦、汉，文章虽然跟着时代而有所盛衰，但它们的语言却都繁富滋润，它们的光泽都灿烂照人，它们的音节都清晰明亮，这是因为还都保留有先王遗留下来的功绩。经过晋、魏，文章就衰弊了，到唐代的韩愈手里，文章重新振兴起来。唐代的文章，经过五代又衰弊了，到宋代欧阳修手里，又再次振兴起来。挽回百川之颓波，平息千古的邪说，使这种文章的正气，可以辅佐大道，可以扶持人心，这都是韩愈、欧阳修两人所作的努力啊！韩愈在政治上没有得到重用，欧阳修得到了重用，但最终还是不能有所作为，这件事真应该被世道惋惜的啊！

（姚汉荣 译）

【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鏤刻骈偶，洪涩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归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

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奉使河东。自西方用兵，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修曰：“麟州天险不可废，废之，则河内郡县，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内诸堡，缓急得以应援，而平时可省转输，於策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岚多禁地废田，愿令民得耕之，不然，将为敌有。”朝廷下其议，久乃行，岁得粟数百万斛。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奏罢十数事。

使还，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贼平，大将李昭亮、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修捕博文系狱，昭亮惧，立出所纳妇。兵之始乱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杀之，胁从二千人，分禁诸郡。富弼为宣抚使，恐后生变，将使同日诛之，与修遇于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从，为变不细。”弼悟而止。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颺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颺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行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知嘉佑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问之器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修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垆故道，四河使东流。有李仲昌者，欲导入六塔河，议者莫知所从。修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

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耳。横垆功大难成，虽成将复决。六塔狭小，而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纵使入海，此数十年之利也。”宰相陈执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为河北患。台谏论执中过恶，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常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修在兵府，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缺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东宫犹未定，与韩琦等协定大议。英宗以疾未亲政，皇太后垂帘，左右交构，几成嫌隙。韩琦奏事，太后泣语之故。琦以帝疾为解，太后意不释，修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宠，太后处之裕如；今母子之间，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复曰：“仁宗在位久，德泽在人。故一曰晏驾，天下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至一妇人，臣等五六书生耳，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久之而罢。

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

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帝将追崇濮王，命有司议，皆谓当称皇伯，改封大国。修引《丧服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太后出手书，许帝称亲，尊王为皇，三夫人为后。帝不敢当。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争论不已，皆被逐。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修荐为御史，众目为奸邪。之奇患之，则思所以自解。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谴修。访故官臣孙思恭，思恭为辨释，修杜门请推治。帝使诘思永、之奇，问所从来，辞穷，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罢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明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辞不拜，徙蔡州。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汙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常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

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意；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常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惊，众莫能及，故一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荀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

论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

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王安石传

——《宋史》卷三二七

【说明】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初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出息还官，减轻高利贷剥削。历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嘉祐三年（1058），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万言书，主张培养人才，变法革新。神宗即位，起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上书皇上，列举北宋建国以来各项制度的弊端，阐述改革的必要，与神宗意合。熙宁二年（1069），拜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主持变法，陆续颁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以期富国强兵，史称“王安石变法”。次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于保守派的反对，新法推行迭遭阻碍。七年，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第二年，复相。九年，再次罢相，出差宁府，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元丰二年（1079），复拜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封荆国公。神宗死，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司马光为相，尽罢新法，王安石闭门不言政。哲宗元祐元年（1086）去世。赠太傅，谥

号“文”。王安石博学多才，执政时会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人重新注释《周官》、《尚书》、《诗经》，颁之学官，不用先儒传注，时称《三经新义》。退居江宁时，又作《字说》，文字训诂也多与前人不同。善长诗文，散文雄健峭拔，政论简洁有力，诗词亦清新高峻，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著《字说》、《钟山日录》等多已失传，今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行世，后人并辑有《周官新义》、《诗义钩沉》等。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亲王益，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小时候喜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他写起文章来下笔如飞，初看好象漫不经心，完成后，见到的人都佩服他的文章精采绝妙。朋友曾巩把他的文章带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他扩大声誉。王安石考中进士，被选为上等，出任签书淮南判官、按照以前的制度，任职期满，允许进献文章要求考试馆阁职务，唯独王安石没有这样做。又调任鄞县的知县，修筑堤堰，疏治陂塘，兴修水利，方便水陆交通；将官谷借贷给农民，让他们秋后加些利息偿还，使官仓中的存谷能够以旧换新，鄞县的老百姓都觉得很方便。再任舒州通判。当时文彦博做宰相，向朝廷推荐王安石淡于名利，请求越级提拔，以此来遏止追逐名利的不良风气。不久，朝廷召王安石考试馆职，他没有参加。欧阳修推荐他做谏官，他又以祖母年事已高为理由而推辞。欧阳修对朝廷说王安石须要俸禄养家，于是朝廷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他请求担任常州知州。调任提点江东刑狱，又进京担任度支判官，当时是宋仁宗嘉祐三年。

王安石的议论和主张高深新奇，善于用雄辩和旁征博引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事，慷慨激昂地立下了矫正世事、改变传统陋俗的志向。于是，他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认为：“如今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乏，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毛病就在于不知道规律，不遵循先王的政令。效法先王政令，在于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只要效法先王政令的精神，那么我们所推行的改革变更就不至于惊扰天下人的视听，就不至于使天下舆论哗然、议论纷纷，也就必然符合先王的政令了。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来生产天下的财富，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消费，自古以来的太平治世，不曾因为财富不足而造成国家的祸患，忧患是在于治理财政不得其法。居官任职的人才能既已不足，而城乡民间又缺少可以使用的人才，国家的重托，疆域的保持，陛下难道能够长久地依靠上天赐予的幸运作为常法，而不考虑万一出现忧患该怎么办吗？希望陛下能够明察朝政中因循苟且的弊端，明文诏令大臣，逐渐采取措施，革除这些弊端，以符合和适应当前世事的变化。我所讲的这些想法，那些沉溺在颓靡习俗中的人是不会谈论的，而且议论者还会认为这些都是迂腐疏阔、不切实际的老生常谈。”后来王安石执政，他所施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大体上都是以这份万言书为依据的。

随后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在此以前，朝廷多次委任他担任馆阁职务的命令，但王安石一再推辞。士大夫们都认为他不想显赫于世、对功名利禄十分淡漠，都恨不能跟他结识，朝廷多次想委派他担任名利优厚的养官，生怕他不肯接受。第二年，朝廷委任他同修起居注，王安石推辞了好几

天。阁门吏带着委任状到他府上交给他，他拒不接受；阁门吏随即下拜，他却溜到厕所里躲避起来；阁门吏干脆把委任状放在桌上离去，王安石又追上去将委任状还给他；他连续上章辞谢了八、九次，才接受了这项任命。于是任知制诰，纠察京城的刑事狱讼，从此他不再辞官了。

有位少年得到了一只善斗的鹌鹑，他的同伴向他求取，他不给，同伴仗着跟他关系亲密就把鹌鹑拿走了，这个少年追上去把同伴杀了。开封府判决这个少年当处死刑，王安石反驳道：“按照刑律，公开的夺取和偷偷的窃取都是盗贼行为。一方不给而另一方拿之以去，就是盗窃；追上去把他杀死，是追捕盗贼，虽然把人杀死了也不应当追究。”于是弹劾开封府审判机构将不该判刑的人反而判了重刑，犯了失入的错误。开封府的官员不服，皇帝将这件事交给审刑院和大理寺再次审理，审刑院和大理寺都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是正确的。皇帝下诏免于追究王安石的弹劾错误，但他应当到合门前道歉。王安石说：“我没有罪！”不肯道歉。御史上章弹劾他，皇帝置之不问。

当时有诏令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争辩说：“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舍人院就不再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听任大臣为所欲为，假如不是大臣为了私利而侵夺舍人职权，那么国家立法就不应当这样。如今大臣中软弱的人不敢为陛下执法守纪，而强硬蛮横的人则假借皇帝的旨意来制造命令，谏官和御史们都不敢违背他们的意志，我实在感到害怕。”王安石的这些话都触犯了执政大臣，从此更加跟执政大臣相抵触。他因为母亲去世离任，直到英宗朝结束，朝

廷多次召他，他都不肯赴任。

王安石本是楚人，在朝廷中没什么名气，因为韩、吕二姓是世家大族，所以他想借助韩、吕二族来取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于是就和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著深交，这三人对王安石交相称赞，王安石的声望才开始显著。

宋神宗在颍王府时，韩维任记室，每当他的讲解议论得到神宗称赞时，就说：“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我的好友王安石的见解呀！”到他升任太子庶子时，韩维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神宗于是很想见到王安石，刚即帝位，就任命他为江宁府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才到朝廷。他进宫答对皇帝询问时，神宗问他治理国家首先应当做什么事，他回答说：“首先应当选择治国的方法。”神宗问道：“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要学唐太宗呢？尧、舜的治国之道，极为简明而不烦琐，极为扼要而不迂阔，极为简易而不繁难。但后世学者不能通晓，所以才认为高不可及。”神宗说：“你这可以说是让我勉为其难了，我自己认为跟尧、舜相比太过渺小，恐怕无法跟你的这番好意相称。你可以尽心尽意地辅佐我，希望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有一天讲学，大臣们都退朝了，神宗皇帝让王安石留坐，说：“我有事想跟你认真讨论。”于是说道“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征，刘备必须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够有所作为，这两人确实不是每代都有的杰出人物啊。”王安石回答说：“陛下果真能为尧、舜，那么必然会有皋、夔、稷、禹这样的人物来辅佐；果真能为商高宗，那么必然会有傅说。诸葛亮和魏征那

两个人都是有识之士所羞于提及的，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凭借我大宋幅员之大，人民之多，百年治平相承，有学问的人不可说不多。但经常忧虑没人可以帮助陛下治理国家，其原因在于陛下选拔人才的方法还不明确，诚意待人做得还不到家，即使有皋陶、后夔、后稷、禹和傅说这样的贤人，也会被小人遮蔽，藏身退隐而去。”神宗说：“哪个朝代没有小人？即使是尧、舜的时代，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答道：“正因为能够辨别‘四凶’而加以惩处和铲除，尧、舜才能够成其为尧、舜。假如让‘四凶’肆无忌惮、谗害忠害、为非作歹，那么皋陶、后夔、后稷、禹还肯因循苟且、贪图俸禄而虚度一生吗？”

登州有个妇人嫌恶自己的丈夫相貌丑陋，夜里用刀砍杀丈夫，丈夫受了伤，但没有死。这个案子上报朝廷后，朝中讨论都认为这个妇人应判死刑，唯独王安石依据法律辩驳证明，此案符合谋杀致伤的律条，应当减死刑二等论处。神宗同意王安石的意见，并且把它定为法律。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神宗对他说：“别人都不能了解你，以为你只懂经学，不明白现实事务。”王安石回答道：“经学正是用来治理现实事务的，但后世的所谓儒生，大都是些平庸之辈，所以世俗才认为经学不能施用于治理现实事务。”神宗又问：“既然如此，那么你首先要施行设置的是什么呢？”王安石回答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最是今天的当务之急。”神宗认为很对。于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命王安石跟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命令他的党徒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具体事务。随后，农田水利、青

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相继问世，称为新法，朝廷派遣了四十多名提举官，到全国各地颁行新法。

青苗法，是把籴买常平粮的本钱作为青苗钱，散借给百姓，让他们出二分的利息偿还，每年春天借出、秋天收回。均输法，是把发运的职能改为均输，朝廷给予钱币和实物，凡是上供朝廷的物品，都必须离开价钱高的地区而到价钱便宜的地区购买，并用路程近的地区代替路程远的地区，预先了解京城仓库需要购买的物品，以使用便宜的价钱购买贮存。保甲法，就是把乡村的人口编入户籍簿，两名男丁取一人，十家为一保，挑选出来的保丁都发给弓弩、教给他们战斗阵法，维护地方治安。免役法，就是根据百姓家庭财产的多少，分别让他们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户、女户等本来不用服役的家庭，也一律出钱，称为助役钱。市易法，允许私人向官府赊购或借贷货物钱款，以自己的田地、住宅或者金帛作为抵押，出十分之二的利息还官，超过期限没有交纳的，利息之外每月另加百分之二的罚金。保马法，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将牧马监现有的马匹给他们喂养，或者由官府给予买马的钱款，让他们自行购买，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死亡的和生病的由养马户负责赔偿。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相当于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的田地作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县佐分地丈量计算，检验土地肥瘠，确定这些土地的成色，分为五个等级，按照土地的等级，均定赋税数额。还有免行钱，规定京师各行各业根据获利多少，都要交钱，官府则给予免除行户的当差义务。自从这些法令推行以后，全国各地争相谈论农田水利，古

代的陂塘和废弃的堤堰，都必须兴建修复。又下令平民百姓可以向官府投递密封状，增加价钱购买坊场，又增加茶、盐的税收数额，还设立了措置河北余便司，在临近河流的州县大量囤积粮食，以备粮饷运输。从此赋税聚敛越来越重，而天下也骚动不安了。

御史中丞吕诲论说王安石有十大过失，神宗为此将吕诲调离朝廷到地方任职，王安石推荐吕公著取代吕诲任御史中丞。韩琦规劝神宗停止实行青苗法的奏疏送到朝廷，神宗感动醒悟，打算同意韩琦的意见，王安石立即要求辞职离去。司马光为神宗起草批答诏书，其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百姓骚动不安”的话，王安石大怒，上章为自己辩护，神宗不得不谦逊地向他道歉，派吕惠卿传达劝慰的旨意，韩绛又劝神宗挽留他。王安石入朝谢恩，因而对神宗说了朝廷内外大臣、从官、台谏官、朝士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形，并且说：“陛下想要先王的正道战胜天下流于颓靡风俗的人，所以跟他较量轻重。流俗的势力大了，那么天下人就会归向流俗；陛下的力量强大了，那么天下人就会归依陛下。秤锤与物体较量轻重时，即使是重达千钧的物体，增加或减少一铢一两的重量就会使秤杆移动变化。如今奸邪的人们想要败坏先王的正道，以阻止和破坏陛下所进行的改革。现在正是陛下和流俗的秤锤较量轻重的时候，流俗增加铢两的重量，用力虽然极小，但天下这杆秤已向流俗这一方倾斜了，这就是天下议论纷纷的缘故啊！”神宗认为确实是这样。于是王安石重新任职治事，韩琦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王安石与司马光一直很有交情，司马光依据朋友之间相

互督促行善的道理，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反复进行规劝，王安石很不高兴。神宗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不就而王安石已经出任执政，这项任命就停止执行了。吕公著虽然是王安石推荐的，也因为请求废除新法而被派出去担任颍州知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戢、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造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任命诏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不守孝道，都被罢免并逐出朝廷。翰林学士范镇三次上疏议论青苗法，被免除职务，迫令退休。吕惠卿因为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在不知道把他走后的空缺委任给谁时，得到了曾布，王安石对他很信任，程度仅次于吕惠卿。

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就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春天，京东、河北两路发生了暴风的灾异现象，老百姓十分恐慌。神宗批示中书机构，命令小事安静、停止变法以应付天变，放还这两路应募的农夫，责罚不如实上报情况的监司和郡守。王安石扣下这道诏令，不予传达。

开封府的百姓为逃避保甲，有截掉自己的手指、砍断自己手腕的，知府韩维将这些情况报告朝廷，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这些情况我固然还不太清楚，即使有的话，也不足为怪。如今士大夫们看到推行新政，尚且大惊小怪、吵吵嚷嚷；何况是二十万户百姓，必然会有由于愚蠢而受人煽动蛊惑的，怎能因为这种人而不敢有所作为呢？”神宗说：“听取百姓们符合实际的各种意见就能取得成功，百姓的意见

也不能不畏惧。”

东明县的老百姓有人拦住宰相的坐骑控诉助役钱的不合理，王安石对神宗说：“知县贾蕃是范仲淹的女婿，喜欢依附流俗，导致老百姓做出这样的事。”又说：“治理百姓应当知道他们的真假利弊，不可以向他们表示无原则的姑息宽容。如果放纵他们越轨闯过中书省、御史台，击鼓拦驾，凭借人多以图侥幸，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王安石的强词夺理，大体上都是如此。

神宗皇帝起用韩维任御史中丞，王安石对韩维以前的言论怀恨在心，指斥他善于附和流俗来反对神宗所建立的新法，这次任命因韩维推辞而停止。欧阳修请求退休，冯京要求朝廷挽留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把韩琦看作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重臣。象他这样的人，在一郡就败坏一郡，在朝廷就败坏朝廷，留下他有什么用？”于是神宗同意欧阳修退休。富弼因为阻挠青苗法的实施而被削除了使相的称号，王安石说这还不足以制止奸邪小人，甚至把富弼比作共工和鲧。灵台郎尤瑛讲天气阴了很久，星辰失去了正常的支行，应该黜退王安石，随即被刺面发配到英州。唐垆本来是由王安石推荐而担任谏官的，只因他请求奏对时极力论说了王安石的罪过，结果被贬谪而死。文彦博说市易法是跟天下人争利，致使华山崩塌。王安石说：“华山的灾变，仅仅是天意为小人而发作的。推行市易法，原本就是因为平民长久空困，用来抑制兼并的，对官府有什么利益呢？”他压下文彦博的奏章，将文彦博逐出朝廷，去担任大名府留守。这样，吕公著、韩维，王安石凭借他们树立自己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推荐

自己的人；富弼、韩琦，用自己担任皇帝侍从的人；司马光、范镇，自己的好朋友；王安石对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排斥。

神官讨论确立太庙中太祖牌位东向的位置，王安石独自决定将僖祖的牌位奉还到祧庙里，参加讨论的官员们联合起来与王安石争论，没能改变他的决定。上元节的傍晚，王安石跟随神宗皇帝的圣驾，骑马进入宣德门，守门的卫士呵斥阻止，并鞭打王安石的坐骑。王安石大怒，上章要求逮捕惩罚这些卫士。御史蔡确说道：“在宫廷内值宿的卫士，其职责只是保卫皇帝，宰相下马下得不是地方，卫士理应回以呵叱阻止。”神宗终于还是为了王安石而杖打了卫士，并斥责了内侍，王安石还是愤愤不平。王韶开拓熙河路成功，向朝廷奏报，神宗因为这是王安石主持建议的，解下自己身佩的玉带赐给了王安石。

熙宁七年春，天下长久干旱，饥民们流离失所，皇帝忧容满面，上朝时叹息不已，想把不好的法令制度统统罢除。王安石说道：“水旱灾害是常有的事情，尧、汤的时候也不能避免，这不足以招致陛下的忧虑，但必须治理好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应付天灾。”神宗说：“这怎么是小事呢？我之所以感到害怕，正是因为没能做好人力能及的事情。现在官府征收免行钱负担太重，百姓怨叹，甚至有人说出对朝廷不敬的话来。从亲近大臣到皇后家族，没有不说免行钱的祸害的。两宫太后为此落泪，担心京城会发生骚乱，认为天旱使朝廷更加失去了人心。”王安石说：“亲近大臣不知道是谁，如果两宫太后有这样的话，那也是向经、曹佺所干的罢了。”冯京说：“我也听说了。”王安石道：“士大夫中不得志的人都归附你冯

京，所以唯独你冯京听到过这样的话，我可从来没听说过。”监安上门郑侠上呈奏疏，把所看到的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不堪的情状，画成图进献给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罢免王安石，上天必然会下雨。”郑侠又因为这件事被流放到岭南。慈圣、宣仁两位皇太后流着眼泪对神宗说：“王安石扰乱了天下。”神宗也怀疑王安石，于是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江宁府知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丧期满，王安石早晚不停地推荐他，这时，王安石奏请神宗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请求召回韩绛代替自己。这两人都坚持遵循王安石的陈规旧模，没有丝毫改变，当时韩绛的绰号是“传法沙门”，吕惠卿的绰号是“护法善神”。然而吕惠卿实际上是想自己掌握执政大权，害怕王安石重新回来当政，于是假借郑侠一案来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制造李士宁案件来排挤王安石。韩绛觉察到了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知皇帝，请求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神宗再次任命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受命后，立即兼程赶赴京城。《三经义》修成，王安石加官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任命他的儿子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雱推辞不受，吕惠卿劝说神宗接受他的请求，从此王、吕之间的猜疑和隔阂更加明显。吕惠卿被蔡承禧攻击弹劾，在家里等待皇帝的处理诏令。王雱暗示御史中丞邓綰，再次弹劾吕惠卿和华亭县知县张若济相互勾结、犯法谋利的事情，立案审查他们，吕惠卿于是被派出去担任陈州知州。

十月，东方出现慧星，神宗下诏征求直言得失，并询问

政事中对百姓不利的地方。王安石带领同朝大臣们上疏说：“晋武帝五年，慧星出现在轸宿；十年，又出现了孛星。然而晋武帝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预言的期限不相符合。这是因为天道遥远，先王虽然有官方占卜的预言，但所相信的依旧是人为之事。天文的变化无穷无尽，上下牵强附会，难道就没有偶然的巧合。周公、召公，怎么会欺骗周成王呢？他们说到商中宗在位的时间很长，就说‘中宗谨慎谦虚，兢兢业业，用天命约束自己，治理人民，不敢荒废政事’。谈到夏、商二朝维持了很长时间，也说是由于‘施行德政’而已。裨灶预言火灾能够灵验，想用祭祀求免灾祸，国侨不听他的意见，裨灶就说‘不采纳我的意见，郑国还将会发生火灾’。国侨最终还是没听他的意见，郑国也没有发生什么火灾。象裨灶这样的人，都难免荒诞，更何况今天的占卜星象的人呢？现在流传的占书，又是历代所禁止的，誉写讹误，尤其不知道有多少。陛下的品德至善至美，不仅比商中宗更加贤明，而且周公、召公所说的话也早已全部看过了，哪里用得着蠢人、盲人再有什么陈述呢？我听说两宫皇后因为这次天灾而担忧，希望陛下用我们所说的这些道理，尽力地开导劝慰。”神宗说：“听说民间吃足了新法的苦头。”王安石说：“冬天严寒，夏天暴雨，老百姓尚且怨恨，这用不着抚恤。”神宗说：“难道不能使冬寒夏雨的怨恨也没有吗？”王安石听后很不高兴，回家托病卧床，神宗忙安慰劝勉，王安石这才上朝治理政事。他的同党谋划道：“现在不要选取皇上历来不喜欢的人迅速提拔任用，这会使自己地位变轻，那时就将有窥伺和利用君臣间隙的人了。”王安石很赞同这个计策。神宗因为王安石出来执

政而感到欣慰和喜悦，完全听从他的所有意见。当时军队出征安南，密探得到安南的布告，说：“中国推行青苗、助役法，使老百姓非常穷困。我国现在出兵，是要帮助拯救那里的百姓。”王安石恼怒，亲自起草敕榜诋毁安南。

华亭一案拖了很久还不能成立，王雱把它交给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同商议，他们取来邓綰所列举的吕惠卿的罪状，夹杂在其它文书下达给皇帝批准审讯的制狱，王安石不知道这件事。省吏到陈州把此事告诉给吕惠卿，吕惠卿随即写了奏状上报神宗，并控告王安石说：“王安石完全抛弃了自己所学的先王教诲，崇尚纵横家的末流小技，违背君命假传圣旨，欺骗皇帝要挟君主。一年之中极力干尽这些坏事，即使是古代丧失理智、倒行逆施的人，恐怕都没有这样的。”又揭发王安石在私人书信中写有“不要让皇帝知道”的话。神宗把这些材料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推说没有这些事，回家问王雱，王雱把情况说了出来，王安石斥责了他。王雱恼怒怨恨，背上的痛疽发作而死。王安石公开宣布邓綰的罪过，说：“邓綰为我的子弟求取官职并举荐我的女婿蔡卞”，于是邓綰和亨甫都获罪。邓綰开始因为依附于王安石而做了谏官，等到王安石和吕惠卿互相倾轧时，邓綰极力帮助王安石攻击叶惠卿。神宗对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感到厌烦，邓綰生怕失势，屡次在皇帝面前要求挽留王安石，说起话来无所顾忌；亨甫为人阴险刻薄，靠巴结王雱而得以进用，到现在两人都被贬斥了。

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到儿子王雱死后，更是悲戚忧伤得无法承受，极力请求解除他的枢要职务，任命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平章声、判江宁府。第二年，

改任集禧观使，封为舒国公。王安石多次乞求把自己的将相印钦交还朝廷。元丰三年，王安石再次被任命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为特进，改封荆国公。哲宗即位，加封他为司空。

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终年六十六岁，追赠为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文”，配享于神宗庙庭。徽宗崇宁三年，又配享于文宣王庙，牌位列在颜回和际子后面追封为舒王。钦宗时，杨时有议论，朝廷停止王安石在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颐当的意见，停止王安石在宗庙配享，并剥夺了他的王位封号。

当初，王安石训释《诗》、《书》、《周礼》，写成后，颁布到官学学舍，天下称之为《新义》。晚年定居金陵，又写作了《字说》一书，其中有不少穿凿附会的内容。观点则混合了佛经和老庄的思想。一时间，读书的士人没有敢不传授学习的，主考官只用王安石的学说为标准录取考生，士人不得自立一说，凡是先儒解释经书的著作，全都废除不用。又废黜《春秋》这部书，不把它列在学校教材里，甚至将它戏称为“断缺残陋的朝廷公报”。

王安石没有显贵时，名声震动京师，生性不喜好华丽的服饰和丰美的饮食，自己的日常生活极为俭朴，有时衣服脏了不洗，脸上脏了也不洗，当时人们都称赞他贤明有德。只有蜀人苏洵说：“这样子是不近人情的，这种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并写了《辩奸论》一文来讽刺王安石，说他是王衍、卢杞合为一身的人。

王安石性格坚强刚愎，遇到事情不管对错，都相信自己

的见解，固执己见不肯改变。到议论变法时，在朝百官都持不能变法的意见，王安石附会儒家经义，提出自己的主张，辩论起来动不动就是好几百字，大家都驳不倒他。他甚至说：“天灾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忧虑。”朝廷内外老成持重的人几乎被王安石罢除殆尽，他多任用自己门下轻薄而有点小聪明的年轻人。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后，因为天发旱灾而引退；到他第二次担任宰相，一年多后就被罢免了，直到神宗朝结束没有再召他回朝廷，前后共八年。儿子王雱。

（江小涛 译）

【原文】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文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光乏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

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嘗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在位之人财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则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合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

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颖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议论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书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禹；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盖，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摧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禹、傅说这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丸斫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

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可施于世务耳。”上问：“然则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余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财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余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值，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米，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祇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余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海，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辩，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诏书反复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颢、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戢、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摯，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造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

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感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东明民或遮宰相马诉助役钱，安石白帝曰：“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其强词背理率类此。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耳，于官何利焉？”阅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已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礼官义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议者合争之，弗得。上元夕，从驾乘马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安石怒，上章请逮治。御史蔡确言：“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帝卒为杖卫士，斥内侍，安石犹不平。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

所服玉带赐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舜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侂所为耳。”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边。”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痊，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絳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时号絳“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絳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雱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著。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雱风御史中丞邓綰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鞠之，惠卿出守陈。

十月，慧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晋武帝五年，慧出轡；十年，又有李。而其

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岂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将又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謄写伪误，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窃闻两宫以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云。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另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謗诋之。

华亭狱久不成，雱以囑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綰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闻，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矢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愤惠，疽发背死。安石暴綰罪，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与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职，地石与吕惠卿相倾，綰极力助攻惠卿。上颇厌安石所为，綰

惧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亨甫险薄，谄事雱以进，至是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几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三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颐当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辨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卢杞合为一人。

安石性强怯，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离。其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子雱。

周敦颐传

——《宋史》卷四二七

【说明】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宋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曾历任县主簿、县令、州通判、知州、提点刑狱等官。学者称他为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通书》及少量诗文等。从本传看，他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廉能的中下级官吏。

周敦颐做过程颢、程颐兄弟少年时的老师，而二程是北宋理学（或称道学）的奠基人。南宋时，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和他的学友张栻等人很尊崇周敦颐，朱熹搜集、整理和注解过他的著作，并确认二程的思想学说源出于他。这一看法后来得到多数人承认。但也有一些学者根据二程的著作、言论中对周氏并未十分推崇之类的理由，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只是注意到一些表面现象，而没有从思想学说的内部联系上观察问题，因而难以成立。至今大多数学者承认周氏是北宋理学的先驱。

周敦颐，字茂叔，营州营道县人。原名敦实，因英宗皇帝旧名宗实，避讳改名敦颐。由于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的保

举，做了分宁县的主簿。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敦颐到任后，审讯一次立即弄清。县里的人吃惊说：“老狱吏也比不上啊！”部使者推荐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有个囚犯按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转运使王逵想重判他。王逵，是个残酷凶悍的官僚，大家没人敢和他争，敦颐一个人和他争辩，王逵不听，敦颐就扔下笏板回了家，打算丢官而去，说：“这样还能做官吗？以杀人来拍上级的马屁，我不干。”王逵明白过来了，这个囚犯才免于一死。

改任郴州桂阳县县令，政绩尤其显著。知州李初平很尊重他，对他说：“我想多读些书，怎么样？”敦颐说：“您太老来不及了，请让我给您讲讲学。”两年后，李初平果然有收获。调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都说：“这是能弄清分宁县那件疑案的人，我们有机会申诉了。”那些富家大族，狡黠的衙门小吏和恶少，惴惴不安地不单是担忧被县令判为有罪，而且又以沾污清廉的政治为耻辱。选任合州通判时，事情不经他的手，下面的人不敢做决定，即使交下去办，老百姓也不愿意。部使者赵抃被一些毁谤他的话所迷惑，对他的态度很严厉，敦颐处之泰然。后来当了虔州通判，赵抃是虔州的知州，仔细观察了他的所作所为，才恍然大悟，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你这样的人才，从今以后算是了解你了。”

熙宁初，担任郴州的知州。由于赵抃和吕公著的推荐，做了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昭雪冤枉、泽及万民为己任。巡视所管辖的地区不怕劳苦，即使是有瘴气和险峻遥远之地，也不慌不忙地视察（而不急于离开）。因为有病请求改任南康军的知军，于是把家安置在庐山的莲化峰下，屋前有条溪水，

下游与湓江合渡，就借营道县老家所在的濂溪这个名称来称呼这条溪。赵抃第二次任成都知府时，打算奏请皇帝重用他，还没有来得及敦颐就死了，享年五十七岁。

黄庭坚称赞他“人品很高，胸怀洒脱，像雨后日出时的风，万里晴空中的月，不贪图获取名声而锐意实现理想，淡于追求福禄而重视得到民心，自奉微薄而让孤寡获得安乐，不善于迎合世俗而远与古人为友”。

他博学而努力实践，写了一篇《太极图》，阐明天理的根源，探究万物的终结与起始。他的理论说：

由无极而变为太极（元气），太极运动而产生阳气。运动到了极限而变为静止，静止而产生阴气。静止到了极限又变为运动。一阵儿动一阵儿静，动与静相互成为对方产生的根源。太极分化出阴气和阳气，（由阴阳二气构成的）天和地这两个仪范就形成了。阳气变化而阴气相配合，而产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气按一定的先后顺序布散，春夏秋冬四季就依次出现。五行都是阴阳，阴阳都是太极，太极以无极为本源。五行产生以后，各有一种特性。无极的真实本质，阴阳五行的精粹。奇妙地相互结合而凝聚，禀受阳刚之道的成为男人，禀受阴柔之道的成为女人。阳阴二气交相感应，变化而生成万物，万物生而又生，而变化就无穷无尽了。只有人类得到了阴阳五行的优秀精华而最聪明。肉体已经产生了，精神发出智慧了。仁义礼智信五种本性对外物发生感应而产生情欲的冲动，而善和恶就区分开来了，各种好事坏事都出现了。圣人确定了中正仁义的原则而又主张静心寡欲，建立了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所以圣人与天地的道德相符合，

与日月的光明相符合，与四季的次序相符合，与鬼神的吉凶相符合。君子修养圣人之道所以吉，小人违背圣人之道所以凶。所以《周易》说：“构成天道的，是阴道和阳道；构成地道的，是柔道和刚道；构成人道的，是仁和义。”又说：“推原万物的开始又反观万物的终结，所以知道死和生的道理。”伟大啊《周易》，它是至高无上的真理。

敦颐又著有《通书》四十篇，揭明太极的底蕴。替它作序的人说“它的语言简炼而道理博大，文章质朴而义理精深，探求到了孔、孟子学说的本源，是极大地有功于学术的”。

敦颐担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程珦担任通判军事，看到他的气质和相貌不是普通人，与他谈话，知道他研究学术懂得大道，因而和他做了朋友，派两个儿子程颢、程颐去他那里接受教育。敦颐每每叫他们探寻孔子、颜回快乐的地方，所乐意做的是什么事，二程的学术思想正是从这里发源而变成巨流。所以程颢的话说：“自从再次见到周茂叔后，吟风弄月地回来，有孔子‘我赞许曾点’的意境。”侯师圣受学于程颐，未能通悟，去拜访敦颐，敦颐说：“我老了，讲解不能不详细。”把他留下面对面坐在两张小床上连夜谈论，过了三天才回来。程颐看到他感到十分惊奇，说：“莫不是从周茂叔那里回来吗？”他平时善于启发别人正与此相似。

嘉定十三年，御赐给他谥号叫做“元公”。淳祐元年，封他为汝南伯，在孔子庙里陪从受祭祀。

两个儿子：周寿、周焘。周焘做官做到宝文客待制。

【原文】

（陈金生 译）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元名敦实，避英宗旧讳

改焉。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辩，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郡守李初平贤之，语之曰：“吾欲读书，何如？”敦颐曰：“公老无及矣，请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辩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历合州判官，事不经手，吏不敢决，虽下之，民不肯从。部使者赵抃惑于谮口，临之甚威，敦颐处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视其所为，乃大悟，执其手曰：“吾几失君矣，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

熙宁初，知郴州，用抃及吕公著荐，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洗冤泽物为己任。行部不憚劳苦，虽瘴疠险远，亦缓视徐按。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镇蜀，将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月十七。

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茆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博学力行，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

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①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著《能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

掾南安时，程^②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不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类此。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二子：寿、焘。焘官至宝文阁待制。

程颢传

——《宋史》卷四二七

【说明】程颢（1032—1085），字伯淳，宋河南府（今洛阳市）人。曾历任县主簿、县令、监察御史、提点刑狱、州判官等。因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曾被贬官，后来主要从事讲学，民称明道先生或大程子。

程颢和他的弟弟程颐是北宋理学（亦称道学）的奠基人。程颢曾说：“吾学虽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颐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最早明确地把“理”或“天理”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所以他们的学说被称为“理学”。他们两人的著作流传到现在的有《遗书》、《外书》，各自的《文集》、《经说》、《易传》、《粹言》等六种。前四种在宋代就有合刊本，称《程氏四书》。大约从明代起，又有人将后两种加进去，称为《二程全书》，《遗书》、《外书》、《粹言》都是弟子们记下的语录，是研究二程思想最重要的材料，其中一部分由于记录者没有明确交代是谁所说，故有些混淆不清。两人的思想倾向相同，但也有小异。有人认为这种差异是导致后来朱熹与陆九渊发生争论的原因之一，这有待深入研究。

程颢，字伯淳，世代居住在中山府，后来又从开封府迁到河南府。高祖程羽，在太宗朝任三司使。父亲程珦，仁宗时录用旧臣的后代，让他当了黄陂县尉。好久以后，当了龚州知州。当时宜州少数民族首领区希范已经被处死，但乡里人忽然传说他的灵魂从天而降，说“应当替我在南海建立祠堂”，于是大家迎了他的神主牌子去南海，经过龚州，程珦派人去盘问，回答说：“不久前经过浔州，浔州知州认为是妖怪，把祭具扔到江里，祭具却逆流而上，知州害怕了，就反而给送了礼。”程珦让人也把祭具投到江里，祭具顺流而去，这桩怪事就平息了。改任磁州知州，又改任汉州知州。曾在开元寺的僧房里宴请客人，刚开始敬酒，许多人闹着说佛光出现，看的人竞相奔跑践踏，无法禁止，程珦安坐不动，秩序顷刻安定下来。熙宁年间新法推行，当知府县令的执行命令唯恐落后，只有程珦表示反对，指斥它不适宜。使者李元瑜大怒，程颢就写信说有病回了家，随即辞官。后来逐步升到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程珦仁慈宽厚而又刚强果断，平时和年幼或卑贱的人相处，唯恐对他们的心意有所伤害，但如果违犯了义理，则不予宽假。对身边听使唤的人，没一天不注意观察他们的饥寒饱暖。先后五次得到保举儿子做官的名额，都拿来均分给伯父叔父的儿孙。出嫁家族中死了父亲的女儿，必定尽自己的力量。所得到的俸禄，分出一部分赡养亲戚中的穷人。伯母死了丈夫，程珦奉养她很周到。堂姐嫁人后死了丈夫，程珦接她回来，教养她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侄子平等对待。那时官小俸禄少，克己做好事，人们认为不容易。文彦博、苏

颂等九人上书表彰他清正的节操，皇帝下诏赐给他帛二百匹，由官家供给丧葬费用。

程颢中了进士，先后调任鄆县、上元县主簿。鄆县民间有一个借哥哥的房子居住的，控地时得到一批陪葬的铜钱，哥哥的儿子申诉说：“这是当年我父亲埋藏的。”程颢问：“埋藏多少年了？”说：“四十年。”“你叔叔借住多少年了？”说：“二十年。”程颢派人取来十千钱仔细看过后，对申诉者说：“现在官家所铸的钱，不用五六年就能遍布天下，而这些钱都是没有埋藏之前好几十年所铸的，这是为什么？”那个人不能回答。上元县茅山中有个水池，出产一种龙样子像蜥蜴而五色斑斓。大中祥符年间曾捉了两条送到京城里去，半路上丢失一条，太监们说是飞到空中跑掉了。民间风俗对这种动物一直认真祭祀不敢松懈，程颢叫人捉来杀了做成肉干。

当晋城县令时，财主张某的父亲死了，一天早晨有个老头儿上门对张某说：“我，是你的父亲。”张某又惊又疑弄不明白，一起来到县衙门。老头儿说：“自己当医生，老远出门给人治病，而妻子在家生了孩子，贫穷没法养活，就把孩子送给了张家。”程颢质问他有何证据。老头儿从怀里拿出一张文书，上面所记载的是：“某年某月某日，抱着孩子给了张三翁家。”程颢问：“张某的父亲那时才四十岁，哪能有‘翁’的称呼？”老头儿吓得连声谢罪。

老百姓上税交纳的小米大多要运到边界附近去，用车子运去则道路太远，到边界附近购买则价钱太贵。程颢挑选一些有钱又可信任的人，事先让他们贮存小米等着，费用大大节省。老百姓有事到县衙门来的，必定教给他们忠悌忠信，在

家怎样奉养父兄，出门怎样侍候官长。衡量村子距离的远近把老百姓组织成五家为一伍、十伍为一保，让他们有劳务互相帮助，有患难互相救护，而坏人没有容身之地。凡没有父母兄弟或残废的人，责成亲戚或邻居照顾，让他们不致流离失所。出门在外途经本地的，生了病都能得到疗养。每个乡必须有学校，空暇时亲自到校，召集父老和他们谈话。儿童所读的书，亲自替他们纠正断句和理解的错误，教师不称职，就替他们改聘，挑选子弟中最优秀的，集合起来教育培养。乡里老百姓组织会社，替他们制订章程条例，旌别好人坏人，使大家努力做好事耻于做坏事。在这个县三年，老百姓对他爱如父母。

熙宁初年，由于吕公著推荐，做了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神宗久已知道他的名字，多次召见。每次退出，必定说：“以后要多争取来答复咨询，联想要常常见到卿。”一天，神宗从容不迫地提问，报时的人说时间已到正午，程颐才急步退出，内廷太监说：“御史不知道皇上还没吃饭吗？”前后进陈的意见很多，大抵是围绕着端正心术、杜塞私欲、访求贤人和培养人才来说话，务求以诚心来感悟皇上。曾经劝皇帝预防尚未滋生的私欲，以及不要轻视天下的读书人，皇帝俯着身子说：“当会为卿而警惕这些。”

王安石执政，建议更改法令，朝廷内外都不认为适宜，议论的人攻击得很厉害。程颐奉旨到宰相办公的地方去参加讨论，王安石正恼恨议论的人，以严厉的脸色等着大家。程颐从容不迫地说：“讨论天下的大事不是一家子的私下议论，希望平心静气地听意见。”王安石为之惭愧而改变脸色。自从王

安石管事，程颢从来没有讲过一句涉及功利的话。在职八九个月，几次议论时政，最后说道：“聪明人做事就像夏禹治水那样（让洪水顺其自然地从低洼的地方流走），做的是无事之事；舍弃这种办法而到险峻的地方去（筑堤防水），说不上是聪明。自古以来为振兴政治而提出的措施，没有朝廷内外的舆论都说不可以而能够有成绩的，何况还排斥忠良之士，阻拦和抹杀公众舆论，使卑贱的人欺侮高贵的人，邪恶的人侵犯正直的人呢！即使侥幸有一点小成绩，然而使追求功利的臣子一天天受重用，崇尚道德的风气一步步被破坏，尤其不是朝廷的福气。”于是请求辞去谏议的职务。王安石本来与他友好，到这时虽然意见不和，还敬重他的忠诚，不深责怪他，只让他出去担任提点京西刑狱。程颢坚决推辞，改任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疏请求退职，称赞程颢无私正直，认为是自己所比不上的。

程昉负责治理黄河，调走澶州（镇宁军）的士兵八百人而残暴地役使他们，大家逃路回来。澶州的官吏畏惧程昉，打算不让他们进城。程颢说：“他们为着逃避死亡擅自回来，不让进来必然造反作乱。要是程昉发怒，我自己承当。”就亲自带人去开城门安抚慰劳，约定稍稍休息三天再去服役，士兵们欢喜跳跃着进了城。程颢具体详细地将事实经过报告上去，得到允许不再遣送这些人。程昉后来经过澶州，扬言说：“澶州士兵的溃逃，怕是程中允诱使的，我将向皇上申诉。”程颢听到后，说：“他正怕我，能把我怎样！”程昉果然不敢对皇上说什么。

曹村的堤防决了口，程颢对知军刘涣说：“曹村决口，京

师的安全堪忧，做臣子的本分，如果用身子能堵住决口也是应当做的。何不派遣全部厢兵交付给我。”刘焕把镇守的大印交给了程颢，程颢立即带领厢兵跑到决口的地方，并激励和晓喻他们。有人发表意见认为决口的情况不可能堵住，徒然劳累大家。程颢命令善于泅水的人游过决口，拉上大绳帮助其他人渡过去，两岸的人同时并进，几天就合上了口子。

程颢请求担任洛河竹木条监督官，由于多年没有对他的功劳与资历进行考核升级，特地升他为太常丞。皇帝又想让他撰修《三经义》，宰相不赞成，就命他任扶沟县令。广济河、蔡河都流经县境，沿河的恶少没有正当生计，专门以威胁手段夺取过往船只的财物，每年必定要烧掉十来只船以示威。程颢抓到其中一人，让他供出同伙，都宽赦以往的罪恶，分别在不同地方安置，让他们以拉纤为职业，并负责监视干坏事的人，从此境内没有发生烧船抢劫的问题。宦官王中正巡视保甲，权势气焰极令人畏惧，各县争着以奢侈的帷帐和物品来取悦他。手下主事的人来请示，程颢说：“我们县穷，怎能仿效其他县。从老百姓那里索取，是国法所禁止的，只有县令用的旧青帐可以用罢了。”任命为判武学事，李定弹劾他在刚开始实行新法时首先提出异议，撤销了任命回到原职。又因监狱里有囚犯逃路，罚他去监汝州盐税。哲宗接位，召他当宗正丞，没动身就死了。享年五十四岁。

程颢的资质超过一般人，充实和修养内心又有正确的方法，平和纯粹的气质，充分显露在外表上，学生和朋友跟随他几十年，也未曾见到过他愤怒严厉的面容。遇事善于处理，即使遇到紧急的事，也不动声色。从十五六岁时，与弟弟程

颐听到汝南周敦颐议论学术，便厌弃科举的陋习，慨然有追求大道的志向。广泛地浸润于各家的学说，出入于佛家、道家之说好几十年，再回过头来从儒家的《六经》中追求然后得到了大道。从秦汉以来，没有人达到过这样高深的真理。

教导学生，从“扩展知识”到“懂得必须达到至善境界”，从“意念真诚”到“平治天下”，从“洒水扫地和有礼貌地回答长者”到“穷尽万物之理和充分发扬善良本性”，一步一步地有先后秩序。担心学者厌弃低下浅近的东西而追求高明深远的东西，终于无所成就，所以他的言论说：

大道之所以不被人们认识，是因为异端邪说妨害了它。以往的妨害浅而容易觉察，现在的妨害深而难于辨别；以往的迷惑人是乘着对方的糊涂愚昧，现在的迷惑人是利用对方的高才大智。自己说他们能穷究神妙的道理和懂得变化的法则，却不足以启发大众的心智和成就伟大的事业；议论起来像是无所不到，实际是与伦理道德毫不相干；像是把高深微妙的道理都研究透彻了，然而不能够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术，不是浅薄卑陋固执不通，就必然进入到这类学说中去。自从大道不被人们所认识，邪恶荒诞奇怪虚妄的学说竞相兴起，堵塞了百姓的耳目，把整个天下浸泡在污泥浊水之中。即使是高才大智，为耳濡目染的学说所束缚，醉生梦死，自己还觉察不到。这些异端邪说是遍布在正确道路上的荆棘，设立在圣人门户前的障碍，只有痛加驳斥才能进入尧舜之道。

程颢的去世，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他，没有不悲伤的。文彦博采纳大家的意见，在他的墓碑上题写了“明道先生”的称号。他弟弟程颐叙述这个称号的原由说：“周公去世，圣人

的大道不再实行；孟子死，圣人的学术不再流传。大道不实行，百代没有好的政治；圣人的学术不流传，千年没有真正的儒者。没有好政治，儒士还可阐明走向好政治的途径，以教育好别人，以流传给后代；没有真正的儒者，则懵懵懂懂地没有人知道该走向哪里去，人欲横行而天理灭亡了。先生出生在孟子之后一千四百年，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学到了已经失传的学术，以振兴这一文化传统为自己的责任，识别异端，驳斥邪说，使圣人的大道焕然一新地再次为世人所认识，恐怕从孟子以后，只有这样一个人而已。然而学者对于大道如果不知道有所向往，则谁能知道这个人之所以是有功的呢；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大道，则谁能知道这个称号之所以符合实际情况呢！”

嘉定十三年，御赐给他谥号叫做“纯公”。淳祐元年，封他为河南伯，在孔子庙里陪从受祭祀。（陈金生 译）

【原文】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

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珣，仁宗录旧臣后，以为黄陂尉。久之，知龚州。时宜獠区希范既诛，乡人忽传其神降，言“当为我南海立祠”，于是迎其神以往，至龚，珣使诘之，曰：“比过浔，浔守以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惧，乃更致礼。”珣使复投之，顺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汉州。尝宴客开元僧舍，酒方行，人谏言佛光见，观者相腾践，不可禁，珣安坐不动，顷之遂定。熙宁法行，为守令者奉命唯恐后，珣独抗议，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归，旋致仕。累转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

珣慈恕而刚断，平居与幼贱处，唯恐有伤其意，至于犯义理，则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无日不察其饥饱寒燠。前后五得任子，以均诸父之子孙。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奉禄，分贍亲戚之贫者。伯母寡居，奉养甚至。从女兄既适人而丧其夫。珣迎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时官小禄薄，克己为义，人以为难。文彦博、苏颂等九人表其清节，诏赐帛二百，官给其葬。

颢举进士，调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发地得瘞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颢问：“几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几时？”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视之，谓诉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产龙如晰蜴而五色。祥符中尝取二龙入都，半涂失其一，中使云飞空而逝。民俗严奉不懈，颢捕而脯之。

为晋城令，富人张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门曰：“我，汝父也。”子惊疑莫测，相与诣县。叟曰：“身为医，远出治疾，而妻生子，贫不能养，以与张。”颢质其验。取怀中一书进，其所记曰：“某年月日，抱儿与张三翁家。”颢问：“张是时四十，安得有翁称？”叟骇谢。

民税粟多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采则价高。颢择富而可任者，预使贮粟以待，费大省。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长上。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

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

熙宁初，用吕公著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神素知其名，数召见。每退，必曰：“频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言，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尝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王安石执政，议更法令，中外皆不以为便。言者攻之甚力。颢被旨赴中堂议事，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颢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安石为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颢未尝一语及于功利。居职八九月，数论时政，最后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险阴，不足以言智。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排斥忠良，沮废公议，用贱陵贵，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幸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职。安石本与之善，及是虽不合，犹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点京西刑狱。颢固辞，改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疏求退，称颢公直，以为己所不如。

程昉治河，取漕卒八百而虐用之，众逃归，群僚畏昉，欲勿纳。颢曰：“彼逃死自归，弗纳必乱，若昉怒，吾自任之。即亲往启门拊劳，约少休三日复役，众欢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后过州，扬言曰：“漕卒之溃，盖程中允诱之，吾且诉于上。”颢闻之，曰：“彼方憚我，何能为！”果不敢言。

曹村埽决，颢谓郡守刘涣曰：“曹村决，京师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当为。盍盖尽遣厢卒见付。”涣以镇印付颢，立走决所，激谕士卒。议者以为势不可塞，徒劳人尔。颢命善泅者度决口，引巨索济众，两岸并进，数日而合。

求监洛河竹木务，历年不叙伐阅，特迁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经义》，执政不可，命知扶沟县。广济、蔡河在县境，濒河恶子无。生理，专胁取行舟财货，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颢捕得一人，使引其类，赏宿恶，分地处之，令以挽辘为业，且察为奸者，自是境无焚剽患。内侍王中正按阅保甲，权焰章震。诸邑竞侈供张悦之，主吏来请，颢曰：“吾邑贫，安能效他邑。取于民，法所禁也，独有令故青帐可用尔。”除判武学，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为异论。罢归故官。又坐狱逸囚，责监汝州盐税。哲宗立，召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

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

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学者厌卑近而骛高远，卒无成焉，故其言曰：

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

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是皆正路之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

颢之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纯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程颐传

——《宋史》卷四二七

【说明】程颐（1033—1107），字正叔，宋河南府（今洛阳市）人。曾历任崇政殿说书、管勾西京国子监、判登闻鼓院等官。后因参与以司马光、吕公著为首的旧党活动，曾被流放，复职后又被罢官，以后主要从事讲学，世称为伊川先生或小程子。

程颐比他的哥哥程颢多活二十余年，活动和讲学的时间更长，培养的弟子也更多，其中有些知名度也很高，因此他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影响比程颢更大。他的著作也比程颢多，特别是其中《易传》，在当时及后世影响较大。

程颐，字正叔。十八岁时，到宫阙之下上书，希望天子摈弃世俗的议论，以实行王道为志向。到太学参观，看到胡瑗正向学生们提出“颜回所喜好的是什么样的学问”这个问题，程颐于是提笔答道：

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圣人的一套道德学问。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吗？回答说：是的。学习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回答说：天地储蓄着精气，禀赋了五行之气的优秀精华

的是人。人的本性是真诚而安静的，当情欲没有发生时，五种善良本性完整地具备，叫做仁、义、礼、智、信。肉体出生以后，外物接触他的肉体而动摇了他的内心，他的内心动摇而七种情欲就发生了，叫做喜、怒、哀、乐、爱、憎恶、欲望。情俗炽烈，而又越来越放纵，他的善良本性就破坏了。所以觉悟的人约束他的情欲，使之符合中道，端正他的心，修养他的本性。愚昧的人就不知道制约它，放纵他的情欲而变成邪恶，桎梏他的善良本性而使之丧失。

然而学习的方法，必须先使心里有明确的认识，知道所要修养的是什么，然后努力实践以求达到目标，这就是《中庸》所说的“从明确的认识而达到至诚的境界”。达到至诚境界的途径，在于对道的信仰深厚，对道的信仰深厚行动就会果决，行动果决对道的遵守就会牢固，仁义忠信的准则不离开心，匆忙紧急的时候必定在心里，颠沛流离的时候必定在心里，出门、在家、说话、沉默的时候都必定在心里，久久而不丧失它，就能安稳地停留在心里，动作和仪容展转都符合礼的规范，而邪恶的思想就无从产生了。

所以颜子所从事的，就是所谓：“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孔子称赞他，就说：“学到一条好道理就牢牢记住而不要忘记它啊。”又说：“颜回不把怒气转移到不相干的人身上，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从来没有再去做的。”这是由于他对道的信仰深厚，学习起来又掌握了正确方法。然而圣人则是不思考就得到真理，不努力就合乎中道；颜子则必须思考以后才得到真理，必须努

力以后才合乎中道。他与圣人比还有点儿差距，所未能达到的，是能严格遵守道，而不能把道融化在心里。以他那样的好学之心，老天再让他多活些年，不多久就会融化了。后来的人不通，以为圣人本来是生而知之，不是通过学习可以得到的，因而治学的正确方法便丧失了。不从自身的修养上去追求圣人的道德学问，而到身外去追求，把知识渊博、记忆牢固、文章巧妙、辞藻华丽当做真工夫，讲起道理来天花乱坠，极少有能达到圣人的道德学问的。然则现在的所谓学问，与颜子所喜好的学问根本不同啊！

胡瑗拿到他的文章，大为惊异，立即请他相见替他在太学里安排了职务。吕希哲头一个以尊师之礼事奉程颐。

治平、元丰年间，大臣屡次推荐他做官，都不去上任。哲宗元年，司马光、吕公著一起上疏表彰他的德行说：“伏见河南府没有出仕的读书人程颐，勤于学习而崇尚古代学术，安于贫贱而严格遵守节操，说话只谈忠信，行动遵循礼法。年龄过了五十，不追求高官厚禄，确实是儒者中德行高尚的人，太平盛世的隐逸之士。希望加快提拔他而不按通常的次序，使读书人有一个效法的榜样。”皇帝下诏让他当西京的国子监教授，程颐极力推辞。

不久后召他当秘书省校书郎。入见皇帝后，提拔为崇政殿说书。程颐随即上疏说：“习惯与智慧一起培养，变化与心性一起形成。现在的老百姓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也必定要聘请以道德著称的儒士，让子弟和他相处，以熏陶成良好的品性。何况陛下年轻，余下的时间还很富裕，虽然从天生资质中获得了聪明圣哲的优点，然而辅导培养的办法不可不极为

周到。大体上一天之中，接触贤明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气质就会变化，自然而形成。希望挑选大儒入宫在身边劝导讲解，讲完后留在宫里分别值班，以供随时咨询，偶或有小过失，随事贡献意见进行规劝，时间长了，必定能培养成圣明的品德。”程颐每次进讲，脸色很庄重，接着便委婉地劝谏。听说皇帝在宫里盥洗时避开蚂蚁，便问：“有这回事吗？”皇帝说：“是，真怕伤害它们。”程颐说：“把这样的爱心推广到四海去，是做帝王最重要的方法。”

神宗的丧事还没有办完，冬至那天，百官上表致贺，程颐说：“节气变换，此时皇上对神宗的思念正深切，请求改祝贺为安慰。”丧事结束以后，主事官员请求开始奏乐设宴，程颐又说：“丧事结束后而举行祭神之礼，尚且应当依据事情的需要来决定奏乐，现在特地为丧事结束而奏乐设宴，这是当喜事来办了。”大家都听从了他的意见。皇帝曾因患疮疹连日不到迺英殿，程颐到宰相那里问皇帝平安否，而且说：“皇帝不到迺英殿，太后不应当单独坐在那里。况且主上有病，大臣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百官才奏请问候皇上的病。

苏轼不招程颐的喜欢，程颐的门人贾易、朱光庭心里感到不平，联合起来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底毁程颐说不宜任用，孔文仲极力弹劾程颐，于是把程颐排挤出朝廷去担任管勾西京国子监。好久以后，加直秘阁一职，程颐两次上表辞谢。董敦逸又收集他说过的一些有怨恨的话，罢了他的官。绍圣年间，革职流放到涪州。李清臣任洛阳（西京）知府，当天就强迫遣送他，想回家告别叔母也不允许，第二天赠送他

一百两银子，程颐拒绝接受。徽宗接位，把他迁到峡州，不久后恢复了他的官职，到崇宁年间又剥夺了官职。死时七十五岁。

程颐什么书都读，他的学术以诚为根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宗旨，而通向《六经》。动作、静止、说话、沉默，一切以圣人为师，不修养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息。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从十四五岁时起，就超脱一切只想学圣人，所以终于学到了孔子、孟子那套已经失传了的学术，而成为诸儒的先导。其学说的意义，就像棉布、丝绸、大豆、小米一样（人人都需要它），懂得道德的人尤其尊崇它。程颐曾说：“现在农夫冒着严寒、酷暑和大雨，深耕除草，播种五谷，我可以拿来吃；各行各业的技术工匠，制作器物，我可以拿来用；武装的兵士，身披坚甲手拿利器，以守卫疆土，我能够平安无事。我这种人没有什么功劳恩泽贡献给别人，而虚度光阴，安心做天地间一条蛀虫，唯有整理圣人遗留下来的书，或许对别人有些补益吧。”于是撰写了《易传》、《春秋传》以流传于世。《易传》的《序》说：

《易》，变易的意思，随时变易以服从道的意思。它作为一部书，内容广博一切都包含，是要理顺人性与天命的道理，贯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事情之间的因果关系，穷尽万事万物的真实情况，而显示开通民众的心志、成就天下事业的方法。圣人的为后世操心，可以说极为周到了。现在离开古代虽然久远，圣人遗下的经典还在，但是先前的儒者不理解其本意，而只把其言论传下来，后来的学者只知道背诵这些言论而忘记其深长的意味，从

秦朝以后，其本意大概就失传了。我出生在千年之后，为这些人文内容的湮没不彰而悲伤，要使后人溯流而上找到源头，这就是我写作《易传》的原因。

《周易》具有圣人之道的四个方面：用它来发表言论的人重视它的卦爻辞，用它来指导行动的人重视它的卦变，用它来创制器物的人重视它的卦象，用它来预测吉凶的人重视它的占卜方法。吉与凶、消与长的道理，进与退、存与亡的原故，都具备在卦爻辞中，推敲卦爻辞和考察卦象可以知道未来的变化，卦象与占卜方法就都包括在其中了。“君子平时则观察其卦象而玩味其卦爻辞，有所行动则观察其变化而推究其占卜方法”，找到了卦爻辞而不通晓本意的人是有的，但没有不找到卦爻辞而能通晓其本意的，最微妙的是道理，最显著的是卦象。体和用同出一源，显著与微妙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观察二者之间的相互汇合和沟通之点以举行其典礼，则可知卦爻辞中无所不备。所以善于学习的人，想要立言必须从浅近的地方开始，把浅近看得很容易做到的人，不是真正懂得立言的人。我所解释的是卦爻辞，由卦爻辞而探究到它的深意，则在乎读者们的努力了。

他的《春秋传》的《序》说：

天之所以生出人类，必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人起来做他们的君长，治理他们而使相互间的争夺停止，引导他们而使生息长养的事情顺遂，教育他们而使伦理道德明确，然后人道才能够确立，天道才能够完成，地道才能够均平。尧、舜二帝以前，圣贤代代出现，随时势的需

要而有所创造，都是适应当时风气的需要，而不是在天时成熟之前去人为地开创，是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政治措施。等到夏、商、周三代圣王更迭兴起，议定礼仪、制定法度、考订文献这三项措施已经完备，立子月、丑月、寅月为正月的不同历法，和崇尚忠、崇尚质、崇尚文的不同文化精神更迭产生，于是人道完备了，天运也得到普遍体现。圣王既然不再兴起了，拥有天下的人即使想模仿古代的事迹，也不过是从私心出发胡作非为而已。以至事情的荒谬，秦代竟然立亥月为正月；正道的背叛，汉代竟依靠小聪明和权力去把持天下。哪里又能懂得什么先王之道呢！

孔夫子生当周代的末期，认为圣人不会再兴起，顺从天道适应时势的政治不会再有，于是写作了《春秋》，作为历代王者不可更改的根本法则。也就是《中庸》所谓“拿到三代圣王那里去考核不会指为谬误，树立在天地之间不会受到反对，拿到鬼神那里请教不会提出疑问，千年百世地等着圣人出来也不会表示困惑不解”的东西。据先儒的传说：“子游、子夏都不能帮着孔子措一句辞”。其实措辞是不需要帮助的，这句话是说子游、子夏没有能力参与此事而已。《春秋》所表述的这个大道，只有颜子曾听孔子说过：“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大车，佩戴周代的礼帽，音乐则采用《韶乐》和《武乐》。”这是它的目标。后代的人把《春秋》看作史书，说它只是褒扬善的贬斥恶的，至于它包含的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就不知道了。

《春秋》包含的重大义旨有几十个，它的义旨虽然重大，但明白得像太阳星星，是容易见到的。只有其中一些含蓄的辞句和隐晦的义旨、因时而发以适应时宜的部分，是难懂的。有的贬抑有的宽纵，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有的奖励有的排斥，有的含蓄有的明显，而都做到了义理的稳妥、文质的适中，宽严的合宜，是非的公正，是判断事物的尺度，衡量真理的标准。观察了众多事物之后才能知道造化工夫的神妙，收集了许多种材料之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要用哪些东西，想在一件事、一个义旨上去窥察圣人的用意，不是绝顶聪明不能办到。所以学习《春秋》的，必须从容不迫地浸泡在其中，默默记住和用心领会，才能深入到它的最含蓄微妙的地方。后来的王者懂得了《春秋》的含义，则即使不像夏禹、商汤那样的道德高尚，也还能够效法三代的政治。

自从秦代以后，《春秋》的学术不再流传，我为圣人的志向不能被后代的人理解而哀伤，所以写作《春秋传》以阐明它，使后来的人通晓其文字而求得其义旨，懂得其用意而体现其作用，三代的盛况就可以恢复。这部《春秋传》虽然没有能够穷尽圣人蕴藏书中的深奥道理，大体上还能使学习者获得一个入门的途径。

程颐平生教人不知疲倦，所以从他的门下出来的学者最多，他作为学术渊源所培养的人，都成为著名儒士。涪州人在北岩建祠堂祭祀他，世人称他为伊川先生。

嘉定十三年，御赐给他谥号叫正公。淳祐元年，封他为伊阳伯，让他在孔子庙堂里陪着受祭祀。（陈金生 译）

【原文】

程颐，字正叔。年十八，上书阙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游太学，见胡瑗问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颐因答曰：

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基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

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其好之笃，学之得其道也。然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其与圣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

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

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职。吕希哲首以师礼事颐。

治平、元丰间，大臣屡荐，皆不起。哲宗初，司马光、吕公著共疏其行义曰：“伏见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招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

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既入见，擢崇政殿说书。即上疏言：“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与之处，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曰：“然，诚恐伤之尔。”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神宗丧未除，冬至，百官表贺，颐言：“节序变迁，时思方切，乞改贺为慰。”既除丧，有司请开乐置宴，颐又言：“除丧而用吉礼，尚当因事张乐，今特设宴，是喜之也。”皆从之。帝尝以疮疹不御迺英累日，颐诣宰相问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请问疾。

苏轼不悦于颐，颐门人贾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轼。胡宗愈、顾临诋颐不宜用，孔文仲极论之，遂出管勾西京国子

监。久之，加直秘阁，再上表辞。董敦逸复摭其有怨望语，去官。绍圣中，削籍窜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别叔母亦不许，明目赈以银百两，颐不受。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卒年七十五。

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张载称其兄弟从十四五时，便脱然欲学圣人，故卒得孔、孟不传之学，以为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尝言：“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无功泽及人，而浪度岁月，晏然为天地间一蠹，唯缀缉圣人遗书，庶几有补尔。”于是著《易》、《春秋传》以传于世。《易传序》曰：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

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同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乾，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在乎人焉。

《春秋传序》曰：

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繆，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

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涪人祠颐于北岩，世称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庭。

朱熹传

——《宋史》卷四二九

【说明】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宋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县人），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尤溪县）。十九岁考中进士，历任县主簿、知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知州等，但任期都不长。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从事讲学和著述。曾在建阳（今福建建阳市）芦山筑草堂以居，名为晦庵，又曾在建阳考亭乡筑室，故世人多称他为晦庵先生、考亭先生，或称其谥号为朱文公。

朱熹是我国从南宋中期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止学问最广博、影响也最深的学者，如同称孔子为“孔夫子”一样，也有人尊称他为“朱夫子”。他确是孔子、孟子以后在古代文化、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所写作或整理编辑的书数量也很惊人，除《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字数近200万字外，本传中还列举了20余种著作，但仍不是全部。此外，他的口头讲学也由90多位门人记录，由后人分类整理成《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约200万字。其中内容涉及古代文化学术的各个方面。

朱熹综合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的学说，建立了

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同时与理学内部的某些不同论点和理学以外的不同派别进行了持久不懈的争论，从而确立了理学在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达七百年之久。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亲朱松，字乔年，考中进士。胡世将、谢克家推荐他，任命为秘书省正字。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军马时，招聘朱松作他的下属，朱松推辞。赵鼎再次当宰相，任命他为校书郎，后来又升为著作郎。由于御史中丞常同的推荐，任命为度支员外郎，兼任史馆校勘，后来历任司勋、吏部郎。秦桧决策与金人议和，朱松和同级官员上书，极力争辩说不应当。秦桧大怒，暗示御史弹劾朱松怀有异心而自以为高明，让他离开京师去任饶州的知州。

朱熹小时很聪明，刚会说话，父亲指着天给他看说：“这是天。”朱熹问道：“天的上边是什么？”朱松极为惊异。从师后，老师给他一本《孝经》，一读，就在上面题字说：“不这样，不是人。”曾跟一群小孩在沙上玩，独自端端正正坐着用指头在沙上画，别人一看，画的是八卦。十八岁，成为本地的贡生，绍兴十八年中了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挑选本县的优秀人才充当县立学校的学生，天天和他们讨论圣贤修养自身治理人民的学问，妇女中当尼姑道士的一律禁止。罢官回来后请求做宫观官，当了潭州南岳庙监。第二年，由于宰辅大臣的推荐，和徐度、吕广问、韩侂吉一同被召，以有病为理由推辞。

孝宗接位，下诏征求直言，朱熹上了一份密封的奏章说：

圣上本身虽然没有过错，然而帝王之学不能不精心研究。朝廷政治虽然没有失误，然而治军退敌的谋略不能不早些确定。关系国家的利与害、百姓的乐与忧的事情虽然不可能一一亲自去办，然而属于根源本体的地方（心性修养）不能不加以注意。陛下养德的早期，亲自披览书籍，不过是背诵文学作品，抒发感情，又很留心读道家、佛家的书。背诵华丽的词藻，不足以探求万事万物的根源而领悟出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佛道虚无寂灭的学说，不足以贯通本末而树立起大中至正的胸怀。帝王的学问，必须先研究事物而穷尽知识，以彻底了解事物的变化，使存在于事物中的义理，都能精细详尽地照察到，自然就会意念诚实和心术端正，而能够应付天下的事务了。

其次说：

治军退敌的计谋不能及时确定，是由于讲和的主张耽误了它。金人和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然则不能讲和十分明显。希望依照公认的是非标准做出决断，封闭关卡，废除和约，任用贤能，建立法纪，激励风俗。几年之后，国富兵强，衡量我方力量的强弱，观察对方内部裂缝的深浅，慢慢起来设法打败它。

其次又说：

国家的利与害，决定于百姓的乐与忧；百姓的乐与忧，决定于州县官的好与坏。各路监察司法官是决定州县官好坏的主要因素，朝廷又是决定监察司法官好坏的根本关键。想要使老百姓得到安乐，根本的关键也就在朝廷而已。现在的监察司法官员，犯法贪污声名狼籍、放肆作恶以祸害百姓的，没

有一个不是宰相执政和御史谏官的亲戚朋友与门客。基本已失去势位的，固然已经觉察到他们私相串通的情状而罢斥掉了；不占据势位的，难道就没有这种人，不过陛下无从知道罢了。

隆兴元年，又召朱熹。入宫答对，第一是说：“古代大学中的教育之道在于研究事物以穷尽知识。陛下虽然有生而知之的天性，高于一般人的品行，然而不曾随所遇到的事情来观察天理，按照天理来处理事情。因而办事之中动不动产生怀疑犹豫，听取意见之时不免受到蒙蔽欺骗，治国平天下的功效因此未能显著。”第二是说：“君父的仇敌是不能与之共同顶着一个天活着的。现在所应当做的，不是进行战争就无法报仇，不是坚决抵抗就无法取胜。”而且陈述了古代圣明的王者用以加强国本、挫败进攻、威胁和制服远方敌人的办法。当时的宰相汤思退正在倡导和平谈判，任命朱熹为武学博士，但要他等着按次序上任。乾道元年，催他就职，刚到任而洪适当了宰相，又主张和谈，意见不合，就回了家。三年，陈俊卿、刘珙推荐他当枢密院编修官，等着按次序上任。五年，遭母亲的丧事。六年，工部侍郎胡铨把他作为诗人推荐，与王庭珪同时被召，以没有服完丧的理由推辞。七年，已经服完丧，又召他，以俸禄不够养家的理由推辞。九年，梁克家当宰相，重申以前的命令，又推辞。梁克家上奏说朱熹屡次召他都不上来，应当受到褒扬录用，执政大臣们也都称赞他，皇上说：“朱熹安于贫贱，遵守正道，廉洁谦退，值得嘉许。”特地将召回待合改为召回当官，主管台州的崇道观。朱熹认为想要谦退却得到了官职，在道义上不大妥当，再次推辞。淳

熙元年，才应命上任。

二年，皇上想奖励和任用廉洁谦退的人，来激励风俗，当时裘茂良行丞相事，把朱熹的名字呈上去，任命为秘书郎，朱熹极力推辞，并且将亲笔信送给裘茂良，议论了当时一些权贵宠臣。一群小人乘机进行毁谤，于是乘朱熹再次推辞，就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去主管武夷山的冲佑观。五年，史浩再次当宰相，任命他为南康军知军，降下圣旨让他走便道上任，朱熹再次推辞，不允许。到达后，采取了兴利除害各种措施。正值当年气候干旱，注重实行救荒政策，保全救活了许多人，事情办完后，奏请依照规定赏赐捐献过粮食的人。有空就到州立学校去，召见学生们一起讨论学术。考察了白鹿洞书院的遗址，奏请恢复原来的样子，草拟了《学规》让书院的人遵守。第二年夏天，发生大旱，皇帝下诏叫各路监察司法官和州官逐条陈述百姓的福利和痛苦，于是上疏说：

天下的事务没有比关怀百姓更重大的，而关怀百姓的根本，在于君主要端正心术以建立法纪。这是因为天下的法纪不可能自然地建立起来，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的不正直的私心，然后才能有所依赖而建立起来。君主的心术也不可能自然端正起来，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小人，研究清楚义理的归宿所在，堵塞住通向邪恶的道路，然后才有可能端正起来。现在宰相、三省长官、师傅、宾友、谏议官都丧失了他们的职权，而陛下与之亲密商议的，不过是一两个近身侍候的臣子。这种人对上则迷惑陛下的心意，使陛下不相信先王治国的大道，而喜受急功近利的卑下论调，不爱听正派人士的好话，而习惯于私相亲匿逢迎的丑态；对下则

招集天下士大夫中贪图私利、卑鄙无耻的人，文的和武的区分开来，各自投奔他们的门下。所喜欢的就暗下拉拢，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所讨厌的人就暗地进行毁谤，公开放肆地排挤。相互进行贿赂，所盗窃的都是陛下的财富；任命高官、安排大将，所盗窃的都是陛下的权柄。陛下的所谓宰相、师傅、宾友和谏议官等臣子，有的反而在他们的门墙下进出，看他们的脸色和意图办事；其中幸而自己还能站稳脚跟的人，也不过是谨小慎微地约束自己，而从没有敢说一句话指斥他们；其中特别畏惧公众舆论的人，才能够对他们的一两个爪牙略加警告或驱逐，既不能够深深伤害他们，而且始终也不敢义正词严地讲话，以捣毁他们借以藏身的巢穴。势力已经形成，威风已经树立，朝廷内外都顺风倒向他们，使陛下的号令和官员升降的决定不再是从朝廷发出，而是出于这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是陛下独自决断，而实际是这一两个人暗中操纵了权柄。

并且说：“莫大的灾祸，必然到来的忧患，已经近在早晚，而只有陛下一个人不知道。”皇上读了，大怒说：“这是把我看作亡国之君了！”朱熹以有病为由请求做宫观官，不予答复。

陈俊卿以前以宰相的身分担任金陵府知府，经过皇宫入见皇上，极力推荐朱熹。宰相赵雄对皇上说：“由于读书人的喜欢出名，陛下越是讨厌他们，人家夸奖他的就越多，岂不是正好抬高了他们。不如依照他们的长处任用他们，他们逐渐担当了实际责任，能干不能干自然暴露出来了。”皇上觉得对，就任命朱熹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随即又记录他救灾的功劳，任命为直秘阁。朱熹以前次上奏的捐纳粮食的人

没有论功行赏为理由，推辞。

正值浙东发生大饥荒，宰相王淮上奏改任朱熹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当天就乘一辆车子上路，又以捐纳粮食的人未给予赏赐为理由，辞掉职名。对捐纳粮食者的赏赐实行以后，就接受了职名。入宫答对，首先陈述发生灾异的原由和修养道德、任用贤人的主张，其次说：“陛下亲政的初期，大概曾选立一些英豪之士，让他们负责政事，不幸当时所能得到的并不都是合适的人才，因此不再广泛访求贤能之士，而是姑且择取一些软弱、熟悉、容易控制的人来充当这些职务。于是身边私相亲近的供使唤的贱人，才能借侍奉陛下过安乐空闲生活的机会，供陛下驱使去参与国家大事，而宰相的权力便日益削弱。又担心造成偏听偏信的局面，而使这些人依赖其重要地位来蒙蔽自己，有时就听听外廷官员的议论，想借以暗中监视这伙人违犯法纪的行为而加以严格控制。陛下自己既已不能遵循天理，使圣心公平，以端正朝廷的大纲大法，然则固然已经丧失了根本的东西；而又想兼听士大夫的话，拿来作为驾驭这些人的办法，然而士大夫进见陛下有一定的时间，而这些近侍可以从容不迫从不间断地守在陛下身边。士大夫的礼貌既是端庄而难以亲近，其议论又苦涩而难以听进去；身边亲近的受宠爱者谄媚的姿态既足以蛊惑陛下的心志，他们那种衙门小吏式的狡猾又足以眩惑陛下的视听。所以虽然想要压抑一下这类人，而这类人的权势却一天比一天重大；虽然想要兼采士大夫的公论，而士大夫的权势一天比一天轻微。权势重的既挟持其重大权势，来盗取陛下的权柄；权势轻的又借重于陛下所重用的人的力量，作为窃取禄

位、保持宠爱的办法。天长日久，逐步亏耗腐蚀，使陛下的道德功业一天天被摧毁，纲常法纪一天天被破坏，邪恶谄媚的人充斥朝廷，贿赂公开地进行，士兵愁苦而百姓怨恨，盗贼接连兴起，灾害怪异频频出现，饥荒重复到来。大群小人互相勾结，人人都能满足其私欲，只有陛下什么也没有得到，却独自承受了它的恶果。”皇上看后为之变了脸色。所奏上的七件事，其中一两件亲手书写以防泄漏出去。

朱熹刚刚接受任命，立即写信到其他州郡，招募米商，减免他们的赋税，等他到任时，外地船只运来的米已经从四面八方来到。朱熹每天访察百姓的疾苦，巡行自己管辖的境内，只坐一辆车而不要手下的人跟随，所到之处人们都来不及知道。州县的官吏畏惧他严肃的风范，有的甚至引咎辞职而去，所统辖的地区很快变得法纪严明。凡丁钱、和买、役法、酒类专卖等措施，有对百姓不便利的地方，都考察而加以改革。在救荒之外，随时对各种事情都加以研究谋划，一定要规定出经得起长时间考验的办法。有讲朱熹坏话的人，说他不善于处理政务，皇上对王淮说：“朱熹的政务倒是有可观的成绩。”

朱熹因为前后奏请皇帝实行的主张有很多都被压抑，幸而听从了的，也大都延缓不办而失去了时机，而蝗灾旱灾又相继发生，心中不胜忧愁愤恨，便又奏道：“对付当前局势的办法，只有由圣上内心做出决断，迅速地发出号令，批评自己和征求意见，然后君臣互相告诫，各自反省和改正。其次只有把宫中大库里的钱全都拿出来，用供应重大祭礼的费用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命令户部免征以往拖欠的赋税，命令

漕运官员依照条例验放租税，命令宰执大臣清除受灾各路、各州军的监察司法官、地方官中不像样子的人，慎重选择贤能的人，把救荒的事委付给他们，或许还能维系下面的人心，消除他们乘机作乱的意图。不然，臣担心值得忧虑的将不单是饿死人，而将是出现反贼；受其祸害的将不只是官吏，而且还会向上危及国家。”

台州的知州唐仲友和宰相王淮同乡又是亲戚，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都推荐他，升他为江西提刑，但还没有动身赴任。朱熹巡察到台州，台州人纷纷控告唐仲友，朱熹查到了他做坏事的事实，连上三封章奏，王淮都隐瞒起来不让皇上知道。朱熹弹劾他愈来愈急切有务，唐仲友也作了自我辩护，王淮只好把朱熹的奏章呈上，皇上命令宰相等详细调查，都司陈庸等人请求命令浙西提刑委派清廉能干的官员查实，仍旧命令朱熹赶快到受旱灾伤害的州郡视察。朱熹当时留在台州没有离开，接到诏书后，益发坚决上章弹劾，前后上了六份奏章，王淮不得已，收回派唐仲友到江西做提刑的新任命，转授给朱熹，朱熹推辞不接受，就回了家，而且请求做宫观官。

当时郑丙上疏诋毁程颢、程颐的学术来打击朱熹，王淮又提拔太府寺丞陈贾当了监察御史。陈贾面见皇帝回答咨询时，首先攻击说近来士大夫中有标榜所谓“道学”的，大抵都是假借这个名义来掩饰其虚伪，希望认真考察这类人，摒弃不用。这大概是指朱熹而言。十年，下诏说由于朱熹屡次请求做宫观官，可差他去主管台州的崇道观。然后又接连主管云台观、鸿庆宫共五年。十四年，周必大当宰相，任命朱

熹为提点江西刑狱公事，朱熹以有病推辞，不允许，就上任。

十五年，王淮的宰相职务被罢免，朱熹就入宫奏事，首先说近年来许多案件判决不当，今后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做狱官。其次讲经总制钱的祸害百姓，以及江西各州科罚的流弊。而末尾说：“陛下登位二十七年了，因循苟且使光阴白白流逝，没有一点功绩可以称得上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臣曾反复地想过，莫非是安乐悠闲地生活在深宫大院之中，在那虚静昭有而能感应万物的心地里，天理还有不够纯粹之处，人欲还有没彻底清除的地方，因此行善时不能够充其量地去做，除恶时不能够彻底去掉根，每个念头出现的一刹那，公与私、邪与正、是与非、得与失两方面的动机，在心里互相打架。所以礼遇大臣并非不优厚，然而身边宠幸谄媚的人能够深深受到心腹的寄托；思念英雄豪杰并大不急切，然而柔媚、邪恶、平庸、荒谬的人能够长久地窃取朝廷的权力。不是不乐意听公正的议论，然而有时不能容忍；不是不憎恨谗言地暴行，然而未免错误地相信；不是不想为祖宗报仇雪耻，然而未免畏惧怯懦而苟且求安；不是不爱惜和培植百姓的财力，然而未免使他们悲伤叹息愁苦埋怨。希望陛下从今以后，每一个念头产生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地考察：这是出于天理呢，还出于人欲呢？要真是天理，就恭恭敬敬地去扩充它，而不使它稍微有一点儿堵塞不畅；果真是人欲，就认认真真去克服它，而不使它稍微有一点儿凝固停留。推广到日常的言语行动中，用人处事中间，无不用这种办法去处理，圣上的心就会洞然明白，表里一致，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掺杂在其中，而天下的事情就将会完全依照陛下的意愿去办，没有什么不如心意

的了。”这次进京，有在半路上拦阻朱熹的，认为“正心诚意”的论调是皇上所讨厌听的，劝他不要拿到皇上面前去讲。朱熹说：“我平生所学的，就是这四个字，难道可以隐瞒沉默来欺骗我们的君主吗？”等到奏完以后，皇上说：“好久没见到卿，浙东的事，朕自己知道，现在将给卿安排清闲而重要的职务，不再拿地方上的事情来麻烦卿了。”

当时曾觌已经死了，王抃也驱逐走了，只有内侍甘昇还在，朱熹极力拿这个人做话题。皇上说：“甘昇是德寿宫皇太后所推荐，说他有才罢了。”朱熹说：“小人没有才，怎能够耸动君主。”第二天，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因脚有病请求做宫观官。兵部侍郎林栗曾经和朱熹讨论《周易》、《西铭》意见不合，弹劾朱熹说：“本来没有什么学术，只不过是窃取张载、程颐留下的那点东西，称之为‘道’。所到之处总是带着几十个门生，妄图攀比孔子、孟子周游列国的做法，以索取高价，不肯担任实际职务，其虚伪简直无法掩饰。”皇上说：“林栗的话似乎过分了。”周必大说：“朱熹上殿的那天，脚病还未好，勉强登上大殿去答对。”皇上说：“朕也看见他跛着脚走路。”左补阙薛叔似也上书声援朱熹，于是命令朱熹依然任江西的提刑的职务。”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林栗辩论，说他的话没一句是实的，“称之为道学”这句话，尤其没有事实根据，以前王淮操纵御史谏官，阴谋排斥正派的人，就是用的这种手法。皇上下诏说：“朱熹昨天入宫答对，所谈论的都是有关新任职务的事，朕体谅他的心诚，又同意他的请求，可以赶快上任。”正值胡晋臣新任侍御史，首先弹劾林栗执拗不通事理，喜欢臭味相投的人而排斥异己，无端地攻击学者们

营私结党，于是把林栗贬为泉州知州。朱熹再次推辞，就任命他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崇福宫。没超过一个月再次召他，朱熹又推辞。

起初，朱熹认为口头陈述的意见还有些没有讲完，曾请求写一份密封的奏章让皇上知道，到这时，把密封的奏章投进登闻鼓院的铜匣里，其中说：

现在天下的大势，就像有人有重病，从里边的心腹，到外面的四肢，没有一根毛一根头发不感染病痛的。姑且拿天下重大的本源性的东西和今天最紧要的事务，给陛下说说。重大的本源性的东西，就是陛下的心；最紧要的事务，就是辅助太子、选任大臣、振兴法纪、移风易俗、爱惜和培植百姓的财力、办理好军务这六项。

古代的圣明王者兢兢业业，要保持和修养这善良的心，所以设立太师、太保等官员，安排谏官的职务，一切有关饮食、酒水、衣服、住宅、器物用具、财货以及有关宦官、宫女的事务，没有一项不由宰相来统管。使在他的前后左右侍候的人，一动一静，没有一样不由官家制定的章程来加以制约，而没有一点小小的缝隙、一眨眼一呼吸的时间，能够隐藏住一丝一毫的私心。陛下所用以使自己精诚专一、克己复礼从而保持和修养身心的措施，果真有这样的功效吗？所用以修身治家而使身边的人都能端正的措施，果真有这样的效果吗？宫廷是禁密之地，臣固然无法知道其中情形，然而封官赏财的太滥，贿赂的流行，大街小巷私下议论，好久以来就层出不穷了，然则陛下用以在家里进行修养的一套，恐怕没有一点可以赶得上古代的圣明王者了。至于身边宠幸的私人，

对他们的恩遇超过了适当限度。以往龙大渊、曾觌、张说、王抃之类人，权势气焰十分嚣张，惊动了一时，现在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惟有前些日子臣所当面讲到的那个甘昇，虽然承蒙皇太后委婉的开导解释，然而以臣的愚见，私下认为这类人只应当让他们看门传令，承担洒扫的工作，不应当给他们面子抬高他们，使他们在宫内能够肆行邪恶谄媚、做各种败坏道德的事，来动摇和引诱皇上的心；在宫外能树立门庭、招纳权势，来破坏圣明的政治。臣在外面听说，自从王抃放逐以后，列位将军的差遣任命，大多出自这个人的手。陛下用尽百姓的脂膏血汗来蓄养军队，士兵们反而未曾得到一点温饱，这都由于将帅们巧立名目，夺取他们的口粮，放肆地对陛下身边的人进行贿赂，以谋求进升任用。出入宫门的心腹之臣，在外面勾结将帅，一起进行欺骗蒙蔽，因而造成这样的后果。然而陛下不觉悟，反面宠爱和亲近他们，把这些人当作属于自己的人，以至使宰相不能议论他们处置事情的得与失，谏议官不能议论他们差遣任命的是与非。然则陛下所用以端正身边的人的手段，未能赶得上古代圣明的王者又很明显了。

至于辅助太子，则自从王十朋、陈良翰之后，东宫官僚的选用，号称是得到了合适人选，然而真能够称职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而且又时常使得一些邪恶伪善、卑下闲散、平庸虚妄的人掺杂在其中，所谓讲读，也只是姑且拿来应付条文规定充个数而已，而从未听说它有什么告诫规劝的功效。至于从早到晚和颜悦色、陪从游乐的，又不过是几个使唤人、宦官而已。师傅、宾客等官既不再设置，而詹事、庶子等官又

有名无实，左春坊和右春坊就直接让使唤人去掌管，既无法启发太子尊敬老师、亲近朋友、重视道德、喜好仁义的心，又无法防止他好开玩笑、怠慢无礼、亲近小人和沾染各种不良习性的缺点。应当参考以前的规定，设置师傅、宾客等官，罢掉春坊中使唤人的职务，而使詹事、庶子各自恢复原有的职权。

至于选任大臣的事，则以陛下那样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必须物色到刚直贤明、公平正派的人之后才可以任用吗？其所以经常不能找这样的人，却反而容许卑鄙的人窃取权位，仅仅由于一闪念之间，没能够洞察私心邪念的害处，而安乐的私生活中所喜好做的事，所宠爱的人，不可能都是符合和遵循规章制度的，如果任用刚直贤明、公平正派的人担任宰辅，就会怕他妨碍自己做所喜好的事，危害自己所宠爱的人，而不能肆情任意。因此在选择的时候，常常先把这种人排除在外，然后把所有无能怯懦、软弱熟悉、平时从不敢正色直言的人都拿来掂量考虑，又从其中挑出最平庸、极卑陋、绝对可以保证他对自己不至于有妨碍的人，然后提拔起来放到那个位子上。所以任命书还没有写出，而挑选什么货色已经事先决定，姓名没有公布，而朝廷内外早已料知他们决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了。

至于振兴和严肃法纪，移风易俗，则现在宫廷中中书、门下省办事之处，本该戒严保密的地方，然而天下最不公平的做法，最不正派的人，却反而能够窝藏盘踞在其中。因而陛下所耳闻目见的，无非都是不公平不正派的事，那末在这些东西的薰陶腐蚀之下，使陛下好善的心思不显著，疾恶的意

念不深切，它的害处已经是无法说得完的了。等到这些人做坏事犯了法，陛下就又不能够痛下决心割舍这些私自宠爱的人，而交给外廷去讨论，依官府的法吏论处，因此上面的法纪不严正，下面的风俗败坏，它为害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而浙江一带尤其严重。多数人习惯于采取软弱卖好的姿态，讲些顺从阿谀的话，把不分是非、不分曲直看作上策，严重的甚至用黄金珍珠代替通常赠人的肉乾肉酱，用债券代替通常送人的诗歌文章，实相可以引诱就引诱实相，近侍可以买通就买通近侍，只求得到利益，不再顾及廉耻。一旦有个刚毅正直、遵守道理的儒士出现在他们中间，就群起而讽刺排挤，指斥他们是“道学”，而加上虚伪偏激的罪名。十几年来，用“道学”这两个字来阻挡天下的贤人君子仕进的道路，又如同以往对待所谓“元祐学术”一样，排斥诋毁，一定要使他们没处容身才罢手，这难道是政治清明时代应有的事吗？

至于爱惜和培植百姓的财力，办理好军务，自从虞允文当宰相时起，全部抽走户部每年收入中立有名目的必定可以指望拿到手的部分，号称是年终盈余的数字，而输送到内廷大库里，却把其中有名目无实际、历年累积挂帐拖欠、空自记载在帐本上、无法催索清理的部分，拨回给户部，说是内廷大库里的积蓄，将用来应付今后用兵进攻全说不清具体时间的那种需要。然而从此以来二十多年，内廷大库每年的收入不知道有多少，却看作是陛下私人的积蓄，由陛下自己的人来掌管，宰相不能够依贡纳的规定制度调节它的收支，户部不能够按帐簿考查它的存亡，积日累月地消耗着，用来供奉陛下安乐生活的费用的，恐怕不知道有多少了，而又何尝

听说过能够用这些钱换来敌人的首级，像太祖听说的那样呢？白白使户部的经费一天比一天缺乏，督促下面一天比一天严峻，以至废除了太祖太宗以来分成的好办法，而一定要以十分交足为限；还觉得不够，就又创立比较各路监察司法官、州郡官聚敛钱财的多寡而排定名次的办法，以利诱和威胁他们。于是朝廷内外望风承意，争着实行苛政，这正是百姓财力加倍困乏的原因。将官们的追求升官，必然先要剥削士兵，以培植私利，然后用这些钱财为自己结交陛下身边的人，以求把自己的姓名通报到陛下的大将那里。大将知道了他们的姓名，就交代到军队里去，让他们从基层起向上面逐级保举。

称赞他们的军事才能可以担任将领，然后写好奏章到陛下面前为他们说情。陛下只看到他们是逐级优先推举，档案材料完备，就真以为是公平推荐从而能够得到人才，而怎能知道他们是按价交钱，已经和唐末的“欠帐元由”相似了呢！将领，是决定三军命运的人，而其选立的办法如此荒谬，那末那些智勇双全、雄才大略的人！谁肯甘心低头拜倒在宦官、宫女的门下，而陛下所得到的担任将帅的人，都是凡夫俗子，却还希望他们能够办理好军务，激励士兵，来增强国势，岂能不误事呢！

所有这六件事，都不能拖延，而根本的东西就在于陛下的这一颗心。这颗心端正了这六件大事就没有一件不能办好。只要有一点心中的私欲掺杂在其中，就即使想要费尽精力，以求办好这六件事，也将不过是徒然做表面文章，而天下的事情会愈来愈发展到毫无办法了。

奏疏送进宫里，夜里的漏壶已漏下七刻，皇上已经就寝，

急忙起来命人举着蜡烛，一口气读完全篇。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太一宫，兼任崇政殿说书。朱熹极力推辞，改任为秘阁修撰，到京外去任宫观官。

光宗接位，再次辞去职名，依旧任直宝文阁，皇上下诏奖励。住了几个月，任命为江东转运副使，以有病推辞，改任漳州知州。奏请免除所属各县无正当名义的赋税七百万，减少经总制钱四百万。由于当地习俗不懂得礼仪，采取古代丧葬嫁娶的礼仪，公开张贴出来告诉大家，命令年纪大的人进行解说，以教会青年人。当地风俗信奉佛教，男男女女在和尚庙里聚集举行传经会，女儿不出嫁的就给她建造尼姑庵来往，朱熹都加以禁止。常常忧虑不实行划定田界造成的弊害，正值朝廷议论想在泉州、汀州、漳州实行划定田界，朱熹就调查有关事宜，选择了适当的人才及大量的方法报告上去。然而久居当地的豪强大族一向侵吞穷人土地的人认为对自己不利，加以阻拦。宰相留正，是泉州人，他的同乡、族人也多数认为不宜实行，读书人吴禹圭上书控诉说这件事烦扰大家，皇上下诏泉州暂且推迟到以后，有命令先在漳州实行划界。第二年，朱熹以儿子死了为理由请求奉祠。

当时史浩入见皇上，请求延揽天才有声望的人，于是任命朱熹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鸣庆宫。朱熹再次推辞，下诏说：“论撰的职务，是用来表示对名儒的尊敬的。”就接受了任命。任命为荆湖南路副使，推辞。漳州划定田界的事终于宣告停止实行，朱熹以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弹劾自己。没有多久，差遣为潭州的知州，极力推辞。黄裳当了嘉王府翊善，自认为学问不及朱熹，请求召朱熹为东宫官，王府直讲彭龟

年也在大臣面前说了话。留正说：“我留正不是不了解朱熹的才德，但他的性格刚强，恐怕到这里意见不合，反而害了他。”朱熹再次推辞，有圣旨说：“长沙是国家的重要屏障，选择贤才去镇守是很重要的。”于是接受了任命。正值一些少数民族的人骚扰所辖地区，朱熹派人去讲清利害，使他们都降服。反复交代法令，做好军事准备，约束不良官吏，抑制土豪劣绅，所到之处都兴办学校，修明教化，各地的学者都聚集到这里来。

宁宗接位，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和陈傅良，有圣旨命朱熹到行宫奏事，朱熹一面上路一面推辞。任命为焕章阁待制、侍讲，推辞，不允许。入宫答对，首先说：“近来，太皇太后亲自确定重大决策，让陛下恭敬地继承洪图大业，可说是既能灵活处理，而又不丧失正确原则。自那时到现在三个月了，有时反而不能在逆与顺、名与实之间无所怀疑犹豫，臣私自为陛下担忧。还有可以推诿的，也就是说陛下的心，以前本不曾有过求取帝位的打算，现在也不曾失去挂念父亲的情感，这正就是所以能够实行灵活办法而又不失去正确原则的根本了。扩充这种不曾追求帝位的心，来竭尽承担罪过、引咎自责的诚意，扩充这种不曾忘记父亲的心，来尽冬送温暖、夏送清凉、晚铺被褥、早问平安的礼节，而重大的伦理便端正，重大的根本就树立起来了。”又当面辞去待制、侍讲的职务，皇上亲手写劄子说：“卿的经学根底深厚，正适合担任劝讲、待制的职务，不要再劳卿推辞，以满足朕尊儒重道的心意。”于是接受了任命。

正值赵彥逾巡视准备埋葬的陵墓，认为上面的土层太浅

薄，下面又有流水沙石。孙逢吉复查，也请求另行物色好的葬地。有旨集会讨论，负责此事的台史害怕有麻烦，讨论中途停止。朱熹便呈上议状说：“寿皇（孝宗）具有圣德，他的衣冠所藏之地，应当博访名山，不宜偏信台史的意见，委弃在泉水沙砾之中。”不予答复。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皇上没有回到皇宫里去，就会因为名义身分不正而产生怀疑的论调；金人的使者将要来，或许会观察到一些内情。而皇上却下旨修理旧的太子宫，成为三几百间房屋，想搬到那里去住。朱熹便上疏说：

这必定是身边近侍首先提出这种意见来误导陛下，从而想趁此来实现他们奸诈的用心。臣担心不单是上帝会大怒，灾害怪异将频频出现，正当陛下诚惶诚恐修养反省的时候，不应当兴起这样的大劳役，而违背老天谴责的警告的用意；也担心近郊的老百姓在饥饿流离、濒于死亡的时候，有人可能怨恨忿怒，而发生意外事变。不单没什么可以用来感动太上皇帝（光宗）的心，以致没有进见他的机会；也担心寿皇的灵柩还在停放着，因为墓地没有选择好，祭席的供奉不容许有少许的松弛，太皇太后、皇太后都以很高的年纪，孤独地处在愁苦之中，早晚的奉养尤其不可缺少。而四面八方的人，只看到陛下急着要大修宫室，想尽快能够完工，一朝轻快地放弃一切责任而离去，以图自己的舒适方便，六军和万民的心将必然会有扼住手腕愤愤不平的了。以往的教训并不遥远，极为可怕啊！

又听说太上皇后惧怕违背太上皇帝的心意，不想让他听到“太上”的称呼，又不想让他听到“内禅”的说法，这又

是过分的顾虑了。殊不知如果只是这样做，而不做婉转调和的工作，父子之间就会一个在上面怨恨恼怒，而一个在下面忧愁恐惧，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呢。父子关系是重大的伦常关系，是三纲的关键，迟迟不去想办法理顺，也将会有人借此名义造谣生事的，这又是臣所极害怕的。希望陛下公开传令大臣，首先停止修理东宫的工程，而把那些工料运回到慈福宫、重华宫一带，草草修盖一二十间寝殿，使之大体还能居住。至于过宫的办法，则臣又希望陛下下诏责备自己，减少车辆随从，入宫以后，暂时改变衣服颜色，就像唐肃宗不穿黄袍而改穿紫袍，站在玄宗的马前替他牵马那样，来表明承担罪过、引咎自责的诚意，则太上皇帝即使有恼怒之意，也将一下子消散，而感情也融洽了。

至于朝廷的法纪，则臣又希望陛下深切告诫身边侍候的人，不要干预朝政。对其中确有功勋而所得的奖赏未能使舆论惬意的，也传令大臣公平讨论这件事，参考以前的好做法，对其功劳给予丰厚报偿。而一切命令的实施或取消，人才的进用或黜退，则完全委托给两三个大臣，叫他们反复比较衡量，不要只按自己的意见，而要酌情采纳公论，奏请陛下批准实行。有不恰当的，批驳下去再讨论，选择其中好的意见以陛下名义做出决断，这样不但近侍不能干预朝廷大权，大臣不能专按自己私意办事，而陛下也能借以更加明白与熟练地处理天下的事，而在得失的衡量上没有什么怀疑犹豫了。

至于寿皇葬地的选择，则希望否定台史的意见，另找好的地方，来营造新的地宫，使寿皇的遗体能好好安息在里面，而宗庙社稷与百姓都能在外面蒙受福佑了。

奏疏送进去后不给答复，但皇上也没有什么恼恨朱熹的意思。朱熹每每把自己给皇帝讲课的内容编辑成册进呈皇上，皇上也开心的接受。

朱熹又上奏勉励皇上增进道德说：“希望陛下在平日的修养当中，把寻求丢失了的善心作为根本的课题，而对于研玩经典、借鉴历史，亲近儒学，更加地用力。多把大臣召来，切磋琢磨治理天下的办法，其他臣子进宫答对，也赐给他们温和的脸色，反复地询问，由此以知道政事的得失，民情的苦乐，而且又可趁此机会来观察他们人品的邪正和才能的长短，或许对于天下的事情能分别懂得它的道理了。”朱熹又奏道：“按照礼经和朝廷的敕令，儿子为父亲，嫡孙中继承了重大权力的人为祖父，都要穿用最粗的麻布制成的丧服三年之久；嫡子应当作为他父亲的后继人，如因故不能就位执行丧礼，就由嫡孙继承祖统而代替他执行丧礼。自从汉文帝缩短丧期，历代都因袭了这种做法，天子就没有服三年丧服的事了。儿子为父亲尚且如此，嫡孙中继承重大权力者该会怎样就不难知道了。人伦被废弃破坏，三纲的道理不明确，千多年了，没有人能够纠正。孝宗皇帝天生有好的德性，除了执行把月数变成日数的丧事外，还执行天下通行的三年之丧，朝衣朝帽都改用布做，这应当明确写在书上，作为千秋万世的典范。最近，孝宗的遗命刚刚颁布，太上皇帝身体偶尔不很舒服，不能亲自参加丧礼。陛下是以世袭嫡子的身分继承天子的大位，那末继承重大权利者的丧服是已明确写在礼律上的，应当遵照寿皇已经实行的办法。一时匆忙，没等详细讨论，就用了漆纱浅黄的丧服，不仅违反了以前的礼律，而且使寿皇已经

实行过的礼仪刚刚兴起就又废除了，臣私下很为之痛心。然而以往的过失来不及追改，唯有将来灵柩启行时，按礼应当再用初丧时该穿的丧服。

正值孝宗的木主送到宗庙里去与祖先的木主一起安置，讨论起宗庙中远祖的木主逐次撤走的制度，孙逢吉、曾三复率先请求把僖祖（赵匡胤的高祖父）、宣祖（赵匡胤的父亲）一并迁出去，把太祖赵匡胤供奉在第一庙室，在不分亲疏远近对所有的先祖举行大合祭时则安置在朝向东方的位置。皇上有旨让大家集会讨论：僖祖、顺祖（赵匡胤的曾祖父）、翼祖（赵匡胤的祖父）、宣祖四位远祖撤下去的木主，放在什么地方适宜。自从太祖皇帝赵匡胤头一个尊崇四位远祖的庙，到治平年间，发议论的人认为世数相隔逐渐遥远，请求把僖祖的木主迁到庙堂东西两头的夹室里去。后来王安石等人上奏说，僖祖有庙，和周代的后稷、商代的契没有什么区别，请求恢复原先的样子。当时的宰相赵汝愚素来不认为再祭祀僖祖是对的，侍从们大多服从他的意见。吏部尚书郑侨想要暂且撤掉宣祖而把孝宗安放进去。朱熹认为藏到夹室里去，就是把祖宗的木主下藏到子孙的夹室里；神宗仍旧奉他们为始祖，已经是符合礼的正确做法，因而符合人心，正是所谓有人创立就没有人敢去废除的做法。又起草了一篇《庙制》来进行辨析，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没有本源而产生的。朝堂的大臣不告诉皇上，就撤销了僖祖、宣祖的庙室，另外创立一所庙来供奉四位远祖。

起初，宁宗的接位，韩侂胄自称有参与决策的功劳，于是在宫中揽权管事。朱熹担心他危害朝政，多次就此发表议

论，而且约同吏部侍郎彭龟年一起弹劾他。正值彭龟年奉命外出陪伴外国的使者，朱熹就上疏指陈皇上身边的人窃取权柄的过失，在给皇上授课的讲席上又重复讲起。皇上批道：“怜悯卿的年纪老了，恐怕难以站着讲授，已经任命卿去做宫观官。”赵汝愚把御笔放在袖子里还给皇上，一面劝一面拜。内侍王德谦径直把御笔交给朱熹画押，御史谏官们争相挽留，皇上不允许。楼钥、陈傅良随即封还诏书，修注官刘光祖、邓驘也交替上章劝皇上。朱熹上路后，受命担任宝文阁待制，给予州郡官的差遣，推辞。随即任命为江陵府知府，推辞，又请求追还新旧职名，下诏仍旧为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官。庆元元年初，赵汝愚当了宰相，收揽四方的知名之士，朝廷内外伸长脖子盼望大治，朱熹却独自警惕地把韩侂胄专权看作可忧虑的事。不但屡次向皇上说，又多次亲自写信告白赵汝愚，应当用重赏酬谢他的功劳，不要让他得以干预朝政，其中有“防止和杜绝细微的、渐进的趋势，谨慎而不可疏忽”的话。赵汝愚正认为他容易制服，心里不当一回事。到这时，赵汝愚也因被诬告而驱逐出去，而朝廷的大权都归韩侂胄了。

朱熹起初以自己有关宗庙制度的议论弹劾自己，不允许。以有病请求退休，下诏说：“辞谢职事，不合朕优待贤者的本意，仍旧当秘阁修撰。”二年，沈继祖当监察御史，诬告朱熹有十条罪，下诏撤职、罢掉宫观官，门下蔡元定也送到道州编置和管束。四年，朱熹因年近七十，申请退休。五年，同意了他的请求。第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病将危急起，亲笔嘱咐他儿子朱在和门人范念德、黄干，谆谆地告诫他们勉

力做学问和修定自己的遗著。第二天，端正地坐起来整理衣冠，睡到枕头上就去世了。

朱熹考上进士后五十年中，在外地做官每年一次的考核仅仅经历了九次，立身朝廷才四十天。家里一向贫穷，少年时投靠父亲的朋友刘子羽，住在建州的崇安县，后来行到建阳县的考亭，经常缺吃少喝，安然处之。学生中自远方来的，豆饭和野菜汤，总是一起吃。常常向人借钱补足用度，然而不符合道义的钱财则一文也不取。

自从朱熹离开朝廷，韩侂胄的权势愈来愈嚣张。何澹当了御史中丞，首先攻击所谓自称别为一家的“专门之学”，说他们文饰奸诈的用心来沽名钓誉，请求辨别真假。刘德秀在长沙做官，不被张栻的门人所礼敬，等到当了谏官，首先弹劾留正有重用伪学之罪。“伪学”的名称，大概从这里开始。太常少卿胡纛说：“近年来伪学猖獗，图谋做不正当的事，希望明确告诉大臣们，暂时停正提拔这类人的考虑。”于是召唤陈贾来当兵部侍郎，不久，朱熹就收到撤销职务的命令。刘三杰以前以御史身份弹劾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等人，以前的所谓“伪党”，到这时又变成为所谓“逆党”了。当天就任命刘三杰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攻击说道学和权臣勾结成为死党，觊觎皇帝的权位。就命令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告白天下，于是攻击所谓伪学一天比一天加紧，候选官余吉甚至上书要求砍朱熹的头。

当这个时候，儒者中规行矩步、因其儒学修养而稍有名气的人，简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跟从他们学习的士人，特立独行无所顾忌的，退隐到山沟里去；随顺怯懦的，改换

名字去拜他人做老师，经过原来的老师门前也不敢进去；还有的甚至改变穿戴，结伙游逛市场，以表明自己不是同党。而朱熹却天天与学生们讲学不倦，有人劝他把学生遣送回去，只是笑而不予回答。有个当籍田令名叫陈景思的，是以往的宰相康伯的孙子，和韩侂胄有点姻亲关系，劝韩侂胄不要做过分的事，韩侂胄心里也渐渐有点后悔。朱熹死后，快要埋葬了，谏官说：“各地伪学的徒子徒孙都约定日期来聚会，给伪学老师送葬，聚会期间，不是对现在当权的人随意说长论短，就是对当前朝政的好坏说三道四，希望命令地方官加以管束。”皇上同意了 this 建议。

嘉泰初年，对学者的禁锢稍稍放松。二年，下诏说：“朱熹已经退休，赏给他一个华文阁待制的职名，给予他退休的福利待遇。”后来韩侂胄死了，下诏对朱熹临终写遗表一事给予赏赐，给他一个谥号叫做“文”。不久又赠给他中大夫的官阶，特赠宝谟学士职名。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职名，追封为信国公，又改为徽国公。

起初，朱熹少年时，有追求大道的慷慨志向。父亲朱松病得很危急的时候，曾嘱咐朱熹说：“籍溪的胡原仲、白水的刘致中、屏山的刘彦冲这三个人，学术上有深厚根底，是我所敬畏的人，我若死了，你就去师事他们，而且只听他们的话。”这三人，指的是胡宪、刘勉之、刘子翥。所以朱熹的学问既是广博地从经典传注中寻求，又是从广泛结交当代有识之士中得来。延平的李侗老了，曾随罗从彦学习，朱熹从同安县主簿任上回来，不惧数百里之远，步行去跟他学习。

他的治学，大抵是穷究事物之理以推广其知识，回到自

己身上以践履其实在内容，而以内心始终处于庄敬专一状态为主要修养方法。曾经说圣人贤人道统的流传分散在古代典籍中，圣经中的义理不明白，因而道统的流传才晦暗起来。于是耗尽他的精力，来彻底研究圣贤的经典和对经典的训释。所著的书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周易著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大学中庸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楚辞辨证》、《韩文考异》；所编辑的书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这些书都流行在世上。朱熹死后，朝廷把他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所做的注解规定为学校里必修的课程。又有《仪礼经传通解》一书没有完全定稿，亦放在学校里当课本。平生写的诗文共一百卷，口头解答学生疑问记录整理出来共八十卷，另外不搜集整理出十卷。

理宗绍定末年，秘书郎李心传请求把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七人列入陪从孔子受祭礼之列，不予答复。淳祐元年正月，皇上视察学校，亲手写诏把周、张、二程及朱熹的木主放在孔子庙里陪从受祭祀。

黄干说：“道的正统必须等待有合适的人才能够传下来，从周代以来，可以承担传道责任的不过几个人罢了，而能使这个正道光大昭著的，只有一两个人而已。从孔子以后，曾子、子思在道统沦于微弱的时候继承了它，到孟子才开始显著。从孟子以后，周子、程子、张子在道统濒于断绝的时候

继承了它,到朱熹才开始显著。”有见识的认为他很懂得立言。

朱熹的儿子朱在, 绍定年间当吏部侍郎。

(陈金生 译)

【原文】

朱熹, 字元晦, 一字仲晦, 徽州婺源人。父松, 字乔年, 中进士第。胡世将、谢克家荐之, 除秘书省正字。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军马, 招松为属, 辞。鼎再相, 除校书郎, 迁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荐。除度支员外郎, 兼史馆校勘, 历司勋、吏部郎。秦桧决策议和, 松与同列上章, 极言其不可。桧怒, 风御史论松怀异自贤, 出知饶州, 未上, 卒。

熹幼颖悟, 甫能言, 父指天示之曰: “天也。” 熹问曰: “天之上何物?” 松异之。就傅, 授以《孝经》, 一阅, 题其上曰: “不若是, 非人也。” 尝从群儿戏沙上, 独端坐以指画沙, 视之, 八卦也。年十八贡于乡, 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主泉州同安簿, 选邑秀民充弟子员, 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 禁女妇之为僧道者。罢归请祠, 监潭州南狱庙。明年, 以辅臣荐, 与徐度、吕广问、韩元吉同召, 以疾辞。

孝宗即位, 诏求直言, 熹上封事言:

圣躬虽未有过失, 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 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偏举, 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 亲御简策, 不过风诵文辞, 吟咏情性, 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 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 虚无寂灭, 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五之学, 必先格物致知, 以极夫事物之变, 使义理所存, 纤悉毕照, 则自然意诚

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次言：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岸之浅深，徐起而图之。

次言：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妖脏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隆兴元年，复召。入对，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且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时相汤思退方倡和议，除熹武学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职，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合，归。三年，陈俊卿、刘珙荐为樞密院编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艰。六年，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荐，与王庭珪同召，以未终丧辞。七年，既免丧，复召，以禄不及养辞。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辞。克家奏熹屡召不起，宜蒙褒录，执政俱称之，上曰：“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熹以求退得进，于义未安，再辞。淳

熙元年，始拜命。

二年，上欲奖用廉退，以厉风俗，龚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进，除秘书郎，力辞，且以手书遗茂良，言一时权倖。群小乘间谗毁，乃因熹再辞，即从其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军，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辞，不许，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讼事，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诏监司、郡守条其民间利病，遂上疏言：

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谏言，而安于私蛰之鄙能。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夫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穷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齷齪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论者，乃能略警逐共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正言以捋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

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

且云：“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上读之，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熹以疾请祠，不报。

陈俊卿以旧相守金陵，过阙入见，荐熹甚力，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乃除熹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旋录救荒之劳，除直秘阁，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辞。

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复以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纳粟赏行，遂受职名。入对，首陈灾异之由与修德任人之说，次言：“陛下即政之初，盖尝选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间不能尽得其人，是以不复广求贤哲，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褒使令之贱，始得以奉燕闲，备驱使，而宰相之权日轻。又虑其势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则时听外廷之论，将以阴察此辈之负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则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听士大夫之言，以为驾驭之术，则士大夫之进见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辟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其胥史狡狴之术又足以眩聪明。是以虽欲微抑此辈，而此辈之势日重，虽欲兼采公论，而士大夫之势日轻，重者既挟其重，以窃陛下之权，轻者又借力于所重，以为穷位固宠之计，日往月来，浸淫耗蚀，使陛下之德业日隳，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

灾异数见，饥谨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惟有陛下无所恃，而顾乃独受其弊。”上为动容。所奏凡七中，其一二事手书以防宣泄。

熹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凑。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憚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有短熹者，谓其疏于为政，上谓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熹以前后奏请多所见抑，幸而从者，率稽缓后时，蝗旱相仍，不胜忧愤，复奏言：“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责躬求言，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采之本，诏户部免征旧负，诏漕臣依条检放租税，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守臣之无状者，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庶几犹足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不然，臣恐所忧者不止于饥殍，而将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

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

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圭丞陈贾为

监察御史。贾面对，首论近日缙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考察其人，摈弃勿用。盖指熹也。十年，诏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既而连奉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点江西刑狱公事，以疾辞，不许，遂行。

十五年，淮罢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狱失当，狱官当择其人。次言经总制钱之病民，及江西诸州科罚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覆思之，无乃燕闲蠖获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故体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缪得以久窃廊庙之权。非不乐闻公议正论，而有时不容；非不_聖听谏说殄行，而未免误听；非不欲报复陵庙仇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爱养生灵财力，而未免叹息愁怨。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阂；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然，中外融澈，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见卿，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

时会輶已死，王抃亦逐，独内侍甘昇尚在，熹力以为言。上曰：“昇乃德寿所荐，谓其有才耳。”熹曰：“小人无才，安能动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尝与熹论《易》、《西铭》不合，劾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过。”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对。上曰：“朕亦见其跛曳。”左补阙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旧职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栗辨，谓其言无一实者，“谓之道学”一语，无实尤甚，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诏：“熹昨入对，所论皆新任职事，朕谅其诚，复从所请，可疾速之任。”会胡晋臣除侍御史，首论栗执拗不通，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辞免，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逾月再召，熹又辞。

始，熹尝以为口陈之说有所未尽，乞具封事以闻，至是投匭进封事曰：

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

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是以建师保之官，列谏诤之职，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基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

得以隐其毫发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穷言，久已不胜其籍籍，则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至于左右使嬖之私，恩遇过当，往者渊、覲、说、抃之徒势焰熏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面陈者，虽蒙圣慈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穷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臣闻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后，诸将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灵膏血以奉军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是皆将帅巧为名色，夺取其粮，肆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出入禁闼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为欺蔽，以至于此。而陛下不悟，反宠匿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

至于辅翼太子，则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官僚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闾冗庸妄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所谓讲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又无以防其戏慢嫖狎、奇褻杂进之害。宜讨论前典，置师傅、宾

客之官，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

至于选任大臣，则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直以一念之间，未能彻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择之际，常先排摈此等，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面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一流矣。

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则今日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正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胜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而加以矫激之罪。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昔时所谓元祐学术者，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后已。此岂治世之事哉？

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羨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以为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敌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协之。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薪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

至于不可为矣。

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尺寐，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熹力辞，除秘阁修择，奉外祠。

光宗即位，再辞职名，仍旧直宝文阁，降诏奖谕。居数月，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改知漳州。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释氏，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经界贫弱者以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州人也，其里党亦多以为不可行。布衣吴禹圭上书讼其扰人，诏且需后，有旨先行漳州经界。明年，以子丧请祠。

时史浩入见，请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熹再辞，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漳州经界竟报罢，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辞，主管南京鸿庆宫。未几，差知潭州，力辞。黄裳为嘉王府翊善，自以学不及熹，乞召为宫僚，王府直讲彭龟年亦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刚，恐到此不合，反为累耳。”熹方再辞，有旨：“长沙巨屏，得贤为重。”遂拜命。会洞獠扰属郡，熹遣人谕以祸福，皆降之。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

宁宗即位，赵汝愚首荐熹及陈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辞，除焕章阁待制、侍讲，辞，不许。入对，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绍丕图，可谓处之以权，而

庶几不失其正。自顷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窃为陛下忧之。犹有可诿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尝有求位之计，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此则所以行权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尝求位之心，以尽负罪引慝之诚，充未尝忘亲之心，以致温清定省之礼，而大伦正，大本立矣。”复面辞待制、侍讲，上手札：“卿经术渊源，正资劝讲，次对之职，勿复劳辞，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

会赵彦逾按视孝宗山陵，以为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孙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议，台史憚之，议中辍。熹竟上议状言：“寿皇圣德，衣冠之藏，当博访名山，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砾之中。”不报。时论者以为上未还大内，则名体不正而疑议生；金使且来，或有窥伺。有旨修葺旧东宫，为屋三数百间，欲徙居之。熹奏疏言：

此必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灾异数出，正当恐惧修省之时，不当兴此大役，以拂谴告警动之意；亦恐畿甸面姓铠饿流离、阡于死亡之际，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变。不惟无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进见之期，亦恐寿皇在殡，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戟然在忧苦之中，晨昏之养尤不可阙。而四方之人，但见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军万民之心将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鉴未远，甚可惧也。

又闻太上皇后惧忤太上皇帝圣意，不欲其闻太上之称，又不欲其闻内禅之说，此又虑之过者。殊不知若但

如此，而不为宛转方便，则父子之间，上怨怒而下忧恐，将何时而已。父子大伦，三纲所系，久而不图，亦将有借其名以造谤生事者，此又臣之所惧也。愿陛下明诏大臣，首罢修葺东宫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华之间，草创寝殿一二十间，使粗可居。若夫过宫之计，则臣又愿陛下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入宫之后，暂变服色，如唐肃宗之改服紫袍、执控马前者，以伸负罪引慝之诚，则太上皇帝虽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欢意浹洽矣。

至若朝廷之纪纲，则臣又愿陛下深诏左右，勿预朝政。其实有勋庸而所得褒赏未愜众论者，亦诏大臣公议其事，稽考令典，厚报其劳。而凡号令之弛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较量，勿循己见，酌取公论，奏而行之。有不当者，缴驳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习天下之事，而无所疑于得失之算矣。

若夫山陵之卜，则愿黜台史之说，别求草泽，以营新宫，使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而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

疏入不报，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讲编次成帙以进，上亦开怀容纳。

熹又奏勉上进德云：“愿陛下日用之间，以求放心为本，而于玩经观史，亲近儒学，益用力焉。数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进对，亦赐温颜，反覆询访，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长，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

理。”熹奏：“礼经敕令，子为父，嫡孙承重为祖父，皆斩衰三年，嫡子当为其父后，不能袭位执丧，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自汉文短丧，历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为父且然，则嫡孙承重可知。人纪废坏，三纲不明，千有余年，莫能厘正。寿皇圣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犹执通丧，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为万世法程。间者，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统，则承重之服著在礼律，所宜遵寿皇已行之法。一进仓卒，不及详议，遂用漆纱浅黄之服，不惟上违礼律，且使寿皇已行之礼举而复坠，臣窃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将来后殯发引，礼当复用初丧之服。”

会孝宗祔庙，议宗庙迭毁之制，孙逢吉、曾三复首请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袷祭则正东向之位。有旨集议：僖、顺、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归。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庙，治平间，议者以世数浸远，请迁僖祖于夹室。后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庙，与稷、契无异，请复其旧。时相赵汝愚雅不以复祀僖祖为然，侍从多从其说。吏部尚书郑侨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为藏之夹室，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神宗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举之而莫敢废者乎。又拟为《庙制》以辨，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庙堂不以闻，即毁撤僖、宣庙室，更创别庙以奉四祖。

始，宁宗之立，韩侂胄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忧其害政，数以为言，且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论之。会龟年出护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在讲筵复申言之。御

批云：“怜卿耆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汝愚袖御笔还上，且谏且拜。同侍王德谦径以御笔付熹，台谏争留，不可。楼钥、陈傅良旋封还录黄，修注官刘光祖、邓驸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辞。寻除知江陵府，辞，仍乞追还新旧职名，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初，赵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熹独惕然以侂冑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有“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语。汝愚方谓其易制，不以为意。及是，汝愚亦以诬逐，而朝廷大权悉归侂冑矣。

熹始以庙议自劾，不许，以疾再乞休致，诏：“辞职谢事，非朕优贤之意，依旧秘阁修撰。”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编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书属其子在及门人范念德、黄干，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簞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

自熹去国，侂冑势益张。何澹为中司，首论专门之学，文诈沽名，乞辨真伪。刘德秀仕长沙，不为张栻之徒所礼，及为谏官，首论留正引伪学之罪。《伪学》之称，盖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纁言：“比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望宣谕大臣，权住进拟。”遂召陈贾为兵部侍郎。未几，熹有夺职之命，刘三

杰以前御史论熹、汝遇、刘光祖、徐谊之徒，前日之伪党，至此又变而为逆党。即日除三杰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日急，选人余吉至上书乞斩熹。

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陈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孙也，与侂冑有姻连，劝侂冑勿为已甚，侂冑意亦渐悔。熹既没，将葬，言者谓：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

嘉泰初，学禁稍弛。二年，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后侂冑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始，熹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尝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听。”三人，谓胡宪、刘勉之、刘子翬也。故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尝学于罗从彦，熹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

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所著书有：

《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监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又有《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亦在学官。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十卷。

理宗绍定末，秘书郎李心传乞以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于从礼，不报，淳祐元年正月，上视学，手诏以周、张、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

黄干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识者以为知言。

熹子在，绍定中为吏部侍郎。

程大昌传

——《宋史》卷四三三

【说明】程大昌（1123—1195），字泰之，宋代徽州休宁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曾任吴县主簿、著作佐郎、国子司业兼礼部侍郎、浙东提点刑狱、江西转运副使、秘阁修撰、国子祭酒、权吏部尚书、泉州知府、明州知府等职，卒谥文简。程大昌笃好学问，对于古今之事都要考察研究。《演繁露》是他的一部笔记杂著，其内容广泛，涉及不少自然科学内容，其中对度量衡的考证，对色散现象的认识，对太阳和月亮的认识，对浑仪和浑象的区分，考证印书的起源、考证水车、玻璃的源流，及对龙门的解释等在中国科学史上都是较早和较重要的发现和认识。他的《禹贡论》是部地理学著作。

程大昌，字泰之，是徽州休宁人。他十岁就能撰写成篇文辞，绍兴二十一年登进士第。授吴县主簿，适逢他父亲故去，而未去上任，丧服除去后，他撰写了《十论》来讨论当时的国家大事，并把它奏献给朝廷，宰相汤思退看后称奇，提拔程大昌为太平州教授。第二年，调至京师任太学正，继而

参与选用馆职官的策试，因论述得当改任秘书省正字。

宋孝宗即皇帝位，程大昌迁升为著作佐郎。当时，孝宗皇帝刚刚临政，急于拓广功业，广向四方发布命令，贵臣和亲近们往往参与机密和决策。有一次，恰逢孝宗命令大小众官针对朝政得失和社会状况，提出意见，程大昌奏说：“汉代的石显知道汉元帝信任自己，就事先请求获得了夜间能开启皇宫之门的诏书。后来有一天，石显故意在夜晚归还，口称有诏书命令开启宫门，有人据此弹劾石显假托君命，汉元帝不但不重视这问题，还笑着拿出以前的诏书给人来看。自这以后，石显真的假托君命发布诏敕，人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朝颁布命令例行均由三省发出，就是为了防止此类弊病的。请求从今起凡是直接得到皇帝交办的诏令，都要送交三省审议，重行奏准，方可施行，这样才合乎祖宗的规章，才能防止象石显那样的奸诈。”此外，他还奏道：“去年，完颜亮入侵，没有一个将士拼死守卫，但是对将帅的策封授勋到现在也没有停止。应该重视的是，只有李宝在胶西的告捷，虞允文在采石的战胜，这两战才是打败完颜亮并最终促成其被杀的基础，可是现今李宝被免去兵权，虞允文也调知夔州，对比之下，前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就是公论所说的不平啊。”皇帝称是，将程大昌选拔为恭王府赞读，并升迁为国子司业兼权代理部侍郎、直学士院。皇帝询问程大昌道：“我掌握不好治国的原则，成效不大，怎么好？”程大昌对答道：“陛下治国的勤奋节俭超过了往古的帝王，自从女真与中原通和以后，已经知道尊敬中原了，不轻易南侵，这不能说没有成效。只要广求贤才，采纳忠谏，修明政事，那么陛下大有

作为的功业必在其中了，没有必要去另外求寻什么奇计异策，来侥幸迅速取得成功。”他又说道：“沿淮河上建筑的城池已经不少，更应考虑情势急迫的时候派什么人去守卫。设立险要还不如训练好兵卒，训练好兵卒还不如选择好将帅。”皇帝称是。

程大昌受任为浙东提点刑狱。遇到这年丰收，酒税超过了原来的额定总数，有人挟持朝廷的命令要求增加额定总数，程大昌坚决加以拒绝，说：“大昌宁可获罪免职，也不能增加酒税总额。”他又迁徙为江西转运副使，大昌说：“这可以直接去作兴有益的事，去除有弊的事，来实现我的志向了。”正遇这年歉收，程大昌从其原财政结余中，提出十多万缗钱，代吉、赣、临江、南安等地的百姓交纳夏税折帛。清江县原有破坑、桐塘两个堰坝，用来阻挡江水保护农田和人民的住房，面积几乎达到二千顷大，后来堰坝损坏，每年都要遭受水灾，已有四十年了，程大昌尽力主持领导，使之修复如初。

程大昌进为秘阁修撰，被召任为秘书少监，皇帝慰劳他说：“你是亲自选拔的。监司之内如果人人都象你一样，我还有什么忧愁呢？”接着又兼职中书舍人。六和塔寺的僧人自认为镇服潮水有功，请求皇帝须与奖赐，而且因而免除他们私买田地的课税和徭役的征调。大昌奏道：“寺庙买田业已违法，又要把他们应该提供的课税徭役转嫁给百姓，这怎么能允许它呢！况且自从修建六和塔以后，潮水果真不再侵蚀岸边了吗？”终于停止颁给这样的命令。程大昌暂代刑部侍郎之职，升侍讲兼国子祭酒。程大昌说道：“行使刑法是为了防止出现触犯刑法的事，没听说把放纵有罪的人当作施行仁政的。现

今四方各地审判定案都打算宽免死罪，我认为司法官吏应当遵守法律规定，皇帝认为可以宽免的再宽免。如果是这么作，那么法律在下面就能得到伸张实行，而爱人之德的仁都可归属于皇上了。”皇帝认为是这样的。又让他兼任给事中。江陵都统制率逢原纵容部下无理殴打百姓，湖北守帅辛弃疾据实向朝廷上书参劾，不但没有获准，反因此而被调任江西守帅。大昌为此上奏，极力论述处置不当，还指出：“如此下去，今后所有驻有屯田戍守将的州郡，都将无法管治了。由于大昌之言深切合理，率逢原终于被削掉两级官阶，而降为本军的副将。程大昌接连升迁，升至权吏部尚书。他说：“现在的军队里，原来西北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子孙中刚正健壮的，应当训教他们战阵打仗，不要轻意听任这些人离开军队。况且禁卫的将士，祖先不是只用他们来作宿卫的，南北征战，都曾用他们作为前锋。现今大约三年就要抽调补充外任，所用违背他们的长处，有了征战，就没有人可以挑选了。开始作为有武略的人才来选择的人怎能后来作为庸才常人使用呢？希望还是留住他们在三衙而不要派遣他们作它用吧。”

正值中央地方更迭官制，程大昌极力请求去外任，做州郡地方官，于是他出任泉州。汀州人沈师作乱反叛，有个城池的镇守军官姓萧的统领与之交战中阵亡，整个福建地区都为之惊恐震动，泉州告警，大昌急发军书，通过海道，约请距泉州较近之军队统制裴师武率兵讨伐增援，裴师武因为没有得到地区统帅军符而没有行动，程大昌亲笔写书信催促裴师武说：“事势急迫，如果守帅责问你，你可拿我的书信来解脱自己。”当时，贼寇谋划攻城，先派间谍穿甲衣准备放火作

为攻城的内应。正赶上裴师武的军队赶到，又捕捉到间谍，贼寇遂即溃散而去。程大昌迁为建宁知府。宋光宗继立嗣位，又徙调为明州知府，不久，又被任命为奉祠宫观之官，绍熙五年，程大昌告老辞官，作为龙图阁学士退休。庆元元年，程大昌亡故，终年七十三岁，被谥为文简。

程大昌笃好学问，对于古今事情没有不考察研究的。他有《禹贡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和《北边备对》等著作被刊行于世上。

（夏经林 译）

【原文】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人。十岁能属文，登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主吴县簿，未上，丁父忧。服除，著《十论》言当世事，献于朝，宰相汤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为太学正，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

孝宗即位，迁著作佐郎。当是时，帝初政，锐意事功，命令四出，贵近或预密议。会诏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汉石显知元帝信己，先请夜开宫门之诏。他日，故夜还，称诏启关，或言矫制，帝笑以前诏示之。自是显真矫制，人不复言。国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请自今被御前直降文书，皆申省省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规，以防石显之奸。”又言：“去岁完颜亮入寇，无一士死守，而兵将至今策勋未已。惟李宝捷胶西，虞允文战采石，实屠亮之阶。今宝罢兵，允文守夔，此公论所谓不平也。”帝称善，选为恭王府赞读。迁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帝问大昌曰：“朕治道不讲，奈何？”大昌对曰：“陛下勤俭过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国，不

可谓无效。但当求贤纳谏，修政事，则大有为之业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筑城太多，缓急何人可守。设险莫如练卒，练卒莫如择将。”帝称善。

除浙东提点刑狱。会岁丰，酒税逾额，有挟朝命请增额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宁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转运副使，大昌曰：“可以兴利去害，行吾志矣。”会岁歉，出钱十余万缗，代输吉、赣、临江、南安夏税折帛。清江县旧有破坑、桐塘二堰，以捍江护田及民居，地几二千顷，后堰坏，岁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复其旧。

进秘阁修撰，召为秘书少监，帝劳之曰：“卿，朕所简记。监司若人人如卿，朕何忧？”兼中书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镇潮为功，求内降人赐所置田产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违法置田，又移科徭于民，奈何许之！况自修塔之后，潮果不齿岸乎？”寝其命。权刑部侍郎，升侍讲兼国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辟，未闻纵有罪为仁也。今四方谳狱例拟贷死，臣谓有司当守法，人主察其可贷则贷之。如此，则法伸乎下，仁归乎上矣。”帝以为然。兼给事中。江陵都统制率逢原纵部曲欧百姓，守帅辛弃疾以言状徙帅江西。大昌因极论“自此屯戍州郡，不可为矣！”逢原由是坐削两官，降本军副将。累迁权吏部尚书。言：“今日诸军，西北旧人少，其子孙伉健者，当教之战阵，不宜轻听离军。且禁卫之士，祖宗非独以备宿卫而已，南征北伐，是尝为先锋。今率三年辄补外，用违其长，即有征行，无人在选。奈何始以材武择之，而终以庸常弃之乎？愿留三衙勿遣。”

会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请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贼沈师

作乱，戍将萧统领与战死，闽部大震。漕檄统制裴师武讨之。师武以未得帅符不行，大昌手书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帅责君，可持吾书自解。”当是时，贼谋攻城，而先使谍衷甲纵火为内应。会师武军至，复得谍者，贼遂散去。迁知建宁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寻奉祠。绍熙五年，请老，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庆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

大昌笃学，于古今靡不考究。有《禹贡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北边备对》行于世。

陆九龄传

——《宋史》卷四三四

【说明】陆九龄（1132—1180），南宋学者，字子寿，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陆九龄从小聪颖持重，敏而好学。少年时代因不满郡里所办学校的讲授内容，辞学回家，师从其父兄的教导。此后陆九龄读书更加勤奋，不仅博览诸子百家经典，而且钻研阴阳五行之道，对星象历术、占筮卜卦之说无不通晓。可惜他在天文历算方面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著述，因此，在清代阮元等编著的《畴人传》中未见对他的事绩的记载。陆九龄乾道五年（1169年）中进士，后曾任兴国军教授。当时的学者称其为复斋先生，著有《复斋文集》，与其弟陆九渊并称为“二陆”。淳熙七年（1180年），在家中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宝庆二年（1226年）受赐封号“文达”。

陆九龄，字子寿。他的八代先祖父陆希声曾任唐朝昭宗时期的丞相，陆希声的孙子陆德迁因躲避战乱，于五代末年迁居杭州的金溪。陆九龄的父亲叫陆贺，他以自己学识和品行的高尚而受到乡里人的尊敬和推崇，曾经在自己家族中采用司马光《家范》中所宣扬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仪

式，共生下六个儿子，陆九龄排行第五。陆九龄自幼聪颖，领悟力强且举止稳重，十岁时生母去世，他表现的悲痛之情犹如成人一般。年龄稍大一些时，被递补为郡里所办学堂的学员。

当时正逢秦桧当朝，学堂内外很少有宣传程氏理学的学者，而陆九龄却独尊程氏之学。时间长了，听说新博士学习黄老的道家学说，不传授儒家的礼教，很是感慨地叹息道：“这并不是我希望学习的东西。”于是辍学回家，跟随其父兄读书，更加勤勉努力。就在此时，朝廷中颇有名气的吏部员外郎许忻辞职回乡定居临川，许忻很少引接宾客，初次接见陆九龄，与之交谈，非常高兴，于是便将他所了解的当时的书籍文献尽数告知陆九龄。从此之后，陆九龄愈加刻苦钻研学问，常常翻阅诸子百家经典，昼夜不倦，终于精通阴阳五行、星象卜筮、天文历术等各种学说。

陆九龄的性格比较稳重踏实，做事读书不肯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进入太学之后，司业汪应辰推举他为协助博士教学、执行学规的学录。乾道五年中进士。此后，调陆九龄任桂阳军教授，他因离父母太远之故而改任兴国军教授，未及上任，正逢湖南的茶寇抢劫庐陵，风声传来，各周围郡县人心惶惶。过去地方上有义社这样的团体，用来防备盗匪的骚扰，郡里的百姓请求陆九龄出面主持当地的义社，他的家人与随从多数不希望他承担此事。陆九龄对他们说：“文事武备，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古代如遇有征战对伐之事，王公大臣便是领军的将帅，乡里数十户人家的统领，不过是一个非常小的长官，如果仁人志士耻于担当此任，那么这样的位置就要被那些专

横霸道的人占据了。”于是欣然接受组织义社的事情，指挥调度各屯防御颇有章法。盗匪虽然未来，但郡县上下仍对此非常重视。闲暇之时，陆九龄便与乡里的子弟练习射箭，他说：“这才是男人要做的事。”年成不好时，有打家劫舍的路过陆家时，旁人都告诫说：“这一家主人箭术高超，你们不要自取灭亡。”

待到兴国军赴任，这里滨临大江，民风俭朴节约但很少讲求学问。陆九龄没有因为公务累闲而自我放纵，而是更加行止严谨、衣著整洁，仿佛置身正式的公众场合一般。他规劝大家互相鼓励学习知识，于是读书之风气逐渐兴起。在兴国军任职不足一年，因继母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之后，调至全州任教授。未及赴任，身患疾病。一日早起，坐在床上同来访客人交谈，言事间仍然关心天底下人才与学术之事。待到晚上，衣装整齐安然仰卧而逝，享年四十九岁。宝庆二年，朝廷特别追任朝奉郎、直秘阁，并赐封号“文达”。

陆九龄曾继承其父的志向，勤奋学习礼教，治理家事有条有理。全家上下近百口人，领班家佣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家室内部女眷的章法，宛若朝廷内宫一样严谨规矩。而陆九龄为人之忠敬、和乐、平易，成为大家效仿之楷模，乡里人都恭顺谦让尊敬兄长。九龄与九渊互相为师友，和好但却不同，当时学者称其为“二陆”。凡是有来请教学问的人，陆九龄通常淳淳启发、从容相告，使求学者人人有所得而归。对有些人如果不便讲授，则对其所问一言不发。陆九龄曾说：“人们的疑惑有些是难以言传所能争辩得清楚的，话说得鲜明，固然能表达其意；但少说一点，点到即止，听话的人未

必不能够从其中自己揣悟明白。”（曲安京 译）

【原文】

陆九龄，字子寿。八世祖希声，相唐昭宗。孙协迁，五代末避乱居抚州之金溪。父贺，以学行为里人所宗，尝采司马氏冠昏丧祭仪行于家。生六子，九龄其第五子也。幼颖悟端重，十岁丧母，哀毁如成人。稍长，补郡学弟子员。

时秦桧当国，无道程氏学者，九龄独尊其说。久之，闻新博士学黄、老，不事礼法，慨然叹曰：“此非吾所愿学也。”遂归家，从父兄讲学益力。是时，吏部员外郎许忻有名中朝，退居临川，少年宾接，一见九龄，与语大说，尽以当代文献告之。自是九龄益大肆力于学，翻阅百家，昼夜不倦，悉通阴阳、星历、五行、卜筮之说。

性周谨，不肯苟简涉猎。入太学，司业汪应辰举为学录。登乾道五年进士第。调桂阳军教授，以亲老道远，改兴国军。未上，会湖南茶寇剽庐陵，声摇旁郡，人心震摄。旧有义社以备寇，郡从众请以九龄主之，门人多不悦，九龄曰：“文事武备，一也。古者有征讨，公卿即为将帅，比闾之长，则五两之率也。士而耻此，则豪侠武断者专之矣。”遂领其事，调度屯御皆有法。寇虽不至，而郡县倚以为重。暇则与乡之子弟习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岁恶，有剽劫者过其门，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无自取死。”

及至兴国，地滨大江，俗俭墙而鲜知学。九龄不以职闲自佚，益严规矩，肃衣冠，如临大众，劝绥引翼，士类兴起。不满岁，以继母忧去。服除，调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兴，坐床上与客语，犹以天下学术人才为念。至夕，整

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宝庆二年，特赠朝奉郎、直秘阁，赐谥文达。

九龄尝继其父志，益修礼学，治家有法。阖门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职，闺门之内严若朝廷。而忠敬乐易，乡人化之，皆逊弟焉。与弟九渊相为师友，和而不同，学者号“二陆”。有来问学者，九龄从容启告，人人自得。或未可与语，则不发。尝曰：“人之惑有难以口舌争者，言之激，适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

陆九渊传

——《宋史》卷四三四

【说明】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宋江西抚州金溪县人。三十四岁考中进士，历任县主簿、国子正、敕令所删定官、荆门军知军等。曾一度夺贵溪县的象山居住讲学，自号象山居士，后世称象山先生。著有《象山先生全集》。

陆九渊是理学内部与主流派即程朱学派相对立的陆王学派（又称“心学”派）的创始人。他曾提出“心即理”的著名命题，认为“理”不必到心外去寻求，朱熹的“格物穷理”是支离破碎的办法，而自己的“存心”、“养心”、“发明本心”的方法才是“简易直截”的工夫。1175年（淳熙二年）他应吕祖谦之约到信州鹅湖寺与朱熹会讲时会做诗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

陆九渊著作不多，对其论旨的阐述也不够周密详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远敌不过程朱学派的影响。直到明代王阳明才进一步阐发和推进他的学说，加上他在当时的地位与名声等条件，才使陆王之学一度成为与朱学相颉颃的“显学”。

陆九渊，字子静。生下来才三四岁，问他父亲天地的边际在哪里，父亲只是笑而不答复，便深深思索，到了忘记睡觉吃饭的地步。到把头发梳成两个抓髻的年纪，举止不同于一般小孩，见到他的人都尊敬他。对人说：“听到人复述伊川（程颐）的话，自己感觉像是伤害我。”又说：“伊川的话，为什么和孔子、孟子的话不相似？近来看到其中有许多不对的地方。”初次读《论语》，就怀疑有子的话支离破碎抓不住根本。后来读古书，到“宇宙”两个字，解释的人说“四方上下叫做宇，古往今来叫做宙”，忽然大有省悟说：“宇宙内的事是自己分内的事，自己分内的事是宇宙内的事。”又曾说：“东海有圣人出来，这颗心是相同的，这个理是相同的。到西海、南海、北海都有圣人出来，也无不如此。千百世之前有圣人出来，这颗心是相同的，这个理是相同的。到了千百世之后有圣人出来，这颗心这个理，也没有什么不同。”

后来考上乾道八年的进士名次。到了行都，士子们争着跟随他游学。言谈议论都感动和启发人，听到的人因而能振奋起来的很多。教育学生时不设立烦琐的学规，有小过失的，批评时能说中他的真实动机，有的人甚至惭愧得流汗；有动机藏在心里而自己不能意识到的，替他逐条分析其原因，都能符合他的本心。也有相隔千里的人，只听到过他的大致情况，却能晓得他的为人如何。曾经说：“意念不端正的，顷刻之间意识到了，便可以端正。意念端正的，顷刻之间丧失掉了，就成为不端正。有的人可以从外在表现去观察，有的人则不可以。专从外在表现去观察人，就不足以了解人。一定要从外在表现去要求别人，就不足以救正别人的缺点错误。”

起初被调任隆兴府靖安县主簿，遭母亲的丧事回了家。服完丧，改任建宁府崇安县主簿。由于少师史浩的推荐，召去接受审查，不去。侍从大臣又推荐，任命为国子正，教育国子监学生和在家时教育学生没什么两样。任命为敕令所删定官。

陈九渊少年时就听说过靖康年间的事，深深受到复仇思想的感染。到这时，访求和结识了勇士，与他们商议恢复故土的宏图大略。因参与轮流答对，就向皇帝陈述了五点议论：第一论述仇恨与耻辱还没有报复和洗刷，希望广泛访求天下的豪杰之士，一起来振兴研究道术、治理国家的事业；第二论述希望皇帝竭尽崇尚德性、喜爱道义的诚意；第三论述知人善任的不容易；第四论述事情应当逐步办到而不能要求一步办好；第五论述君主不应当亲自去做琐细的事。皇帝称赞他说得好。没多久，任命为将作监丞，被给事中王信所驳回，就下诏让他主管台州的崇道观。回到家乡，学生从四面八方聚集，每次开办讲席，门外堆满了鞋子，老年人也扶着拐杖来看和听。自称是象山翁，而学生称他象山先生。曾对学生说：“你的耳朵自然尖，眼睛自然亮，事奉父亲自然能孝，事奉兄长自然能悌，本来没什么欠缺，不必到其它地方去寻求，在于能够自立罢了。”又说：“这个道理跟沉溺在利益欲望中的人讲还容易，跟沉溺在先入之见中的人讲却困难。”有人劝陆九渊著书，回答说：“《六经》注解我，我注解《六经》。”又说：“学问上如果懂得了道，《六经》都是我的注解。”

光宗就皇帝位，差遣他当荆门军的知军。百姓有控告的，不论早晚都可以到他衙门的大庭上去，又让他们自己拿着状纸去催促被告，给他们订立期限，双方都按照期限到庭，就

替他们酌情判决，而对双方多加规劝调解。案情有涉及亲属关系的，让控方自己烧掉控告状，以使人情风俗变得淳厚。只有不堪教育的人，才绳之以法。其所辖区域内官吏的贪污廉洁，百姓风俗的习尚好坏，都事先知道。有控告某人杀了自己儿子的，陆九渊说：“此人不会坏到这样。”等到追查清楚，这人的儿子果然安然无恙。有人控告被盗窃却不知是谁干的，陆九渊点出两个人的姓名，派人抓来，一审讯便承认有罪，全部追回所盗窃的东西还给控告人，而且赦免这两人的罪过让他们改过自新。顺便对手下人说起某地某人常做恶事，第二天有控告遇到抢劫的，正是那个人，便加以追究，手下人大为吃惊，当地人把他看做神仙。反复讲明和严格实行把居民按五户为伍、十伍为保组织起来的办法，盗贼如有发生，抓起来一个也跑不掉，盗贼们便不敢活动。

荆门是接近边界的地方而没有城墙。陆九渊认为：“荆门处在长江、汉水的中间，是四面集中的地方，南面捍卫着江陵，北面可以支援襄阳，东面保护着随州、郢州的侧翼，西面正当光化、夷陵的要冲，荆门巩固四邻就有所依靠，否则就有后翼、侧翼和中心不可靠的忧虑。敌人由唐州的湖阳而走向大山，他们渡过汉水的地方就已经到了荆门的侧翼；由邓州的邓城而渡过汉水，他们走向大山的地方已经到了荆门的腹地。除此之外，小道可以跑马的，汉水的渡口可以涉过的，缓山坡不足以限制马队的，沙石淤积的浅滩不足以渍湿车轴的，到处还很多。但如从我方主动出奇制胜，以求威胁敌军的腹心与侧翼的，也正在这里。这里虽然四面有大山环绕合抱，容易防御，然而城墙与护城河都没有，又将依靠什

么固守？”于是请求到朝廷的允许而修筑了城池，从此百姓消除了对边界的忧虑。取消关卡和市场上官吏的盘问检查而减低百姓的赋税，商人都汇集到本地，税收一天天增加。当地旧时使用铜钱，因它接近边界，就用铁钱来代替，而对铜钱的流通有禁令，但又让百姓交纳铜钱。陆九渊说：“既然禁止用它了，又叫百姓交纳吗？”于是全部免除。老规矩，平时训练士兵射箭，当地百姓可以参加，射中的都有奖赏；推荐自己的下级可以不限定资格的高低。陆九渊曾说：“古代没有资格高低的区分，然而贤与不贤的区别很严格；后世有资格高低的区分，然而贤与不贤的区别很马虎。”每逢旱灾，祷告就下雨，当地人很惊奇。过了一年，政策贯彻法令清明，百姓风俗为之变好，各方面的长官交相推荐。丞相周必大曾称赞荆门的政绩，认为这是陆九渊亲自带头修养德行的效果。

一天，对所亲近的人说：“担任过教授的先兄（陆九龄）有志参预天下大事，终于未能施展才能就去世了。”又对家里人说：“我快死了。”又告诉僚属说：“陆某将会告终。”正逢祈祷下雪，第二天，下了雪。于是洗澡换衣服端正地坐着，两天后的正午便死了。参加会葬的人以千计，谥号叫文安。

起初，陆九渊曾和朱熹在鹅湖相会，就各自所持的学术见解进行辩论，意见大多不合。到朱熹担任南康军知军时，陆九渊去拜访他，朱熹同他一起到白鹿洞书院，陆九渊给大家讲解了《论语》中“君子只懂得利，小人只懂得义”这一章，听的人甚至有流下眼泪的。朱熹认为他的话准确说中了学者们身上不明显但深重顽固的毛病。至于关于“无极而太极”的辩论，就彼此书信往来辩论个不停了。门人杨简、袁燮、舒

璘、沈焕都能够传播他的学说。

(陈金生 译)

【原文】

陆九渊，字子静。生三四岁，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寝食。及总角，举止异凡儿，见者敬之。谓人曰：“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初读《论语》，即疑有子之言支离。他日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尝曰：“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

后登乾道八年进士第。至行在，士争从之游。言论感发，闻而兴起者甚众。教人不用学规，有小过，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闻其大概，而得其为人。尝曰：“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有可以形迹观者，有不可。以形迹观人，则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绳人，则不足以救之。”初调隆兴靖安县主簿。丁母忧。服痊，改建宁崇安县。以少师史浩荐，召审察，不赴。侍从复荐，除国子正，教诸生无异在家时。除敕令所删定官。

九渊少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至是，访知勇士，与议恢复大略。因轮对，遂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

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帝称善。未几，除将作监丞，为给事中王信所驳，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还乡，学者辐凑，每天讲席，户外屦满，耆老扶杖观听。自号象山翁，学者称象山先生。尝谓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或劝九渊著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光宗即位，差知荆门军。民有诉者，无早暮皆得造于庭，复令其自持状以追，为立期，皆如约而至，即为酌情决之，而多所劝释。其有涉人伦者，使自毁其状，以厚风俗。唯不可训者，始置之法。其境内官吏之贪廉，民俗之习尚善恶，皆素知之。有诉人杀其子者，九渊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无恙。有诉窃取而不知其人，九渊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讯之伏辜，尽得所窃物还诉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语吏以某所某人为暴，翌日有诉遇夺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惊，郡人以为神。申严保伍之法，盗贼或发，擒之不一人，群盗屏息。

荆门为次边而无城。九渊以为：“郡居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阳，东护随、郢之胁，西当光化、夷陵之冲，荆门固则四邻有所恃，否则有背胁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阳以趋山，则其涉汉之处已在荆门之胁；由邓之邓城以涉汉，则其趋山之处已在荆门之腹。自此以外，间道之可驰，汉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马，滩濞不能以濡轨者，所

在尚多。自我出奇制胜，徼敌兵之腹胁者，亦正在此。虽四山环合，易于备御，而城池阒然，将谁与守？”乃请于朝而城之，自是民无边忧。罢关市吏讥察而减民税，商贾毕集，税入日增。旧用铜钱，以其近边，以铁钱易之，而铜有禁，复令贴纳。九渊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输邪？”尽蠲之。故事，平时教军伍射，郡民得与，中者均赏；荐其属不限流品。尝曰：“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略。”每旱，祷即雨，郡人异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为变，诸司交荐。丞相周必大尝称荆门之政，以为躬行之效。

一日，语所亲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又谓家人曰：“吾将死矣。”又告僚属曰：“某将告终。”会祷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后二日日中而卒。会葬者以千数，谥文安。

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辨所学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太极”之辨，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门下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传其学云。

胡安国传

——《宋史》卷四三五

【说明】胡安国（1074—1138）宋代著名经学家，他所撰《春秋传》称于后代，被定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定本，对后世影响很大。胡安国在宋朝凡历官四十年，实际在位不及六年，他为人正直，讲求道德、学问、不趋炎附世，敢于直谏，是典型的儒学家。他学术上与二程相近，在《春秋传》中阐发了他的理学思想，尤其是封建纲常道德学说。本篇内容较为详实。《宋元学案》等史传大都尊此。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进入大学，拜程颐的朋友朱长文以及颖川靳裁之为老师。裁之和他讨论经史大意，非常惊奇并器重，三次参加礼部考试，中了绍圣四年进士。开始，朝廷考试官确定他的对策为第一，主持者因为他没有诋毁元佑的话，就把何昌言排为第一，方天若第二，又想让宰相章惇儿子排在天若后面，当时打开对策大要是恢复熙宁、元丰的体制，安国推明《大学》，并因慢慢恢复至上古三代作为回答。哲宗让他再读，注意听并几次说好，亲自提升为第三，做太学博士，足不踏进当权者之门。

提举湖南学事，有诏书举荐遗逸之人，安国推荐永州布衣王绘、邓璋应诏。二人年老不出行，安国请求封官，用来劝勉做学问的人。零陵主簿说两人的同党范纯仁客居，于是流人邹浩所请求依托。蔡京平常厌恶胡安国和自己相异，得到主簿的话很高兴，命令湖南提刑设置监狱追查此事，又移送湖北再次审查，最终无法验证，而安国却被除名。没过多久，主簿因为其他罪过犯法，御史台官员论述以前的事，恢复安国原官。

政和元年，张商英为宰相，担任提举成都学校之事。二年，碰上父亲丧故，迁到江东，父亲死后除去丧服，对学生们说：“我过去为父母亲而做官，现在虽然有俸禄万钟又有什么用？”于是称病不为官，在坟墓边筑房，耕田种地自己供给，大概想终其一生了。宣和末年，李弥大、吴敏、谭世勳一起推荐，封屯田郎、辞职。

靖康元年，拜太常少卿，辞职；又拜起居郎，又辞职，朝廷命令赶快赴任，到京师，以疾病为告。一天正中午，钦宗急忙召见，安国上奏说：“圣明君王应当以求学问为当务之急，圣学则以端正心性为首要。心是万物的根本，端正心性是揣测事物主宰万事的根本。希望选拔知名儒生懂得治理天下根本的，虚心咨询访问，真正发表他们的独到智慧。”又说：“治理天下国家一定要有一定不可变易的计策，计谋商议既然确定，君王和臣子固守，所以有志向的一定会成功，治世之功可以建立。现在登位称皇已经半年了，但纲纪还很混乱，风俗更加衰坏，办事处置更加失措，大臣互相争斗，那么结朋为党的祸乱就萌芽了；众官互相窥探，那么苟且偷安的坏事

就会发作；使用人失当，那么国家名器更加轻、发布的命令多次变更，人民就不相信。假若不扫除旧的痕迹，乘势更换，我担心大势一倒，不可能再正了，请求咨访大臣，都让他们各自展开自己的底细、计谋一块呈上。首先张示御史台谏官，让他们根据事情上疏驳斥。假若大臣们的议论笨拙，那就参考使用御史台谏官的言论；假若上疏驳斥不恰当，那么就专门信守大臣的计策，仍然集合在朝廷议论，决断则由皇上内心做出。作为国家之论，按次实施奉行。敢有动摇的，一定惩罚不赦免。这样差不多新的政局有了依靠，可以希望中兴了。”钦宗说：“近日留下来用话相接待，已经下命召你试行了。”语没说完，下午很热，汗沾满了上衣，于是退下。

当时门下侍郎耿南仲依靠攀附恩幸，凡是和自己不相合的，就指责为朋党之人，见安国上奏，发怒说：“中兴这样了，却说成绩没有体现，这是诽谤圣上之德。”于是说安国窥视讲经之席，不适宜于下召应试。钦宗不回答。安国多次辞退，南仲又说安国不臣服，钦宗问具体情况，南仲说：“从前不事奉上皇，现在不事奉陛下。”钦宗说：“他自己是以病辞职，开始并没有不臣的意思。”每次群臣对答，钦宗就询问认识胡安国不，中丞许翰说：“自从蔡京得到政权，士大夫没有不受他宠络的，超然处世、远远离开不被他所污染的象胡安国一样的很少。”钦宗叹息，派中书舍人晁说之宣布圣旨，让他勉强接受赐命，并且说：“以后想离开，就不勉强挽留。”既试，拜官中书舍人，赏赐三品服，南仲暗地里让御史台谏官评论他不尊敬皇命，应该削职免官，上疏没有发下，安国于是到任为官。

南仲既然倾倒了宰相，枢密使李纲，又说许景衡、晁说之对待大臣的升降为去职离职！心怀奸诈，都一起废黜。安国说：“二人为去职离职，一定有所陈述表达，怀抱奸私之心，一定有可靠事迹。请降旨交给本省，登载他们的文辞。”没有回答。

叶梦得为应天府知府，因为被蔡京所赏识了解。丢官奉祠。安国说：“蔡京的罪已反正了，子孙被编户处置、家产被没收，已经没有蔡氏了。那么一起为蔡京引荐的，现在都是朝廷中人，假若指为蔡京之党，那么人才被抛弃的很多了，结党之论什么时候可以平息。”于是拜梦得为小郡官。

中书侍郎何栗建议分天下做四道，设置四人都总督，各交给一方，用来保卫王室，捍卫强敌。安国说：“内外的形势，平衡就安定，偏重就危险。现在州郡大轻，按理应该变化。一旦因为二十三路的广阔，分为四道，事情都要专门处置，财产都要专门使用，官吏都要征行安排，士兵都要奖赏处罚，权力担心太重，万人互相对抗争气，用什么去对付？请根据现在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交给都总管的权力，专门治理军队。即使有紧急情况，就各自率领所率守将响应支援，那么一举两得了。”不久用赵野领北道。安国说魏都地势重要，赵野一定有误重任。这年冬天，金人大举入侵，赵野逃走，被盗贼所杀，西道王栻拥有众兵不再照应北方，象安国所说一样。

李纲罢职，中书舍人刘珪写文告，称李纲勇敢报国，多次失败。吏部侍郎冯澥说刘珪替李纲游说，刘珪因此被贬。安国封上退还文告认为“侍从虽然应当献言纳谏，而至于弹劾

官吏一定要归顺风俗。现在御史台谏议没有闭口不说的错误，而冯澥超越职权，这条路一开我担心在朝廷中的人各自根据自己的爱憎来进行诬陷倾轧，不是用来安靖朝廷之法。”耿南仲大怒，何栗跟着排挤他，下诏交给郡县。何栗认为安国平常患有脚病，而海门地方低下潮湿，于是拜安国为左文殿修撰，主管通州。

安国在省一个月，大多为告讼之日，等到出巡一定有所判断裁决。有的说：“事情中小的，为何不放下？”安国说：“事情中的大事没有不是起于小事的，现在借口小事不必讲，成了大事又不敢说，是没有时间可以讲了。”

安国已经离开，过了十天，金人逼近都城，儿子胡寅在城中做郎官，客人有的担心，安国凄惨地说：“皇帝在重围之中，号令不发布，卿大夫痛恨，效忠没有路子，怎么敢想念儿子？”敌人围城更急，钦宗急召安国和许景衡，诏书竟然没送到。

高宗即位，用给事中的名义召见，安国说：“过去因为收缴奏折，独独触坏了当权贵臣，现在陛下想要建设中兴之世，但政事废弛，人才升降，都没有安排合理，我假若一一地奉行职守，一定会有胡妄地做法，再触犯典制刑法。”黄潜善讽喻给事中康执权论述他以前的旧过，罢免了他。三年，枢密张浚推荐安国可以大用，再次拜为给事中，赏赐他的儿子起居郎胡寅手札，让他根据意思催促，既然停在池州，听到皇帝到了吴、越，称病而回。

绍兴元年，拜官中书舍人兼侍讲，派使者急忙召见，安国拿《对政论》二十一篇首先献上。政论献入，再拜官给事

中。二年七月再进入对，高宗说：“听到你的大名，渴望着见到你，为什么多次下诏书却不来？”安国推辞道歉：“请按所进的二十一篇具体实施。他论述的是：《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老》、《正心》、《养气》、《宏度》、《宽隐》。论述《定计》大致说：陛下登位六年，用来建立都城，却没有一定守住不移动的地方；用来讨伐敌人，却没有一定胜利不变的办法；用来建立政制，却没有一定实行不改变的命令；用来任命官吏，却没有很可信不怀疑的臣子。舍弃今天不考虑，后悔来不及了。”论述《建都》说：“应该定都建康来与关中、河内相比，作为复兴的基地。”论述《设险》说：“想固守上游，一定要保全汉水、沔水。想要巩固下游，一定要守住淮河、泗水，想要巩固中游，一定要用重兵守住安陆。”论述《尚志》说：“一定要立志恢复中原，敬奉祖先陵园；一定要首先扫平敌人，迎回两宫。”论《正心》说：“平定祸害叛乱，虽急于战事，却裁定战争，一定要有一定方寸，希望选拔正直的臣子又多见识，有志向谋虑、敢于直言不讳，安排在身边，从早到晚讨论，用来安定心神。”论《养气》说：“用兵的胜和负，军队的强和弱，将帅的勇敢与胆怯，关系在于君王所养之气曲直如何。希望强于为善的，增益他的品德，让他尊信于华夏，闻名于春秋之地，没有曲事可以平议，那么最为刚直的可以堵住两边，一发怒可以安定天下了。”安国曾经说：“即使诸葛亮复生，为今天计谋，不能改变这个论述。”

过了十多天，再次拜见皇上，因为疾病恳切地请求离去。高宗说：“听说你对《春秋》有很深的研究，正想要讲述。”于

是把《左氏传》交给胡安国断句正音，安国上奏说：“《春秋》是经世大典，见诸具体事情，不是空说可以相比的。现在正想救世济难，《左氏》很繁杂，不太适宜空费时光，耽玩文辞丽采，不如深入用心圣经。”高宗说很好，不久拜安国兼侍读，专门讲《春秋》，当时讲官四个八，按贯例多人专守一经。高宗说：“他人通经术，怎能和胡安相比？”不同意。

赶上拜前宰相朱胜非一起都督江、淮、荆几州军事，安国上奏说：“胜非和黄潜善、汪伯彦一起在朝廷，沉默附和牵合，招致了渡江；尊用张邦昌结交好金国，大失三纲，天下愤恨忧郁；等到冢司正位，苗、刘大肆为逆，贪生怕死，苟且偷安，不幸君王被捕。现在强大的敌人压境，叛乱之臣无所顾忌，用人的得与失，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深深地担忧胜非会有误国家大计。”胜非改任侍读，安国拿着禄黄不下，左相吕颐浩特别命令检正黄龟年书写。安国说：“有官位的人，不能尽职就离开。”我现在待罪没有什么作用，既然已经失职，离开是比较开明之举。更何况胜非是我所论列过的人，现在朝廷仍然赞称胜非处理苗、刘的变故，能调养护理皇上身体。从前公羊氏说祭仲废除君王代替行权，先代儒士极力议其不对。大概随时废置并不能用在君王身上。《春秋》大法，仍然如此严谨。建炎之所以有失节之事，现在虽然特赦但仍有不同，又加以选拔提升，习俗既已养成，大大的不利于君王。我用《春秋》进入侍讲，而非议胜非所列官位，与经典训成义有违。”于是躺在家里不出。

开始，颐浩都督江上回朝，想排斥与自己相异的，没有想出办法，有人教他指斥为朋党，并且说：“朋党之斗在宫中，

应当首先赶走。”顾浩很高兴，就拿胜非作为助手，并降旨说：“胡安国多次下诏闭门不出，现在才来朝廷，又有几次请求。开始说胜非不可一块都督，等到改任为经学讲师，又认为错了，难道不是因为时世艰难而不肯出力，是求一点小错而离开？他这样自己打算尚好，但对国家怎样？”削职提举仙都观。这一年，彗星出现在东南，右相秦桧三次上书请求留下来，不上报，就解除相印回去。侍御史江齐上书，多次说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应受责。右司谏吴表臣也说安国带着病拜见君王，想实施他听学的，现在无缘无故获罪而去，恐怕不是昭示天下之举。不上报，顾浩就废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以及跻等二十多人，说响应上天除旧变新的气象，御史台督省一下变空了，胜非于是为宰相，安国竟然归老。

五年，拜徽猷阁待制、永州知州，安国推辞。下诏用讲经席的旧官，重重的照顾慰劳特意听从他的请求，提举江州太平观，让他编纂所写的《春秋传》。

书写成以后，高宗说深得圣人的意旨，署官万寿观提举兼侍读，没有赴任，谏官陈公辅上书诋毁假托程颐之学的学者，安国上奏说：“孔孟的道义没有传布很久了，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发昌明它，然后才知道孔孟之道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现在让学者师法孔孟，却禁止不应该跟从程颐学习。这是要进入房间都不从门进。本朝自从嘉佑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和他的弟弟程颐，关中有张载，都以道德之著称于世，公卿大夫很钦敬仰慕并师从尊重他们。赶上王安石、蔡京等人弯曲并加以排斥，所以他们之道不能实行。希望交给礼官讨论旧事，加给他们封典爵位，和荀卿、杨雄、韩愈相同，并

下诏馆阁表彰他们的遗书，校正刊行；让邪说不能兴起。”奏疏呈上，公辅和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揣揆度宰相的学术风向、著文论说，胡安国的学术很僻颇。拜官永州知州，辞职，再为太平观提举、进升为宝文阁直学士，逝世，享年六十五。下诏赠追回官称，又下诏加以抚恤，赏赐田四十顷抚恤他的儿女，谥号为文定，大概是很特别的事。

安国勤奋学习切实奉行，把圣人作为目标，立志于救济时代艰难。看到中原沦陷，沦陷的民众被迫害，经常象自己身经痛苦一样，虽然多次因为落罪离职，他爱君忧国的心越远越坚。每次有君王之令，就把家事放开不管。而且风度超迈，越出尘俗，对天下万事万物没有一件能挂在心上。从中了科举到辞职退休，当官四十多年，实际经历不到六年。

朱震被召唤，询问出处的办法，安国说：“子发学习《周易》二十年，这件事应当早已定下了。世间只有讲学与从政两件事，不可以不实实咨明究明。至于奉行的大概，离开或赴任开口或不言的时机，就象人吃饭饮食一样，饥饱温寒，一定要自我斟酌，不应该由别人决断，也不是别人所能决断的。我平生是进是退都在心中作出决定，浮世名利就象蚂蚁经过眼前。有什么值得说的？”所以渡江以来，儒学家进退符合节义的，指胡安国、尹惺为最佳者。侯仲良说话只称赞二程先生，对其他人没有什么称道的，后来见到安国，感叹说：“我认为志在天下，把不义和富贵看得象浮云一样的，只有二程先生，没想到还有这个人。”

安国一起从游的，游酢、谢良佐、杨时都是程氏的高足，良佐曾经对人说：“胡康侯象冬天的大雪，百草都枯萎而死，

而松柏却独独挺拔秀美。”安国出使湖北，杨时正为府学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发问请教，对他们很礼貌恭敬，每次来拜见之后离去，一定端正地拿着手笏站着目送。

自从王安石废除《春秋》不立学官，安国说：“先代圣人亲手删定的书，却让君王不能听其讲述评说，学士不能相传布讲习，乱伦天理，使中原变为蛮夷，大概从此开始吧。”所以潜心于这本书二十多年，认为天下的事和物都在其中。经常叹息说：“这是传心的要典。”

安国少年时想以文章传名于世，既然学习道义，于是不再留意，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胡安国有三个儿子：胡寅、胡宏、胡宁。（吴言译）

【原文】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入太学，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颖川靳裁之为师。裁之与论经史大义，深奇重之。三试于礼部。中绍圣四年进士第。初，廷试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职以无诋元佑语，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时发策大要崇复熙宁、元丰之制，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封。哲宗命再读之，注听称善者数四，亲擢为第三。为太学博士，足不蹑权门。

提举湖南学事，有诏举遗逸，安国以永州布衣王绘、邓璋应诏。二人老不行，安国请命之官，以劝为学者。零陵簿称二人党人范纯仁客，而流人邹浩所请托也。蔡京素恶安国与己异，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狱推治；又称湖北再鞫，卒无验，安国竟除名。未几，簿以他罪抵法，台臣直前事，复安国元官。

政和元年，张商英相，除提举成都学事。二年，丁内艰，移江东。父没终丧，谓子弟曰：“吾昔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钟将何所施？”遂称疾不仕，筑室墓傍，耕种取给，盖将终身焉。宣和末，李弥大、吴敏、谭世勛合荐，除屯田郎，辞。

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辞；除起居郎，又辞。朝旨履趣行，至京师，以疾在告。一日方午，钦宗亟召见，安国奏曰：“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万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愿擢名儒明于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虚怀访问，深发独智。”又言：“为天下国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谋议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视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窥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乞访大臣，各令展尽底蕴，画一具进。先宣示台谏，使随事疏驳。若大臣议绌，则参用台谏之言；若疏驳不当，则专守大臣之策。仍集议于朝，断自宸衷，按为国论，以次施行。敢有动摇，必罚无赦。庶几新政有经，可冀中兴。”钦宗曰：“比留词掖相待，已命召卿试矣。”语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

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见安国论奏，愠曰：“中兴如此，而曰绩效未见，是谤圣德也。”乃言安国意窥经筵，不宜召试。钦宗不答。安国屡辞，南仲又言安国不臣，钦宗问其状，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钦宗曰：“渠自以病辞，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封，钦宗即问识胡安国否，中丞许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汙如安国者实鲜。”钦宗叹息，遣中书舍人晁说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

去，即不疆留。”即试，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南仲讽台谏论其稽命不恭，宜从黜削。疏奏不下，安国乃就职。

南仲既倾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又谓许景衡、晁说之视大臣升黜为去就，怀奸徇私，并黜之。安国言：“二人为去就，必有陈论；怀奸徇私，必有实迹。乞降付本省，载诸词命。”不报。

叶梦得知应天府，坐为蔡京所知，落职奉祠。安国言：“京罪已正，子孙编置，家财没入，已无蔡氏矣。则向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为京党，则人才见弃者众，党论何时而弭！”乃除梦得小郡。

中书侍郎何栗建议分天下为四道，置四都总管，各付一面，以卫王室、捍强敌。安国言：“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避置，兵得诛赏，权恐太重；万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据见今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属守将应援，则一举两得矣。”寻以赵野总北道，安国言魏都地重，野必误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不复北顾，如安国言。

李纲罢，中书舍人刘珣行词，谓纲勇于报国，数至败衄。吏部侍郎冯澥言珣为纲游说，珣坐贬。安国封还词头，以为“侍从虽当献纳，至于弹击官邪必归风宪。今台谏未有缄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职，此路若开，臣恐立于朝者各以好恶胁持倾陷，非所经靖朝著。”南仲大怒，何栗从而挤之，诏与郡。栗以安国素苦足疾，而海门地卑湿，乃除安国右文殿修撰、知

通州。

安国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论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国曰：“事之大者，无不起于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时而可言也。”

安国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为郎在城中，客或忧之，安国愀然曰：“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敌国益急，钦宗亟召安国及许景衡，诏竟不达。

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安国言：“昨因缴奏，遍触权贵，今陛下将建中兴，而政事弛张，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职守，必以妄发，干犯典刑。”黄潜善讽给事中康执权论其托疾，罢之。三年，枢密张浚荐安国可大用，再除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

绍兴元年，除中书舍人兼侍讲，遣使趣召，安国以《时政论》二十一篇先献之。论入，复除给事中。二年七月入封，高宗曰：“闻卿大名，渴于相见，何为累诏不至？”安国辞谢，乞以所进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论之目，曰《定计》、《建都》、《设险》、《制国》、《卹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宠度》、《宽隐》。论《定计》略曰：“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论《建都》谓：“宜定建康以比关中、河内，为与复之基。”论《设险》谓：“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

必以重兵镇安陆。”论《尚志》谓：“当必志于恢复中原，诋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论《正心》谓：“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愿选正臣多闻识、有志虑、敢直言者，置诸左右，日夕讨论，以宅厥心。”论《养气》谓：“用兵之胜负，军旅之强弱，将帅之勇怯，系人君所养之气曲直何如。愿疆于为善，益新厥德，使信于诸夏、闻于夷狄者，无曲可议，则至刚可以塞两间，一怒可以发天下矣。”安国尝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

居旬日，再见，以疾恳求去。高宗曰：“闻卿深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正音。安国奏：“《春秋》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济艰难，《左氏》繁碎，不宜虚费光阴，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经。”高宗称善，寻除安国兼侍读，专讲《春秋》。时讲官四人，援例乞各专一经。高宗曰：“他人通经，岂胡安国比。”不许。

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安国奏：“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政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胜非改除侍读，安国持录黄不一，左相吕颐浩特命检正黄龟年书行。安国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今待罪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胜非外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发置百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建

炎之失节者，今虽特释而不问，又加选择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

初，颐浩都督江上还朝，欲去异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为朋党，且曰：“党魁在琐闼，当先去之。”颐浩大喜，即引胜非为助，而降旨曰：“胡安国屡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艰不肯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为谋则善，如国计何？”落职提举仙都观。是夕，彗出东南，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之，不报，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跻上疏，极言胜非不可用，安国不当责。右司谏吴表臣亦言安国扶病见君，欲行所学，今无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报。颐浩即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余人，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象，台省一空。胜非遂相，安国竟归。

五年，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安国辞。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

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安国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佑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韩氏，仍诏馆阁褒其遗书，校正颁行。

使邪说者不得作。”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诏赠四官，又降诏加赠，赐田十顷恤其孤，谥曰文定，盖非常格也。

安国强学力行，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自登第迄谢事，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

朱震被召，问出处之宜，安国曰：“子发学《易》二十年，此事当素定矣。世间惟讲学论政，不可不切切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说语默之几，如人饮食，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诸人，亦非人所决也。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浮世利名如蟻蠓过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义，以安国、尹懌为称首。侯仲良言必称二程先生，他无所许可，后见安国，叹曰：“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

安国所与游者，游酢、谢良佐、杨时皆程门高弟。良佐尝语人曰：“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安国之使湖北也，时方为府教授，良佐为应城宰，安国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每来谒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宫，安国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每叹曰：“此传心要典也。”

安国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学道，乃不复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三子，寅，宏、宁。

真德秀传

——《宋史》卷四三七

【说明】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更名景希，建宁浦城（今属福建）人，为朱熹再传弟子，庆历五年进士。历知泉州、福州、户部尚书，后改为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后卒，谥文忠。学者称为西山先生，著有《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和《西山读书记》等。

真德秀是继朱熹以后在当时以道德、文章声名著称之人，尤其是对理学走向正统、权威产生了关键的作用，并对宋明以下理学有很大影响。他在文学方面，以《文章正宗》为代表作，在理学方面以《大学衍义补》为代表。

真德秀，字景元，后来换为希文，福建浦城人。四岁读书，过目成诵。十五岁成了孤儿，母亲吴氏贫困但极力教育他，同郡杨圭见后感到奇异，让他回去和几个儿子一块学习，最后把儿女嫁给他。

中了庆历五年进士，授予南剑州判官，接着试中博学宏词科，加入闽地帅府幕僚，征召为大学长官。嘉定元年迁为博士。当任时韩侂胄已被杀，进宫应对，首先说：“权臣开拓

边疆，南北生灵涂炭，现在恢复了，不是天下的大福吗？然而以前因为行人的派遣，金人想增加岁币的数量，而我也说可以增加，金人想得到奸臣的脑袋，而我说也可以给，来往之间的称谓，犒牢军士的金帛，搜求归顺流民，都可以承受答应，那样不是在欺侮我们吗？还是善于考虑国事的人不观察敌情，只考虑政情？现在号称更纪，却无法使敌情畏服，正是担心他们借取我们每年的贿赂来增加他们自己的力量，我的不准备来增长自己的智谋，一旦挑起争端而我方没有办法响应，这是有识之士感到寒心的事。”又说：“侂冑自己知道不被清议所用，真诚忧国的人就认为是好名，因此忠良之士被斥退，正直公正的言论听不到。真正忠心诚意的学问也诬为好名，因此伪学的论调兴起了，却正道不行，现在改弦易张，应该褒扬尊崇名节，明确表示喜好追求。”

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兼检讨玉牒，第二年，迁校书郎，又应对，讲风暴、下雨、冰雹、荧惑、螽蝗等变化，都是污秽小吏所致，不久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三年，迁秘书郎，再入对，请开公道，杜绝别的道路，用来控制小人之道之增长，选择好的官吏，鼓励战士，用来扼杀盗贼兴盛的气势。四年，选为著作佐郎。一起的人乘机讽刺他，德秀忍受不和他计较。宰相将任用德秀，赶上言官诋毁他，德秀坚决拒绝。兼礼部郎官，上书说：“金朝具有一定灭亡的形势，但也足构成中国的担忧。大概金朝灭亡是因为上面高兴，臣下嬉松，可担忧的不在敌方而在自我，多事的开端恐怕从此开始了。”五年，迁为军器少监，升权直。

六年，迁为起居舍人，上奏说：“权臣奸吏把持政治十四

年，朱熹、彭龟年因为抗旨而遭放逐，吕祖俭、周端朝因上书而被放斥，当时亲近之臣还有抗争的。从那以后吕祖泰遭贬，不仅亲近之臣不敢说，而且御史台进谏也极力排挤他，那么嘉泰的失落比庆元更深了。更化初年，群贤都自我奋进，没有多久，傅伯成因为谏官论事而离职，蔡幼学因为以词臣论事离职，邹应龙、许奕又接着因为秘密驳奏之事而去职。这几个人，不能太大的有所矫正，却已经都不能容于朝廷。所以人人追求的是自我保全，一句话也不讲。假若有大的危险，大的祸害，群臣都这样闭口不说，难道不很危险吧？现在想和陛下讲，勤快地咨访，广泛地计谋，明白地升降这三件事而已。当时钞法楮令实行，告奸兴讼之事很多，抵罪之人很多，没有谁敢让皇帝知道。”德秀上奏说：“有时一个人犯了罪，却一块没收兄弟的财产；有时仅亏陌四钱，却误收百万的资产；至于收取富家的钱，约取盐商的船，根据财产的多少，分配民众藏纳货币，买田土房屋用来收取契券，即使大户人家也不能幸免，竟将此名之为便民的计策？”从此没收的财产因此渐渐得以归还。

兼太常少卿。又说金人一定灭亡，君臣上下都以求天永远长命为心。充当金国庆贺登位的使节，到盱眙，听到金人内部生变故而返回，对皇上说：“我自扬到楚，再从楚到盱眙，肥沃的土地没有边际，大小湖泊相连，人民都强劲坚韧忍耐，这是上天赐给我国用来作为大江的屏障，让强兵足食作为进取之资。顾视却田土没有得到开辟，沟洫没有疏峻，险要没有扼守，丁壮没有操练，豪杰武勇之士没有得以招附相聚，一旦有警情，那只有以长江为险守，哪里比得上现在大修垦田

之政，专门设一个官吏去主管，数年之后，积累储藏充实，边民父子争着自我保卫，根据队伍，用兵法进行训练，用不着带粮食，都是精兵。”讲述边防要事。

当时史弥远正用爵禄官位收聚天下人材，德秀感慨地对刘燊说：“我们应该快快隐居去，让朝廷也知道世上还有不肯服从官吏的人。”于是极力请求离职，外放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山东盗贼发生，朝廷还与金朝通聘问，德秀上朝辞职，说：“国耻不可以忘记，邻盗不可以轻视，侥幸之谋不可以依靠，阿谀奉承之言不可以听，最公正的言论不可以忽视。”宁宗说：“你的力量有限，到江东每天为我筹财聚粮，以便防边之用。”

江东闹旱灾、蝗灾，广德、太平最厉害，德秀就和留守、宪司分所部九郡大讲穷荒之状，而自己统领广德、太平。亲自到广德，和太守魏岷一块根据情况发放粮食，派教授林庠赈灾补给，事情完成以后才返回，百姓数千人送他们到郊外，指着路边一丛丛坟墓说：“这都是以前年岁饿死的，没有先生，我们这些人都跟着到这里去了。”追索并毁掉了太平州私创的大斛，新来的徽州太守林琰没有廉洁的名誉，宁国守张忠恕计划藏匿救济粮，都被弹劾，而用李道传代管徽州政务。以前，都司胡榘、薛拯总是讥笑德秀迂腐懦弱，用事情试验一定失败，到这时政事声誉一天天广，因此大肆说旱情本来很轻，监司喜欢名声，赈灾太过份，让魏岷弹劾林庠以动摇德秀，德秀上书自己表明，朝廷明白，让魏岷祭祠，授与庠干官，而道传不久也召还。

德秀以右文殿修撰名义出守泉州，外国船舶害怕苛刻的

征税，来的人每年没有三四只，德秀首先放宽政策，来的人突然增加到三十六艘，送租时让民众自己装斗，打官司只告示姓名，当事人就自动来到州府。泉地多大家之人，是乡里的祸患，痛恨并绳法他们，有诉讼田土的，乃至焚烧了田土券而不敢抗争，海盗作乱，快要攻城，官军败逃，德秀祭奠战死的，于是亲自传授战略，捕获海盗。再全面搜索海滨，审察形势，增加要害防守，用来防备不测。

十二年，用集英殿修撰之名为隆兴府知府，赶上宽松之政之后，于是稍微管束严格。尤其留意于军政，想分鄂州军民驻守武昌，以及通达广盐到赣和南安，用来削平汀、赣的盐贼。没有实行，因为母亲丧故而归，第二年，蕲、黄失守，盗贼起于南安，征讨多年才平息，人们佩服德秀高见。

十五年，以宝谟阁侍制、湖南安抚使为潭州知州，用“廉仁公勤”四个字勉励官僚属从，用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栻之学术源流勉励官吏，废除官府专买酒品，解除觶面米，申请免除平价卖出，用来恢复民力，民众难于生活的，就尽力去救济他们，又建立惠民仓五万石，让每年出放。又换谷七万五千石，分别在十二县设立社仓，用来遍及每个乡村。再建立慈幼仓，立义阡、嘉惠之政都实施了，每月试验各军的射击，捐献他的四万之利以及官方的田租。凡是苦中生病，死而没有安葬的、怀孕的、结婚娶亲的，给予一定补给救济。朝廷听从寿昌朱橐之请，用飞虎军戍守寿昌，并且把家人安排在一起。极力谏争废止。江华县贼师进入境内烧杀抢劫，发檄广西一起讨伐征平。司马遵镇守武冈，激发军变，弹劾司马遵并杀了为乱的人。

理宗继位，召为中书舍人，不久升迁为礼部侍郎，直学士院。进入拜见，上奏说：“三纲五常，这是维持宇宙的主干，奠定民生安全的基石。晋代废除三纲而刘、石之变兴起，唐代废止三纲而安禄山之灾难发作。我朝建立国家，首先正名分。陛下不幸经历人伦变故，传流闻播四方、遭到损害不浅，霅川之变，不是济王的本意，以前有回避藏匿的踪迹，后来听说追讨捕捉的计谋，情状本末，明白可以考明。愿意讨论雍熙追封秦王放下罪过抚恤孤儿的故事，济王没有儿子后代，也希望陛下使其有传。”皇帝说：“朝廷对济王也尽意了。”德秀说：“假如说这事安排处置得很好，臣下不敢认为是这样的。观察舜所以处置象，那么陛下知道有这样的失当而要进一步讲修德政。”又说：“霅川之狱没有听说在朝廷公审，淮、蜀二将乃出于众论所期之外，天下的事不是一家的私事，为什么爱惜不和众人共享？”并且说：“乾道、淳熙年间，在位于朝廷的以送礼到门为耻辱，在外为官的为送礼人感到羞愧，现在贿赂公然施行，薰染成风俗，竟不感到奇怪。”

又上疏说：“朝廷之中，敏锐的人大多很老成，虽然曾经用元老宿艾褒傅伯成、杨简，以儒学名义褒扬柴中行，用淡泊隐退名义使用过赵蕃、刘宰；至于忠心正直敢于说话的象陈密，徐侨，都没有得到录用。”皇上询问廉明的官吏，德秀用袁州知州赵籛夫相回答，亲自提拔赵籛夫为直秘阁司监，准备手札感谢。又说，崔与之守蜀，杨长儒守闽，都有廉洁之声，请求广加咨询寻访。

皇上开始到清暑殿，德秀以经筵侍候皇上，进言说：“这是高、孝两祖保留神位休息的地方，抬头看着栋楹，就象二

位祖宗实际登临其中。陛下所住的地方很近东朝，不敢就当人主之奉祀，现在宫阁的意义逐渐废除，因而一心而受到很多攻击，没有不因此而慢慢蚀坏的，只有学习可以明白这种用心，只有尊敬可以保存这种用心，只有亲近君子可以保持这种用心。”因此大力陈述古代守丧的法制以及先代帝王视理朝政的勤劳。

宁宗死后一周周年纪念祭，下诏群臣穿纯白之服。德秀争论说：“自从汉文帝根据自己的感情变更古制以来，只有我孝宗正好守丧服三年，上朝衣冠帽都用大布，可惜当时不一起确定臣下守丧的礼节，这是千年无穷无尽的遗憾。孝宗去世，侍从罗点等议论，让群臣过了一个月之后，不要放下粗制丧服，只有朝廷集会议事代用黑带公服，时序仍然临慰，至二周年纪念时才去掉。侂冑干政，开始从一周年后穿吉服，并且带子不用金，鞵靴不用红，佩不用鱼，马鞍坐轿不用文饰，过对众臣又有什么伤损？对朝廷之义又有什么伤害？”议论于是放下。

德秀多次进呈忠直之言，皇上都虚心采纳但弥远更加害怕他。于是计谋怎么动摇他，因害怕普遍舆论而没有发作。给事中王圣、盛章开始驳斥德秀所主持的济王追赠典礼，不久殿中御史莫泽弹劾他，于是以焕章阁待制提举玉隆宫，谏议大夫朱端常又弹劾他，失落职务免除祭祠，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他，请求加以放逐。”皇上说：“仲尼不做过份的事情。”于是才停止。

归官后，修《读书记》，告诉学生们说：“这是君王治国的方法道路，如果有使用我的，拿着这个去做。”汀地寇贼发

生，德秀推荐陈辇有文武全才，常平使者史弥忠讲给朝廷，于是就起用陈辇讨伐平乱。绍定四年，改任职务参马祭祠。

五年，进升为徽猷阁，为泉州知州，欢迎者填塞了道路，深山老村中百岁老人也扶着拐杖出来，城中欢呼声震天动地。各个县邑二税曾经提前借到六七年以后，德秀来了以后，首先禁止提前借用，各县邑有几个月没有一点钱开销，郡县预算也空空的，做不了什么事，有的认为过错在于宽谅体恤太突然，德秀说人民这样贫困，宁可自身代替受苦。判断诉讼从卯至申时都不断，有的劝戒好好休养精神，德秀说郡中弊病没有力量施惠于民，只有政事公平、诉讼合理应当努力。建炎初年设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只有三百人，漕司和本州供给他们，而朝廷每年辅助度牒，不久就不再供给，却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郡里因此更加无法做事，德秀向朝廷请求，下诏供给度牒百道。

史弥远逝世，皇上亲自理政，以显谟阁待制为福州知州，禁戒他的部属不要随意用刑横征暴敛，不要徇私收贿，废除市令司，说：“物相同那么价相同，难道有公和私的差别吗？”闽县的里正苦于督赋，革除掉，所属县苦于粮食买卖太贵，根据情况发放平价粮赈济他们，海盗纵横，按次序抓拿消灭他们。没有多久，听到金朝灭亡，京、湖守帅献上露布画上八陵，而江、淮有进取潼关、黄河的议论，德秀感到担忧，上秘密奏章说：“迁移江、淮精兵去守住没有用途的空城，运送江、淮金币粮食去治理无法耕种的废地，富裕的结果无法等待，根本性的弊病却马上见到了，希望陛下慎重思考。”

召为户部尚书，进入拜见，皇上迎上去说：“先生离开国

家十年，总是急切的思得贤才。”于是用《大学衍义》进上，再陈述祈天永命的学说，说：“尊敬是道德的相聚，仪狄的酒、南威的女色，优游射猎的快乐，禽兽狗马的玩好，有一件事在这上面，都能够违害尊敬之心。”皇上高兴地接纳，改任为翰林学士、制诰主管，对时事政策多有建议议论。第二年为贡举之管，不久得病，拜为参知政事，一起编修敕令，《经武要略》，三次请求去祠禄，皇上不得已，进升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辞职，病很重了，仍穿着朝服、帽子起身安坐，等到事情完了，仍然精神不乱遗下书信，皇帝知道了很震惊，中止处理朝政，追赠青光禄大夫。

德秀身材修长颈头宽广，容貌洁白，看见的人没有不认为是相公辅佐之材。处朝没满十年，上奏的章疏不止十万字，都切中当时世务，正直的声誉震惊了朝廷。四方的人读他的文章，想见到他的丰采。等到宦游所至，政治开明，深入实际，无愧于他自己之言，因此中外更加显要。都城的人当时惊讶地相传，都拥着出关说：“真直院到了。”果然来到，却又去填塞聚观不处理，当时宰相因此很忌恨他，往往屏退不用，但声誉更加显要。等回朝，正赶上郑清之迎敌，兵士民众死去的数十万，朝廷民间大为消耗，仍然是世道升降治乱的关键，而德秀已经衰老了。杜范正攻击郑清之误国，并说他贪心渎职比以前更为严重，而德秀上奏说：“这都是以前权臣玩火失职的罪责，现在处事的人，就象和、扁在庸医之后看病，一次用药失误，代替庸医受责。”他的议论与杜范如此不相同，然而自从韩侂胄立伪学这个名目来禁锢好人，凡是近代大儒的书，都明显禁止弃绝。德秀出现较晚，独独以斯

文自任，讲诵研习并亲自实行，党禁一开，于是正学就大明于天下后世，他的功劳很大了。

所写下的《西山甲乙藁》、《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章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逝世后，皇上思念不止，谥称文忠。

（吴言 译）

【原文】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希元，建之浦城人。四岁受书，过目成诵。十五而孤，母吴氏力贫教之。同郡杨圭见而异之，使归共诸子学，卒妻以女。

登庆元五年进士第，授南剑州判官。继试中博学宏词科，入闽帅幕，召为太学正，嘉定元年迁博士。时韩侂胄已诛，入封，首言：“权臣开边，南北涂炭，今兹继好，岂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岁弊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嫚我乎？抑善谋国者不观敌情，观吾政事。今号为更化，而无以使敌情之畏服，正恐彼资吾岁赂以厚其力，乘吾不备以长其谋，一旦挑争端而吾无以应，此有识所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为清议所贷，至诚忧国之士则名以好异，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论不闻；正心诚意之学则诬以好名，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张，正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

召试学士院，改秘书省正字兼检讨玉牒。二年，迁校书郎。又对，言暴风、雨雹、荧惑、螭蝗之变，皆贼吏所致。寻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三年迁秘书郎。入对，乞开公

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长之渐；选良牧，励战士，以扰群盗方张之锐。四年，选著作佐郎。同列相甚期之，德秀恬不与较。宰相将用德秀，会言官觐之，德秀力辞。兼礼部郎官，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盖金亡则上恬下嬉，忧不在敌而在于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迁军器少监，升权直。

六年，迁起居舍人，奏：“权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龟年以抗论逐，吕祖俭、周端朝以上书斥，当时近臣犹有争之者。其后吕祖泰之贬，非惟近臣莫敢言，而台谏且出力以挤之，则嘉泰之失已深于庆元矣。更化之初，群贤皆得自奋。未几，傅伯成以谏官论事去，蔡幼学以词臣论事去，邹应龙、许奕又继以封驳论事去。是数人者，非能大有所矫拂，已皆不容于朝。故人务自全，一辞不措。设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岂不殆哉！今欲与陛下言，勤访问、广谋议、明黜陟三者而已。”时钞法楮令行，告讐繁兴，抵罪者众，莫敢以上闻。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财；或亏陌四钱，而没入百万之货；至于科富室之钱，拘盐商之舟，视产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没之产以渐给还。

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当以祈天永命为心。充金国贺登位使，及盱眙，闻金人内变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扬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无际，陂湖相连，民皆强悍强忍，此天赐吾国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为进取资。顾田畴不辟，沟恤不治，险要不扼，丁壮不练，豪杰武勇不收，一旦有警，则徒以长江为恃；岂如及今大修垦田之政，专

为一司以领之，数年之后，积储充实，边民父子争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粮饷，皆为精兵。”又言边防要事。

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谓刘燠曰：“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出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山东盗起，朝廷犹与金通聘，德秀朝辞，奏：“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幸安之谋不可恃，导谏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宁宗曰：“卿力有余，到江东日为朕撙节财计，以助边用。”

江东旱蝗，广德、太平为甚，德秀遂与留守、宪司分所部九郡大讲荒政，而自领广德、太平。亲至广德，与太守魏岷同以便宜发禀，使教授林庠振给，竣事而还。百姓数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业冢泣曰：“此皆往岁饿死者。微公，我辈已相随入此矣。”索毁太平州私创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无廉声，宁国守张忠恕规匿振济米，皆劾之，而以李道传摄徽。先是，都司胡榷、薛拯每诮德秀迂儒，试以事必败，至是政誉日闻，因倡言旱伤本轻，监司好名，振贍太过，使岷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与岷祠，授庠干官，而道传寻亦召还。

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输租令民自概，听讼惟揭示姓名，人自诣州。泉多大家，为闾里患，痛绳之。有讼田者，至焚其券不敢争。海贼作乱，将逼城，官军败衄，德秀祭兵死者，乃亲授方略，禽之。复徧行海滨，审视形势，增屯要害处，以备不虞。

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承宽弛之后，乃稍济

以严。尤留意军政，欲分鄂州军屯武昌，及通广盐于赣与南安，以弭汀、赣盐寇。未及行，以母丧归。明年，蕲、黄失守，盗起南安，讨之数载始平，人服德秀先见。

十五年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以“廉仁公勤”四字励僚属，以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栻学术源流勉其士。罢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籴，以苏其民。民艰食，既极力振赡之，复立惠民仓五万石，使岁出籴。又易谷九万五千石，分十二县置社仓，以徧及乡落。别立慈幼仓，立义阡。惠政毕举。月试诸军射，损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营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给有差。朝廷从寿昌朱橐请，以飞虎军戍寿昌，并致其家口，力争止之。江华县贼苏师入境杀劫，檄广西共讨平之。司马遵守武冈，激军变。劾遵而诛其乱者。

理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入见，奏：“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晋废三纲而刘、石之变兴，唐废三纲而安禄山之难作。我朝立国，先正名分。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雪川之就，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讨捕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愿讨论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济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兴灭继绝。”上曰：“朝廷待济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谓此事处置尽善，臣未敢以为然。观舜所以处象，则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当以二帝、三王为师。”上曰：“一时仓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愿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讲学进德。”次言：“劔川之狱未闻参听于公朝，淮、蜀二阨乃出于佥论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

与众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餽饭公行，薰染成风，恬不知怪。”

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锐之士多于老成，虽尝以耆艾褒傅伯成、杨简，以儒学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赵蕃、刘宰；至忠亮敢言如陈密、徐侨，皆未蒙录用。”上问廉吏，德秀以知霄州赵箴夫封，亲擢箴夫直秘阁为监司。具手劄入谢，因言崔与之帅蜀，杨长儒师闽，皆有廉声，乞广加咨访。

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经筵侍上，进曰：“此高、孝二祖储神燕闲之地，仰瞻楹桷，当如二祖实临其上，陛下所居处密迩东朝，未敢遽当人主之奉。今宫阁之义浸备，以一心而受众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蚀者，惟学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亲君子可以维持此心。”因极陈古者居丧之法，与先帝视朝之勤。

宁宗小祥，诏群臣服纯吉，德秀争之曰：“自汉文帝率情变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当时不并定臣下执丧之礼，此千载无穷之憾。孝宗崩，从臣罗点待议，令群臣易月之后，未释衰服，惟朝会治事权用黑带公服，时序仍临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从吉。且带不以金，鞵不以红，佩不以鱼，鞍鞵不以文绣。此于群臣何损？朝仪何伤？”议遂格。

德秀屡进鲠言，上皆虚心开纳，而弥远益严惮之，乃谋所以相撼，畏公议未敢发。给事中王概、盛章始驳德秀所主济王赠典，继而殿中侍御史莫泽劾之，遂以焕章阁待制提举玉隆宫。谏议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职罢祠。监察御史梁成

大又劾之，请加鞫殛。上曰：“仲尼不为已甚。”乃止。

既归，修《读书记》，语门人曰：“此人君为治之门，如有用我者，执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荐陈辇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弥忠，言于朝，遂起辇讨平之。绍定四年，改职与祠。

五年，进徽猷阁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动地。诸邑二税尝预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预借。诸邑有累月不解一钱者，郡计赤立不可为。或咎宽恤太骤，德秀谓民困如此，宁身代其苦。决讼自卯至申未已，或劝啻养精神，德秀谓郡弊无力惠民，仅有政平、讼理事当勉。建炎初置南宗政司于泉，公族仅三百人，漕司与本州给之，而朝廷岁助度牒。已而不复给，而增至二千三百余人，郡坐是愈不可为。德秀请于朝，诏给度牒百道。

弥远薨，上亲政，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戒所部无滥刑横敛，无徇私黠货，罢市令司，曰：“物同则价同，宁有公私之异？”闽县里正苦督赋，革之。属县苦贵籴，便宜发常平振之。海寇纵横，次第禽殄之。未几，闻金灭，京、湖帅奉露布图上八陵，而江、淮有进取潼关、黄河之议，德秀以为忧。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惟陛下审之重之。”

召为户部尚书，入见，上迎谓曰：“卿去国十年，每切思贤。”乃以《大学衍义》进，复陈祈天永命之说，谓“敬者德之聚。仪狄之酒，南威之色，盘游弋射之娱，禽兽狗马之玩，有一于兹，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纳，改翰林学士、知制诰，时政多所论建。逾年，知贡举，已得疾，拜参加政事，同编

修敕令、经武要略。三乞祠禄，上不得已，进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辞。疾亟，冠带起坐，迄谢事，犹神爽不乱。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赠银青光禄大夫。

德秀长身广额，容貌如玉，望之者无不以公辅期之。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则又填塞聚观不置。时相益以此忌之，辄摈不用，而声愈彰。及归朝，治郑清之挑敌，兵民死者数十万，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乱之机，而德秀则既衰矣。杜范方攻清之误国，且谓其贪黷更甚于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权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继庸医之后，一药之误，代为庸医受责，其议论与范不同如此。自侂冑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迈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

所著《西山甲乙藁》、《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谥曰文忠。

魏了翁传

——《宋史》卷四三七

【说明】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历五年进士，历知汉阳、眉州、泸州，在蜀十七年，宰相史弥远去世，与真德秀一道召入朝廷，充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兼侍读，不久迁吏部尚书，官至尚书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学者称为鹤山先生。著有《九经要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在思想史上，“从来西山（真德秀）、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花，不独举也。”（《宋元学案》卷八一）他主张“正心”“养性”“力斥时弊、崇尚正统，上接濂洛一派，有开正道，在确立理学正统方面，世居其功。

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年仅数岁就跟从几位兄弟学习，很象大人的样子。稍为长大，英杰特悟，非常突出，每天背诵一千多字，过目不用再看，乡里人称为神童，十五岁写下了《韩愈论》，抑扬挫，有作家风格。

庆元五年，中了进士，当时避讳讲道学，了翁试第提及，授予尚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对公事尽心尽责。嘉泰

二年，召为国子主管，第二年，改为武学博士。开禧元年，召试学士院韩侂胄主持政务，计划开发边疆用来自我稳固，考虑到国家多忧患而不敢说。了翁于是说：“国家纪纲没有建立，国家政策没有确定、风俗苟且偷安，边防废除松弛，财产物用凋谢省耗，人才衰弱，但是道路上窃窃私语，而都说快要有北伐之事了，人情沸沸，担忧怀疑不断产生。金国土地广阔力量强大，不能突然成功，反过来寻求自我，没有看到可以战胜别人的法宝，为什么不赶快自己内部修练，姑且逃出外患。不然的话，全天下去一试，都关系着宗庙社稷的存亡，不应该忽略啊！”对策一出台，大家很惊讶。改任为秘书省正字。御史徐枋立即弹劾了翁对策狂妄，独韩侂胄坚持认为不应该而停止。

第二年，迁校书郎，因双亲年老而请求外补，于是为嘉定府知府。走到江陵，蜀大将吴曦在四川反叛，了翁认为他一定失败，第二年吴曦被诛灭，蜀平定，了翁奉持亲人回到故里。侂胄也因为误国而诛杀了。朝廷收罗人材贤士，了翁在其中。赶上史弥远为相主持国事，了翁看到他的作为，极力辞职，赶上生父丧故去官守丧，在白鹤山建房，用所听说的在辅广李燾等地开门教授学生，人们争着去学习，从此蜀人都知道义理之学。

补差为汉州主管，汉州号称为繁杂地方，了翁用变善作为治理的办法，首先免除了积累的二十多万逃债，省除控制卖酒专利的弊端，严禁家户婚姓互相攻击，又再发文告晓谕民众要讲求人伦来停止斗讼，人民尊敬信奉没有再敢进犯。赶上境内桥坏了，百姓有压死的，管理者把此事告诉了朝廷，下

诏降官一级，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没有几个月，恢复原来的官为眉州的主管，眉州虽然是文物之邦，但那里的习俗法令，依恃官吏的好坏，所以也很难治理。听说了翁来了，争着去试办事情，于是尊敬礼全长老，选择英俊年轻之人，每月初一、十五到学校，亲自进行讲论，劝诱奖掖后学实行乡饮酒礼以示教化，增加贡士人数用来振兴文风，恢复墓颐堰，建造江乡馆，有利于人们的事情，只要知道没有不做的，士人的议论大为佩服，世俗为之一变，治事之行显得于天下。

嘉定四年，提升为潼州路提点刑狱公事，八年，兼任提举常平等事，迁运转判官。收捕奸吏，访问民情，举荐降职不回避权臣，风采严明，上书请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封爵定谥号，指示学者的趋向，朝论议论赞成他，同意了他的请求。遂宁没有守备，了翁巡行郡中之事，就上书请求修葺城池以备不虞之需，朝廷议事减少他所提费用，了翁于是增高城墙，疏通护城河，如同敌人将至一样，后一年，溃败的敌人攻城掠县，知道他有所准备而不敢放肆，人们才开始叹服他预防的想法，十年，迁直秘阁，为泸州知州，主管潼川路安抚司公事。母亲去世服丧，除丧后，任潼州川府知府，约束自己富裕百姓，功绩大为显著，象游侣、吴泳、矣子才，都是蜀中名士，来到他的门下学习。

十五年，被应召入对，上疏两千多言，首先论述人和天地是一个根本，一定要和天地相似而后可以不会使天空旷，兼论及人才、风俗五件事情，明白切实畅达，又论述郡邑强干弱枝的弊病，应该有所变通。大概自了翁离开朝廷十七年后，到这时皇上亲自慰劳体恤，赞叹接受他的话，进升为兵部郎

中，不久，改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官。转换入对，论述江、淮、秦、蜀应当分为四个重镇，选择人员任用，虚心地接受，授于他权力，依靠他的才干，做为联络守备的计策。再论述蜀地边疆开垦以及实灵缺文等事，都把他的奏章下至中书。十六年，做省试参详官，升迁为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

十七年，迁秘书监，不久以起居舍人，再次推辞而后赴任。入朝上奏，尽力讲事变的隐患，人心的背离，边疆的安危，邻国敌人的动静，大概机会会有五类。说：“应该根据时机而共享天命，尊重道德而严守法度，集思广益，急急地考虑，不比坐着观看事情发展要好处多吗？却去听任事情的发展？”又论述士大夫风俗的弊病，说：“君臣上下同心一德，然后一起才有所补益，危急才有所依靠，如果各人自己考虑自己，那么天下忧患就无穷无尽了。现在是脸上听从而肚子里非议，学习阿谀而顺从陋误，我实在感到害怕，为什么不考察人心的邪和正，推断世界变化的情状，开拓规模，收聚人物，这样差不多碰到事情不会有缺人的感叹了。”他所说的干脆，没有什么避讳，但是当时的宰相感到不快了。

宁宗去世，理宗从宗室进入即帝位，时事忽然变化，了翁积忧成疾，三次上书请求休闲而没有获准，升为起居郎。第二年，改元宝庆，打雷不按季节，皇上有“我心中从早到晚不安”的话，了翁进入对答，就论述说：“人主的心义理所安，因此叫做天，不是这个心之外另有所谓天地神明。陛下何不从不安中寻求，尊对天地，事奉太母，用引见群臣，亲临讲读，都跟事情反过来寻求，那么大本立确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了。”又论述说：“讲初学不明白，风俗浮浅，立于朝

廷没有冒死敢谏的忠心，临难没有仗节死义的勇气。但愿广求大儒，大力阐明正学，考虑长治久安的计策。”又请求申明命令大臣，在除职授官之时，公开观看，然后实在之意才相信，真正好人才会都出现了。

赶上济王的被废黜而死，管理者观望，治理丧事不虔诚。了翁每次见到皇上，请求敦厚人伦，用来弥合别人的言论。响应诏书讲此事的十多人，朝廷官员只有了翁和洪咨夔、胡梦昱、张忠恕所讲的能引述旧义说服皇上，最为贴切。而了翁也因为疾病而请求离职，右正言李知孝弹劾梦昱流窜岭南，了翁出关送别，就指责了翁首先提倡不同的言论，将排斥他，弥远仍然外表上显得很宽容。不久代替尚书工部侍郎，了翁极力借口疾病辞谢，于是用集英殿修撰为常德府知府，第二天，谏议大夫朱端常就弹劾了翁欺世盗名，朋党为邪、诽谤国家，下诏降职之官，到靖州居住。开始，了翁再次入朝，弥远想依靠他来自我帮助，了翁正色不屈，从没有私自拜访过。所以三年之中，按规矩一步一步地升官，从没有处在要位上。了翁到靖州，湖南、浙、江、浙的贤士，不远千里背着书囊求学。于是著《九经要义》一百卷，订正审定精密，先代儒生所没有过。

绍定四年恢复职务，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五年，改任为江州太平兴国宫提举，不知为遂宁府知府，辞官不赴任。进封为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泸州知州。泸州是一个大的边郡、控制着边疆线二千里，但是武装修备不够，城墙楼阁不修。了翁于是上奏修葺城楼女墙及箭垛，增加置办器械，教授训练牌手，申明严肃军事法律，兴建学校，免除以

前债务，恢复仓库，创立义冢，建立养老救济院。过了几个月，百废都重新恢复了。弥远去世，皇上亲理政务，进他为华文阁待制，赐给金带，恢复他的职务。

了翁考虑到国家权臣一个接着一个，在内擅持国家权柄，对外变易风俗，伦理纲常变坏，法律制度废弃破坏，贪污者在官位，办事者是弊端，不能洗涤干净。于是应诏上章论述十大弊病，请求恢复旧典用来表彰新的教化：一是恢复三省的典制用来敬重六卿；二是恢复二府的典制来集合大家的议论，三是恢复都堂典制来重视省府，四是恢复侍从典制以招徕忠告，五是恢复经筵的典制用来推行圣学，六是恢复台谏之制来公开表明官位的升降，七是恢复制造的命令用来严肃诏令，八是恢复听从别人之言的制度用来通达下情，九是恢复三衙之制用来加强皇上之威，十是恢复有关内宫的制度来减省私心。上疏达万字，首先引用典故，再次陈述时代弊病，分别利害，明白得象白和黑一样。皇上读了很感动，于是推荐给经学讲坛上朗诵。从此以后，旧有典制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大臣庶民密奏都请求召回了翁及真德秀，皇上根据人民的愿望都一块召回，使用魏了翁代替理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进宫对答，首先请明白小人君子的区别，又讲及修身、整齐家道、选择宗族贤士、建立小学等建议，都切合于皇上之意。其他象和议不可相信、北军不可保、军物质及财产不可以依靠，总共十多件事，再重新口头上奏利害，昼漏四十刻才退下来，兼任同修国史兼侍读，不久兼吏部尚书。在皇宫中讲经说义，皇上一定端正态度去听讲，咨询考察政事，寻访

人才。又条举十件事献上，都是苦心设计，直述事情，讲人所难讲、皇上都赞扬接纳，并且亲手下诏奖谕。又上奏请求收还并保全史弥远家的御笔，请求确定赵愚配享宁庙，请求催促崔与之参与政事，请求界定田土的命令用来放宽民众的力量，请求下诏听从臣子一块议论用来拯救失弊，请求在内收罗人材用来应付危急。还根据情况进呈故事：象究明黄陂叛军的利害，象分别任用众帅等级及投降依附等事。

回到朝廷过了六个月，前前后后上奏二十多次，都是当时的紧急时务，皇上想要引用一块议政，而忌恨的人共同合谋排挤，因此不能安身于朝廷了。执政者就说亲近之臣中只有魏了翁懂得用兵治国，于是用端明殿学士，同佾书枢密院事督管京湖的军队人马，赶上江、淮督府曾从龙因为害怕忧郁而去世，都把江淮交给了魏了翁，朝廷议论大为震惊，认为不可，三学也上书争论。正赶上边防警情不断传来，皇上心里担忧，了翁嫌避回事，既然五次辞职没有同意，于是受命升府，宣押同二府奏事，皇上特别加以勤劳勉励。不久兼任提举编修《武要略》，恩侍同执政一样，进封临邛郡开国侯，又赏赐随便下诏上书象张浚的事例一样。朝拜辞谢，当面赐御书唐人严武侍和鹤山书院四个大字，仍赐给金带和鞍马，下诏宰臣饮酒在关外，于是酌杯上下流之中，开江州幕府，向将帅申明尊卑警戒，调遣派援军队，奖励为战事而死的臣属，斥退懦弱的将领，上奏边防事十件。刚二十天，召为佾书枢密院事，到朝廷上奏事情，当时因为生病坚决不拜。大概在朝廷的众人开始计谋借此把了翁赶出朝廷，既放出朝廷却又认为建督错了，虽然皇恩礼敬很大，但督府上奏陈情动辄

相牵制，所以马上召回，前前后后都不是皇上之意。

不久改为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又极力推辞，下诏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没有多久，改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改为福州知府，福建安抚使。多次上章请求退休，下诏不允许。疾病很严重，再次上书，学生弟子询问疾病的，仍然衣冠整齐和他们一起应酬对答，并且说：“我平生处世，淡泊没有什么经营。”再讲西蜀中兵乱之事，皱着眉头很久，口头授传上奏遗书，不久拱手去世。以后十天，下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退休。

皇上见了遗书，很震惊，中止了朝事，感叹有用才不尽的遗憾。下诏赠为太师，谥称文靖，赏赐房屋住宅在苏州、多次封赠为秦国公。

所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田图说》、《古今考》、《经史杂钞》、《师友雅言》。

（吴言 译）

【原文】

魏了翁字华父，邛州浦江人。年数岁从诸兄入学，俨如成人。少长，英悟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

庆元五年，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授监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尽心职业。嘉泰二年，召为国子正。明年，改武学博士。开禧元年，召试学士院。韩侂胄用事，谋开边以自固，遍國中忧骇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风俗苟偷，边备发废，财用凋耗，

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谓将有北伐之举，人情恟恟，忧疑错出。金地广势强，未可卒图，求其在我，未见可以胜人之实。盖亦急于内修，姑逭外攘。不然，举天下而试于一掷，宗社存亡系焉，不可忽也。”策出，众大惊。改秘书省正字。御史徐枬劾了翁对策狂妄，独侂冑持不可而止。

明年，迁校书郎，以亲老乞补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将吴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败。又明年曦诛，蜀平，了翁奉亲还里。侂冑亦以误国诛。朝廷收召诸贤，了翁预焉。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燾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

差知汉州。汉号为繁剧，了翁以化善俗为治。首蠲积逋二十余万，除科抑卖酒之弊，严户婚交讦之禁；复为文谕以厚伦止讼，其民敬奉条教不敢犯。会境内桥坏，民有压死者，部使者以闻，诏降官一秩，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未数月，复元官知眉州。眉虽为文物之邦，然其俗习法令，持吏部长，故号难治。闻了翁至，争试以事。乃尊礼耆老，简拔俊秀，朔望诣学宫，亲为讲说，诱掖指授，行乡饮酒礼以示教化，增贡士员以振文风。复墓颐堰，筑江乡馆，利民之事，知无不为。士论大服，俗为之变，治行彰闻。

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点刑狱公事。八年，兼提举常平等事，迁转运判官。戢吏奸，询民瘼，举刺不避权右，风采肃然。上疏乞与周恼颐、张载、程颐锡爵定谥，示学者趣向，朝论韪之，如其请。遂宁阙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备不虞，延议靳其费，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敌至者。后一

年，溃卒攻掠郡县，知其有备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迁直秘阁，知泸州，主管潼川路安抚司公事。丁母忧，免丧，差知潼川府。约己裕民，厥绩大著。若游侣、吴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门受业。

十五年，被召入对，疏二千余言。首论人与天地一本，必与天地相似而后可以无旷天位，并及人才、风俗五事，明白切畅。又论郡邑强干弱枝之弊，所宜变通。盖自了翁去国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劳优渥，嘉纳其言，进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官。转对，论江、淮、襄、蜀当分为四重镇，择人以任，虚心以听，假以事权，资以才用，为联络守御之计。次论蜀边垦田及实录阙文等事，皆下其章中书。十六年，为省试参详官，迁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

十七年，迁秘书监，寻以起居舍人，再辞而后就列。入奏，极言事变倚伏、人心向背、疆场安危、邻寇动静，其凡有五，谓：“宜察时几而共天命，尊道揆而严法守，集思广益，汲汲图之，不犹愈于坐观事会，而听其势之所趋乎？”又论士大夫风俗之弊，谓：“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后平居有所补益，缓急有所倚仗。如人自为谋，则天下之患有不可终穷者。今则面从而腹诽，习谀而踵陋，臣实惧焉。盍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变之倚伏，开拓规模，收拾人物，庶几临事无乏人之叹。”其言剴切，无所忌避，而时相始不乐矣。

宁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时事忽异，了翁积忧成疾，三疏求闲不得请，迁起居郎。明年，改元宝庆，雷发非时，上有“朕心终夕不安”之语。了翁入对，即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非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神明也。陛下盍

即不安而求之，对天地，事太母，见群臣，亲讲读，皆随事反求，则大本立而无事不可为矣。”又论：“讲学不明，风俗浮浅，立朝无犯颜敢谏之忠，临难无仗节死义之勇。愿敷求硕儒，丕阐正学，图为久安长治之计。”又请申命大臣，于除授之际，公听并观，然后实意所孚，善类皆出矣。

属济王黜削以死，有司顾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见上，请厚伦纪，以弭人言。应诏言事者十余人，朝士惟了翁与洪咨夔、胡梦昱、张忠恕所言能引义塚上，最为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梦昱窜岭南，了翁出关饯别，遂指了翁首倡异论，将击之，弥远犹外示优容。俄权尚书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辞，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谏议大夫朱端常逐劾了翁欺世盗名，了翁正色不挠，未曾私谒。故三年之间，循格序迁，未尝处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乃著《九经要义》百卷，订定精密，先儒所未有。

绍定四年复职，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五年，改差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知遂宁府，辞不拜。进宝章阁待制、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泸大藩，控制边面二千里，而武备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楼櫓雉堞，增置器械，教习牌手，申严军律，兴学校，蠲宿负，复社仓，创义塚，建养济院。居数月，百废具举。弥远薨，上亲庶政，进华文阁待制，赐金带，因其任。

了翁念国家权臣相继，内擅国柄，外变风俗，纲常沦敎，法度坠弛，贪浊在位，举事弊蠹，不可涤濯。遂应诏上章论十弊，乞复旧典以彰新化：一曰复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

复二府之典以集众议，三曰复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复侍从之典以来忠告，五曰复经筵之典以熙圣学，六曰复台谏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复制诰之典以谨命令，八曰复听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复三衙之典以疆主威，十曰复制阉之典黜私意。疏列万言，先引做实，次陈时弊，分别利害，粲若白黑。上读之感动，即于经筵举之成诵。其后，旧典皆复其初。

臣庶封章多乞召还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并招之，用了翁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入对，首乞明君小人之辨，以为进退人物之本，以杜奸邪窥伺之端。次论故相十失犹存，又及修身、齐家、选宗贤、建内小学等，皆切于上躬者，他如和议不可信，北军不可保，军实财用不可恃，凡十余端。复口奏利害，昼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修国史兼侍读，俄兼吏部尚书。经帙进读，上必改容以听，询察政事，访问人才。复条十事以献，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难。上悉嘉纳，且手诏奖谕。又奏乞收还保全弥远家御笔，乞定赵汝愚配享宇宙，乞趣崔与之参预政事，乞定履亩之令以宽民力，乞诏从臣集议以救楮弊，乞储阉才以备缓急。又因进故事：如储人才、凝国论，如力图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诏，如分别襄、黄二帅是非，如究见黄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诸帅区处降附。

还朝六阅月，前后二十余奏，皆当时急务。上将引以共政，而忌者相与合谋排摈，而不能安于朝矣。执政遂谓近臣惟了翁知兵体国，乃以端明殿学士、同佥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湖军马。会江、淮督府会曾从龙以忧畏卒，并以江、淮付了翁。朝论大骇，以为不可，三学亦上书争之。适边警沓至，上心焦劳，了翁嫌于避事，既五辞弗获，遂受命开府，宣押同

二府奏事，上勉劳尤至。寻兼提举编修《武经要略》，恩数同执政，进封临邛郡开国侯，又赐便宜诏书如张浚故事。朝辞，面赐御书唐人严武诗及鹤山书院四大字，仍赐金带鞍马，诏宰臣饮饯于关外。乃酌上下流之中，开幕府江州，申儆将帅，调遣援师，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将，奏边防十事。甫二旬，召为金书枢密院事，赴阙奏事，时以疾力辞不拜。盖在朝诸人始谋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则复以建督为非，虽恩礼赫奕，而督府奏陈动相牵制，故遽召还，前后皆非上意也。

寻改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复力辞，诏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未几，改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抚使。累章乞骸骨，诏不允。疾革，复上疏，门人问疾者，犹衣冠相与酬答，且曰：“吾平生处己，澹然无营。”复语蜀兵乱事，蹙额久之，口授遗奏，少焉拱手而逝。后十日，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致仕。

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叹惜有用才不尽之恨。诏赠太师，谥文靖，赐第宅苏州，累赠秦国公。

所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田图说》、《古今考》、《经史杂抄》、《师友雅言》。

刘因传

——《元史》卷一七一

【说明】刘因（1247—1293），字梦吉，元代保定容城人，元初著名学者，与许衡并称北方两大儒。他的祖先是金朝人，世代业儒，所以他一生也与元朝格格不入，屏迹心野，超然物外。他的学问主要师法程朱理学，但又杂有陆氏心学。主要著作除《文集》外，其他均已失传。

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世代为儒学家，五世祖刘琮生了敦武校尉、临洮府录事判官刘昉，刘昉生了奉议大夫、中心府录事刘侯，刘侯生刘秉善，金代贞祐年中迁到南方。他的弟弟刘国宝，中了兴定年间进士，官至奉直大夫、枢密院经历，刘秉善生下了刘述，刘述是刘因的父亲，壬辰年，刘述开始回到北方，刻意学向，精于性理学说，喜欢长啸。中统元年，左三部尚书刘肃宣抚真定，征辟刘述为武邑令，因为生病而辞职回家。四十岁了没有孩子，叹息说：“上天真的让我没有儿子就算了，有儿子一定让他读书。”生刘因的晚上，刘述梦见神人用马载着一个小孩到家里，说：“好好养育他。”醒来以后就生了他。于是取名为驂，字梦驥，后来改现在的

名和字。

刘因天资绝人，三岁识字，每天写数百字，过目即能朗诵，六岁能写诗，七岁能作文，下笔很惊人，才二十岁，才华器识十分超迈，每天读书，心里想与象古人那样的人交朋友，写下了《希圣解》一书，国子司业砚弥坚在真定教书，刘因跟从学习，同住的太学生都赶不上。开始学经学，研究训诂疏释之学，往往叹息说：“圣人的精义，大概不止这些。”等到得到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吕柟的著作，一看到就能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说：“我本来说应当有这样的书，”等到评述他们学问的长处，就说：“郡雍，学问最大的人；周敦熙，是学术最精者；程颐，道义最端正的；朱子，把他们的学问发展到最大，做到了最精，并且用正道去贯彻。”他的高见远识大都象这样。

刘因早年丧父，事奉继母很孝顺，祖父、父亲去世后没有安葬，致书以前的朋友翰林侍制杨恕，杨恕可怜而帮助他，才得以完成葬事。刘因性格不合众，不随便和人来往，家里虽然很贫困，不合道义的，一点也不索取。住在家里教授学生，很重师道，进他门的弟子，按才华和器宇教育他们，都很有成绩造诣。公卿经过保定的很多，听到刘因的名声，往往来拜见，刘因大多谦逊地回避，不和他们相见，不知道的认为是他孤傲，不体贴。喜欢诸葛孔明静以修身的话，把他所住的地方叫“静修”。

不忽木因为刘因学问品行向朝廷推荐，至元十九年，有诏书征刘因，提拔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开始，裕皇在宫中建造学校之时，命令赞善官王恂教育近臣侍从的子弟，王

恂死后，于是让刘因继承他。不久，因为母亲生病而辞职回家。第二年，碰上家庭难事。二十八年，下诏并派使者，用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召刘因，因为疾病而坚决拒绝，并且给宰相上书说：

刘因从小读书，听到大人君子的一些议论，虽然他没有得到什么，至如君和臣之间的义理，自认为理解得很清楚。如果按平常日用及相近的事情来讲，凡是这些人所以能够安心地住下来并且优闲地生活，用来满足生命的快乐，这是靠谁的力量？都是皇上君王的恩赐。因此凡是我们有生命的民众，有的服役，有的贡献智能，也一定各自都有自己的贡献了。这是事理的必然，万古都不会改变的，即是庄周所说的无法从天地之间逃出去。

刘因生下来四十三年了，没有贡献一点点力量，用来报效国家养育生成的大德，却恩命不断地来到。刘因怎么敢伏家不出？贪图高尚之名来自我讨欢，有愧于国家知遇的恩德，却得罪圣门中庸之教啊！况且刘因的本心，从小到大，从没有一天敢去做在崖岸卓绝，非常高而又艰难的行为，平时交朋友，即使有一天的雅好，都知道刘因这片心，但是有的从传闻那儿听说，不求真实，只在行动踪迹相近之处去看，因此有的把我看成高人隐士，只有阁下您也知道刘因从来没有以高人隐士来自居。

从前，皇太子用赞善之官来征召我，就和使者一块去了，又奉旨令教授学生，也是按时应命。后来因为老母中风，请求回家探望，不幸多留了时日，竟然赶上了

丧事之忧，于是不再出仕，开始难道不想出仕为官吗？现在圣明天子选用贤能良臣，是一时的新政策，即使以前隐晦不仕的人也将出来为官了，何况刘因以前就不是隐逸之人？又更何况加上不按次提拔的宠幸，用非常优厚的待遇对我，因此身体留下来了但心里已经很向往，命运和内心相违背，病倒了躺在空房之中，惊慌地等待着遣责。

刘因本来有风痹之病，自从去年死了儿子，忧心之余，又得了虐疾，从夏天到秋天，后来虽然恢复了一些，但是精神血气，已不再象从前了。没想到今年五月二十八日，虐疾又发作，至七月初二，又引发旧有的毛病，肚子痛得如针刺，流血不止。八月初，偶然产生一个想法，自己叹息身边没有什么亲近的亲人，家里也没有什么有规矩的奴仆，假若一天突然逝去，一定会害累别人，已经派人在容城的祖先坟墓旁边，建造了一所坟墓，倘若病情减不下去，就住在中间等待生命结束。派人的时候，不免有些伤感。因此病情更加增重，饮食急剧下降。至二十一日，使者带着皇帝恩命来，刘因刚听到，惊慌恐怖无地自容，不知道怎么办为好，慢慢一想，私下里说担任职务虽然不能带病而行，但是皇帝恩命则不敢不带病回拜。刘因又考虑，假若稍有滞留，那么不仅愚臣之心中有所不安，而且形迹太高，又太不近人情了。于是当天就拜命接受，留下使者，等到病势稍退一点，和他一块出发。一直耽误到现在，服药治疗都用尽了，没有一点效果，于是请求使者先出发，仍让学生李道恒，交

纳马匹和圣旨，等到病稍退，自己准备据力出发。希望阁下加以体贴照顾、并多方保全。刘因实在是疏远低微卑贱的人，和朝廷中那些大臣很不相同，是进还是退，本来不是什么太难处置的事情，希望阁下您从头到尾成全我的心愿。

书信送上去，朝廷没有强迫他来，皇帝听说了，他说：“古代听说有不听从征召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三十年夏四月十六日逝去，年四十五，没有孩子，听到死讯的人都叹息。延祐年中，赠封为翰林学士、资善大夫、护军，追封为容城郡公，谥号为文靖。

欧阳玄曾经赞述刘因画像说：“没有曾点的狂大，却有沂上风乎舞雩的快乐；取法了子由的勇敢，却没有北方边地鼓瑟的声音。以裕皇的仁义，却与商山四皓一样不可挽留；以世祖的谋略，却不能使他获得两次生命。可叹啊！麒麟和凤凰，本来是天下不可常有的东西，但是一叫唤而《六典》产生，一出现《春秋》便写成。那么他们的志向是不留在世上而愿独来独往也很明显了，也将跟着周公、孔子的后面为过去的圣人继承绝学，为以后的事业打开太平之道啊！”评论的人认为这是了解刘因的话。

刘因所撰的著作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五卷，名叫《丁亥集》，是刘因自己选定的。还有文集十多卷，以及以《小学四书语录》，都是他的学生及朋友记录的，《易系辞说》，是刘因病中亲笔所写。

（吴言 译）

【原文】

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世为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临洮府录事判官昉，昉生奉议大夫、中山府录事侯，侯生秉善，金贞祐中南徙。其弟国实，登兴定进士第，终奉直大夫、枢密院经历。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岁壬辰，述始北归，刻意问学，邃性理之说，好长啸。中统初，左三部尚书刘肃宣抚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辞归。年四十未有子，叹曰：“天果使我无子则已，有子必令读书。”因生之夕。述梦神人为载一儿至其家，曰：“善养之。”既觉而生，乃名曰驥，字梦驥，后改今名及字。

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国子司业硯弥坚教授真定，因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以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及评其学之所长，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其高见远识率类此。

因蚤丧父，事继母孝，有父、祖丧未葬，投书先友翰林待制杨恕，怜而助之，如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者，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过保定者众，闻因名，往往来谒，因多逊避，不与相见，不知者或以为傲，弗恤也。尝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语，表所居曰静修。

不忽木以因学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诏徵因，擢承

德郎、右赞善大夫。初，裕皇建学宫中，命赞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继之。未几，以母疾辞归。明年，丁内艰。二十八年，诏复遣使者，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徵因，以疾固辞，且上书宰相曰：

因自幼读书，接闻大人君子之余论，虽他无所得，至如君臣之义，自谓见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气聚之乐者，是谁之力与？皆君上之赐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给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势之必然，亘万古而不可易，而庄周氏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

因生四十三年，未尝效尺寸之力，以报国家养育生成之德，而恩命连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负我国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长，未尝一日敢为崖岸卓绝、甚高难继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传闻不求其实，止于纵迹之近似者观之，是以有高人隐士之目，惟阁下亦知因之未尝以此自居也。

向者，先储皇以赞善之命来召，即与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学，亦即时应命。后以老母中风，请还家省视，不幸弥留，竟遭忧制，遂不复出，初岂有意于不仕邪。今圣天子选用贤良，一新时政，虽前日隐晦之人，亦将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隐晦者邪。况加以不次宠，处之以优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与心远，病卧空榻，惶恐待罪。

因素有羸疾，自去年丧子，忧患之余，继以疟虐，历夏及秋，后虽平复，然精神气血，已非旧矣，不意今岁五月二十八日，虐疾复作，至七月初二日，蒸发旧积，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叹旁无期功之亲，家无纪纲之仆，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侧，修营一舍，倘病势不退，当居处其中以待尽。遣人之际，未免感伤，由是病势益增，饮食极减。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闻之，惶怖无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窃谓供职虽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则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虑，若稍涉迟疑，则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纵迹高峻，已不近于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势稍退，与之俱行，迁延至今，服疗百至，略无一效，乃请使者先行，仍令学生李道恒，纳上铺马圣旨，待病退，自备气力以行。望阁下俯加矜悯，曲为保全，因实疏远微贱之臣，与帷幄诸公不同，其进与退，苦非难处之事，惟阁下始终成就之。

书上，朝廷不强致，帝闻之，亦曰：“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徙欤！”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无子，闻者嗟悼。延祐中，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

欧阳玄尝赞因画像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乌乎！麒麟凤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

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论者以为知言。

因所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五卷，号丁亥集，因所自选。又有文集十余卷，及小学四书语录，皆门生故友所录，惟《易系辞说》，乃因病中亲笔云。

吴澄传

——《元史》卷一七一

【说明】吴澄（1249—1333 年），元代理学家，饶鲁的再传弟子，与许衡为同代名儒，号称“南吴北许”，元代理学从朱子过渡到王阳明的主要人物。《元史》本传的主要价值在于不仅简要介绍了他的生平，而且精要摘录了他论述道德的文字。他的著作后人编有《草庐吴文正公全集》。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高祖吴晔，开始住在咸口里，在华盖、临川两山之间，望气者徐觉说那个地方会出一个异人。吴澄生下来的前一天晚上，同乡父老看见异气降到他家，邻居老太婆又梦见有一东西蜿蜒地降在他房子旁边的池塘里，早晨把这事告诉别人，而正巧吴澄诞生了。三岁，一天比一天聪明颖悟，教他古诗，跟着即能背诵。五岁，每天读千余字，晚上读书读到早上。母亲担心他过于勤奋，节下来油灯，不多给他，吴澄等到母亲睡了，又再点灯读书学习。九岁，跟着许多学子参加乡试，总得最前面的名次。等到长大以后，对经书、传记都熟习背诵了，并懂得在圣贤之学上用功，曾经考进士没有考中。

至元十三年，宋民开始依附元朝，到处都是强盗，乐安郑松招呼吴澄住在布水谷，于是写下了《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以及《大、小戴礼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书到江南求贤才，举荐吴澄到京城。不久，因为母亲年老而回家。程钜夫请求把吴澄所写的书放在国子监，用来培养教育学习的人，朝廷派人到他家写录交上来。元贞初年，游龙兴，按察司经历郝文迎接他到郡学中，每天听他讲学论述，记下他的问答，一共数千言。行省掾元明善对文学很自负，曾经询问吴澄《易》、《诗》、《书》、《春秋》的深奥义理，叹息说：“和吴先生谈话，象深海一样。”于是对吴澄行弟子礼，一直到死。左丞董士选请到家里，亲自送上饭食，说：“吴先生，天下的人才。”等到进了朝廷，推荐吴澄有道识，提拔为应奉翰林文字。管事的人敦促劝勉，很久才去。但代替的已经到任。吴澄当天即回到南方。不久，拜江西儒学副提举，过了三个月，因为疾病而弃官。

至大元年，召做国子监丞。以前，许文正公衡做祭酒，开始用《朱子小学》等书传授弟子，过了许久，慢慢地失去了旧有的东西。吴澄来了，早晨即点灯在讲堂上，学生们按次序授课，到下午，退到住的屋子里，拿着经书来提问的，接踵而至。吴澄按他们的才华器质，反反复复地教训诱导，每天都到半夜，即使冬天暑日也不变。

皇庆元年，升为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立约作为教法四条：一是经学，二是行实，三是文艺、四是治事。没有能够实行。又曾经对学习的人说：“朱子对于道学讲学方面的功绩较多，

但陆九渊则专门以尊重道德品性为根本，讲学不以道德品情为根本，那么他的弊端一定在于偏废在言语和训释等末节上，所以学习必须以道德品性为根本，大概可以得到。”评论的人于是认为吴澄承袭的是陆氏之学，并不是许氏尊信朱子的本意，然而也不知道朱子、陆子是为什？吴澄一天晚上辞谢而去，学生有的没有请求就跟随他南归的，不久拜官集贤直学士，特别授予奉议大夫，派人乘驿车送到京师，到了真州，疾病发作了，没有走成功。

英宗即位后，越位升至翰林学士，又进升为太中大夫。以前，皇帝有命令召集会书写的，用黄金捣粉成泥，书写佛教大藏经。皇帝在上都，派左丞杨速速，下诏吴澄写序。吴澄说：“皇帝写经，是为民众求福，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假若靠此来追荐，愚臣从来不知道。大概福田利益，虽然是人人所乐于知道的，但是轮回之事，那些诵习佛学的人，犹且有的不想说，不过说做善事的人，死了上通高明，那些最好的则和日月一样光辉，为恶的人，死了以后下降到污秽之地，其中最低下的就会与沙和虫为伍，佛徒于是就用荐拔的说法，用来迷惑世人。现在列圣的神灵，上面与日月相同，那里用得着荐拔！况且国初以来，凡是写经来追荐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假若没有效应，那是没有佛法了；假若有所效验，那是诬妄他的先祖了。写下这些文辞，不可以告诉后世。请求等到皇帝回京时奏上。”赶上皇帝去逝中止了此事。

泰定元年，刚开始设经筵。第一个命吴澄和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在至治末年，下诏建造太庙，议论的人习惯见到了同堂异室的制度，于是建十三室。还没来

得及搬迁供奉，国家就发生大的变故，官吏们怀疑昭穆的次序，下令共同讨论此事。吴澄说：“世祖统一天下，都是考察万代的制度而实行的，从前，天子七庙，每座庙都有宫室，太祖居于中正，左三庙是昭、右三庙是穆，昭和穆的神主牌，都各按照次序变化。庙中的宫室，很类似现在朝廷的中书六部。省部的设立，也是仿效金、宋两朝，难道宗庙的次序、位置可以不考诸古代吗？”有司着急办事，竟然象旧次。当时吴澄已经有离开朝廷的打算，正赶上修纂《英宗实录》，命令他主持此事，过了几个月，实录写成，没有奏上，就居疾不出门。中书左丞许师敬按皇帝旨意在国史院设宴招待，仍然表达朝廷劝勉挽留的意思，宴会结束，就离开城坐上船离开了。中书听说了，派官方驿马追赶，没有赶上回来了，对皇帝说：“吴澄，国家的名儒，朝廷的旧德，现在请求告老回家，不忍心过份劳累他，但应该有所表彰褒扬。”下诏加资善大夫，并用金织的文绮二个及钞五千贯赏赐他。

吴澄身体象不能穿衣一样，端坐拱手，气质融融，神情超迈，回答提问都很儒雅，能让人象冰释一样。二十岁时，曾写下论说：道的广大是从天哪儿来的，神圣者继承天道，尧舜以上，是道的开始，尧舜以下，道的亨也，洙、泗、邹、鲁，亦道之利，廉、洛、关、闽，道之贞也。分别地说，上古则伏羲、黄帝是道原，尧舜是道亨，禹汤是道利，文武周公是道贞。中古的道统则是，仲尼是道元，颜渊、曾子是道亨，子思是道利，孟子是道贞！近古的道统，周敦颐是元，程、张是亨，朱子得利，谁是现在之贞？还没有，然而，可以能够没有什么归化吗？”他早年用道术自任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他

出仕登朝，辞退回家，所经郡邑之地，士大夫都迎接请求跟他学习，而四面八方的人士不远数千里，穿着草鞋、背着行李来到山中学习的，经常不止千数百人。稍有一点空暇就写书，直到快死了，仍不放下。对于《易》、《春秋》、《礼记》，都有所纂言，全部破除了传注的穿凿附会，来求得底蕴，按条归纳加以纪录叙述，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之言。著有《学基》、《学统》二篇，让人知道学习的根本，和做学向的次序，尤其对邵雍的学问有所收获。校定《皇极经世书》，又校正《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以及《八阵图》和郭璞的《葬书》。

开始，吴澄所住数间草屋，程矩夫题名叫草庐，所以学者称他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朝廷因为吴澄年老，特别命令第二个儿子吴京做抚州教授，以便于奉养。第二年六月，染病，有大星落在房屋的东北，吴澄逝去，卒年八十五岁。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为临川郡公，谥号为文正。长子吴文当上了柳州路总管府知事。次子吴京，当了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孙吴当，别有传。（吴言 译）

【原文】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高祖晔，初居咸口里，当华盖、临川二山间，望气者徐觉言其地当出异人。澄生前一夕，乡父老见异气降其家，邻媪复梦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岁，颖悟日发，教之古诗，随口成诵。五岁，日受千余言，夜读书至旦。母忧其过勤。节膏火，不多兴，澄候母寝，燃火复诵习。九岁，从群子弟试乡校，每中前列。既长，于《经》、《传》皆通之，知用力圣贤之学，尝

举进士不中。

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盗贼所在蜂起，乐安郑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礼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起澄至京师。未几，以母老辞归。钜夫请置澄所著书于国子监，以资学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录上。元贞初，游龙兴，按察司经历郝文迎至郡学，日听讲论，录其问答，凡数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学自负，尝问澄《易》、《诗》、《书》、《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子弟礼，终其身。左丞董士选延之于家，亲执馈食，曰：“吴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荐澄有道，擢应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劝，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归。未几，除江西儒学副提举，居三月，以疾去官。

至大元年，召为国子监丞。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

皇庆元年，升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澄一夕谢去，诸生有

不谒告而从之南者。俄拜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俾乘驿至京师，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书者，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诏澄为序，澄曰：“主上写经，为民祈福，甚盛举也。若用以追荐，臣所未知。盖福田利益，虽人所乐闻，而轮回之事，彼习其学者，犹或不言。不过谓为善之人，死则上通高明，其极品则与日月齐光；为恶之人，死则下沦污秽，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其徒遂为荐拔之说，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几举。若未效，是无佛法矣；若已效，是诬其祖矣。撰为文辞，不可以示后世，请俟驾还奏之。”会帝崩而止。

泰定元年，初开经筵，首命澄与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在至治末，诏作太庙，议者习见同堂异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迁奉，而国有大故，有司疑于昭穆之次，命集议之。澄议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庙，庙各有宫，太祖居中，左三庙为昭，右三庙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递迁，其庙之宫，颇如今之中书六部。夫省部之设，亦仿金、宋，岂以宗庙叙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于行事，竟如旧次云。时澄已有去志，会修《英宗实录》，命总其事，居数月，实录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赐宴国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罢，即出城登舟去。中书闻之，遣官驿追，不及而还，言于帝曰：“吴澄，国之名儒，朝之旧德，今请老而归，不忍重劳之，宜有所褒异。”诏加资善大夫。仍以金织文绮二及钞五千贯赐之。

澄身若不胜衣，正坐拱手，气融神迈，答问亹亹，使人涣若冰释。弱冠时，尝著说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义、黄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著，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憚数千里，蹑履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少暇，即著书，至将终，犹不置也。于《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作《学基》、《学统》二篇，使人知学之本，与为学之序，尤有得于邵子之学。校定《皇极经世书》，又校正《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及《八阵图》、郭璞《葬书》。

初，澄所居草屋数间，程钜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之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为抚州教授，以便奉养。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坠其舍东北，澄卒，年八十五。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

长子文，终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京，终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孙当，自有传。

王守仁传

——《明史》卷一九五

【说明】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县人。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先后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贬到贵州担任龙场驿丞。刘瑾被诛后，历任知县、南京大仆少卿等。后升察都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府、赣州。因平定藩王叛乱有功，封新建伯。又曾以原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平定思恩府、田州之乱。曾筑室于阳明洞以居，故世称王阳明，或称谥号为王文成公。著有《王文成公全书》（一称《阳明全书》）。

王守仁在明代中叶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南宋陆九渊“心即理”的学说，并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命题加以阐发。又广收弟子，发展成王学的各个分支，使陆王心学派成为理学内部足以与主流派程朱理学派相抗衡的一大派，并在明代中后期一度占居主导地位。他是在朱熹之后对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一人。

王守仁，字伯字，余姚县人。父亲王华，字德辉，宪宗成化十七年考上进士第一名，授予修撰职务。孝宗弘治年间，

逐步升到学士、少詹事。王华有才干风度，在给皇帝讲课的职位上呆得最久，孝宗很看重他。宦官李广地位高贵很受宠幸，王华讲授《大学衍义》，讲到唐朝的宦官李辅国与张皇后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宫里揽权干政时，有所指地面陈规谏甚为剴切，皇帝命令宦官赐给他食物表示慰劳。武宗正德元年，进升为礼部左侍郎。由于儿子王守仁忤逆了宦官刘瑾，被排挤出去担任南京吏部尚书，又因事被罢免。随后又因编写《会典》有小错误，隐职为吏部右侍郎。刘瑾身败后，才恢复旧职，没多久死去。王华性情孝顺，母亲岑氏年过百岁才死，王华已七十多岁，还睡草席吃粗饭履行丧事，士大夫的舆论很称赞他。

王守仁是怀孕十四个月才生的。祖母梦见神仙从云彩里送小孩下来，因此给他取名叫云。五岁还不能说话，一个奇异的人抚摸了他，给他改名守仁，才说话。十五岁，出门访问客居于居庸、山海关，时常擅自跑到塞外去，放眼观察山河的险要形势。二十岁考上举人，学问大有长进。但更加喜好谈论军事，而且很会射箭。考上弘治十二年的进士。派他主持以前封为威宁伯的王越的埋葬事宜，回来时朝廷正急着讨论西北边界上的事，王守仁提出八条意见奏上去。随即授予刑部主事的职衔。奉命去江北判决囚犯，托病回到家里。上来后充任兵部主事。

正德元年冬天，刘瑾逮捕了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多人。王守仁上章直言进行援救，刘瑾大怒，罚他在殿前台阶上挨打四十杖，贬到贵州龙场驿担任驿丞。龙场成山连绵草木茂盛，苗族、僚族杂居。王守仁顺着当地习俗加以感化

引导，少数民族都很高兴，一起砍树盖房，来给王守仁居住。刘瑾被杀后，量情移任庐陵县知县。入见皇帝后，升为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清改命他去负责验封。逐步升到考功郎中，提拔为南京太仆少卿，就地升为鸿胪卿。

兵部尚书王琼素来看重王守仁的才能。正德十一年八月提拔他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府、赣州府。当这个时候，南方盗贼纷纷起来。谢志山霸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霸据浰头，都自称为王，与大庾的陈日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攻打和抢劫州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人又起来了。前任巡抚文森托病避开了。谢志山联合乐昌盗贼掳掠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的主簿吴玘战死。王守仁到达后，知道身边很多人是盗贼的耳目，就叫来一个老而狡诈的仆役来盘问。仆役吓得发抖不敢隐瞒，便赦免他的罪，让他监视盗贼的动静便无所不知。于是传军令给广东、福建来会师，先讨伐大帽山盗贼。

第二年正月，督促副使杨璋等在长富村击破贼兵，逼迫他们逃到象湖山，指挥覃桓、县丞纪镛战死。王守仁亲自统率精锐部队屯驻在上杭，假装退兵，出其不意直捣贼兵巢穴，接连攻破四十多个寨子，俘掳和斩杀七千人有余，指挥王铠等捉住了詹师富。上疏说权力太轻，无法指挥将士，请求发给旗牌，总督军务，可以依据事宜不经请示自行处置。兵部尚书王琼奏请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改革兵制：以二十五个人为一伍，每伍设一个小甲率领；两个伍为一队，每队设一个总甲率领；四个队为一哨，每哨设一个哨长率领，有协哨二人辅佐他；两个哨为一营，每营设一个营官率领，有

参谋二人辅佐他；三个营为一阵，每阵设一个偏将率领；两个阵为一军，每军设一个副将率领。都是临到事情需要时委任，不由朝廷任命；副将以下，可以依次对下一级实行处罚惩治。

这年七月，进兵到大庾。谢志山乘空子急攻南安府，知府季塚打败了他。副使杨璋等也活捉了陈日能带回来。便商议讨伐横水、左溪。十月，都指挥许清、赣州府知府邢珣、宁都县知县王天与各带一支军队会集在横水，季塚与守备郑文、汀州府知府唐淳、县丞舒富各带一支军队会集在左溪，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程乡县知县张戡负责阻拦贼兵逃跑。王守仁自己驻扎在南康，离横水三十里，先派四百人埋伏在贼兵巢穴的左右两旁，然后大军逼进。贼兵刚刚迎战，埋伏的人在两旁山上举起旗帜。贼兵大惊，以为官军已经全部犁平了他们的巢穴，于是溃散。官军乘胜攻克横水，谢志山和他的爪牙肖贵模等人逃到桶冈。这时左溪也被攻破了。王守仁由于桶冈险要牢固，把兵营移到桶冈附近，派人去向他们讲清利害祸福。贼兵头目兰廷凤等人正十分惊恐，见到官军的使者到来便十分高兴，濠璠约定十一月初一那天投降，而邢珣、伍文定已经冒雨攻下险要地形进入。贼兵依靠河水的阻挡在对岸布阵，邢珣率兵迳直上前搏斗，伍文定和张戡从右边出兵包抄，贼兵惊慌败走，遇到唐淳的部队又被打败。各路军马攻破桶冈，谢志山、肖贵模、兰廷凤都反绑双手投降。总共攻破巢穴八十四处，俘虏和斩杀六千有余。当时湖广巡抚秦金也击破了龚福全，他的爪牙上千人逃窜到这一带，将军们把他们全部俘虏和杀死。于是在横水设立崇义县，控制各

寨瑶人。回到赣州，高议讨伐浰头的盗贼。

起初，王守仁讨平詹师富的时候，龙川的盗贼头目卢珂、郑志高、陈英都请求投降。到征讨横水时，浰头的贼将黄金巢也带五百人投降，只有池仲容还没有攻下。横水攻破后，池仲容才派弟弟池仲安前来归附，却又严密地进行防守的准备，诡称卢珂、郑志高，是仇人，将会偷袭我，所以要做防备。王守仁假装把卢珂等人杖打和关押起来，而又暗地让卢珂的弟弟集合士兵待命。然后下令解散士兵，正月初一大规模张设花灯和乐队，池仲容又相信又怀疑。王守仁赐给池仲容节日的礼物，引诱他进来道谢。池仲容带领九十三个人在教练场上扎营，而自己带几个人进来谒见。王守仁叱责他说：“他们都是我的老百姓，屯扎在外面，是怀疑我吗？”于是把这九十三人也都带入祥符宫，以丰厚的饮食款待。贼兵们因超过了原来所期望的待遇而极为高兴，更加感到安心。王守仁留池仲容观赏花灯音乐。正月初三那天大摆酒席，在大门口埋伏武士，盗贼们进来，逐个拿下杀掉。亲自带兵抵达贼巢，接连攻破上浰、中浰和下浰，暂获两千有余。剩下的贼兵逃奔九连山。这座山横亘好几百里，极为陡峻无法攻打。就挑选壮士七百人穿上贼兵的衣服，假装败逃跑到悬崖下面，贼兵招呼他们上去。官军发动进攻，内外配合作战，俘虏和斩杀得一个不留。于是在下浰设立和平县，修好防御工事才回来。从此以后境内为安定。

起初，朝廷议论贼兵势力强大，要调发广东、湖广的兵力联合进剿。王守仁上疏劝阻，没有来得及。桶冈消灭以后，湖广的兵才到达。等到平定浰头以后，广东还没有接到军令。

王守仁所率领的都是文官和一些担任副职、助理的将官和低级军官，却扫平了横行几十年的大盗，远近的人都吃惊地把他看作神仙。进升为右副都御史，赐给可世袭的锦衣卫百户，又再进升为副千户。

正德十四年六月，命令他去平定福建的叛军。走到丰城县而宁王朱宸濠发动造反，知县顾佖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守仁。王守仁急忙赶到吉安府，和知府伍文定一起征调军队和食物，修造器械和船只，传军令揭露朱宸濠的罪恶，让知府、县令各自率领下级和士兵为皇上效力。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郎中曾直，御史张鳌山、周鲁，评事罗侨，同知郭祥鹏，进士郭持平，因罪降职为驿丞的王思、李中，都奔赴王守仁的部队。御史谢源、伍希儒从广东回京，王守仁留下他们为大家纪录功劳。于是集合大家商议说：“反贼如果出兵到长江顺流东下，南京便无法保住。我想用计策阻挠他们，稍许拖住他们十来天就没有问题了。”于是大量派出间谍，传军令给各府各县说：“都督许泰、郤永率领守边界的部队，都督刘晖、桂勇率领京兵，各有四万，水陆两路齐头并进。南安、赣州的王守仁、湖广的秦金、两广的杨旦各自率领所统的部队共十六万，直捣南昌，所到之处官府缺乏供应的，以军法论处。”又写了一封蜡封的密信送给伪宰相李士实、刘养正，奖励他们归顺国家的诚意，叫他们顺着说话怂恿朱宸濠早点发兵东下，而又放出间谍泄露这个消息。朱宸濠果然产生疑虑。和李士实、刘养正商量，便都劝他赶快去南京就皇帝位，朱宸濠更加十分疑虑。十多天后探听到朝中和外地的军队都没有到，才醒悟到是王守仁欺骗他。七月

壬辰初一，朱宸濠留下宜春王朱拱樛在原地防守，而强行夺走他的部下六万人，袭击占领了九江、南康两府，然后出兵到长江，进逼安庆。

王守仁听说南昌守军很少便极为高兴，急忙赶到樟树镇。知府中临江府的戴德孺、袁州府的徐琰、赣州府的邢珣，都指挥余恩，通判中瑞州府的胡尧元和童琦、抚州府的邹琥、吉安府的谈储，推官王玮、徐文英，知县中新淦县的李美、泰和县的李楫、万安县的王冕、宁都县的王天与，各自带兵来会师，总共八万人，号称三十万。有人请求去救安庆，王守仁说：“不这样。现在九江、南康两府已被反贼据守，我军越过南昌府去和江上与贼军对峙，两个府的贼兵断了我们的后路，这是腹背受敌了。不如直捣南昌。反贼精锐部队全部外出，南昌防守空虚，我军新近集合士气锐利，进攻必定能破。贼兵听到南昌攻破，必定解除对安庆的包围来救南昌。我方在鄱阳湖上迎击它，没有不胜的。”大家说：“好。”乙酉那天，进驻丰城，让伍文定部为前锋，先派奉新县知县刘守绪去袭击对方的伏兵。庚戌那天半夜里，伍文定部抵达南昌广润门，守兵都惊慌逃散。辛亥那天黎明各路部队用云梯、绳索登上城墙，捆住了朱拱樛等人，宫人多数烧死。士兵颇有杀人抢劫的，王守仁杀了违反命令的十多个人，宽赦了胁从者，安抚了读书人和老百姓，对宗室的人进行了安慰解释，人心便高兴起来。

住了两天，派伍文定、邢珣、徐琰、戴德孺各领精兵分路进军，而让胡尧元等人设下埋伏。朱宸濠果然从安庆回师。乙卯那天在黄家渡相遇。伍文定迎击它的前锋，贼兵急忙走

向有利地形。邢珣带兵绕到贼兵背后穿插到贼兵中间，伍文定、余恩的部队乘势压上，徐珪、戴德孺从左右两翼出动分散贼兵的力量，胡尧元等人埋伏的部队也发动进攻，贼兵全面崩溃，退守八字脑。朱宸濠害怕了，把南康、九江的兵力全部调来。王守仁派抚州府知府陈槐、饶州府知府林城去攻取九江，建昌府知府曾璵，广信府知府周朝佐去攻取南康。丙辰日又会战，官军退却，王守仁斩了先退却的人。各路部队拼死战斗，贼兵又大败，退守樵舍，把船拴在一起成为方阵，将黄金珠宝全部拿出来犒赏士兵。第二天早晨，朱宸濠正在朝见他的群臣，官军突然到达，用小船装上木柴，乘风放火，烧掉了他的副船，妃子从姜氏以下都跳水淹死。朱宸濠乘坐的船搁浅不能动，慌忙换船逃走，王冕所率部队追上去抓住了他。李士实、刘养正以及投降反贼的按察使杨璋等人都被擒。南康、九江也攻下了。总共三十五天而反贼平定。京师起初听到事变消息，大臣们都震惊恐惧。王琼大声地说：“王伯安驻在南京上游，必定能抓住反贼！”到这时，果然奏上了捷报。

皇帝这时已亲自出征，自称为威武大将军，率领京师附近守边界的勇猛士卒好几万南下。命令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同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带领京军好几千，溯长江而上，抵达南昌。那些皇帝宠幸的太监们以前与朱宸濠通谋，王守仁最初送上的有关朱宸濠造反的奏章，曾因此说到：“窥伺陛下权位的不仅仅是一个宁王，请求罢斥那些奸诈阿谀的人来挽回天下豪杰对陛下的忠心。”所以那些受宠幸的人都很恨他。朱宸濠平定以后，则又合伙儿嫉妒他的

功劳。而且害怕王守仁见到天子会揭发他们的罪恶，便争着制造流言蜚语，说王守仁起先和朱宸濠通谋，顾虑事情不能成功，才起兵讨伐。又想叫王守仁把朱宸濠放走到鄱阳湖里去，等皇帝自己来捉拿。

王守仁乘张忠、许泰还没到，先俘掳了朱宸濠，从南昌出发。张忠、许泰以威武大将军军令的名义邀他去广信。王守仁不愿把朱宸濠交给他们，走僻径赶到玉山，给皇帝上书请求献俘，劝止皇帝南征，皇帝不允许。到钱唐，遇到太监张永。张永负责协助皇帝策划机密军事要务，地位在张忠、许泰一班人之上，而且以往和杨一清友好，合力除掉刘瑾，天下人都称道他。王守仁夜里去拜见张永，称颂他的贤明，借此又极力说明江西贫困凋敝，经受不住皇上大军的扰动。张永深深赞同，说：“我到这里来，为的是协调行动维护皇上，不是抢功劳。你的大功勋，我知道，但事情不能径直凭自己的感情去办罢了。”王守仁就把朱宸濠交给张永，而自己到了京口，想到行宫朝见皇帝。接到巡抚江西的命令，就回到南昌。张忠、许泰已经先到，恼恨没弄到朱宸濠，故意放纵京军去冒犯王守仁，有的还指名道姓地谩骂。王守仁不为之动声色，对他们的抚恤更加优厚，病了的给药，死了的给棺材，路上遇到给死亡官兵送葬的，一定停下车来慰问好久才离开。京军官兵都说王都堂爱护我们，没有再冒犯他的。张忠、许泰说：“宁王府的富足殷实天下数第一，现在他所积蓄的财富在哪里？”王守仁说：“朱宸濠往常把财富全部输送给京师的显要人物，约好做他的内应，这是有帐本可查的。”张忠、许泰以前是曾接受过朱宸濠的贿赂的，气势便消失不敢再说什

么。完了，轻视王守仁是个文人，强使他射箭。王守仁慢悠悠站起来，三发三中，京军都欢呼，张忠、许泰更加丧气。正值冬至，王守仁命令居民举行巷祭，完了，又上坟去哭。当时因新近发生死亡与动乱，悲哭声震动原野，京军离家很久了，听了没有不落泪想回去的。张忠、许泰不得已只好班师回京。等到见了皇帝，和纪功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一起千方百计诋毁王守仁，只有张永常常说些好话帮着他。张忠在皇帝面前扬言说：“王守仁必定造反。试召他来看看，必定不会来。”张忠、许泰曾屡次假冒皇帝的旨意召王守仁去，王守仁收到了张永的密信，就是不去。到这时知道是出自皇帝本人的意思，立即急驰赶到。张忠、许泰的计谋失败，就不让他见皇帝。王守仁就进入九华山，日暮时坐在和尚庙里。皇帝探知后，说：“王守仁是学道的人，听到召唤就来了，为什么说 he 造反！”就派遣他回到自己镇守的地方，让他另行送上捷报。王守仁就修改以前的奏章，说是奉行威武大将军的谋略讨平了叛乱，而又把皇帝宠幸的人的名字全部写进去，江彬等人才无话可说。

当这个时候，那些进谗言的邪恶者诬陷煽动，灾祸变故无法预测，没有王守仁，东南部的事情极为危险。世宗皇帝深知这一点，才接位，就急忙催促他进京接受封赐。而大学士杨廷和与王琼互相不和睦。王守仁前后平定叛逆，总是归功于王琼，杨廷和很不高兴，大臣们也嫉妒他的功劳。正值有说武宗皇帝的丧事没有结束，不应当举办宴会施行赏赐的，于是只拜王守仁为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不去赴任，请求回家省亲。完了，讨论他的功劳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

建伯，爵位世袭，每年禄米一千石。然而不发给他世代收藏的铁制证书，每年的禄米也不给。一起共事而有功的，只有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做上大官，受上等赏赐。其他人都名义上表示升官，而暗地罢黜，废弃排斥没有一个留下的。王守仁极为愤慨。这时已在为父亲服丧，屡次上疏辞去爵位，请求纪录共事的臣子们的功劳，都答复按下不讨论。服完丧，也不召用他。过了好久，他所友爱的席书以及学生方献夫、黄绾由于议论大礼的事得到宠幸，在张璁、桂萼面前说了话，将要召用他，而费宏素来恨王守仁，又阻碍了他。多次推举为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等，都没有真用他。

世宗嘉靖六年，思恩府、田州的少数民族酋长卢苏、王受反叛。总督姚镛不能平定，就下诏让王守仁以原任官职兼任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黄绾借机上书颂扬王守仁的功劳，请求赐给他铁制证书和每年的禄米，并分别等级奖励和任用曾一起征讨反贼的臣子们，皇帝都答复同意。王守仁在半路上上疏陈述用兵的不对，而且说：“思恩府没有设置朝廷派去的流动官时，当地土人的酋长每年出兵三千，听候官府征调。设立流动官以后，我们反而每年要派兵好几千去防守。这样流动官的设立，没有益处不难知道了。而且田州邻近交趾，深山绝谷中，都是瑶族、僮族占据，必须仍旧设立当地土人担任的官，这才可以凭借他们的兵力作为屏障。如果改当地官为流动官，边界的外患就要我们自己去承当，将来必然产生后悔。”奏章下交兵部，兵部尚书王时中逐条陈述其中五点不对之处，皇帝命令王守仁再考虑。十二月，王守仁抵达浔州，正逢巡按史石金确定了进行招抚的办法，把各

路兵马全部解散，留下永顺，保靖的士兵几千人，解下盔甲休息。卢苏、王受起初要求安抚未成功，听说王守仁到了更加害怕，到这时便十分高兴。王守仁去到南宁，这两人派使者请求投降，王守仁命令他们到总督衙门来。两人私下商议说：“王大人向来多诡计，恐怕会诈我们。”于是布好阵势才进去拜见。王守仁数落了两人的罪过，杖打一顿才释放。又亲自到他们的军营里去，安抚他们的七万部众。上奏告知朝廷，陈述了用兵的十条害处，招抚的十条好处。于是请求再设立流动官，酌量割出田州的部分土地，另立一个州，用岑猛的第二个儿子岑邦相充当吏目，代理州里的事务，等他有了功劳就提拔为知州。而在田州设立十九个巡检司，让卢苏、王受等人任职，都接受流动官知府的节制指挥。皇帝都同意了。

断藤峡中瑶人的反贼，上面连络八寨，下面和仙台、花相各洞的蛮人串通，盘踞长达三百多里的地方，各州县受其害好几十年。王守仁想讨伐他们，所以留在南宁。把湖广调来的兵力撤走，示意不再用兵。侦察到反贼没有防备，进兵攻破牛肠、六寺等十多个寨子，峡里的反贼都平定。便沿着横石江而下，攻克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罗凤各地的反贼。命令布政使林富率领卢苏、王受的部下径直抵达八寨，攻破石门，副将沈希仪拦路斩杀逃跑的贼兵，完全平定八寨。

起初，皇帝因为卢苏、王受的招抚成功，派使者持盖了御玺的诏嘉奖。等到王守仁奏上平定断藤峡的捷报，就用亲手写的诏书问内阁大臣杨一清等，说王守仁夸大自己的功劳，而且提到他平时学术上的问题。杨一清等人不知拿什么话回

答。王守仁的起用是由于张璁、桂萼的推荐，桂萼本来不喜欢王守仁，是由于张璁勉强他。后来桂萼当了兵部长官，张璁进入内阁，多年互相不服气。桂萼因骤然贵幸而喜好立功扬名，示意王守仁攻取交趾，王守仁推辞不答应。杨一清向来赏识王守仁，然而王守仁的学生黄绾曾上疏想让王守仁进入内阁辅臣之列，诋毁过杨一清，杨一清也不能不把对黄绾的恨转移到王守仁身上。桂萼便公然诋毁王守仁征讨和招抚两方面都失策，赏赐办法不执行。王守仁的学生方献夫以及霍韬感到不平，上疏争论此事，说：“各寨瑶人为害多平，起初曾用兵好几十万，只得到一个田州，随即又招来侵扰。王守仁只用几句话跑去开导，思恩府和田州的酋长就叩头降服。至于八寨、断藤峡的反贼，依仗悬崖绝壁，本朝初创以来没有敢轻易谈论剿灭的，现在一举扫平，如同摧枯拉朽。议论的人却说王守仁只奉到命令征讨思恩府、田州，并没有奉到命令去征讨八寨。古代的大夫去到边疆，有可以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事情，专权办理是可以的，何况王守仁本来是接受了诏令允许依情况的便利与需要办理事情的呢？”王守仁讨平叛变的藩王，嫉妒的人诬蔑他起初曾同反贼通谋，又诬蔑他用车子装载反贼的金银财帛。当时的大臣杨廷和、乔宇把这件事描绘成事一样，到现在还没有洗刷清白。像王守仁这样的忠诚，这样的有功，头一次在江西受冤屈，第二次在两广受冤屈。臣下担心勤劳的臣子都会心灰意懒，将士们都会体倦神疲，今后边疆有难，谁又会替陛下当此重任！”皇帝只答复“知道了”而已。

王守仁已经病得很重，上疏请求保全完整的骸骨回去，举

荐鄖阳巡抚林富接替自己，不等命令便回家了。走到南安便死去，享年五十七岁。灵柩经过江西，军民没有不穿上白色丧服哭送的。

王守仁天生姿质异常聪敏。十七岁拜见上饶的娄谅，和他讨论朱子所论“格物”的基本意旨。回家后，每天端正地坐着，研读《五经》，不随便谈笑。游九华山回来，在阳明洞中修筑了居室，广泛涉猎释氏、老氏的学说，好几年都没什么收获。贬官到龙场驿，贫穷荒僻的地方没有书籍，天天思考以前学到的东西。忽然体悟到《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通过格物求得知识），应当到自己的心里去求，不应当到事物中去求，感叹地说：“道就在这里了。”于是深信不疑。他用教学生的，专门以推极内心的良知为主。说宋代周敦颐，程颐二子之后，只有住在象山的陆九渊的主张是求得知识的最简易快速的办法，有可以继承孟子的理论之处。而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之类，是他中年尚未定论时的说法。学者们很快便纷纷信从他，世上便有“阳明学派”了。

王守仁死后，桂萼上奏说他擅自脱离职守。皇帝大怒，下交朝廷大臣讨论。桂萼等说：“王守仁做事不师法古代，立言不称述先师。想标新立异以炫耀其高明，便否定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理论；知道舆论不赞成他，便编写论证朱熹到晚年才确定结论的书。以此号召他的门徒，彼此一唱一和。才智高明的喜欢其学说容许任意胡来，平庸低下的利用其虚假不实的名声。传授讲习的过程中辗转发生讹错，悖理荒谬愈加严重。但讨伐和捕捉瑶人中的反贼，擒拿叛变的藩王，功劳有足取之处，应当免于追夺伯爵的封号以表明巨大的信用，禁

止他的邪说流行以端正世道人心。”皇帝便下诏停止爵位的世袭，规定的丧葬礼仪和抚恤措施也不执行。穆宗隆庆元年，朝廷大臣很多人颂扬他的功德，皇帝下诏赠给新建侯的爵名，赐他谥号叫文成。二年，给予世袭伯爵的恩典。既而又有请求让王守仁、薛瑄、陈献章一起在文庙陪从孔子受祭祀的。皇帝只同意礼部大臣的建议，将薛瑄配祀。到神宗万历十二年，御史詹事讲重申前人的请求。大学士申时行等人说：“王守仁讲的‘致知’出自《大学》，‘良知’出自《孟子》。陈献章主张静，是沿袭宋代大儒周敦颐、程颐的说法。况且孝顺友爱、出仕居家都守大节像陈献章这样，气节、文章、功业像王守仁这样，不能说是禅学，的确应当崇敬地祭祀。”而且说胡居仁纯洁的心地与笃实的德行，是舆论所归心的，也应当一起祭祀。皇帝都同意了。到明代终结为止，随从孔子受祭祀的只有王守仁等四个人。

起初王守仁没有亲生儿子，抚养了弟弟的儿子王正宪作为后代。到晚年，生了儿子王正亿，才两岁王守仁便去世。长大后，承袭了锦衣卫副千户的职位。隆庆元年，承袭了新建伯的爵位。万历五年去世。他儿子王承勋继承爵位，监督漕运达二十年之久。王承勋的儿子王先进没有儿子，想要让弟弟王先达的儿子王业弘继承。王先达的妻子说：“大伯没有儿子，爵位自然应当传给我丈夫。再由我丈夫传给我儿子，这样爵位还能跑到哪里去？”王先进大怒，因而抚养族兄弟的儿子王业洵为后代。等到王承勋死后，王先进没来得及承袭爵位便死了。王业洵自认为不是嫡传的继承人，最终还将归还爵位给王先达，而且担忧他会来争抢，于是毁谤王先达是养

子，而另推王承勋的弟弟的儿子王先通应当继承。屡次打官司打到朝廷，好几十年不能判决。崇祯时，王先达的儿子王业弘又与王先通上疏争辩。而王业洵的哥哥王业浩当时担任总督，官府怕忤逆了王业浩的心意，终于让王先通继承了。王业弘拿着奏疏进宫门控诉，自己割脖子没有割断，被抓住送进牢狱，不久即释放。王先通承袭伯爵才四年，流寇攻陷京师，被杀。

王守仁的弟子满天下，其中另有传记的不再在这里记载。只有冀元亨曾经和王守仁一起共患难。

冀元亨，字惟乾，武陵县人。笃实地信仰王守仁的学术。考上正德十一年的举人。在赣州府师从王守仁，王守仁委托他教自己的儿子。

朱宸濠怀有不法的企图，而表面上追求高尚的名声，写信给王守仁请教学问，王守仁派冀元亨去教他。朱宸濠用话挑唆他，他假装不懂，只与对方谈论学问，朱宸濠把他看成书呆子。后来有一天给朱宸濠讲解张载写的《西铭》，反复阐明君臣之间的大义非常详尽。朱宸濠也佩服，赠给他丰厚的礼物送他回去，冀元亨把赠品还给了官府。不久后，朱宸濠造反失败，张宗、许泰诬蔑王守仁与他通谋。问朱宸濠，说没有这事。张忠等问个不停，回答说：“只是曾派冀元亨来讲论学术。”许忠等大喜，拷打冀元亨，又施以炮烙之刑，他始终不承认，被戴上刑具关在京师的牢狱里。

世宗接位，进言的人都替他昭雪冤枉，放也牢狱后五天就死了。冀元亨在牢狱里，友好地对待囚犯们像兄弟一样，囚犯们都感动得掉泪。他被逮捕的时候，官吏捆绑他妻子李氏，

李氏面无惧色，说：“我丈夫尊敬老师乐于为善，难道人有别的图谋。”在牢狱里和两个女儿纺麻线不停手。事情快弄清楚时，看守官想把她放出去。她说：“没见到我丈夫，出了狱又到哪儿去？”负责审查的官僚们的妻子听说她很贤慧，请她去见面，推辞不去。随即到牢里去见她，她就穿着囚服相见，手里的麻线也不放下。问她丈夫的学问，回答说：“我丈夫的学问，不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种种规矩的范围之外。”听到的人都很敬畏。

史官赞道：王守仁开始时以正直的节操著称于世。等到负责边疆的事，统率弱小的军队，带领书生们扫荡多年逍遥法外的盗贼，平定叛逆的藩王。明代到终结时止，文臣用兵夺得胜利，没有比得上王守仁的了。每当危难与狐疑之际，神智愈加镇定，思臣万无一失，虽然是由于天资高超，恐怕也是内心修养上有所收获吧。骄矜于自己的创见，标新立异于先儒之后，终于被学者所讥弹。王守仁曾说胡世宁缺少讲学工夫，胡世宁说：“胡某只恨王公多了一个讲学罢了。”桂萼的议论，虽然是出于嫉妒的私心，但也还是他讲学的流弊实在是如此，的确是不能够因为他功劳多而替他隐瞒的啊！

（陈金生 译）

【原文】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

父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学士、少詹事。华有器度，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广贵幸，华讲《大学衍义》，至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指陈甚切。帝命中官赐食劳焉。正德初，进礼部左侍郎。以守

仁忤刘瑾，出为南京吏部尚书，坐事罢。旋以《会典》小误，降右侍郎。瑾败，乃复故，无何卒，华性孝，母岑年逾百岁卒。华已年七十余，犹寝苦蔬食，士论多之。

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使治前威宁伯王越葬，还而朝议方急西北边，守仁条八事上之。寻授刑部主事。决囚江北，引疾归。起补兵部主事。

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伏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守仁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棲守仁。瑾诛，最移庐陵知县。入观，迁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清改之验封。屡迁考功郎中，擢南京太仆少卿，就迁鸿臚卿。

兵部尚书王琼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当是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浚头，皆称王，与大庚陈日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攻剽府县。而福建大帽山贼詹师富等又起。前巡抚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乐昌贼掠大庚，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吴玘战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贼耳目，乃呼老黠隶诘之。隶战栗不敢隐，因贯其罪，令问贼，贼动静无勿知。于是檄福建、广东会兵，先讨大帽山贼。

明年正月，督副使杨璋等破贼长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挥覃桓、县丞纪镛战死。守仁亲率锐卒屯上杭。佯退师，出

不意捣之，连破四十余寨，俘战七千有奇，指挥王铠等擒师富。疏言权轻，无以令将士，请给旗牌，提督军务，得便宜从事。尚书王琼奏从其请。乃更兵制：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哨有长，协哨二佐之；二哨为营，营有官，参谋二佐之；三管为阵，阵有偏将；二阵为军，军有副将。皆临事委，不命於朝；副将以下，得递相罚治。

其年七月进兵大庾。志山乘间急攻南安，知府季塚击败之。副使杨璋等亦生絜曰能以归。遂议讨横水、左溪。十月，都指挥许清、赣州知府邢珣、宁都知县王天与各一军会横水，塚及守备郑文、汀州知府唐淳、县丞舒富各一军会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乡知县张晋戡遏其奔轶。守仁自驻南康，去横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贼巢左右，进军逼之。贼方迎战，两山举帜。贼大惊，谓官军已尽犁其巢，遂溃。乘胜克横水，志山及其党萧贵横等皆走桶冈。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冈险固，移营近地，谕以祸福。贼首蓝廷凤等方震恐，见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夺险入。贼祖水阵，珣直前搏战，文定与戡自右出，贼仓卒败走，遇淳兵又败。诸军破桶冈，志山、贵模、廷凤面缚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斩六千有奇。时湖广巡抚秦金亦破福全。其党千人突至，诸将擒斩之。乃设崇义县于横水，探诸瑶。还至赣州，议讨浚头贼。

初，守仁之平师富也，龙川贼卢珂、郑志高、陈英咸请降。及征横水，浚头贼将黄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独仲容未下。横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来归，而严为战守备。谗言珂、志高，仇也，将袭我，故为备。守仁佯杖系珂等，而阴使珂弟

集兵待，遂下令散兵。岁首大张灯乐，仲容信且疑。守仁赐以节物，诱入谢。仲容率九十三人管教场，而自以数人入谒。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宫，厚饮食之。贼大喜过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观灯乐。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门，诸贼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将抵贼巢，连破上、中、下三泷斩馘二千有奇。余贼奔九连山。山横亘数百里，陡绝不可攻。乃简壮士七百人衣贼衣，奔崖下，贼招之上。官军进攻，内外合击，擒斩无遗。乃于下泷立和平县，置戍而归。自是境内大定。

初，朝议贼势强，登广东、湖广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冈既灭，湖广兵始至。及平泷头，广东尚未承檄。守仁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进右副都御史，予世袭锦衣卫百户，再进副千户。

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军。行至丰城而宁王宸濠反，知县顾佖以告。守仁急趋吉安，与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楫，传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郎中曾直，御史张鳌山、周鲁，评事罗侨，同知郭祥鹏，进士郭持平，降谪驿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军。御史谢源、伍希儒自广东还，守仁留之纪功。因集众议曰：“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计挠之，少迟旬日无患矣。”乃多遣间谍，檄府县言：“都督许泰、郤永将边兵，都督刘晖、桂勇将京兵，各四万，水陆并进。南赣王守仁、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合十六万，直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军法论。”又为蜡书遗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其归国之诚，令从臾早发兵东下，而

纵谋泄之。宸濠果疑。与士实、养正谋，则皆劝之疾趋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余日间知中外兵不至，仍悟守仁给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榦居守，而劫其众六万人，袭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庆。

守仁闻南昌兵少则大喜，趋樟树镇。知府临江戴德孺、袁州徐珪、赣州邢珣，都指挥余恩，通判瑞州胡尧元童琦、抚州邹琥、安吉谈储，推官王玮、徐文英，知县新淦李美、泰和李辑、万安王冕、宁都王天与，各以兵来会，合八万人，号三十万。或请救安庆，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为贼守，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捣南昌。贼精锐悉出，守备虚。我军新集气锐，攻必破。贼闻南昌破，必解围自救。逆击之湖中，蔑不胜矣。”众曰“善”。己酉次丰城，以文定为前锋，先遣奉新知县刘守绪袭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广润门，守兵骇散。辛亥黎明，诸军梯缒登，缚拱榦等，官人多焚死。军士颇杀掠，守仁戮犯令者十余人，宥胁从，安士民，慰谕宗室，人心乃悦。

居二日，遣文定、珪、珪、德孺各将精兵分道进，而使尧元等设伏。宸濠果自安庆还兵。乙卯遇于黄家渡。文定当其前锋，贼趋得。珪绕出贼背贯其中，文定、恩乘之，珪、德孺张两翼分贼势，尧元等伏发，贼大溃，退保八字脑。宸濠惧，尽发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抚州陈槐、饶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琦、广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复战，官军却，守仁斩先却者。诸军殊死战，贼复大败，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尽出金宝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官军奄至。以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焚其副舟，妃妻姜氏以下皆投水死。宸

濠舟胶浅，仓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执之。士实、养正及降贼按察使杨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贼平。京师闻变，诸大臣震惧。王琼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至是，果奏捷。

帝蛙已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命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将京军数千，激江而上，抵南昌。诸劈幸故与宸濠。守仁初上宸濠反书，因言：“觊觎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诸劈幸皆恨。宸濠既平，则相与媚功。且惧守仁见天子发其罪，竟为蜚语，谓守仁先与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纵宸濠湖中，待帝自擒。

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发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将军檄邀之广信。守仁不与，间道趋玉山，上书请献俘，止帝南征。帝不许。至钱唐遇太监张永。永提督赞书机密军务，在忠、泰辈上，而故与杨一清善，除刘瑾，天下称之。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勋，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闻巡抚江西命，乃还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纵京军犯守仁，或呼名嫚骂。守仁不为动，抚之愈厚。病予药，死予棺，遭丧于道，必停车慰问良久始去。京军谓王都堂爱我，无复犯者。忠、泰言：“宁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异时尽以输京师要人，约内应，籍可按也。”忠、泰故尝纳宸濠贿者，气慑不敢复言。已，轻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发三中。京军皆欢呼，无不泣下思归者。忠、泰

不得已班师。比见帝，与纪功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谗毁百端，独永时左右之。忠扬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试召之，必不至。”忠、泰屡矫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驰至。忠、泰计沮，不令见帝。守仁乃入九华山，日晏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劈幸名，江彬等乃无言。

当是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微守仁，事几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学士杨廷和与王琼不相能。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会有言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书。守仁不赴，请归省。已，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当上赏。其他皆名示迁，而阴绌之，废斥无存者。守仁愤甚。时已丁父忧，屡疏辞爵，乞录诸臣功，咸报寝。免丧，亦不召。久之，所善席书及门人方献夫、黄绾以议礼得幸，言于张璁、桂萼，将召用，而费宏故衔守仁，复沮之。屡推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

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反。总督姚镛不能定，乃诏守仁以原官兼左部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绾因上书讼守仁功，请赐铁券岁禄，并叙讨贼诸臣，帝咸报可。守仁在道，疏陈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设流官，土酋岁出兵三千，听官征调。既设流官，我反岁遣兵数千防戍。是流官之设，无益可知。且田州怜交趾，深山绝谷，翻瑶、僮盘据，必乃设土官，斯可藉其兵力为屏蔽。若改土为流，则边鄙之

患，我自当之，后必有悔。”章下兵部，尚书王时中条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议。二二月，守仁抵浔州，会巡按御史石金定计招抚。悉散遣诸军，留永顺、保靖土兵数千，解甲休息。苏、受初求抚不得，闻守仁至益惧，至是则大喜。守仁赴南宁，二人遣乞降，守仁令诣军门。二人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给我。”陈兵入见。守仁数二人罪，杖而释之。亲入营，抚其众七万。奏闻于朝，陈用兵十害，招抚十善。因请复设流官，量割田州地，别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为吏目，署州事，俊有功擢知州。而于田州置十九巡检司，以苏、受等任之，并受约束于流官知府。帝皆从之。

断藤峡瑶贼，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诸洞蛮，盘互三百余里，郡邑罹害者数十年。守仁欲讨之，故留南宁。罢湖广兵，示不再用。伺贼不备，进破牛肠、六寺等十馀寨，峡贼悉平。遂循横石江而下，攻克仙台、花相、白竹、古陶、罗凤诸贼。令布政使林富率苏、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门，副将沈希仪邀斩轶贼，尽平八寨。

始，帝以苏、受之抚，遣行入奏玺书奖谕。及奏断藤峡捷，则以手诏问阁臣杨一清等，谓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学术。一清等不知所对。守仁之起由璉、萼荐，萼故不善守仁，以璉强之。后萼长吏部，璉入内阁，积不相下。萼暴贵喜功名，风守仁取交趾，守仁辞不应。一清雅知守仁，而黄绂尝上疏欲令守仁入辅，毁一清，一清亦不能无移憾。萼遂显底守仁征抚效失，赏格不行。献夫及堆韬不平，上疏争之，言：“诸瑶为患积年，初尝用兵数十万，仅得一田州，旋复召寇。守仁片言驰谕，思、田稽首。至八寨、断藤峡贼，阻深

严绝冈，国初以来未有轻议剿者，今一举荡平，若拉枯朽。议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专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诏得便宜从事者乎？守仁讨平叛藩，忌者诬以初同贼谋，又诬其辇载金帛。当时大臣杨廷和、乔宇饰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於两广。臣恐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此疆圉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帝报闻而已。

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竟归。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者。

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急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萼等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化，背谬弥甚。但讨捕举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帝乃下诏停世袭，卹典俱不行。隆庆初，廷臣多颂其功。诏赠新建侯，谥文成。

二年予进袭伯爵。既又有请以守仁与薛瑄、陈献章同以祀文庙者。帝独允礼臣议。以瑄配。及万历十二年，御史詹事讲申请前。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陈献章主静，沿宋儒周敦颐、程颢。且孝友出处如献章，气节文章功业如守仁，不可谓禅，诚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纯以笃行，众论所归，亦宜并祀，帝皆从之。终明之进，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始守仁无子，育子正宪为后，晚年，生子正亿，二岁而孤。即长，袭锦衣副千户。隆庆初袭新建伯。肆历五年卒。子承勋嗣，督漕运二十年。子先进，无子，将以弟先达子业弘继。先达妻曰：“伯无子，爵自传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进怒，因育族子业洵为后。及承勋卒，先进未袭死。业洵自以非嫡嗣，终当归爵先达，且虞其争，乃谤先达为乞养，而别推承勋弟子先通尝嗣，屡争于朝，数十年不决，崇祯时，先达子业弘复与通疏辨。而业洵兄业浩时为总督，所司惧忤业浩，竟以先通嗣。业弘愤，持疏入禁门诉。自刎不殊，执下狱，寻释。先通袭伯四年，流贼隐京师，被杀。

守仁弟子盈天下，其有传者不复载，惟冀元亨尝与守仁共患难。

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笃信守仁学。举正德十一年乡试。从守仁于赣，守仁属以教子。宸濠怀不轨，而外务名高，贻书守仁问学，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语挑之，佯不喻，独与之论学，宸濠目为凝。他日讲《西铭》，反覆君臣义甚悉。宸濠亦服，厚赠遣之，元亨反其赠于官。已，宸濠败，张忠、许泰诬守仁与通。诘宸濠，言无有。忠等诘不已，曰：“独尝

遣冀元亨论学。”忠等大喜，擄元亨，加以炮烙，终不承，械系京师诏狱。

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冤，出狱五日卒。元亨在狱，善待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系其妻李，李无怖色，曰：“吾夫尊师乐善，岂他虑哉。”狱中与二女治麻枲不辍。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见吾夫，出安往？”按察诸僚妇闻其贤，召之，辞不赴。已就见，则囚服见，手不释麻怠。问其夫学，曰：“吾夫之学，不出闺门衽席间。”取者悚然。

罗钦顺传

——《明史》卷二八二

【说明】罗钦顺（1465—1547）是明代哲学家。曾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父丧以后，再未去做官，隐居家乡二十多年，潜心著书立说，足不入城市。

罗钦顺早年笃信佛学，后断然舍弃，归于儒学之门。他自称道学家，推崇程朱理学，反对陆王心学，实际上他与程朱的思想也有很大区别与矛盾。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理”是“气”运动变化的一定条理秩序，不是神秘莫测主宰一切的东西，认为“理”与“气”是一种东西，“除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批判了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他认为自然界最主要的规律是“生生之序”即运动变化的普遍性及自身的特殊性；他首先把人当做一个生物来看待，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物，但有与万物不同的特点，人心是思维的器官，但他认识不到人的社会性，认为人性是天命的，在认识论上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他是一位富有战斗性的思想家，他对陆王等心学家甚至朱熹的某些观点都展开了批判。他在明朝最黑暗的时期，也为当时民间疾苦呐喊，想从改善道德风

尚入手，拯救日薄西山的明王朝。

他的著作主要有《困知记》和《续记》、《再记》、《三续》、《四续》等，此外有《整庵存稿》二十卷。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今江西省太和县）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授编修，升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际行动教育士人。不久，送父母归乡，因此乞求回家乡为父母养老。刘瑾很生气，剥夺了他的职务让他成为老百姓。刘瑾被杀以后，又给罗钦顺授官，迁南京太常少卿，再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世宗继位，命罗钦顺辅佐尚书事务。他上疏说：“任职很久和超迁的，在法度上要疏通。”没有回音。又要议起大礼，罗钦顺请求慎重举行大礼，以全圣上之孝，也没有回答。迁为南京吏部尚书。探望父母，乞求归乡。又改派他为礼部尚书，正好赶上父亲的丧事，没有来得及拜授。再次起用任为礼部尚书，他辞谢不任，又改为吏部尚书。皇上下诏敦促，他再次提出辞职，才允许他退休，并让有司给予禄米。当时张璁、桂萼以讨论礼义突然显贵，把持政事，培养党徒，摒弃驱逐正直之人。罗钦顺耻与他们为伍，所以屡次下诏要他做官，他都不愿出来。

他在家乡隐居二十多年，足迹从未到过城市，潜心研究格物致知的学问。王守仁以“心学”立教，富有才学知识的士人都一致去师从王守仁的“心学”。罗钦顺写信给王守仁，大概说：“圣门确立教义，文与行两者兼顾，博学于文，才有明确的义训。如果说学习可以不借助外部事物，只应反观内省，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有什么不能穷尽的，还一定

要在入门之际，加上格物的功夫呢？”王守仁接到罗钦顺的信后，也写了一封信回复他。大概说，“理没有内外之分，性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学也就没有内外之分。讲习讨论并非说‘内’不需要，反观内省也不是说把‘外’遗落一边不管。”他反复讨论了二千多字。罗钦顺又写信与王守仁辩论。罗钦顺说：“先生讲推究事物的道理，是推究其心中的事物；是推究其意念中的事物；是推究其知道的事物。正心，是正其物之心。诚意，是诚其物之意。获得知识，是获得其物的知识。自从有《大学》以来，还没有这样的论点。说什么推究自己心中的事物、推究自己意念中的事物、推究自己知识中的事物。这样的事物有三类，即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和。可这作为事物只有一类罢了。就事物有三类而言，用程子的推究事物道理之法推导，还可以讲通，拿先生推究事物道理的办法推论，就讲不通了。就一种事物来说，那所讲的事物究竟是什么事物呢？如果一定说它是被意念所用的，这样虽然安排得十分巧妙，但最终还是没有讲通的一天。另外先生讨论学习《书》时谈到：‘我心中的良知，即所谓天理，获得我心中良知的天理到事物上，那么万事万物都得到其道理了。获得我心中的良知，就是获得知识。万事万物都得到其道理，就是推究事物的道理。’如果真象先生所说，那么《大学》应当是：‘推究事物的道理，在于获得知识。’而不应该说：‘获得知识，在于推究事物的道理，以及事物的道理被推究，这样才获得了知识。’罗钦顺的信还没到达王守仁的手中，王守仁就去世了。

罗钦顺做学问，致力于推究事理，存心知性。他最初是

从佛教那里入门的，后来省悟到佛说不对，于是全力排斥它。他说佛教的明心见性，与我们儒家的尽心知性相似，但本质上不一样。佛教的学说，大抵只能见于心而不见于性。现在的人讲明心之说，常混同于禅学，而并不知道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谬误。道学不能被人明了的原因，将由此产生，罗钦顺有点担忧。因此著《困知记》。他自号整庵。八十三岁那年去世。封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孙剑 译）

【原文】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进士及第，授编修。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世宗即位，命摄尚书事。上疏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迁南京吏部尚书，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时张璁、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

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

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钦顺再以书辨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歿。

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困知记》，自号整庵，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陈献章传

——《明史》卷二八三

【说明】陈献章（1428—1500）是明代哲学家、学者。曾受学于吴与弼，绝意科举。曾应召，授翰林院检讨而归，以后长期在家乡讲学。

陈献章是宋代“心学”的继承者，继承陆九渊“心即理也”的观点，认为宇宙只是一理的表现，这理便是心。他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提倡“主静”，这与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有直接承继之处。他认为“诚”（又称“道”、“理”）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而诚却是“具于一心”，实际上他是说天地万物是“心”的显现和派生物。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了万事万物都当“求诸心”的主张，把人的认识活动规定为人心的自我体现；他认为这一认识主要靠“静坐”实现，为此，必须去掉一切人事作为，以求“自进出”心中本有的“善端”。他与陆九渊有所不同之处在于“存养”方面不强调“去私欲”，而提倡所谓“以自然为宗”。在他的思想中道家的影响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著述后人编为《白沙子全集》及《与林缉熙书》。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今广东省新会县）人。举正统十二年（1447）乡试，再上礼部，没有及第。跟随吴与弼讲学。过了半年时间回来，白天黑夜读书从不停息。修筑阳春台，在其中静坐，好多年户外没有他的足迹。很久以后，再次游览太学。祭酒邢让让他和杨时《此日不再得》诗一篇考他，祭酒惊叹“龟山先生都不如啊。”在朝廷传扬他的事迹，认为是真正的儒者又出现了。由于名声震动京师。给事中贺钦听过他的议论，当天就坚持上疏辞去官职，行弟子礼奉事陈献章。陈献章回家乡以后，每天都有四面八方来求学的人。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朱英接连推荐他。陈献章被召到京城，命他去吏部考试。多次称说有病不去应试，上疏乞求养天年，授他翰林院检讨官回归乡里。到达南安，知府张弼怀疑他拜了官，与吴与弼不一样。他回答说：“吴先生以一介布衣被石亨所举荐，所以不求职官而求观读秘书，希望主上开化顿悟罢了。可当时的负责人不明白他的意思，先命令他受职然后再去观读秘书，这大大违背了先生的胸意，于是他决然走掉了。献章只不过听选国子生，怎么敢说假话钓取虚誉呢？”从此后，屡次举荐他，他一直没有答应，到死再未得起用。

陈献章的学说，以静为主。他教学，仅仅让学生端坐澄心静气，从安静中培养出头绪。有人劝他写作著述，他不予回答。曾经自言自语说：“我二十七岁的时候，才跟随吴聘君学习，对于古代圣贤的著作没有不讲的，但一直还不知道从何下手。等到回到白沙里，专门探求用力的方法，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收获。于是我舍繁求约，静坐了很久以后，这才见我心的形体慢慢显露了出来，每天的日用之物和应酬来往，都

随心所欲，象马带了笼头一样。”他的学问洒脱独得己意，评论的人说，他的学问有鸢飞鱼跃般的自由之乐趣，而兰谿的姜麟甚至认为他是“活孟子”。

陈献章仪表堂堂，才干杰出，和善伟岸，右脸颊有七颗黑痣。母亲二十四岁就守寡，陈献章事奉母亲特别孝顺。母亲一有思念，他的心速加快，就会回到母亲身边。弘治十三年（1500）去世，享年七十三岁。万历初年，从祀孔庙，追谥为文恭。

陈献章的弟子李承箕，字世卿，嘉鱼（今湖北省嘉鱼县）人。成化二十二年（1486）举乡试。前往师从陈献章，陈献章每天与他爬山涉水，投壶赋诗，纵论古今之事，只是没有一句谈到道学。过了一段时间，李承箕有所顿悟，辞谢老师回到乡里，隐居黄公山，不再出来求取仕途之名。他和兄长进士李承芳，都好学，被称为嘉鱼二李。死时五十四岁。

张翥，字廷实，南海（今广东省南海县）人。也师从陈献章。成化二十四年（1488）举进士。授户部主事。不久遇丧事，多次举荐他，他都不出外做官。正德年间，召用他为南京通政司参议。拜谒了一次孝陵后，立即告退归乡。陈献章说张翥的学问以自然为宗旨，以忘己为最大，以无欲为至上。去世的时候六十岁。（孙剑 译）

【原文】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举正统十二年乡试，再上礼部，不第。从吴与弼讲学。居半载归，读书穷日夜不辍。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久之，复游太学。祭酒邢让试和杨时《此日不再得》诗一篇，惊曰：龟山不如也。”

赐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给事中贺钦听其议论，即日抗疏解官，执弟子礼事献章。献章既归，四方来学者日进。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朱英交荐，召至京，令就试吏部，屡辞疾不赴，疏乞终养，授翰林院检讨以归。至南安，知府张弼疑其拜官，与弼不同。对曰：“吴先生以布衣为石亨所荐，故不受职而求观秘书，冀在开悟主上耳。时宰不悟，先令受职然后观书，殊戾先生意，遂决去。献章听选国子生，何敢伪辞钓虚誉。”自是屡荐，卒不起。

献章之学，以静为生，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谿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献章仪髯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

门人李承箕，字世卿，嘉鱼人。成化二十二年举乡试。往师献章，献章日与登涉山水，投壶赋诗，纵论古今事，独无一语及道。久之，承箕有所悟，辞归，隐居黄公山，不复仕，与兄进士承芳，皆好学，称嘉鱼二李。卒年五十四。

张诩，字廷实，南海人，亦师事献章。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寻丁忧，累荐不起。正德中，召为南京通

政司参议。一谒孝陵即告归。献章谓其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卒年六十。

康有为传

——《清史稿》卷四七三

【说明】康有为（公元 1858—1927 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79 年开始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和国内刚兴起的改良思想，1891 年开始撰写阐述变法理论的著作。1898 年参加会试，联合各省在京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起“公车上书”，提出维新纲领。在京发起组织强学会，推进变法维新从事宣传组织工作。光绪帝派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民国建立后，他于 1919 年参加了张勋的复辟活动，复辟失败，保皇派瓦解。康有为原先从朱次琦受学，后来独立研求经世致用之学。他不仅接受和总结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的变法维新思想，还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民主议会思想。主要著作有《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礼运注》、《论语注》、《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

康有为字广厦，号更生，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考中进士，被任命工部主事。少年时跟随朱次琦游学，广博精通经学、历史，酷好公羊派的学说，谈到孔子改

制时，提倡用孔子诞生年代作为历史纪年，为了尊孔，保护教诲，首先聚集了门徒讲学。赴京师呈递万言书，议论变法，给事中余联沅弹劾康有为迷惑世人欺骗百姓，诋毁圣人无法无天，请求把他所写的书都烧掉。中日甲午战争后议定条款时，康有为聚集了各省在京参加考试的举人向朝廷上奏书，请求拒绝议和、迁都、变法，被阻碍而没有上达。康有为又单独上书，由都察院代奏，光绪帝看了奏书很赞成他的看法，命令将它誊录存放以便考虑。康有为再次请求光绪帝向群臣立誓制定国家大事，开办制度局讨论新的制度，另外设立法律局等机构以推行新的政事，都发下交总理衙门讨论。

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尚书李瑞藻，大学士徐致靖、张百熙，给事中高燮曾等人，都先后上奏疏推荐康有为的才能，这时才被光绪帝召见询问。康有为极力陈述：“四边的外夷交替入侵，国家随时可能灭亡，如果不实行新政变更旧法，就不能自强。变更法制必须统筹全局加以推行，遍及到用人行政等各个方面。”光绪帝感叹道：“怎奈我在做事时有人故意留难牵制？”康有为说：“就皇上现在手中有的权力，实行可以变法的事情，抓住要点加以谋划，也足以挽救国家。只是朝廷的大臣们都很守旧，应当广泛召见职位低的官员，破格提拔任用；另外请求陛下颁布表示哀痛的诏书，可以收拾人心。”光绪帝认为都很对。康有为从上午辰时入见，到下午太阳偏西时才退出，命令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别准许他可以专门上奏折谈事情。不久光绪帝又征召侍读杨锐、中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康有为接连向光绪帝上条陈，於是皇帝下诏制

定科举考试的新章程，取消考试时用《四书》中的句子作试题，改为考政策和时事，开设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兴力农政，奖励新的著作和新式机器，把各省的旧式书院改为学校，允许士民百姓上书言事，告谕实行新政变更旧法。裁抑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机构，以及各省和总督同城的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并且商议开懋勤殿，定制度，改年号换服饰，去南方巡视迁国都，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因为向朝廷进言的途径受到遏制阻碍，首先违反了诏旨，被罢去礼部尚书、侍郎的官职。守旧的大臣们感到怀疑恐惧，纷纷起来指责康有为，御史文悌又对他痛加弹劾。光绪帝先命令康有为督办官方报纸，又催促他离开北京。

光绪帝虽然亲政，但是遇到事情仍旧要秉承慈禧太后的意旨，长期以来感到受外来的欺侮，想要变更旧法力图强盛，采纳康有为的意见，用三个月的期限推行新政，国内外都引起震动和期待。但是新入仕途的人骤然起用，事机不能保密，便促成祸端。当时盛传将要用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人心惶恐疑惑。光绪帝下朱批告谕杨锐等人筹划商议进行调和，朱批中有“朕的皇位将不能保全”的话，这些话都记载在《杨锐传》里。于是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罢掉所有新政。她认为康有为结党营私，用坏话淆乱国家的政事，夺去官职下令逮捕。康有为事先逃走得以幸免，他的弟弟康广仁和杨锐等人被捉住投入监狱，一并被处死。又认为康有为有犯上谋反的反叛行为，制造煽动阴谋，颁布朱批谕告向国内宣示，并且没收他的家产，悬赏捉拿。康有为已经连夜离开

北京乘船南下，由英国兵船迎接抵达吴淞。当时传说光绪帝已经遭到幽禁废黜，而且被杀掉，康有为便起草了遗书，立誓以身殉节，将投海自尽。英国人告诉他这些都是误传，康有为这才脱身逃走，逃亡到日本，流转去南洋，又遍游欧美各国。所到的地方都用尊皇保国作为号召，设立保皇会创办报纸，收集经费计谋再次举事，屡次遭到艰难险阻而不稍停。他曾经组织了富有会。在长江汉水一带发动事变，都被清朝官兵破获，他的同党被处死。清政府连续下令大搜捕，把他所著的书加以焚毁，阅读他主办的报纸、文章的人都一并判罪。起初，慈禧太后打算废掉光绪帝，说他生病召来医生给他看病，长久禁闭在瀛台，生命危在旦夕无法预测。康有为听到消息以后，首先揭露这个阴谋，公正的评论进行抗争劝阻，外国人也纷纷起来加以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样才没有废黜光绪帝。义和拳起事，用灭洋人、杀新党作为口号，慈禧太后想借义和拳树立自己的威信，便造成后来的大乱，凡是和康有为有来往的，动辄以康有为同党的罪名遭到奇祸。

宣统三年，湖北爆发革命，清朝才开放党禁，因为参加戊戌政变而获罪的人全部被免罪，这时康有为逃亡国外已经十几年了，才打算回国。当时革命军已经决定实行共和政体，清政府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而康有为却创议实行虚君共和政体，认为“中国的皇帝制已经实行了几千年，不能突然改变，而大清得到的国家最纯正，清代历朝的德行恩泽深入人心，保留皇帝的尊号来统率全国的五大民族，消灭战乱平息纷争，没有比这种做法更为顺当。”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遵照

革命军的要求，决定改为共和政体，于是清朝政府下了皇帝退位的诏书。康有为知道空话不足以挽回阻挡这种决定，想连结握有军权的人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对当时的执政者进行游说，经过几年而一无所成。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任命康有为担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打算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康有为仍旧主张虚君共和政体。张勋复辟失败，康有为逃到美国使馆，不久便脱身回到上海。

民国十三年，驱逐溥仪出宫的事件发生，修改对清朝废帝的优待条件，康有为打电报到北京进行力争，大意说：“优待条件，是大清皇帝和民国临时政府共同议定的，永远有效，由英国大使保证，并且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国，用来昭示重要的信用，无异是国际条约。现在政府擅自改变条文，强迫对方签字认可，还胆敢带兵进宫搜查，侵犯皇帝，欺侮并驱逐后妃，查抄没收宫中的宝贝器物，不顾国家的信誉，仓促之间签订协定，那么以后国内的宪法，国际上的条约，都可以立即废除，这样还能够立国吗？皇上是天下为公，中国和外国共同敬仰，难道值得和你们相争，实际上是为民国感到羞耻！”第二年，溥仪移居天津，康有为从上海到天津拜见溥仪，用进德、修业、亲贤、远佞作为进言。民国十六年，康有为七十岁时，溥仪写了“寿”字赏赐给他，康有为亲笔上疏给溥仪表示感泣拜谢，一一叙述了清朝皇帝对自己的恩遇和个人一生艰难险阻的状况，写得悲愤动人。当时康有为怀今感旧，极其悲伤痛苦，无缘无故地忽哭忽笑。康有为自己知道病好不了，便起草了遗书，在青岛病逝。

康有为的天资奇异，对古今的学术无所不通，自信很坚

定，常常有独创的见解，能够开风气之先。首先谈改制，其次谈论大同世界，认为太平盛世一定可以很容易地达到，最终领悟到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互为一体的道理。康有为撰写的作品很多，著作有《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同书》、《物质救国论》、《电通》以及《康子内外篇》、《长兴学舍》、《万木草堂》、《天游庐讲学记》，还有各国的游记以及文集、诗集。

（何双生 译）

【原文】

康有为，字广厦，号更生，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用工部主事。少从朱次琦游，博通经史，好公羊家言，言孔子改制，倡以孔子纪年，尊孔保教，先聚徒讲学。入都上万言书，议变法，给事中余联沅劾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请焚所著书。中日议款，有为集各省公车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格不达。复独上书，由都察院代递，上览而善之，命录存备省览。再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议新制，别设法律等局以行新政，均下总署议。

二十四年，有为立保国会于京师，尚书李端棻，学士答致靖、张百熙，给事中高燮曾等，先后疏荐有为才，至是始召对。有为极陈：“四夷交侵，覆亡无日，非维新变旧，不能自强。变法须统筹全局而行之，遍及用人行政。”上叹曰：“奈掣肘何？”有为曰：“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亦足救国。唯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并请下哀痛之诏，收拾人心。”上皆颔之。自辰入，至日久始退，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言事。旋召侍读杨锐、中

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有为连条议以进，于是诏定科举新章，罢《四书》文，改试策论，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兴农学，奖新书新器，改各省书院为学校，许士民上书言事，谕变法。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及各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并议开懋勤殿，定制度，改元易服，南巡迁都。未及行，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尽夺礼部尚书、侍郎职。旧臣疑惧，群起指责有为，御史文悌复痛劾之。上先命有为督办官报，复促出京。

上虽亲政，遇事仍承太后意旨，久感外侮，思变法图强，用有为言，三月维新，中外震仰。唯新进骤起，机事不密，遂致害成。时传将以兵围颐和园劫太后，人心惶惑。上硃谕锐等筹议调和，有“朕位且不能保”之语，语具《锐传》。于是太后复垂帘，尽罢新政。以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褫职逮捕。有为先走免，逮其弟广仁及杨锐等下狱，并处斩。复以有为大逆不道，构煽阴谋，颁硃谕宣示，并籍其家，悬赏拘捕。有为已星夜出都航海南下，英国兵舰迎至吴淞。时传上已幽废，且被杀，有为草遗言，誓以身殉，将蹈海。英人告以讹传，有为始脱走，亡命日本，流转南洋，遍游欧、美各国。所至以尊皇保国相号召，设会办报，集贤谋再举，屡遇艰险不少阻。尝结富有会，起事江汉，皆为官兵破获，诛其党。连诏大索，毁所著书，阅其报章者并罪之。初，太后议废帝，称病征医，久闭瀛台，旦夕不测。有为闻之，首发其谋，清议争阻，外人亦起责言，两江总督刘坤一言“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始罢废立。拳匪起，以灭洋人、

杀新党为号，太后思用以立威，遂肇大乱，凡与有为往还者，辄以康党得奇祸。

宣统三年，鄂变作，始开党禁，戊戌政变获咎者悉原之，于是有为出亡十余年矣，始谋归国。时民军决行共和，廷议主立宪，而有为创虚君共和之议，以“中国帝制行已数行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得国最正，历朝德泽沦浃人心，存帝号以统五族，弭乱息争，莫顺于此”。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徇民军请，决改共和，遂下逊位之诏。有为知空言不足挽阻，思结握兵柄者以自重，颇游说当局，数年无所就。丁巳，张勋复辟，以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勋议行君主立宪，有为仍主虚君共和。事变，有为避美国使馆，旋脱归上海。

甲子，移宫事起，修改优待条件，有为驰电以争，略曰：“优待条件，系大清皇帝与民国临时政府议定，永久有效，由英使保证，并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国，以昭大信，无异国际条约。令政府擅改条文，强令签认，复敢挟兵搜宫，侵犯皇帝，侮逐后妃，抄没宝器，不顾国信，仓卒要盟，则内而宪法，外而条约，皆可立废，尚能立国乎？皇上天下为公，中外共抑，岂屑与争，实为民国羞也！”明年，移跸天津，有为来觐谒，以进德、修业、亲贤、远佞为言。丁卯，有为年七十，赐“寿”，手疏泣谢，历叙恩遇及一生艰险状，悲愤动人。时有为怀今感旧，伤痛已甚，哭笑无端。自知将不起，遂草遗书，病卒于青岛。

有为天资瑰异，古今学术无所不通，坚于自信，每有创论，常开风气之先。初言改制，次论大同，谓太平世必可坐致，终悟天人一体之理。述作甚多，其著者有《孔子改制

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同书》、《物质救国论》、《电通》，及《康子内外篇》，《长兴学舍》、《万木草堂》、《天游庐讲学记》，各国游记，暨文诗集。

孙奇逢传

——《清史稿》卷四八〇

【说明】孙奇逢（1585—1675），字启泰，号钟元，学者称夏峰先生，两征不就又称孙征君，斋名岁寒居，直隶容城人。万历二十八年中举，和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交往。明末避乱入易州五公山隐居不仕。晚年移居苏门夏峰，与弟子躬耕自给。学宗陆九渊、王守仁，后亦服膺程颐、朱熹之学，和黄宗羲、李颺并称三大儒。孙奇逢能诗文，工书法，为学“以填独为宗，以休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著有《读易大旨》、《理学传心纂要》、《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历大案录》、《甲申大难录》、《岁寒居文集》、《孝友堂家乘》、《夏峰先生集》等。

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钟元，容城人。少年时为人洒脱不受世俗的拘束，喜爱非凡的操守，平日家居时操行诚笃完善。负有经世致用的学识，以为国家建功立业为己责。十七岁时，参加明朝万历二十八年的顺天乡试中举，因为接连遭到父母亲的丧事，在墓旁结庐守孝六年之久，他的孝行受到朝廷的表彰。孙奇逢和定兴的鹿善继讲学，同处一室默默相对，以

圣贤相互期许。

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窃夺了朝廷大政，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因为党祸被逮捕。孙奇逢、鹿善继过去和这三个人关系很好。这时鹿善继担任主事，辅佐大学士孙承宗料理军事，孙奇逢上书给孙承宗，晓以大义，请他急速上奏疏加以援救。孙承宗想趁入觐皇帝时当面陈奏，计策还没有想好，而左光斗等人已在太监的东厂监狱中被迫害致死。阉党诬陷左光斗等人贪赃上万，向他们的家属严加追逼。孙奇逢和鹿善继的父亲鹿正、新城的张果中召集士人百姓凑钱代为偿还，左光斗等人的遗骨最后才赖以送还，这就是世上所传说的范阳三烈士。台垣大臣和巡抚交相上奏章举荐孙奇逢，不被起用。孙承宗要上奏疏请求任命他为兵部职方赞助军事，之后尚书范景文聘请他为赞画，都被他推辞不肯就任。当时京师附近盗贼蜂起，孙奇逢带领全家到易州的五峰山中，跟从并保护他的学生和亲朋故旧有几百家之多。孙奇逢加以部署防守御敌，奏乐歌唱不停。顺治二年，国子监祭酒薛所蕴认为孙奇逢的学识操行可以比得上元朝的许衡、吴澄，推荐他任国子学的校长，孙奇逢以有病推辞。顺治七年，南迁辉县的苏门。顺治九年，工部郎马光裕赠给他夏峰的田地和庐舍，孙奇逢便率领子弟亲自耕种，对四方来向他求学的人也分给田地让他们耕种，他们所住的地方成了聚落。他住在夏峰二十五年，屡次受到朝廷征召而不去就任。

孙奇逢的学说，原来渊源于陆九渊、王阳明，以慎独为宗旨，以体究认识天理为大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他治身务求对自己刻苦严厉。对人不论贤明愚钝，如果向他问学，一

定用性格之所近加以开导，使他们对自己的日常行为严格要求。他和人交往不分界限，虽然是武人悍卒、农夫牧童，一定用诚意结交。因此名满天下而别人对他毫无嫉妒。著有《读易大旨》五卷。孙奇逢曾向雄县的李對学习《易经》，到年老时，才摘取它的大体要旨向学生传授，阐明其中的意义哲理，都切合人世上的各种事情。用《象》、《传》陈述一卦的要旨，从一卦陈述六十四卦的要义。他生平的治学，主要在于实用，所以所说的都关涉法守戒律。孙奇逢还著有《理学传心纂要》八卷，记录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作为直接道统的小传。

康熙十四年，孙奇逢去世，享年九十二岁。黄河南北的学者在百泉书院对他祭祀。道光八年，在文庙祭祀孔子。孙奇逢的学生很多，而新安的魏一鳌、清苑的高铈、范阳的耿阳是最早随从孙奇逢游学的。受业弟子的问答，以魏一鳌为最多。睢州的汤斌、登封的耿介都是做官到监司以后去孙奇逢那里受业的。

（何双生 译）

【原文】

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钟元，容城人。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年十七，举明万历二十八年顺天乡试。连丁父母忧，庐墓六年，旌表孝行。与定兴鹿善继讲学，一室默对，以圣贤相期。

天启时，逆阉魏忠贤穷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以党祸被逮。奇逢、善继故与三人友善。是时善继以主事赞大学士孙承宗军事。奇逢上书承宗，责以大义，请急疏救。承

宗欲假入观面陈，谋未就而光斗等已死厂狱。逆阉诬坐光斗等赃钅万，严追家属。奇逢与善继之父鹿正、新城张果中集士民醵金代输。光斗等卒赖以归骨，世所传范阳三烈士也。台垣及巡抚交章论荐，不起。孙承宗欲疏请以职方起赞军事，其后尚书范景文聘为赞尽，俱辞不就。时畿内贼盗继横，奇逢摧家入易州五峰山，门生亲故从而相保者数百家。奇逢为部署守御，弦歌不辍。顺治二年，祭酒薛所蕴以奇逢学行可比元许衡、吴澄，荐长成均，奇逢以病辞。七年，南徙辉县之苏门。九年，工部郎马光裕奉以复峰田庐，遂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屡徵不起。

奇逢之学，原本象山、阳明，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其治身务自刻厉。人无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其与人无町畦，虽武夫悍卒、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彤此名在天下而人无忌嫉。著《读易大旨》五卷。奇逢学《易》于雄县李𡔷，至年老，乃撮其体要以示门人。发明义理，切近人事。以《象》、《传》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义。其生平之学，主于实用，故所言皆关法戒。又著《理学传心纂要》八卷，录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朱子、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以为直接道统之传。

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河南北学者祀之百泉书院。道光八年，从祀文庙。奇逢弟子甚众，而新安魏一鳌、清苑高铈、范阳耿极拜座游最早。及门问答，一鳌为多。睢州汤斌、登封耿介皆仕至监司后往受业。

黄宗羲传

——《清史稿》卷四八〇

【说明】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学者称梨洲先生。其父黄尊素被太监魏忠贤陷害，他入都讼冤，用铁锥毙伤仇人。他历经明王朝灭亡、农民起义和清政权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有鉴于封建制度的腐朽，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抨击，提出若干具有进步性的唯物主义主张，曾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召募义兵，组织义军“世忠营”，在四明山结寨抗清，被鲁王任命为左副都御史。明亡以后隐居不出，著《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晚年时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在哲学思想上反对宋儒“理直气先”的主张。其他著作有《明儒学案》等，开浙东史学研究的先河。此外，他在算术、天文等自然科学以及乐律、经史百家的研究方面，也有较高的成就，著有《律吕新义》、《明文海》、《大统法辨》等。

黄宗羲字太冲，余姚人，是明朝御史黄尊素的长子。黄尊素是杨涟、左光斗志同道合的好友，因为弹劾太监魏忠贤

死在诏狱里，他的事迹见于《明史》。明思宗即位后，黄宗羲赴京师为父亲申冤。抵达时太监魏忠贤已被分尸处死，便写了奏疏请求皇帝处死曹钦程、李实。正逢朝廷审问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和他们到簿公堂，拿出衣袖中所藏的铁锥子刺许显纯，刺得遍体流血。又殴打崔应元，拔下崔的胡须带回家在黄尊素的牌位前作为祭奠，又追杀监狱中的守兵叶咨、颜文仲，因为黄尊素是死在两个守兵之手的缘故。当时曹钦程已经牵连到魏忠贤的逆案中，李实上疏申辩原先的奏疏并非出自自己手，暗地里送给黄宗羲三千两银子请求他不要出面对质，黄宗羲立即把这件事奏报朝廷，说：“李实直到现在还敢用金钱公开行贿，对他的申辩怎么能相信？”在和李实对簿公堂时又用铁锥子刺他。事情结案以后，他和受害各家的子弟到狱门前设祭台对亲人祭奠，痛哭声传到皇宫里。明思宗听到以后，叹息说：“忠臣孤子，朕的心中很可怜他们。”黄宗羲回家以后，更加奋力学习。痛恨科举之学禁锢人们的思想，考虑加以改变。不久以后，取出家里的藏书进行攻读，感到书不够，又到同乡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家里去抄书，又南方的有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他又在南雷建起“续钞堂”，以继承黄东发开创的传统。山阴的刘宗周在蕺山倡导道学，以黄尊素生前的遗命跟从刘宗周游学。而越中一带继承海门周氏学说的，援引儒学介入佛学，王守仁的学说遗风几乎被败坏。黄宗羲独自约集了六十多个同学竭力排斥这种学说，所以刘宗周的学生象祁彪佳、章潢等人都以名望道德自重，而御敌防侮的功劳却不及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弟黄宗炎、黄宗会都身负不凡的才干，黄宗羲亲自教育他们，有“东浙

三黄”之称。

崇祯十一年，南京有人写了《防乱揭》攻击阮大铖。东林党的子弟们推举无锡的顾杲为首，天启年间被太监魏忠贤陷害的各家推举黄宗羲为首。阮大铖对他们恨之入骨，突然行动，按照揭帖上一百四十人的姓名，要全部杀死。当时黄宗羲刚去朝廷上书，而灾祸发生，于是和顾杲一同被逮捕。他的母亲姚氏叹息说：“章的妻子、滂的母亲的遭遇，怎么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了？”朝廷的书疏还没有颁行，南京已被清兵攻破，黄宗羲才急匆匆地奔走回家。正巧孙嘉绩、熊汝霖侍奉鲁王朱以海在浙东监国，划浙江据守。黄宗羲纠集了家乡的几百个子弟跟随鲁王，号称“世忠营”。黄宗羲被授职职方郎，不久改任南明的御史，制成《监国鲁元年大统历》在浙东颁行。马士英逃奔到方国安的军营，众人都说他应当受诛，熊汝霖怕他会挟制方国安造成祸患，使用好话安慰他。黄宗羲说：“臣子们的力量不能杀死他！春秋时的孔子，怎么能加在陈恒身上，但是不能说他不当被处死。”熊汝霖向他表示道谢他又送书信给王之仁说：“诸公不想破釜沉舟和敌人决一死战，用意是在保守自己。小小的三处府库要供给十万之众的需求，一定无法长久支持，怎么能够防守？”听到这些话的人都同意他的说法却不能采用。

这时孙嘉绩把军营中的士兵交给黄宗羲，和王正中的军队合在一起共有三千人。王正中是王之仁的侄子，以忠义自我振奋。黄宗羲和他结下深交，使得王之仁不能干扰军事。黄宗羲于是渡海到潭山驻屯，从海路进入太湖，招收吴中地方的豪杰之士，直抵乍浦，约崇德的忠义之士孙诤等人做内应。

恰巧清朝的军队集中严防无法前进，而江上的黄宗羲的部队已经溃败，他只得进入四明山结成营寨自己固守，剩下的士兵还有五百人，在山里的杖锡寺驻兵。他穿了平常百姓的衣服出访监国的鲁王，告诫部下好好地和四明山的百姓结交。部下不能完全遵守他的节制，山里的老百姓惧怕兵祸，偷偷地放火焚烧黄宗羲的营寨，部将茅翰、汪涵被烧死。黄宗羲失去了归处，清朝追捕他的檄文一再下达，他只好携带子弟到浙江的剡中。黄宗羲听说鲁王到了海上，于是赶赴那里，被授予左副都御史。每天和吴钟峦在船里，正襟危坐地谈论学问，空暇时便注解《授时历》、《泰西历》和《回回历》三种历书。

黄宗羲跟随鲁王监国流亡，母亲还住在老家。清朝朝廷对被灭亡国家不顺从命令的遗臣，记录他们家中的人口上报。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匆忙向监国鲁王陈诉衷情，得到准许，便更名改姓从小路回到家里。这一年监国鲁王从健跳到了滬洲，又征召黄宗羲，充当冯京第的副手去日本乞求派援军。到达长崎，没有被接见，便赋诗《式微》用以感动部下的将士。从此开始东西迁徙，没有安定的住所。弟弟黄宗炎因为和冯京第有来往被判罪，受刑已经有相当日子，黄宗羲用计使他逃走。顺治十一年，张名振所派负有伺隙行事使命的使者到来，被捉住，又指名逮捕黄宗羲。顺治十三年，慈水寨的寨主沈尔绪起事，也以黄宗羲为首领。他所以没有死，都有上天的保佑，而黄宗羲自己并不惧怕。以后南明小朝廷在海上覆灭，黄宗羲完全绝望，便奉迎母亲返回故里，用全力著书立说，而四面八方向他请教学问的读书人也逐渐去他那里。

康熙十七年，朝廷下诏征求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寄诗给黄宗羲，敦促他上路就任，再次推辞得以避免。过了不久，叶方蔼奉诏同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打算征召黄宗羲作为顾问，地方的督抚大员以礼去聘请他，又被推辞。朝廷议论认为黄宗羲一定不会接受征召，请求下令浙江巡抚把黄宗羲著作中有关历史的部分抄写送到北京，他的儿子黄百家可以参预修史局的事情。徐乾学侍奉皇帝轮值讲学时，康熙问到前朝还有哪些遗贤，又以黄宗羲的名字回答，并且说：“他曾经被臣的弟弟徐元文上奏疏举荐，可惜因为年纪太老不能来。”康熙说：“可以召他到北京来，朕不交给他任务，就是他要回去，当即派遣官员送他回去。”徐乾学答复说黄宗羲病重年老不会有来意，康熙听后叹息不止，认为招致人才很难。黄宗羲虽然不肯来，而修史局凡有重要的问题，一定向他征求意见。《历志》出于吴任臣之手，修史总裁从千里之外将书稿送给他，请黄宗羲审订改正，而后定稿。曾经说到《宋史》另外列有《道学传》，是元朝学者的鄙陋所致，《明史》不应该按照《宋史》的旧例这样做。朱彝尊正好有这种主张，得到黄宗羲的书信以后拿给大家看，便删去《明史》中的《道学传》。黄宗羲去世时，终年八十六岁。

黄宗羲的学说，源于刘宗周的戡山学派，所接受的是诚意慎独的学说，严密平允实在。黄宗羲曾经认为明朝人讲学，沿袭语录的糟粕部分，不以《六经》为基础，把书束之于高阁而只是从事于交游叙谈，所以请问学业的人必须先深入研究经籍，经学是用以治理世事的。如果不想成为拘泥保守的儒者，必须在读经时兼读史书。所读史书不多，无从证明事

理的变化；读书多而不从思想的条理上去探求，就只能是平常的学问。所以对上下古今、各家之说要深入研究融会贯通，从天官书、地理志以及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教义，精心研究。黄宗羲所著的有《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二卷。他的文集有《南雷文案》和《南雷诗案》。现存的共有《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约》四卷。他还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书中叙述明代所有讲学的儒学人物的源流派别、分合得失很详细，所编著的《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编纂过程中阅读了明朝人的文集二千多家，自己说它和《十朝国史》互为首尾。又著有《深衣考》一卷、《今水经》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历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学案》二卷，辑录《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访录》一卷，都是有关治理世事的重大政事。顾炎武看到后感叹说：“象夏周商三代那样政治清明安定可望得到恢复了！”关于天文的著作有《大统法辨》四卷、《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割圜八线解》一卷、《授时法假如》一卷、《圜解》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以后梅文鼎按《周髀算经》谈到天文，当世都感到惊奇认为它是不传的秘密，而不知道实际上是黄宗羲的首创。黄宗羲在晚年时又编辑《宋元学案》，合上《明儒学案》，记录了七百年间儒学人物不同学派的师承源流。宣统元年，黄宗羲被送进文庙陪祭孔子。（何双生 译）

【原文】

黄宗羲，字太冲，余姚人，明御史黄尊素长子。尊素为杨、左同志，以劾魏阉死诏狱，事具明史。思宗即位，宗羲

入都论冤。至则逆阉已僂，即具疏请诛曹钦程、李实。会廷鞫许显纯、崔应元，宗羲封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又殴应元，拔其须归祭尊素神主前；又追杀牢卒叶咨、颜文仲，盖尊素绝命于二卒手也。时钦程已入逆案，实疏辨原疏非己出，阴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质，宗羲立奏之，谓：“实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辨岂足信？”于对簿时复以锥锥之。狱竟，偕诸家子弟设祭狱门，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归，益肆力于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废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废之绪。山阴刘宗周倡道蕺山，以忠端遗命从之游，而越中承海门周氏之绪，援儒入释，姚江之绪几坏。宗羲独约同学六十余人力排其说。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诸子皆以名德重，而御侮之功莫如宗羲。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自教之，有“东浙三黄”之目。

戊寅，南都作防乱揭攻阮大铖。东林子弟推无锡顾杲居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宗羲居首。大铖恨之刺骨，骤起，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尽杀之。时宗羲方上书阙下而祸作，遂与杲并逮。母氏姚叹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驾帖未行，南都已破，宗羲踉跄归。会孙嘉绩、熊汝霖奉鲁王监国，尽江而守。宗羲纠里中子弟数百人从之，号世忠营。授职方郎，寻改御史，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马士英奔方国安营，众方其当诛，熊汝霖恐其挟国安为患也，好言慰之。宗羲曰：“诸臣力不能杀耳！春秋之孔子，岂能加于陈恆，但不谓其不当诛也。”汝霖谢焉。又遗书王之仁曰：

“诸公不沉舟决战，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必不久支，何守之能为？”闻者皆跂其言而不能用。

至是孙嘉绩以营卒付宗羲，与王正中合军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从子也，以忠义自夺。宗羲深结之，使之仁不得挠军事。遂渡海屯潭山，由海道入太湖，招吴中豪杰，直抵乍浦，约崇德义士孙诜等内应。会清师纂严不得前，而江上已溃。宗羲入四明山结寨自固，余兵尚五百人，驻兵杖锡寺。微服出访监国，戒部下善与山民结。部下不尽遵节制，山民畏祸，潜笈其寨，部将茅翰、汪涵死之。宗羲无所归，捕檄累下，攜子弟入剡中。闻鲁王在海上，仍赴之，授左副都御史。日与吴钟峦坐舟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

宗羲之从亡也，母氏尚居故里。清廷以胜国遗臣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宗羲闻之，亟陈情监国，得请，遂变姓名间行归家。是年监国由健跳至滃洲，复召之，副冯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自是东西迁徙无宁居。弟宗炎坐与冯京第交通，刑有日矣，宗羲以计脱之。甲午，张名振间使至，被执，又名捕宗羲。丙申，慈水寨主沈尔绪祸作，亦以宗义为首。其得不死，皆有天幸，而宗羲不慑也。其后海上倾覆，宗羲无复望，乃奉母返里门，毕力著述，而四方请业之士渐至矣。

戊午，诏徵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寓以诗，敦促就道，再辞以免。未几，方蔼奉诏同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将徵之备顾问，督抚以礼来聘，又辞之。朝论必不可致，请敕下浙抚钞其所著书关史事者送入京，其子百家得预参史

局事。徐乾学侍直，上访及遗献，复以宗义对，且言：“曾经臣弟元文疏荐，惜老不能来。”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乾学对以笃老无来意，上叹息不置，以为人材之难。宗羲虽不赴徵车，而史局大议必咨之。《历志》出吴任臣之手，总裁千里遗书，乞审正而后定。尝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朱彝尊适有此议，得宗义书示众，遂去之。卒，年八十六。

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所著《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二卷。文集则有《南雷文案》、《诗案》。今共存《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约》四卷。又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叙述明代讲学诸儒流派分合得失颇详，《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阅明人文集二千余家，自言与《十朝国史》相首尾。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经》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历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学案》二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访录》一卷，皆经世大政。顾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天文则有《大统法辨》四卷，《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线解》一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呈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后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

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晚年，又辑宋元学案，合之明儒学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门户。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李 颺 传

《清史稿》卷四八〇

【说明】李颺（公元 1627—1705 年），字中孚，号二曲，陕西盩厔人。自幼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先在江南讲学，后主讲关中书院。他和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屡拒清政府博学鸿词的征召。学宗朱熹、陆九渊，曾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的问题。他重视实学，把“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等实用学问。著作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曾进呈康熙，得到嘉奖。

李颺字中孚，盩厔人，又字二曲。所谓二曲，水曲叫盩，山曲叫厔。李颺身为平民而安于贫困，在关中提倡理学，关中的读书人对他都很尊崇。他的父亲李可从，曾经做过明朝的材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入寇郿西，陕西巡抚汪乔年总督军事事务，李可从曾跟随汪乔年出征讨伐张献忠。临出发前，李可从拔出一颗牙齿交给李颺的母亲说：“假如不能得胜，我就葬身在战场上。请你好好教育我的儿子。”于是出发。军队打了败仗，李可从牺牲。李颺的母亲将这颗牙齿埋在地下，叫做“齿冢”。当时李颺才十六岁，母亲彭氏，每天对他讲忠

孝节义的道理加以督管，李颺服侍母亲也很孝顺，尽管饥寒清苦，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但是他能超越世俗的一般人，以提倡阐明关学为自己的责任。有人向他馈赠东西，虽然多次送来也不肯接受。有人对他说：“来往交道接受礼物，孟子也不推辞。”李颺却说：“我们这些人学不到孟子的地方有上百处，就这一件事不遵守孟子的家法，自然没有害处。”

起先，李颺听到父亲牺牲的消息，准备去襄城寻找遗骨，因为母亲年老一天不能离开，便作罢。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为了遵守丧礼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之后步行去襄城，寻觅父亲的骸骨，没有找到，穿了用粗麻布制成的丧服昼夜痛哭。知县张允中为他的父亲建立祭祀的祠堂，并在战场上造了墓冢，名叫“义林”。常州知府访钟麟曾经拜李颺为师，告诉他祠堂不是能很快竣工的，请他南下造访道南书院，并且在那里讲授学问以抚慰学者们对他的仰望，李颺于是去南方，凡是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时，来听讲的学者云集一起。既而翻然悔悟说：“我真是不孝顺！这次来是因为什么事情，却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讲学？”便恪守戒律的操作去襄城。常州的人士在他离开后很想念敬慕他，在延陵书院画了李颺的肖象。李颺到了襄城，恰好祠堂建成，便痛哭祭祀招他父亲的亡魂，取了坟墓上的泥土向西回家，将它放在祖坟一起，象刚遇到丧事那样穿上孝服。

康熙十八年，李颺被人举荐为博学鸿儒，他自称患有重病，请人用床板抬着自己到省里，不饮水浆，才获得准许告归。从此便闭门不出，在土室里生活作息，只有昆山顾炎武来家时才款待他。康熙四十二年，清圣祖去西部地方巡视，召

李颺来见，当时李颺已经很衰老，派儿子李慎言到皇帝临时居留的地方陈诉实情，把自己所著的《四书反身录》、《二曲集》进呈给皇帝。清圣祖特别赏赐御笔写的“操志高节”给他表示奖励。李颺说：“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立言垂训，形成后来的《四书》，为了使后世的学者做到身体力行。如果能充实完善自己就上天的福德，如果能做到它就是王者的正道，体用合一，对世间就有所帮助，否则靠这些作为途径以求取官职，对世间就是毫无帮助。这难道是圣贤立言的初衷、国家期望的本意吗？”家居时常常教育别人，专门以要求自身付诸实践为自己的责职，学生们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一共有七卷。这时容城孙奇逢的学说在北方盛行，余姚黄宗羲的学说在南方盛行，和李颺的学说鼎足而立称为三大儒。李颺晚年住在富平，关中地方的儒士都称道“三李”。三李，就是李颺和富平的李因笃、郿县的李柏。

（何双生 译）

【原文】

李颺，字中孚，盩厔人。又字二曲，二曲者，水曲曰盩，山曲曰厔也。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父可从，为明材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寇郿西，巡抚汪乔年总督军务，可从随征讨贼。临行，挾一齿与颺母曰：“如不捷，吾当委骨沙场。子善教吾儿矣。”遂行。兵败，死之。颺母葬其齿，曰：“齿塚。”时颺年十六，母彭氏，日言忠孝节义以督之，颺亦事母孝。铠寒清苦，无所凭藉，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有馈遗者，虽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礼，孟子不却。”颺曰：“我辈百不能学孟子，即此一事不守

孟子家法，正自无害。”

先是颺闻父丧，欲之襄城求遗骸，以母老不可一日离，乃止。既丁母忧，庐墓三年，乃徙步之襄城，觅遗骸，不得，服斩衰昼夜哭。知县张允中为其父立祠，且造塚于战场，名之曰“义林”。常州知府骆钟麟尝师事颺，谓祠未能旦夕竣，请南下谒道南书院，且讲学以慰学者之望，颺赴之，凡讲于无锡，于江阴，于靖江、宜兴，所至学者云集。既而幡悔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喋喋于此？”即戒行赴襄城。常州人士思慕之，为肖像于延陵书院。颺既至襄城，适祠成，乃哭祭招魂，取塚土西归附诸墓，持服如初丧。

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称疾笃，昇状至省，水浆不入口，乃得予假。自是闭关，宴息土室，惟昆山顾炎武至则款之。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召颺见，时颺已衰老，遣子慎言诣行在陈情，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奏进。上特赐御书“操志高洁”以奖之。颺谓：“孔、曾、思、孟，立言垂训，以成《四书》，盖欲学者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于世。否则假途干进，于世无补，夫岂圣贤立言之初心，国家期望之本意耶？”居恒教人，一以反身实践为事，门人录之，为七卷。是时容城孙奇逢之学盛于北，余姚黄宗羲之学盛于南，与颺鼎足称三大儒。晚年寓富平，关中儒者咸称“三李”。三李者，颺及富平李因笃、郾李柏也。

颜元传

——《清史稿》卷四八〇

【说明】颜元（公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初好陆九渊、王守仁，后崇程、朱理学，再后转向批判程、朱。晚年主讲于漳南书院，设立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和学生李塨倡导注重实学、反对死读书的学风，世称颜李学派。他抨击宋儒“读书静坐”和空谈“心性命理”之学，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兼并，主张垦荒、均田、兴水利。著作有《习斋记余》、《四书正误》、《四存编》等。

颜元字易直，博野人。明朝末年，他的父亲在辽东戍守，死在关外。颜元穷得没有立锥之地，千方百计找到父亲的遗骨回乡埋葬，世上称他为孝子。居丧期间，遵守朱氏的《家礼》顺从小心。古代的《仪礼》中，《丧服》说“初丧时，早晨一溢米，傍晚一溢米，食用时要不足此数。”《家礼》中删去了最后一句，颜元遵守这一礼制，过了早晨和傍晚就不敢进食，而正值早晨和傍晚时，遇到吊丧的人来，又不能进食，病得几乎死去。又《丧服传》中说：“已经过了父母死后一周

年的祭礼，治丧者可以不再住在中门外的房屋，开始食用菜蔬果品。吃饭用素食，不需按时哀哭。”《家礼》改成“过了父母死后一周年的祭礼，停止早晨和傍晚时的哀哭，只是在初一、十五没有除去丧服的人在一起哀哭，凡是吊丧的人来到时都克制不哭。”颜元也遵守这一礼制。既而感到它过份压抑遗属的哀痛之情，便用古代的《丧礼》加以校对，才发现《家礼》不对。颜元因而感叹先王制定礼仪，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后来的儒者缺少道德声望和身分地位，做不到这些。颜元于是写出《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篇以树立教化，把自己的住处命名为“习斋”。

肥乡在所漳南书院，当地人郝文灿请颜元去书院教授。书院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跟随颜元游学的有几十人。正逢天降大雨，漳水漫出河道，书院的院墙讲堂房屋全部被水淹没，人们几乎绝迹。颜元叹息说：“老天不让我推行自己的主张！”便辞掉教职回老家。又过了八年便去世，终年七十岁。他的学生李塉、王源编了颜元的《年谱》二卷，钟铨辑录了《言行录》二卷、《辟异录》二卷。

（何双生 译）

【原文】

颜元，字易直，博野人。明末，父戍辽东，歿于关外。元贫无立锥，百计觅骨归葬，世称孝子。居丧，守朱氏《家礼》惟谨。古《礼》，“初丧，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家礼》删去“无算”句，元遵之。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几殆。又《丧服传》：“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食，哭无时。”《家礼》改为“练后，止

朝夕哭，惟朔望未除者会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元亦遵之。既觉其过抑情，校以古《丧礼》非是。因叹先生制礼，尽人之性，后儒无德无位，不可作也。于是著《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以立教。名其居曰习齐。

肥乡漳南书院，邑人郝文燦请元往教。有文事、武备、经史、蕊能等科，从游者数十人。会天大雨，漳水溢，墙垣堂舍悉没，人迹殆绝。元叹曰：“天下欲行吾道也！”乃辞归。后八年而卒，年七十。门人李塉、王源编元年谱二卷，钟铍辑言行录二卷，《辟异录》二卷。

龚自珍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说明】龚自珍（1792～1841），清代思想家、文学家。一名巩祚，字璦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

龚自珍学务博览，在哲学与经学上颇有成就，其文学创作开近代文学新篇章。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用，所作诗文，极力提倡“改图”、“更法”，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洋溢着爱国热情。其散文奥博纵横，自成一家。诗歌形式，风格多样，想象丰富，语言清奇多采，有“龚派”之称。也工词。有《龚自珍全集》。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璦人，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父丽正，进士，曾任苏松兵备道，是段玉裁的女婿，能继承他岳父的学术事业。巩祚十二岁时段玉裁就教他《说文》部目的知识。巩祚才气横溢，他的举动不守常规，经常给人近于奇特古怪的感觉，而解说经书却必定要推究并依据字的本义，这是听从外祖父最初对他教导的结果。他初由举人引用成例做了内阁中书。道光年间，考取进士，继续担任旧职。后被

推荐提升为宗人府主事，改任礼部主事。后请求辞归故里，于是不再从政作官。

在作中书官的任上，曾向总裁上书，论述西北塞外部落的源流以及山川形势，订正《一统志》的疏漏，共五千字。后又上书论述礼部四司政体应加改革的道理，也长达三千字。文字桀骜锋利，取法诸子百家而自成一家。所到之处，总是让人吃惊，名声很大，只是仕途坎坷罢了。五十岁时在丹阳书院病故。著作有《尚书序大义》、《大誓问答》、《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

（邱文龙 译）

【原文】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璚人，仁和人。父丽正，进士，官苏松兵备道，为段玉裁婿，能传其学。巩祚十二岁，玉裁授以《说文》部目。巩祚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倜傥，而说经必原本字训，由始教也。初由举人援例为中书。道光时成进士，归本班。洊擢宗人府主事，改礼部。谒告归，遂不出。

官中书时，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凡五千言。后复上书论礼部四司政体宜沿革者，亦三千言。其文字桀骜，出入诸子百家，自成学派。所至必惊众，名声藉藉，顾仕宦不达。年五十，卒于丹阳书院。著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

魏源传

——《清史稿》卷四八六

【说明】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4年中进士，以知州分发江苏，历任东台、兴化县知县、高邮州知州。太平军起义，因延误驿极被革职，后来恢复原官，不久病死杭州。他和龚自珍友善，同属今文经学派，主张经世致用，反对专作训诂考据，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古文经学派。主要著作有《海国图志》、《古微党诗文集》、《元史新编》、《圣武记》等。1826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命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所选都是在鸦片战争以前清代有关政治、社会和学术思想等方面的论述，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并筹议各省的漕粮、水利等问题。在《海国图志》中，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扩张殖民地、剥削殖民地人民的事实有所觉察。他代表开明的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师夷以制夷”，这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二年，参加顺天乡试考中举人。清宣宗看了他的试卷，挥笔加以褒奖赏赐，名声因此更大。魏源在参加举人会试中没有考中，主持考试的房考官

刘逢禄赋诗《两生行》对他表示惋惜。所说的“两生”，指的是魏源和龚巩祚。这两个人都由于怀有才学而沾沾自喜，名声也不相上下。魏源出钱捐班在两江总督幕府中任职，到道光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发往江苏担任知州，代理兴化县县令。道光二十八年，发生大水灾，督守黄河的河帅将要开启闸门洩洪，魏源据理力争没有结果，便亲自去总督衙门击登闻鼓上诉，总督陆建瀛急速前往勘察实情得以避免，当地的士民百姓因而感激魏源的恩德。补授高邮县令，因为犯迟误驿站邮件的传递的过失被罢官，副都御史袁甲三上奏恢复他的官职。咸丰六年，魏源去世。

魏源意气锋锐凌厉有雄才大略，熟悉朝廷的典章和传统的学术文化，谈论到古今的成功失败利弊病，学术的流派区别，反复论证头头是道，使四座的听者都为之折服。魏源曾经认为黄河应当改为恢复向北的旧河道，到了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黄河果然向北流入故道。他又写成《筹鹺篇》呈上总督陶澍，说：“自古以来有查缉盐场走私的法令，而没有查缉盐场邻近地区贩私盐的法令。邻近地区贩卖私盐只有降低官盐的售价予以抵制而已。不裁减费用怎能降低成本减少盐价？不改变法度怎能裁减费用？”只由于国家太平已久，阻挠魏源主张的人很多。等到汉口大火灾以后，陆建瀛才极力主张加以推行。

魏源因为清朝的版图广大，武功确实超越前代各朝，因此借阅了史馆中的官书，参考了士大夫的个人著作，将材料加以排比整理，写成《圣武记》，计四十多万字。他晚年时遭遇到外国入侵的变故，认为筹办涉及外国的事务一定要了解

外国的情况，又根据史书的志传和林则徐所组织翻译的关于西方各国的《四州志》等，写成《海国图志》一百卷。其他的著作有《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

（何双生 译）

【原文】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宣宗阅其试卷，挥翰褒赏，名藉甚。会试落第，房考刘逢禄赋《两生行》惜之。两生者，谓源及龚巩祚。两人皆负才自喜，名亦相埒。源入赀为中书，至二十四年成进士。以知州废江苏，权兴化。二十八年，大水，河帅将启闸。源力争不能得，则亲击鼓制府，总督陆建瀛驰勘得免，士民德之。补高邮，坐迟误驿褫免。副都御史袁甲三奏复其官。咸丰六年，卒。

源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尝谓河宜改复北行故道，至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河果北流。又作《筹鹾篇》上总督陶澍，谓：“自古有缉场私之法，无缉邻私之法。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非裁费曷以轻本减价？非变法曷以裁费？”顾承平久，挠之者众。迨汉口火灾后，陆建瀛始力主行之。

源以我朝幅员广，武功实迈前古，因借观史馆官书，参以士大夫私著，排比经纬，成《圣武记》四十余万言。晚曹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复据史志及林则徐所译西夷《四州志》等，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他所著有《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

方以智传

——《清史稿》卷五〇〇

【说明】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崇祯十三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明亡后，他南走五岭，改名吴石公，别号燕道人，以卖药为生。桂王在肇庆即位，授詹事府左中允，充经筵讲官，受太监王刊排挤，辞官隐居平乐的平西村。平乐被清兵攻陷，方以智去梧州出家为僧，改名大智，号无可，又称弘智、药地、浮庭等。方以智曾和陈贞慧、吴应箕等人领导了“复社”的政治活动，是明亡后具有民族气节的遗民，也是当时卓越的自然科学者和反神学、反宋明道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文学、经学、史学、天文、地理、物理、医药、书画、音乐均有造诣。著作有《物理小识》、《通雅》、《药地炮庄》、《东西均》、《易余》等。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亲方孔炤，是明朝的湖广巡抚，被杨嗣昌弹劾被捕入狱，方以智怀藏用鲜血写成的奏疏上朝申诉父亲的冤屈，被释放，这件事在《明史》中有记载。方以智是崇祯庚辰（十三年）的进士，被授为检讨官职。

正逢李自成攻破潼关，范景文上奏疏推荐方以智，崇祯帝在德政殿召见方以智奏对，他的回答能切中机密的要政，皇帝用手敲着小桌子称赞他说得很对。但方以智因为违逆了主持政务者的旨意，最后没有被重用。明朝的京城被攻陷后，方以智哭着去皇帝灵柩的临时停放处，到了东华门，被起义军捉住，受到刑罚的折磨，脚上的髌骨都被打得露了出来，但是不肯屈服。

起义军失败，向南逃奔，正值马士英、阮大铖祸害朝政，方以智怀着深仇大怨要杀死他们，便流转至五岭以南一带。他自己写了《序篇》，前面叙述了祖先的德业，后面表达了自己怀有的志向。他改姓换名，在街市上卖药。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王，因为方以智有推戴他为桂王的功劳，提升他为右中允。他扈从桂王到了梧州，被提升为侍讲学士，授职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不久被罢掉相职。方以智坚持称自己有病，屡次受到征召都不肯出来任职。曾经说：“我如果回去就辜负了君主，如果外出不归就辜负了双亲，我是不是只好出家当和尚？”

方以智行到平乐，被起义军队伍捉住，起义军的将帅要他投降，在左边放了官服，右边放了刀子，让他自己选择，方以智便走到右边，将帅对他更加礼遇尊敬，这才听凭他出家做和尚。方以智改名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方以智去吉安，参拜文天祥的坟墓，在途中去世，正是他闭门打坐不跟别人来往的时候。他的朋友钱澄之，也在金陵客居，遇到以前是明朝的宦官现在做和尚的，问起方以智，钱澄之说：“您难道曾经认识他？”答道：“不是。以前我侍奉已故的

皇上，有一天退朝时，皇上忽然叹道：‘必须在孝子中才能求得忠臣！’并一而再地这样说。我跪在皇上面前请他说这是什么缘故，皇上说：‘朕早上去听经筵讲解，有个讲官的父亲在河南任巡抚，因为犯了失去机宜的罪名该当斩首，而这个讲官却仍旧用香料薰衣服，修饰容貌的举止象平时一样。象这样的不孝子，能为朕尽忠吗？听说新进士方以智，他的父亲也在监狱里，他每天呼号哭泣，写了奏疏来求救，这也是做儿子的。’说完后又再次叹息，不久就将方孔炤释放，并任职为河南巡抚，朝廷外的人也知道这个缘故吗？”钱澄之把这个人说的话告诉方以智，方以智悲痛得伏在地上大哭失声。

方以智生来就有特殊的禀赋，十五岁时，对群经、诸子、各史，大都能够背诵。博学涉猎多能融会贯通，从天文、地理、礼乐、律历、数术、音乐、文字、书画、医药、技击之类，都能考证它们的源流，剖析其中的旨趣。他的著作有几十万字，只有《通雅》、《物理小识》二种书在世上盛行。

（何双生 译）

【原文】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炤，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事具《明史》。以智，崇祯庚辰进士，授检讨。会李自成破潼关，范景文疏荐以智，召封德政殿，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以忤执政意，不果用。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髀骨见，不屈。

贼败，南奔，值马、阮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丧。自作《序篇》，上述祖德，下表隐志。变姓名，买药市中。桂

王称号肇庆，以与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罢相。固称疾，屡诏不起。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缙乎？”

行至平乐，被縶。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更名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其闭关高座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施复叹，俄释孔炤，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以智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力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惟《通雅》、《物理小识》二书盛行于世。

傅山传

——《清史稿》卷五〇一

【说明】傅山（公元1602—1683年），字青竹，改字青主，别号很多，如公之他、朱衣道人、啬庐等，阳曲（今山西太原市属县）人。明末，因营救袁继咸，名声动天下。明亡后，坚不出仕，朱衣道冠，居土窑。康熙十年举博学鸿词，强征至京，傅山以死相拒，放还。诗文书画都很有名，他的书法奔放不羁，流畅自然，尤以草书见长，他主张“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他的书风正是如此。又擅长医学，长于妇科。著有《霜红龕集》十二卷。

傅山，字青主，是山西阳曲县人。他六岁时只吃黄精草，不吃粮食，强迫他吃，他才吃饭。他读书过目就能背诵。明朝末年，天下将有大战乱，那些名为士大夫的人，大都迂腐不堪，傅山为此很气愤，于是他含辛茹苦坚持气节，绝不屈节媚时。提学使袁继咸被巡按张孙振诬告，张孙振是宦官魏忠贤的党羽。傅山约同学曹良直等人去通政使衙门，三次上书替袁继咸申诉，巡抚吴生也认为袁继咸无罪，于是得以昭雪。傅山从此名闻天下。甲申年明朝灭亡后，他改为道士装，

身穿大红道袍，住在土窑洞里，侍奉母亲。袁继咸在九江被俘，押往北京，他把在患难中作的诗寄给傅山，信中说：“我不敢有愧于我的朋友！”傅山看了来信失声痛哭，说道：“我也不敢辜负大人的期望！”

顺治十一年，傅山因河南案件的牵连被捕，他坚贞不屈，绝食九天，几乎饿死。他的弟子中有人想出绝妙的计策营救他，因而得以免祸。但傅山非常悔恨，以为不如早些死了为好，因而他整日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一天也不停止，盼望恢复明朝。等到天下大局已定，他才出门和人交往。

康熙十七年，朝廷举行博学鸿词考试，给事中李宗孔荐举他应试，他坚决推辞。有关部门用强制的手段，让夫役们把他捆在床上，抬着他进京。来到离京城二十里的地方，他誓死不入城。大学士冯溥首先来看望他，公卿大臣全都来到，傅山躺在床上，也不施迎送礼。魏象枢向皇帝上奏，说傅山年老有病，皇帝下令可免他考试，给他加内阁中书衔，以示恩宠。冯溥强迫他进宫谢恩，派人抬着他去，傅山看到大清门，止不住泪流满面，昏倒在地。魏象枢上前说：“好了，好了，这就是谢恩了。”第二天就要回乡，大学士冯溥以下的官员都出城为他送行。傅山感叹地说：“从今以后可以摆脱干扰没有牵累了！”接着他又说：“如果后世人象称赞许衡、刘因那样称赞我，我死不瞑目！”听到的人，都啧啧咋舌，大惊失色。傅山回到家，地方大官都到他家去看望。傅山无论冬夏，都穿一身布衣，自称为“民”。有人说：“你不是内阁中书舍人吗？”他不加理睬。他死后，用大红衣、黄冠来殡敛。

傅山擅长书法绘画，他说：“写字要宁拙勿巧，宁丑勿媚，

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人们认为这话不只是在论书法。他的诗文，起初学韩愈，文风倔强，自鸣得意，后来的文章则是信笔写来，民谣俗语，都从笔下流出，但他不希望以此名家。著有《霜红龕集》十二卷。他的儿子傅眉，比他先死，傅眉的诗作也附在《霜红龕集》之后。

傅眉，字寿髦。他每天出去打柴时，把书箱放在担子上，休息时就取出诵读。傅山常去各地卖药，他和傅眉共推一辆车，晚上住在旅店里，灯下教儿子读经书，傅眉也刻苦力学，能继承他父亲的学问和志向。他和人谈起中原文献，滔滔不绝。傅山喜欢喝苦酒，自称老蘗禅，傅眉则自称小蘗禅。

（魏连科 译）

【原文】

傅山，字青主，阳曲人。六岁，啖黄精，不谷食，强之，乃饭。读书过目成诵。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嬖嬖。提学袁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阉党也。山约同学曹良直等诣通政使，三上书讼之，巡抚吴甡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闻天下。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继咸自九江执归燕邸，以难中诗遗山，且曰：“不敢愧友生也！”山省书，恸哭，曰：“呜呼！吾亦安敢负公哉！”

顺治十一年，以河南狱牵连被逮，抗词不屈，绝粮九日，几死。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而其仰视天、俯视地者，未尝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与人接。

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

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冯溥强其入谢，使人舁以入，望见大清门，泪涔涔下，仆于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翼日归，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叹曰：“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既而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庐请谒。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卒，以朱衣、黄冠敛。

山工书画，谓：“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诗文初学韩昌黎，倔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不愿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红龛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诗亦附焉。

眉，字寿髦。每日出樵，置书担上，休则把读。山常卖药四方，与眉共挽一车，暮抵逆旅，篝灯课经，力学，继父志。与客读中州文献，滔滔不尽。山喜苦酒，自称老蘗禅，眉乃称小蘗禅。